

André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根据Éditions Gallimard 1970年版译出

人的命运

---

作者：〔法〕安德烈·马尔罗

译者：李忆民 陈积盛

责任编辑：那 耘

责任校对：罗静文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通县教育局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26千

印数：0001—19,000册

版次：198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67-2/I.66

统一书号：10248·0241

定价：2.60元

---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疼痛（他简直不敢想象这就是自己的胳膊）以及这样的想法——睡觉的人一旦醒来，自己必定要吃苦头——使他解脱了片刻；即使吃苦头也比这使人发疯的气氛好得多。他走近一看，确实是两小时以前在明亮的灯光下看到的那个人。在这平静的夜晚，那只几乎触到陈的裤子的脚象把钥匙似的突然转动了一下，随即又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上。或许睡觉的人已感觉到有人，但这种感觉又不足以使他醒过来……陈打了个寒战：有个虫子正在他的皮肤上爬动——不，是胳膊在一滴一滴地流着血。而且，他一直都有那种晕船的感觉。

弹指间，此人便会一命呜呼。杀死他是不成问题的；但要一下子刺中他的要害却是不大可能的。然而，必须刺得准才行。睡觉的人仰面朝天躺在一张欧式床的中间，身上只穿了一条短裤，可是在厚厚的脂肪下面，很难分辨出肋骨来。陈只好以深色的乳头为标记。他深知从上往下扎有多么困难，因此他把匕首的锋刃朝上拿着。可是左侧的乳房离他最远，这样一来，他扎的时候，就得透过蚊帐布，伸长手臂，做一个类似挥拳侧击的曲线动作。于是他变换了匕首的角度：锋刃成水平状。要想刺中这么个一动不动的躯体，同扎一具僵尸一样困难，原因也许都是一样的。好象是由于他想到了“尸体”这个概念，那躯体竟发出了一阵嘶哑的喘气声。陈甚至连退都退不回来了，他的腿和胳膊完全瘫软了。然而，喘气声变得规律起来：那个人不再喘粗气，而打起呼噜来了。他又有了活力，尽管还很脆弱；与此同时，陈却感到自己受了嘲弄。那躯体缓缓地向右侧滑过来。看来就要醒了！陈照准一块肥膘猛刺过去，只听蚊帐布撕裂的声音与刀

进肉沉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那躯体不再滑动了。通过匕首的握柄，他感觉到，钢丝床绷已将那个躯体向他这边反弹过来，于是他死命地挺直胳膊按着它：它的双腿一齐向胸前收缩，象是被捆绑着一般，随即又一下子伸得直挺挺的。必须再给它一击方行，可是怎么才能把匕首拔出来呢？那躯体始终侧卧着，并不安稳，而且由于痉挛还抖动了几下。尽管如此，陈依然觉得，他已用这把匕首将它牢牢地固定在床上，因为他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上面了。他从蚊帐的大窟窿看那个躯体看得十分清楚：眼睛睁开了——难道他会苏醒过来不成？——原来已经翻白眼了。在这微弱的灯光下，呈黑颜色的血液开始沿着匕首往外冒了。整个躯体随时都有向右或向左倾倒的可能，看样子还没咽气。陈不能松开匕首。通过匕首，通过他僵直的胳膊以及他疼痛的肩膀，在躯体和他之间，产生了一阵焦虑不安的感觉，这感觉扩展到他胸膛的深处，直至他那处于痉挛状态的的心脏——在这间屋子里，唯有它还在跳动。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觉得从他左臂上继续往下流的血是躺着的那个人的；什么新的情况也没有发生，但他突然断定那个人确实是死了。在这静止不动、模模糊糊的灯光下，在这房间的一片孤寂气氛之中，他屏住呼吸，继续按着这个侧卧着的躯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曾进行过搏斗，甚至连撕裂的蚊帐布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好象原来就是两扇似的；这里有的只是一片寂静，而紧握匕首、与世隔绝的陈则陷入了极度的狂热之中。他的手指攥得越来越紧，但手臂肌肉却越来越松弛，整个手臂如同一根绳索，不停地抖动起来。这不是胆怯，而是一种自童年后为他所淡忘了的

既残酷又庄严的焦虑不安：他独自一人同死亡在一起，独自一人呆在一个渺无人迹的所在，虽被恐怖和血腥味儿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依然无动于衷。

他终于把手松开了。那躯体缓缓地俯卧下去，匕首把柄斜歪着。床单上一个黑点开始向四周蔓延，如同一个生物体在不断地长大。在这黑点的旁边，出现了两只尖耳朵的影子，它象黑点一样也在不断地变大。

房门离得很近，阳台则较远，影子是从阳台那边来的。尽管陈不信鬼神，但也吓得浑身瘫软，连身子都转不过来了。“喵——”的一声猫叫，把他吓了一跳。稍稍平静了一下，他才定睛看了看：原来一只野猫从窗口悄悄地溜进屋里，两眼正直勾勾地瞪着他。随着影子往前移动，陈的肝火也越来越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得闯入这个他已投身进来的残暴地区，因为不论什么，只要看见他手持匕首，都有碍于他重返人间。于是他打开剃刀，向前跨了一步，野猫便从阳台上逃走了。陈面对着上海城。

被他的焦灼不安所震撼的夜晚，如同充满火星儿的浓烟，沸腾翻滚。随着他的呼吸越来越均匀，夜已平静下来，处于永恒运动中的繁星从云彩缝里钻了出来，而那永恒的运动连同外界的新鲜空气又一起向他袭来。一阵汽笛声划破夜空，随后便消逝在这令人心碎的宁静之中了。下边，最下边，透过一层黄色的薄雾，那湿漉漉的石子路和惨淡的铁轨所反射的午夜光，映照出不杀人的那些人们的跳动的生命。那是亿万人的生命，而所有那些生命眼下对他的生命都弃置不顾；然而，死神正在离他而远去，如同那个人的血一样，

似乎正在他的体外咕嘟咕嘟地流着。跟这样的死亡相比，他们那种毫无价值的指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片静止不动或闪烁发光的影子是生命，如同这长江和远处望不见的大海也是生命一样——大海……最后，他终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重新投入这样的生命里，看来他无限地感激——眼看就要掉眼泪了，他心里跟刚才一样烦乱不安。“得赶快走了……”然而他没有走，仍在凝视着他脚下灯火辉煌的马路上那川流不息的汽车和行人，宛如一个盲人重见光明后在饱览风景，宛如一个饿死鬼在就餐。由于对生命的贪恋，他很想跟那些人接触接触。江对岸，汽笛声响彻天际：兵工厂的夜班工人下班了。让那些愚蠢的工人制造武器去杀害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人吧！难道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将象一块地产似的为该城的军事独裁者所霸占吗？难道全城的人都将象畜群似的卖身给那些军阀和西洋商号吗？他这次的杀人之举，抵得上中国的兵工厂长时间的劳动成果；为把上海交给革命军而举行的迫在眉睫的起义，所拥有的枪支尚不足二百支，假如起义者能把这个经纪人——即死者——刚同政府谈妥出卖的那批手枪（约三百支）搞到手，那么，他们解除警察武装以装备自己军队的第一次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然而十分钟以来，陈对此却连一次也没有想到过。

他杀死这个人是为了得到一张单据，但直到现在还没弄到手。这个人的衣服挂在蚊帐下边的床腿上。他翻了翻口袋：手帕，香烟……唯独不见皮夹子。这间屋子还是老样子：蚊帐，白墙，清晰的长方形亮光都依然如故；看来，凶杀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他闭上眼睛，伸手在枕头下面一

摸，摸到了皮夹子。皮夹子很小，象个钱包。他隔着枕头感到那人的脑袋很轻，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忧虑，于是他又睁开了眼睛：枕头上并没有血，这个人好象还没完全断气。是否有必要再给他一下呢？然而，这时他已看到了白眼珠和床单上的血迹。为了查看皮夹子，陈退到了亮处：这亮光是从一家充斥着打麻将的呜啊喊叫声的酒楼里投射进来的。他找到了单据，收起了皮夹子，几乎是跑着出了房间，紧紧地锁上房门，把钥匙放进了自己的衣袋里。他尽量放慢脚步，因为旅馆走廊尽头的电梯还没有下来。要按铃吗？他还是自己下楼了。在下一层，即设有舞厅、酒吧间和台球室的那一层，有十来个人在等电梯。电梯下来后，陈跟着那些人走了进去。“红衣舞女真叫棒！”他身旁一个略带醉意的缅甸人或是暹罗人用英语对他说。陈既想给这家伙一记耳光让他住口，又想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因为他毕竟是个活人。陈张口结舌，没有回答；那个人用一种默契的神态拍打着他的肩膀。“他还以为我也醉了昵……”对方却又要开口说话了。“我不会讲外国话，”陈操着北京话说。那人不再吭声了。只是惊讶地瞅着这个没穿衬衫却贴身穿了一件优质粗毛线衫的年轻人。陈的对面是电梯间的镜子。凶杀在他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陈的相貌与其说象汉人，不如说象蒙古人：突起的颧骨，中间微起、酷似鸟嘴的塌鼻子，这些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显得有些疲惫罢了；甚至在他那结实的肩膀、敦厚的嘴唇上，好象也看不出什么异样的东西，只是他的胳膊有些发烫，一弯曲就有一种粘糊糊的感觉……电梯停了，他同那些人一起走了出来。

## 凌晨一点

陈买了一瓶矿泉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这是一辆篷车，他在里面擦拭了伤臂，用手绢儿包扎了伤口。明亮的天空映照在清冷的铁轨和午后暴雨残留下来的水洼上，微微闪着光。不知为什么，陈举目望了望天空：刚才，当他发现满天星斗时，他离天空竟是那么近！可是当他恐慌不安的心情越来越平静，距人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离天空反而越来越远了……在马路的尽头，跟水洼一样差不多也呈灰白色的装甲车以及由悄然无声的人影所背挎着的明亮的刺刀，都说明前面有哨所，那是法租界的边界线。出租汽车不能再往前开了。陈出示了租界雇用电工的假护照，哨兵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他心想：“我刚才干的事肯定没被发现”。）就放他过去了。伸展在他前面的“双共和国”大街，是华界的边界。

松弛，沉寂。隆隆的雷电波负荷着中国这座最大城市的各种喧嚣声——战争的种种声响，成千上万毫无困意的人们最后神经质地抖动身体的声响，都一块儿消逝在那里，如同从地心深处传来的声音消失在井底一样。可是只有在很远的地方才有人居住；这儿，宇宙除留下一个黑夜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东西，陈象适应突如其来的友情一样本能地适应了这样的夜晚：这惶惑不安的黑暗世界并不反对谋杀。这是人类死亡的世界，永恒的世界，白昼有朝一日还会来到这些

破旧不堪的瓦房和这些弄堂的上空吗？——这些弄堂的深处各有一盏路灯照着一堵没有窗户的墙壁和一个电线巢。这是一个凶杀的世界，他呆在这儿就象呆在蒸笼里一样闷热。这里没有任何生命，没有任何人迹，没有任何声音传来，甚至听不到小商贩的叫卖声，看不见被遗弃的狗的影子。

最后，他来到一个肮脏不堪的商店：娄有顺和海默里希的留声机商店。应该回到人世间来了……他在尚未完全解脱的情况下等待了几分钟，最后在一扇百叶窗上敲了一下，门紧接着就打开了：店里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唱片，粗粗一看，倒很象一个市立图书馆；商店的后间又大又空，里面有四个同志，他们只穿着衬衫。

随着门的关动，电灯摆动起来，几张面孔时隐时现：左边，是矮胖子娄有顺和长着一颗拳击家脑袋但却显得精疲力竭的海默里希，他剃着光头，塌鼻子，端肩膀。后面暗处是卡托夫。右边是京·吉索尔，灯晃到他头顶的时候，清晰地映出了他那日本版画般的下垂的嘴角；当灯离开他的头顶时，影子也随着移动，他那张混血儿的脸庞显得更象欧洲人。灯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小，京的两副面孔交替出现，不过，二者的差别越来越小。

在场的人都呆滞而紧张地盯着陈，一句话也不说；陈则注视着撒满葵花子的石板。倒是可以把情况全部告诉这些人，但他永远也说不清楚。

那个躯体对匕首的抗力要比他胳膊的抗力大得多，这一想法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我从没想到杀一个人竟是那样的难……”



“拿到了，”他说。

他递上提取武器的单据。单据的全文很长。京读后说：

“是这个，可是……”

大家都在等待下文。京既不急躁，也不生气，他一动没动，只是脸上略微有点紧张。但是，谁都能觉察到，他的发现使他深为震惊。不过他还是接下去说：

“武器还没有付款。提货时付款。”

陈感到怒火中烧，犹如自己受骗了一般。当时他坚信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份单据，但来不及细看，再说，就是看了也无济于事。他从口袋里掏出皮夹子，交给京：里面只有几张照片和收据，没有任何别的单据。

“我想，可以跟支队的同志们合计一下，看怎么办好。”京说。

“只要我们能上船，”卡托夫说，“保准没问题。”

他们的存在，使陈从可怕的孤独中解脱了出来，但是缓慢得很，好象从地里拔一棵庄稼一样，千丝万缕的须根总是牵扯着它。就在他慢慢地向他们走来的时候，他好象发现了他们。望见他们时的心情，就象他第一次逛完妓院回来瞧见他的姊妹时一样。这儿的气氛同拂晓时分赌场的气氛一样紧张。

“还顺利吗？”卡托夫问，他终于放下了唱片，向亮处走来。

陈没有回答，只是照这位长着一对滑稽小眼睛和一只翘鼻子的俄罗斯丑角式人物那有趣的脑袋上瞥了一眼，看来，即使有这灯光的配合，也难以使之产生什么戏剧效果；然而卡

托夫却晓得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站起来，过去看了看正在小笼子里安睡的蟋蟀。陈大概有理由沉默不语。他在观察灯光的晃动，这足以使他不再去思考别的事情。被他的到来惊醒了蟋蟀的颤抖叫声与影子在这些面孔上的最后几下晃动呼应在一起了。他老想着那个人的肉体是那么的坚硬。话语只能用来打破早已在他心中确立的同死亡的亲密关系。

“你是几点钟离开旅馆的？”京问。

“二十分钟以前。”

京看了看表：午夜十二点五十分。

“好，就到这儿，我们快走吧。”

“我想见见你父亲，京。”

“那个肯定是明天，你知道吗？”

“好极了。”

大家都知道“那个”指的是什么：革命军抵达铁路沿线最后几站。这将决定起义的胜败。

“好极了！”陈重复道。如同所有紧张的感觉一样，危险的感觉逐渐消失，于是他陷入了空虚之中；他希望这种危险的感觉能再度产生。

“即使这样，我还是想见见他。”

“那你去吧，拂晓以前，他是决不会睡的。”

“我四点左右去”。

每当需要让人理解的时候，陈总是下意识地去 找吉索尔。这种态度使京感到多么痛心啊！更为痛心的是这里面没有掺杂任何虚伪的东西。这一点他很清楚，但却无能为力，京是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中央委员会很信任他，而陈，也同

样信任他。但他从不杀人，除非是在作战的时候。卡托夫的观点跟他较为接近。卡托夫在一九〇五年学医时，曾被判处过五年苦役，因为他参加了攻打敖得萨监狱的幼稚行动。然而……

这个俄国人一颗接一颗地往嘴里塞着糖豆，眼睛却一刻也没离开过陈；这时，陈突然知道馋了。既然杀了人，他就有权享受一切。他有这种权利，即使是幼稚可笑也没关系。他伸出他的方手。卡托夫以为他要去，就跟他握了握手。陈就势站起来，这样也好：他在这儿确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京已得到通知，那就由他好了。而他，陈，晓得自己这会儿该干什么。他走到门口儿，又返回身来：

“把糖豆给我。”

卡托夫把盛糖豆的袋子递给了他。他想把糖豆分成两份儿，但没有纸，于是他把嘴巴塞得满满的，又抓了满满一大把才转身出去了。

“干这种事想必也够费心的了。”卡托夫说。

卡托夫一九〇五年逃亡到瑞士，一九一二年才秘密回到俄国，因此他说法语几乎不带什么口音，但有时却会吃掉某些元音，好象要以此来抵消他讲中国话时必须准确地发音似的。这时他差不多就在灯下，照在他脸上的光线有些暗淡。那对小眼睛，特别是那只翘鼻子（海默里希称之为绷着脸说笑话的麻雀），使卡托夫的面部表情带有幼稚的讽刺意味儿；正因为这种表情特征和京的截然不同，所以才越发显得突出。对此，他本人常常感到别扭，但京却十分喜欢。

“算了，”他说。“唱片呢，姜？”

娄有颀满脸堆笑，点头哈腰，把卡托夫检查过的两张唱片分别放在两架留声机上。需要同时开动两架留声机才行。

“一，二，三。”京数着。

第一张唱片的嚓嚓声盖过了第二张唱片，突然，嚓嚓声停了，只听见“envoyer”<sup>①</sup>，然后重复了一遍。又听到“trente”<sup>②</sup>这个字。嚓嚓声又起。接着是“hommes”<sup>③</sup>。又是一阵嚓嚓声。

“好极了，”京说，他让留声机停止了转动，然后单放第一张唱片：嚓嚓声，无声，嚓嚓声。停。好。贴上废唱片的标签。

放第二张唱片：Troisième leçon, Courir, marcher, aller, venir, envoyer, recevoir, Un, deux, trois, quatre, cinq, six, sept, huit, neuf, dix, vingt, trente, quarante, cinquante, soixante, cent, J'ai vu courir dix hommes, Vingt femmes sont ici, Trente...<sup>④</sup>

这些用作语言教学的假唱片制作得完美无缺；标签仿造得惟妙惟肖。但是京依然不放心：

“我的录音很糟糕吧？”

① 法文，“寄”的意思。

② 法文，“三十”的意思。

③ 法文，“男人”的意思。

④ 法文，意思是：“第三课。跑，走，去，来，寄，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一百。我看见十个男人在跑。这儿有二十位妇女。三十一”

“很好，好极了。”

娄开心地笑了，但海默里希却显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在楼上，一个孩子痛苦地喊叫起来。

京不理解地问：

“那你为什么要换呢？”

“没换，”娄说。“还是那一张。要知道，头一次听，很少有人能辨别出自己的声音来。”

“留声机能使声音走样吗？”

“不会，每个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辨别出别人的声音，但是，要知道，人们却不习惯听自己的声音……”

能向一位有才华的贵人解释一桩他尚且不了解的事情，娄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中国式的得意神情。

“我们的语言也有这种情况……”

“那好。今天夜里是不是一准来取唱片呢？”

“明天天一亮，船就要开往汉口了……”

录有嘹唳声的唱片由一条船寄送；录有课文的唱片由另一条船寄送。那些课文不是法文就是英文的，文种是按照当地传教会是天主教还是新教而决定的。

“啊，明天，”京想，“天亮以前有多少事情要做啊……”他起身说道：

“得找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去搞武器，如果有可能，再找上几个欧洲人。”

海默里希走近他。楼上的孩子又叫了起来。

“那孩子在回答你呢。”海默里希说。“够你受的吧？有这么个快死的孩子和在楼上呻吟的女人，你能干什么呢？”

不过，她呻吟的声音还不算大，是怕打扰我们……”

这些几乎是充满仇恨的话语，正是从那个长着塌鼻子、眵眼的人嘴里说出来的，那双眵眼在自上而下照射的灯光下，变成了两个黑点。

“各有各的工作，”京答道。“唱片也是必不可少的……有卡托夫和我就可以了。我们该去找人了，顺便也可以了解一下明天到底是否发起攻势，我……”

“他们会在旅馆里找到尸体的，这一点你可要想到。”卡托夫说。

“天亮前不会，因为陈把门锁上了。再说，街上也没有巡逻人。”

“中间人要是跟他有约会呢？”

“在这个时候？不大可能。当前最要紧的是，无论如何要让船换个锚地：这样一来，即使他们能找到船，至少也得三个小时的时间。眼下，船在港口边上。”

“你想让船停到哪儿？”

“开到港口里边，当然，不要让它靠码头，那儿有好几百条汽船。他们至少要花费三个小时，至少！”

“船长会怀疑的……”

卡托夫的面孔几乎从来不外露他的思想感情，他总是那么和颜悦色，而又含有讥讽意味。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说话的声调才暴露出他那焦灼不安的心情，而且暴露得十分彻底。

“我认识一位做军火生意的行家，”京说，“有了他，船长就会相信了。我们的钱不多，但一次酬金还是付得起的

……我想，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可以凭借那张单据上船，然后再见机行事，好吗？”

卡托夫耸了耸肩膀，在他看来，一切都彰明较著。他穿上那件从不系领扣的水手服，把搭在椅背上的运动衫递给了京。他俩同海默里希紧紧地握了握手。恻隐之心只会使他更加感到羞愧。他们走了，很快就离开了大街，走进了华界。

低云密布，只能在时而露出一道道裂缝的深处看到最后几颗星星在闪烁。翻滚的乌云给黑夜带来了生气，使夜色时浅时浓，仿佛那些巨大的阴影有时也前来加重这深沉的黑夜似的。卡托夫和京都穿着胶底运动鞋，只是当他们在泥泞的路上打滑时，才听得到他们的脚步声。在租界敌人那一侧，朦胧的月光勾勒出屋顶的轮廓。逐渐充满汽笛长鸣的凉风，带着这座处于戒严状态的城池里近于平息的嘈杂声，带着那些正在向军舰靠拢的快艇嘶叫声，掠过每一条死胡同和弄堂深处的那些闪烁着惨淡光芒的路灯；任何力量均不能使之摇晃的这种灯光，将那些死胡同和弄堂两侧的颓垣断壁连同上面的斑斑污秽，从冷清的阴暗处显露出来，而且这种灯光似乎还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永恒不变的气味。就在这些墙壁的后面，藏匿着五十万人：纱厂里的人，自童年时代每天就工作十六个小时的人，患溃疡病、脊柱侧凸病以及食不果腹的人。保护路灯的玻璃罩已经脏得模糊不清。霎时间，那种中国式的狂风暴雨便洗劫了这座城市。

“多么好的市区啊！”京想。一个多月以来，他一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地作起义的准备工作，无暇去领略这些街道。他不再是走在泥水里，而是走在一张地图上了。千百万

卑微的生命被另一种生命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日夜操劳的景象正在消失。街巷尽头那些租界地，那些富人区，连同那些被雨水冲刷过的铁栅栏，变成了一种威胁，一些屏障，一些没有窗户的监狱的长围墙：这些充满残暴的地区倒是突击队人数最多的地区，在那里，人们群情激奋，严阵以待。在一条弄堂的拐角处，他的目光突然落到一条宽阔马路的灯海中去了。尽管被暴雨笼罩着，但是那里的景致却依然印刻在他的脑海中；因为他们将冒着由纵深发射来的步枪和机关枪的子弹向该街道发起进攻。二月暴动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派京来协调起义队伍。街上房屋的轮廓已消失在冒着水气味的暴雨之中，在这每一条寂静的街道里，活动分子的数量都成倍地增加了。京曾要求把当时的两千人增加到五千人，军事领导机关当月就使队伍达到了这个数字。可是他们的枪支却还不足二百支（而在那艘警惕地停泊于汨汨作响的江心里的“山东”号上，却装载着三百支木把手枪）。京把起义者分成了一百九十二个战斗组，每组二十五人左右，但只有组长们才有枪……途中，他仔细察看了一个民用车库，那里停满了由破旧不堪的卡车改装成的公共汽车。市内所有的车库都作了标记。军事领导机关组成了一个参谋部，党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从起义一开始，就要使参谋部、中央委员会同突击队保持联系，京还组织了一个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自行车联络队。战斗打响以后，其中八个组将去占领所有的车库，夺取汽车。这些组的组长事先都察看过这些车库的地形。其他组的组长们，十天来一直在研究他们各自将要起事的那些地方的情况：包括今天在内，有多



少生人到那些主要楼房里去过？不知有多少人声称来找朋友，但那里的人却谁也不认识他们要找的人，他们在离去之前聊过天、喝过茶；不知有多少工人冒着倾盆大雨在修理屋顶。凡是对巷战有点价值的地形都察看过了，最有利的射击方位都标在突击队队部里的地图上了。京从准备起义的地下生活中所了解到的东西弥补了他的不足；然而，比他本人高明百倍的东西，却来自遍地工厂、极端贫困化的被压榨的闸北和浦东那庞大的两侧。那里将会使中心部位的巨大淋巴结<sup>①</sup>爆裂。看不见的人流，赋予这个决定性的夜晚以生命的活力。

“明天？”京问。

卡托夫有些迟疑，他那双摆动着的右手停了下来。噢，原来京并不是跟他讲话，也不是跟别人讲话。

他们默默地走着。暴雨渐渐地变成了毛毛细雨，雨点落在屋顶上劈劈啪啪的响声也随之变小了，在漆黑的街道上，只能听到小水沟里断断续续的流水声。他们面部的肌肉松弛下来。这时京发觉，映入眼帘的这条街道又长又黑，十分冷漠，如同回首一段往事一般。

“你看陈会到哪儿去呢？”他问。“他说过，他四点左右才到我父亲那儿去。难道睡觉去了？”

他的问话带着一种怀疑和惊讶的口气。

“不知道……他从来没喝醉过……”

他们来到一家姓夏的灯具店。象其他店铺一样，这铺子

---

<sup>①</sup> 这里是引申义，实指起义部署中心。

也已经上了门板。门开处，一个十分丑陋而又矮小的中国人站在他们的面前：他身后的光线暗淡，但借助于环绕在他头上的光轮可以看到，他头部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会使那油亮的反射光滑到他的大酒糟鼻子上。点燃在柜台上的两盏罩子灯的火焰，在悬挂着的数百只风雨灯的玻璃罩上映照出来，消失在商店深处的黑暗之中。

“怎么样？”京问。

夏揉搓着双手，热情地望着他，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回到里面，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翻寻着什么。他的指甲一再触到铁皮上，发出一阵阵吱儿吱儿的摩擦声，使卡托夫难受得牙齿咯咯作响；不一会儿他便回来了，下垂的裤子背带左右摆动着……他把脑袋几乎贴到一盏灯上，让灯光从下面映照着他，读着寻找出来的文件。这是负责联络铁路工人的军事组织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从南京调来了对付革命者、防守上海的援军，为此，铁路工人决定举行罢工。但是，那些拒绝开军用列车的铁路工人，不断遭到白俄警卫和政府军士兵的枪杀。

“其中一名被捕的铁路工人曾使他开的一列火车脱轨，”这个中国人读道，“他已被处死。昨天，又有三列军车脱轨，铁轨被扒。”

“扩大破坏范围，并在这些报告上注明在最短时间内修复的办法。”京说，“还有一件事，没有运武器的列车吗？”

“没有。”

“你知道我们的人什么时候到达郑州？”

“我还没收到午夜的消息。工会代表估计不是今天夜里，就是明天……”

看来，明天或后天便要起义了。但必须等候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京感到口渴。他们走了出去。

离他们应该分手的地方已经不远了。又有一条船的汽笛“呜—呜—呜”地鸣了三下，接着又是一下，这一下鸣的时间很长。在这充满水气的夜晚，汽笛的鸣叫显得格外欢快，尾音象支火箭似的跌落下来。“难道‘山东’号上的人已预感到不安了吗？荒唐！船长八点钟才接待主顾。”他们继续向前走着，思想完全被停泊在淡绿色的冰冷江水中的那条船所占据，因为那上面装有几箱手枪。雨不再下了。

“但愿能找到我的人，”京说，“假如‘山东’号换个地方抛锚，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不能再同路了，他们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就分手了。卡托夫找人去了。

京走到租界栅栏门前，两个安南大兵和殖民军的一个班长上前检查他的证件：他有法国护照。为了引诱哨兵，一个中国商人把一些小肉馅饼插在铁丝网的尖头上了。（“这可能是贿赂岗哨的绝招。”京想。）

班长把护照还给了他。京很快找到一辆出租汽车，让司机把他拉到Black Cat<sup>①</sup>去。

司机驾驶着汽车全速前进，一路上碰到了几批欧洲志愿军的巡逻队。报界称：“八国联军在此警戒。”不过，这也

---

<sup>①</sup> 夜总会的英文招牌，即“黑猫”的意思。

没什么了不起，反正国民党无意进攻租界。林荫道上冷冷清清，只见一些小商贩的身影和他们肩上天平状的货担……汽车在一个狭小的、被明亮的Black Cat招牌映照着的花园门口停了下来。经过衣物寄存处时，京看了一下时间：凌晨两点。“幸好这儿穿什么的都有。”他上身穿一件深灰色的粗布运动衣，里面套着一件背心。

爵士音乐已声嘶力竭。五个钟头以来，它所维持的已不是什么快乐，而是一种野性的狂热，每一对舞伴都惶惶然沉溺于这种狂热之中了。爵士音乐戛然而止，人们都散开了。大厅深处是顾客，四周是职业舞女：有身穿花缎紧身衣的中国女郎，有俄国女郎，也有混血女郎。凡交一张券的，她们就陪跳一次舞或与之谈一次话。一个呆头呆脑，外表很象牧师的老人，正在舞池中央，用胳膊肘儿模仿鸭子的动作。他活到五十二岁的时候，才头一次在外边过夜。因为他老婆威吓他，他始终不敢回家。已经连续八个月了，晚上他一直泡在夜总会里。他不会熨洗内衣，只好在中国衬衫商的两扇屏风之间更换衣服。从濒临破产的巨贾，到舞女、妓女，以及那些自知朝不保夕的人，几乎所有在场的男男女女，都把目光投射到这个幽灵的身上，好象是他单枪匹马地在死亡的边缘上把他们拉住了似的。拂晓，当刽子手<sup>1</sup>即将开始在华界巡游时，他们已都十分厌倦，想去睡觉了。此时此刻，在那些黑铁笼子里，只能看到几颗欲下来的人头，还顺着头发向下淌着雨水。

1. 新政府军巡逻队。巡逻队抓住可疑分子便就地斩首，将人头割下来，放在铁笼子里示众。

“穿上和服，亲爱的女友！给他们都穿上和——服！”

他那受驼背丑角<sup>①</sup>影响的滑稽嗓音，象是从一根柱子里发出来似的。这种苦涩的带有浓重鼻音的声音，相当充分地反映了这些人的精神状态。在那个呆头呆脑的牧师头上叮当作响的酒杯相撞的单调声音中，他的嗓音听起来十分突出。

他一绕过大厅里边的柱子，就发现了那个人。那里排列着长长的几行桌子，舞女们并没有占用。在一堆丝绸服饰中间，在一片杂乱的背影与胸脯上方，一个干瘪而不驼背、但嗓音酷似驼背丑角的人，正在向与他同桌的一个俄国女人和一个菲律宾混血女人发表滑稽演说。他站在那里，双肘贴着身子，两手比比画画说着，那张凸起的面孔上的全部肌肉都在抽动，那块皮埃-尼克莱<sup>②</sup>式的、无疑是为了保护受伤的右眼的方块状黑缎子，使他很是不自在。不管德·柯拉毕克男爵如何穿戴——今晚他穿的是无尾常礼服，都可看出他是伪装的。京决定不在那里与他攀谈，等他出来时再说。

“妙极了，亲爱的朋友，妙极了！蒋介石将象占领某些城市的情景一样，率领革命军进入这座城市。他将用古典方式，我说的是古——典方式高喊：‘让这些商人都给我穿上和服，让那些军人都给我穿上豹皮衣（就好象他们在刚刚油漆过的长凳上坐过似的）！我们跟梁朝末代君王一模一样，我亲爱的，让我们登上龙舟，去观赏我们那些打扮起来的臣民，去消遣吧！他们每个人的职业不同，服饰的颜色也不同；有

① Polichinelle：法国木偶剧中鸡胸驼背、尖嗓音的滑稽人物。

② Pieds-Nickelés，皮埃-尼克莱兄弟，法国一滑稽连环画中的主人公，其中一个的眼睛上总戴着一块方块状的黑缎子。

蓝的，有红的，有绿的。有人拖辫子，有人饰绒球。没说的，亲爱的朋友，告诉您吧，没说的！”

他神秘地说：

“唯一可以演奏的音乐将是用小铃笠<sup>①</sup>演奏出来的乐曲。”

“那么，您将干什么呢？”

他唉声叹气，抽噎着说：

“怎么，亲爱的朋友，您猜不出来吗？我将成为宫廷星相学家，我将在一个酒后的夜晚，下池塘捞取月亮时死去——难道就是今晚吗？”

他操着一副学者的腔调接着说：

“……象杜甫这类诗人的作品，在您闲暇的日子里，一定会使您——没说的，我敢担保——一定会使您心旷神怡的。再说……”

一艘军舰的汽笛声响彻整个大厅。接着，猛的一声钹响，同汽笛声交汇在一起，又开始跳舞了。男爵坐了下去。京穿过一张张桌子和一对对舞伴，来到距男爵的桌子稍后一点的一张空桌子旁。乐声压倒了他所有的声音，但是，现在已经靠近了柯拉毕克，京又能听到他讲话的声音了。男爵猥昵地抚摸着菲律宾女郎，但却继续冲着那个只显一双大眼睛的瘦长脸俄国女人说：

“……所谓不幸，亲爱的朋友，就是平淡无奇。有那么一次，”

---

① 满悬小铃的铜制伞形乐器。

说着，他翘起了食指：

“……欧洲一个部长，寄给他夫人一个小小的邮包，夫人打开一看——没说的……”

他把食指贴到嘴上：

“……原来是他情人的脑袋。”

他变得忧伤起来：

“事过三年之后，人们还在议论纷纷。”

“可悲呀，亲爱的朋友，可悲！瞧我，您瞧见我的脑袋了吗？二十年的遗传性幻想都汇集在这儿了！这种遗传很象梅毒——没说的！”

他带着权威的口气：

“伙计！给这两位夫人上香槟酒，给我……”

他换了神秘的口气：

“……来一小杯马丁尼<sup>①</sup>。”

继而又声色俱厉地：

“特别淡的！”

（“跟这些警察打交道，一切都得做最坏的打算。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京想“难道这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吗？”）

菲律宾女郎在嬉笑，或者说在装笑。俄国女郎瞪大眼睛，试图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柯拉毕克仍在不停地比比画画，食指伸得直直的，晃来晃去卖弄权威，竭力想把她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秘密上来。但是京没怎么注意听柯拉毕克

---

① 马丁尼酒：一种杜松子酒、苦艾酒等混合而成的鸡尾酒。

说什么；炎热使他的头脑迟钝起来，而正是由于这种炎热，今夜走路时曾一度萦绕于他脑际的某种忧虑，此时变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疲劳的感觉。刚才在海默里希店里的那张唱片，他没能辨别出来的自己的声音。想到这些事情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复杂心情，同他在孩提时代外科大夫把他的扁桃腺割下来后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然而，他没法继续想下去了。

“……一句话，”男爵一边尖声喊叫，一边眨巴着他的小眼睛，转身瞧着俄国女子，“他在匈牙利北部有一座古堡。”

“您是匈牙利人？”

“不，我是法国人。（我才不在乎这个呢，亲爱的朋友！——一点——也——不——在——乎！）但我母亲是匈牙利人。

“唔，我的小外祖父住在那儿的一座古堡里，里面有好几个大厅，很大很大的大厅；他的一些同道死后就埋在下面。古堡四周柏树环绕；柏——树多极了！他是个鳏夫。他独自一个人同挂在壁炉上的一个巨——大——的——猎用号角生活在一起。有一次，来了个马戏团，有一位女演员，长得很标致……”

他一本正经：

“我说的是标——一致。”

他又眨巴了一下眼睛：

“……他拐走了她——没费什么事。他把她带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里……”



为了控制注意力，他把手举了起来：

“没说的！……她就在那儿呆下去了。可不久她就腻味了。你也是如此，我的小乖乖，”他挑逗菲律宾女郎说。“噢，耐心点……再说，他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用半个下午的时间让理发师给他剪修手指甲和脚趾盖儿（他的古堡里还有专用理发师呢），与此同时，他的秘书——一个粗俗的奴隶的儿子——反复给他大声朗读家史。真是令人心驰神往的消遣，亲爱的朋友，多么美好的生活！此外，他通常总是醉醺醺的，她……”

“她爱上秘书了吗？”俄国女子问。

“真了不起，你这个小乖乖，真了——不——起！亲爱的朋友，您很了不起。非——凡——的洞察力！”

他吻了吻她的手。

“……但是，她却同一个修脚匠睡了觉，她不象您，她对精神上的东西看得不那么重。被发现后，外祖父把她打了一顿。没说的，打也无济于事，他们俩私奔了。

“被遗弃的人火冒三丈，跑遍了所有的大厅（那些同道的尸体一直埋在下面），声称自己被那两个小丑愚弄了。他们两人在首府的一家客栈里过着淫荡的生活。那是一家果戈里式<sup>①</sup>客栈，院子里有一只缺了口的水罐和几辆轿式马车。他摘下那只巨——大——的猎用号角，没能吹响，于是令管家击鼓集合他的农夫们。（那时他还是有权力的。）他用五支猎枪和两支手枪把他们武装起来。但是，亲爱的朋友，他们

<sup>①</sup> 俄国作家果戈里在其作品中所描述过的那类客栈。

的人未免太多了！

“于是，全古堡上上下下一齐出动，我那些乡巴佬开拔了。我跟你们说，你们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吧！他们携带着花式剑，火枪，枪机打火轮，还有些什么来着？哦，还有长剑和阔剑，外祖父打头，一直朝首府奔去：复仇心切往往导致犯罪。有人告发了他们。一个乡村警察领着几个宪兵来了。那场面真是壮——观！”

“后来呢？”

“没什么。只是缴了他们的武器。尽管如此，外祖父还是来到了城里，两个罪人却乘着一辆满是灰尘的轿式马车，早已匆匆逃离了果戈里式客栈。他找一个农妇取代了马戏女演员的位置，修脚匠也换了人，而他自己却经常和秘书喝得酩酊大醉。有时，他还提笔写写他那些小小的遗嘱……”

“他把钱留给谁了？”

“这个问题没意思，亲爱的朋友。然而，他死的时候，”

他瞪大眼睛：

“……一边让人修脚，一边听人朗读家史，他这个醉生梦死的贵族所精心安排的一切，全被大家知道了！不过，人们还是照他的遗嘱办了：死后把他安葬在小教堂下面的一个极大的墓穴里了，让他直立在他那匹被杀死的马背上，跟阿提拉<sup>①</sup>一样……”

嘈杂的爵士乐停止了。柯拉毕克接着说下去，可远不如

① 匈奴帝国国王。

先前那样滑稽可笑了，他的插科打诨似乎也由于静寂而有所收敛了：

“阿提拉死后，人们把他竖立在他那匹直立于多瑙河畔的马背上，当夕阳西下时，在平川上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骑士们见了个个惊恐万状，都一溜烟似地逃走了……”

他处于朦胧状态，酒精的作用和突如其来的寂静，都促使他胡思乱想起来。京知道应该向他提出哪些建议。如果说京的父亲很了解他的话，京本人对他却并不了解，特别是对他今天所扮演的角色就更摸不着头脑了。京极不耐烦地听他叨叨着（一旦男爵前面的哪张桌子空了，京就会过去打手势让他出来；京既不想凑上前去与他攀谈，也不想当众喊他），但也并非一点不感到好奇。这时，俄国女郎用嘶哑的声音慢条斯理地开腔了——可能是由于失眠的关系吧，她也有点癫狂了：

“我的曾祖父也有不少地产……因为闹共产党，我们才出来了，不是吗？为什么？为了不和那些凡人平起平坐，为了能受人尊敬；可是在这儿，我们都是两个人一桌，四个人一个房间！啊！四个人一个房间……而且还得付房租。受人尊敬……要是酒精能使我不痛苦就好了！……”

柯拉毕克瞧了瞧她的酒杯：她只喝了一点点。菲律宾女郎则相反……她很安静，不过热得活象一只喝得半醉的猫。考虑这些事是徒劳无益的。于是，他仍转向俄国女郎说：

“您没有钱吧？”

她耸了耸肩膀。他喊来了伙计，掏出一张一百美元的票子付款。钱找回来以后，他只拿了十美元，剩下的全都给了

那个俄国女人。她懒洋洋地望着他：

“好吧。”

说罢，她站起身来。

“不，”他说。

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活象一条驯服的狗。

“不，今晚来那个，您会感到乏味的。”

他拉着她的手。女人依然看着他：

“谢谢。”

说着她又犹豫起来：

“不管怎样……假如那个使您痛快的话……”

“如果有一天我身无分文了，您要还能象今天这样，那我就更高兴了……”

他再次露出丑态：

“早晚会有这一天的……”

他捧起她的双手，亲了又亲……

京早已付过钱，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追上了他：

“我们一块儿出去，好吗？”

柯拉毕克打量了他一下，认出是他：

“您怎么在这儿？真是稀奇！不过……”

直到他翘起了食指，这种类似羊的“咩”声<sup>①</sup>才停了下来：

“您堕落了，年轻人！”

“还好……”

---

① 法文字maie（不过）的发音与羊叫声“咩”——相近。

他们已经走了出来。雨虽然停了，但空气里仍饱含着水汽。他们在花园的沙地上走了几步。

“港口里，”京说，“停着一条装武器的火轮……”

柯拉毕克收住了脚步，而京已向前多跨了一步，于是转过身来：男爵的面孔看不大清楚，但Black Cat这块招牌上明亮的大猫却似一轮光环，映照着他。

“是‘山东’号，”他说。

黑暗以及他所处的背光位置，使他用不着再作别的什么表示，他一句话也没多说。

“政府出了一个价钱，”京说，“每支手枪三十美元，但至今没得到答复。我呢，认识一个买主，愿出三十五美元的价，另外给您三美元作为酬金，不过，人家要马上去港口提货。船长认为在哪儿交货方便就在哪儿，但不要出港口。让该船马上离开锚地，今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主已和船上的代表谈妥了，这是契约”。

京把契约递给他，打着打火机，用手挡着。

“他想赶在另一个买主的前头，”柯拉毕克边看契约边想，“……零件……很明显，这样一来，每件武器可多赚五美元。不过这不关我的事，另外三美元才是给我的。”

“可以，”他大声说。“契约自然是放在我这儿罗？”

“那当然。您认识船长吗？”

“我亲爱的先生，当然还有比他交情更深的，但我毕竟还是认识他。”

“他也许起疑心（或许更甚，因为船还在下游呢）。政府会不会不付钱扣押这批武器呢？”

“绝对不会。”

柯拉毕克又露出丑态。但京在等候下文：船长会用什么方法阻止他的人（而不是政府的人）去提取这些武器呢？柯拉毕克用一种更低的声音继续说：

“这批货物是由一位合法的供货人发的。我认识他。”

他带着讥讽的口气：

“这可是个——不讲信义的——家伙……”

这嗓音在黑暗中显得十分古怪，跟他的表情极不协调，就象是在主持一场鸡尾酒会似的。他提高嗓门说：

“一个地地道道背信弃义的家伙，百分之百的背信弃义！因为这一切都得通过一个外交使团，而这个使团吗……没说的！这我去照应。然而，要办此事，我可得先雇辆出租汽车，这也要花不少钱，因为船离这儿很远……我只有……”

他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唯一的一张票子，转过身来，借着招牌的亮光看了看：

“……十美元，我亲爱的先生！这可不够用。我可能马上要替费拉尔买你舅舅嘉麻的几张画，可现在……”

“五十够了吗？”

“绰绰有余……”

京给了他五十块美金。

“事情一办妥，您就到我家里通知我。”

“一言为定。”

“一个小时以后行吗？”

“还得晚一点，我想。不过事一成，我就去。”

这口气同刚才那位俄国女子说“要是酒精能使我不痛苦

就好了……”的口气几乎一模一样，仿佛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陷入了同样绝望的深渊似的：

“这一切都不是为怪……”

柯拉毕克低着头，弓着腰，光着脑袋，双手插在无尾常礼服的口袋里走了，很象是描绘他自己的一幅漫画。

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让司机把他拉到租界边上华界的头一条弄堂里，他与卡托夫约好了在这里碰头。

离开京十分钟之后，卡托夫穿过几条过道，跨过几道小门，来到一间被几盏风灯照得通明的房间里，里面是白色的墙壁，空空如也，没有窗子，从给他开门的中国人的胳膊下面，可以看到五个脑袋低垂在桌子上，但目光都投射到他高大的身影上，所有的突击组都很熟悉这身影。他又着双膝，晃着胳膊，上衣上边敞着，仰着脑袋，头发乱蓬蓬地散着。那几个人正在摆弄着不同类型的手榴弹。这是一个组——京和卡托夫在上海所创建的共产党的战斗组织之一。

“有多少人报名？”他问。

“一百三十八名。”一位年纪最轻的中国人答道，这是一个小脑袋、大喉头、溜肩膀、工人打扮的青年人。

“今天夜里，我绝对需要十二个人。”

“绝对”这个词儿已进入卡托夫所能讲的各种语言中去了。

“什么时候要？”

“现在。”

“在这儿集合？”

“不，到雁荡栈桥码头前。”

那个中国人做了指示后，有一个人走出去了。

“他们将在三点钟之前到那儿。”支队长说。

从那深陷的面颊和细长的身材来看，他显得很虚弱；但他那坚定的语气，凝滞的面部肌肉，却表现出一种由精神力量所显示的意志。

“训练搞得怎么样了？”卡托夫问。

“扔手榴弹嘛，没问题。我们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手榴弹，同志们现在都会使用了。至于手枪，起码纳甘和毛瑟是不成问题的。我让他们用空弹壳进行练习，但是至少还应该让他们放放空枪才行……我没时间带他们到野外去……”

他在为起义作准备工作的四十个房间里，都提了同样的问题。

“火药不够，也许还能搞到，姑且先不谈。可步枪怎么办呢？”

“这也没问题。我担心的倒是机枪，如果不试射一下的话。”

他的喉头随着他的每一声回答，上上下下地移动着。他继续说道：

“难道就没有办法多搞点武器了吗？只有七只步枪，十三支手枪，四十二枚装有火药的手榴弹！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没有火器。”

“谁手里有武器我们就向谁去要。也许我们很快还能搞到一些手枪。假如明天起义，那么，你这个支队里还有多少人不会使用火器呢？”



那个人思考着。他的注意力那么集中，就象是走了神似的。“是个知识分子，”卡托夫想。

“你是说我们从警察手中搞到枪支以后吗？”

“绝对是这样。”

“一半以上。”

“手榴弹呢？”

“每个人都会使用，而且还很熟练。我这里有三十个人是二月遇难者的亲属……然而，只要……”

他犹豫了一下，打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没有再说下去。他的手变形了，但很纤细。

“只要？”

“只要那些混蛋不用坦克来对付我们就行。”

屋子里的六个人都瞧着卡托夫。

“那也没关系，”卡托夫说。“你把六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往坦克下面一塞就成了。必要的话，你们也可以挖壕沟，起码有一侧要挖。你们有工具吗？”

“很少。但没关系，我知道上哪儿去弄。”

“还要弄几辆自行车来。起义一开始，除了中心联络员外，每个支队也都要有自己的联络员。”

“你肯定坦克能炸毁吗？”

“绝对没问题！不过，你放心好了，坦克是不会离开前线的。假如离开了前线，我就带一个专门小组来对付它们。这是我的差事。”

“我们若遭到突然袭击呢？”

“坦克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们附近有侦察员。你自己带

上一捆手榴弹，你信得过的三、四个人，每人再给一捆……”

支队的每个人都知道，放德萨事件后，卡托夫被监禁在一个惩罚最轻的苦役犯监狱里，为了教育那些被送到铅矿做苦工的可怜的工人，他曾自愿要求陪他们前去。

支队的同志们对他虽然都很信任，但仍有些惴惴不安。他们不怕步枪，也不怕机关枪，就是怕坦克。他们感到在坦克面前无能为力。就连这个房间里的人——他们都是志愿兵，而且差不多全是遇难者的亲属——也都觉得坦克似乎承袭了魔鬼的威力。

“假如坦克来了，你们不必担心，我们会来对付的。”卡托夫接着说。

靠这句空话怎么能走得出去呢？下午，他视察过十五个支队，都未曾发现有什么畏惧情绪。这些人并不是不如其他人勇敢，只是他们想得更周到一些罢了。他知道，除了他所指挥的行家们以外，他自己是不能把这些人从畏惧中解脱出来的。看来，革命队伍可能在坦克面前退缩。坦克多半离不开前线，可万一开进城来，在这些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的市区里，单凭一些壕沟是不可能全都把它们挡住的。

“坦克绝对不会离开前线。”他说。

“手榴弹该怎么个捆法？”最年轻的那个中国人问。

卡托夫教了教他。气氛变得不那么沉闷了，好象这操作本身就是胜利的一种保证似的。卡托夫趁此机会离开了这里。将有一半人不会使用武器！但他起码可以指望由他组成的负责解除警察武装的那些战斗小组的成员。明天尚可，但是后天呢？革命军在前进，离这儿越来越近，他们期待着上

海城暴动的成功。也许最后一个火车站已被他们拿下。当京回来的时候，有的情报站肯定会得到这一消息的。灯具商在十点钟以后没有得到情报。

卡托夫在弄堂里踱着步子等候着，终于把京等来了。相互通报了各自所了解的情况之后，两人的胶底鞋又继续在泥水里一步一步地向前踱去：京身材小巧灵活，活象一只日本猫；卡托夫晃着膀子。在这夜深人静之际，革命军向着红褐色的上海城进发，他们的步枪在雨中闪闪发光……他们一路上没受到什么阻碍吧？

他们正走在华界的头一条弄堂里，由于这儿靠近欧洲人的住宅，便成了贩卖动物的市场。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停业了。外面看不见一个动物，没有任何叫声打破这寂静，只能听到呜呜的汽笛声和从带角檐的屋顶上落到水洼里的最后几滴雨水的嗒嗒声。动物都在酣睡。他们敲门进入了其中的一个店铺——一个活鱼店。插在回光镜里的一支蜡烛是这屋子里唯一的光源，它在一排排闪着磷光、阿里巴巴坛子式的鱼缸里微弱地映照出来。一些看不清的名贵的中国鲤鱼在缸里睡着。

“是明天吗？”京问。

“明天，一点钟。”

在屋子深处的柜台后面，一个人把头埋在弯曲的胳膊肘里正睡着觉呢。他略微抬起点儿头来回答问题。这个商店是国民党八十多个党部中的一个，消息就是通过这里传递的。

“是正式消息吗？”

“是的。部队已到郑州。中午举行总罢工。”

黑暗中听不到一点动静，屋子深处昏昏欲睡的商人没有任何反应，可是所有鱼缸里那磷光闪闪的水面却微微波动起来，无声无息地泛起了一层柔和的黑色同心波纹：原来是刚才说话的声音把鱼给惊动了。又有一声汽笛在远方消逝了。

他们出来后，继续往前走，又来到“双共和国”大街。

他们上了出租汽车。车子起动得象电影里的一样猛。卡托夫坐在左边，探着身子，留心看着司机。

“他的大烟瘾上来了，真遗憾。我可绝不想在明晚以前丧命。沉住气，小家伙！”

“柯拉毕克很快就会让船开过来，”京说，“在政府的服装仓库里工作的同志们能给我们搞到警察服……”

“没有必要。我至少有十五套在党部里。”

“我们带上你的十二个人上快艇吧！”

“你最好别去……”

京看着他，一言没发。

“要知道，这件差事虽然算不上特别危险，但也并非轻而易举。那可比这个又在加速的笨蛋司机危险多了。这个时候可不能让你去送死。”

“你也一样。”

“那可不一样。我吗，可以由别人来代替，现在就可以，明白吗……我倒希望你照料一下待命的卡车，管管分发武器的事。”

他一只手放在胸前，迟疑不决，局促不安。“应该让他心中有数才好，”他想。京沉默不语。车子继续在那为薄雾所

笼罩的模模糊糊的光线中飞驰。他比卡托夫更为有用是无须怀疑的：党中央了解他所做的组织工作的详情，但那只是通过书面文件得知的；而他本人则已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城市的弱点犹如他身上的创伤。在同志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的反应能象他那样迅速，那样准确。

电灯越来越多……租界里的装甲车再次出动了，尔后，又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出租车停了。京下了车。

“我去找衣服，”卡托夫说，“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以后，我再派人来接你。”

京同他父亲住在一幢中国式的平房——一个四合院里。他穿过第一间屋子和院子，来到了正庭。正庭左右两侧雪白的墙上，悬挂着一些宋代的画幅和沙尔丹的蓝色凤凰；正庭深处有一尊酷似罗曼风格的魏代菩萨，还摆有几张洁净的长沙发，一张吸鸦片烟用的桌子。京身后是玻璃窗，光秃秃的——没有一点装饰，很象个作坊的窗户。他父亲听到他的声音，走了进来。几年来，他父亲一直患失眠症，只是在黎明前后才能睡上几个小时，所以，凡是能填补夜晚这个空白的事情，他都愿意接受。

“晚上好，父亲。陈要来看你。”

“好。”

老吉索尔的面部表情酷似苦行僧，今晚他穿了件驼毛便袍，更加突出了这种特征。

京长得不象父亲，似乎母亲的日本血统就是以在京的脸

上减弱老吉索尔的面部特点，而赋予京一副日本武士般的面孔。

“他出事了？”

“是的。”

父子俩坐了下来。京并没有睡意。他对父亲讲了讲刚才见到柯拉毕克时的情景，但却回避了关于武器的事。这绝不是出于对父亲的不信任，只是由于他要独自对自己的一生负责的缘故。他父亲原是北京大学的社会学老教授，由于教学上的原因，被张作霖解雇了。尽管他培养了这样一位在华北地区算是最优秀的革命干部，但是目前他本人却已不再从事什么活动了。京一走进来，他的意志便化成了智慧，这一点他不大喜欢。他不主张诉诸武力，而对人感兴趣。因为京向父亲谈起了他十分了解的柯拉毕克，所以京觉得那位男爵比刚才见到的时候更为神秘了。

“他竟敲了我五十美金……”

“他是没有私心的，京……”

“可是他刚刚就花了一百美金，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谎话癖怎么说也是一种令人十分不安的东西。”

他想搞清楚，对柯拉毕克到底能利用到什么程度。他父亲象往常一样，总想在此人身上寻找本质的或独特的东西。然而，一个人是很难使他思想深处的东西立即付诸于行动的。而京想的却是他那些手枪：

“假如他需要作一个自命不凡的富翁，那他为什么不想法去发财呢？”

“他曾是北京城里首屈一指的古玩商……”

“假如不想摆阔，他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把钱花了个净光呢？”

吉索尔眨了眨眼睛，并把他那相当长的白发向后甩去；他那老年人的嗓音，尽管音色不太响亮，但依然十分清晰：

“他的谎言癖是对生活进行否定的一种方式，不是吗，是否定，而不是忘却。在这些方面，你不要过于相信逻辑推理……”

他懵懵懂懂地把手伸了出去。他的幅度很小的手势从来不向左，也不向右，而几乎总是向前：当他借助于手的动作拖长一句话时，这些动作不象是要搬开什么，倒象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

“通过这一切，他似乎想表明这样一个道理：尽管他象个阔佬似的过了两个小时，但实际上财富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时贫困也同样是不存在的。这是本质的东西。什么都不存在，一切都是虚无飘渺的。可别忘了，酒精倒能帮他的忙……”

吉索尔微笑了，他那两角下垂的干瘪嘴唇上挂着的微笑，比他的话语更能完整地表达出他的意思。二十年来，他运用他的智慧在为人们辩护的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爱戴。人们感谢他的这番好意，但谁也猜想不到，他的这番好意竟渊源于鸦片。人们说他具有佛教徒般的毅力：其实那是吸毒者的毅力。

“没有一个活人去否定生活。”京回答说。

“这样生活是生活不好的……他需要过苦日子。”

“可他是迫不得已的。”

“这种迫不得已是由于经营古玩或者麻醉剂、倒卖军火造成的……他肯定已同他所厌恶的警察达成了协议，而警察参与这些小小的勾当，为的是得到某些应得的报酬……”

这没多大关系，反正警察深知共产党没有那么多钱向地下进口商购买军火。

“了解了一个人的痛苦，也就了解了这个人，”京说：“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感到痛苦呢？”

“他的痛苦并非特别重要，并非特别有意义，对不对？不要触及任何比他说谎或作乐更为深刻的东西；他一点也不深刻，这也许是对他这个人的最好的写照，因为这种人是少见见的。他为说谎和作乐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这也是需要有天分的……当你跟一个人还没有什么缘分时，京，你想到他，那是为了预见他的所作所为。柯拉毕克的所作所为……”

他指了指养鱼缸。鱼缸里那些浑身是刺的黑鲤鱼轻飘飘的，很象中世纪法国的方形王旗。它们时而浮上水面，时而潜入水底。

“他的所作所为是：爱喝酒，但他本来是适合抽大烟的。有时人们也会染错恶习，许多人都找不到能够拯救他们的恶习。很遗憾，他绝对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可他的情况你并不感兴趣。”

这倒是真的。假如京今晚不是出于对战斗的考虑，那他只会想他自己。热气渐渐地向他袭来，就象刚才在 Black-Cat 时的情形一样。这时，始终纠缠着他的唱片一事，再次涌上心头，就象解除疲劳后的轻微的热量窜到大腿上一样。他



讲述了自己听唱片时的那种惊异的感受，就好象在英国商店里听一张录制的有声唱片一样。吉索尔一边听他讲话，一边用左手抚摸着他那带有棱角的下巴颏；他那双手，手指细长，极其漂亮。他的头向前探着：纵然他的前额已经全秃了，但他的长发仍垂落到眼睛上。他的头向后一甩，把头发甩到脑后，但他的目光却呆滞了：

“有一次我无意中在镜子里一照，竟认不出我自己来了……”

他右手的大拇指轻轻地摩擦着其它几个手指，好象在搓捻着记忆的粉末，让它滑落下来似的。他继续思索着，仿佛已忘记自己的儿子还在跟前，自言自语地说：

“那可能是个方法问题：我们听别人的声音靠的是耳朵。”

“那听我们自己的声音呢？”

“借助于喉咙：因为你堵上耳朵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鸦片也是一样，那是我们用耳朵听不到的一个世界……”

京站起身来，他父亲几乎没有看到。

“今天夜里我还要出去。”

“对于柯拉毕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不？”

“不必了。谢谢。晚安。”

“晚安。”

京躺在床上，想恢复一下疲劳。他等待着。他没有开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是他在考虑起义，而是起义，如同缠绕着许多人的睡意一样活跃在许多人脑海里的起义，重

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使他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与期待之中。总共还不到四百支枪。只要装备条件稍有改善，即使不能取得胜利，双方对射的局面也必定会出现。明天。不，马上。问题是要神速：解除各处警察的武装，并在政府军装甲兵开始行动之前，用五百支毛瑟枪把所有的战斗小组武装起来。起义将在一点钟开始，那总罢工就得赶在中午十二点。因此，必须在五点钟以前把大部分战斗组武装起来。为数一半的警察一贫如洗，他们肯定会站到起义者一边来。这就只剩下另一半了。他想到“苏维埃中国”，要在那里为自己的同胞赢得尊严。苏维埃的人口将达到六亿。是胜利，还是失败？今晚，世界的命运就在这附近徘徊。只要国民党在攻占上海之后不去镇压它的共产党盟友……他蓦地一惊：院门开了。回忆掩盖了心情的不安：是妻子吗？只听见院门又关上了。梅走了进来。她那件剪裁得很象军装似的蓝皮大衣，使她走路、乃至面孔上所带的男子气——大嘴巴，短鼻子，北部德国女子那突起的颧骨——更为明显。

“真的一会儿就起义吗，京？”

“是的。”

她在一家中国医院当大夫。她却刚从她领导的地下医院的革命妇女支队那儿来：

“总是这一类事儿，你知道，我刚从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那儿来，她在花轿里企图用一个保险刮脸刀片自杀，因为她被强迫嫁给一个有身分的野蛮人……她被抬来的时候，红色的结婚旗袍上已沾满了血迹。她母亲那瘦小萎缩的身影跟在后面，自然是在呜呜咽咽地哭着……我告诉她女儿不会

死的时候，她对我说：“可怜见儿！可是她差不多已有了死的福分了……”福分……这比我们所作的有关这里妇女状况的演说更能说明问题……”

她是德国人，但出身在上海，曾在海德尔堡和巴黎行过医，操起法语来不带一点口音。她把贝雷帽扔到床上。她的波浪式头发向后拢着，这样梳起来更方便些。京很想去抚摸她的头发。她那开阔的前额也具有某种男性的特征，但是，她停止讲话的时候，又女性化了——京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她——一是由于不再受意志的支配，她的面部表情显得温柔了一些；二是由于疲劳使她的面部肌肉松弛了下来；此外还由于她已经摘掉了贝雷帽。这副脸膛之所以动人，是由于一张富有肉感的嘴巴和一双极其晶莹明亮的大眼睛，那强烈的目光，似乎不是从眸子里而是从前额投在狭长眼眶里的阴影里发射出来的。

一只白色的叭儿狗被灯光所吸引，碎步跑了进来。梅有气无力地呼唤着：

“多毛狗，绒毛狗，繁毛狗！”

她用左手抓住它，举到面前抚摸着：

“兔子，”她微笑着说，“兔子，兔子诺维奇<sup>①</sup>……”

“它很象你，”京说。

“是吗？”

她从镜子里看着小狗的白脑袋瓜儿在合拢起来的小爪子上方，紧紧地靠在她自己的头上。由于她长着日耳曼人的突

<sup>①</sup> 开玩笑时，在法文字lapin（兔子）后面加上一个俄语后缀，意即兔崽子（fils de lapin）。

出的颧骨，所以看上去跟那个白脑袋瓜儿极其相似，十分有趣。尽管她只是略有姿色，但他仍然想起了奥塞罗的一句寒暄话：“噢，我亲爱的女武士……”当然他把它改动了一下。

她放下叭儿狗，站起身来。她衣冠不整，大衣半敞着，露出了她那高耸的乳房，不禁使人联想到她的颧骨。京向她讲述了自己今晚的所见所闻。

“医院里，”她回答道，“今晚来了三十多个宣传队的年轻妇女，她们是从白匪军<sup>①</sup>那儿逃出来的……都受伤了。来的人越来越多。她们说革命军已经逼近了。死了许多人……”

“有一半伤员会死掉……痛苦只有当它不导致死亡时才有意义，然而痛苦却几乎总是导致死亡。”

梅思索了一会儿：

“是啊，”她终于又开口了。“但这也许只是男人的一种想法。在我看来，在一个妇女看来，痛苦——奇怪得很——只能使人想到生存，而不是想到死亡……这可能是由于分娩的缘故，很可能……”

她又思索了片刻：

“伤员越多越说明起义迫在眉睫，也就越会想到睡觉的事。”

“那当然。”

“我应该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可能会给你带来点烦

---

① 指政府军。

恼……”

他一只胳膊支着脑袋，向她投去了询问的目光。她既聪明又勇敢，却常做蠢事。

“我最终还是和朗格兰睡觉了，今天下午。”

他耸了耸肩膀，好象在说：“这是你自己的事。”然而，他的动作，他面部的紧张神色，都跟这种满不在乎的劲头儿很不协调。她精疲力竭地瞧着他，在垂直的光线下，她的颧骨显得更加突出了。他也在瞧着她那完全处于黑暗中的呆滞无神的眼睛，一言不发。他在想，她的富有肉感的面部表情，是否来自这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和这一副微微鼓起的嘴唇所强烈突出的效果？这是同她的容貌，同她的女性特征相对比而言的……她坐到床上，拉着他的手。他本想把手抽回来，但还是任她拉着。结果她还是觉察到了他的这一心理活动：

“这件事使你伤心了吧？”

“我曾对你说过，你有你的自由……不必多问了。”他痛苦地说。

小叭儿狗跳到了床上。他把手抽回来，可能是想去抚摸它。

“你有你的自由，”他重复说道。“别的都是次要的。”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我应当告诉你，就是从我的良心上讲，也应该告诉你。”

“是这样。”

她要把这件事告诉他，这对他或她来说都不会引起什么问题。他突然想从床上起来；她坐在床头，自己这样躺着，

好象一个被她照料的病人似的……但是起来干什么呢？一切都是徒劳的……但他仍在瞧着她，并且发现她确能使他苦恼。可是近几个月来，不管他瞧不瞧她，也都看不见她了；有时只看到某些表示罢了……他们这种结合在一起的如同一个病态孩子一样经常令人烦恼的爱情，他们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志向，他们之间这种在肉体关系方面的相互谅解，这一切，在命运面前什么也都不存在了，这种命运使得本已被我们看腻了的体态更加减色。“我对她的爱比我原来想的还淡漠吗？”他想。不会。即使是现在，她一旦死了，他也绝不会再象从前那样信心百倍地从事他的事业了，他必定会悲观失望，就象他自己死了一样。然而，任何东西也胜不过这张面孔的减色，这面孔隐藏于他们共同生活的深处，如同隐藏于雾霭之中，如同隐藏于地下。他想起一个朋友，此人曾看到他心爱的女人是怎样丧失了已麻木几个月的理智的；他似乎看到梅正在这样死去，似乎看到自己幸福的影子竟象阴暗天空中一朵浮云一样荒诞无稽地消散了。好象她已经死过两次，一次是死于时间，一次是死于她刚才对他所说的话。

她起身走到窗前。尽管疲惫，可她的脚步却很利落。由于畏惧和感情上的羞愧交织在一起，加上京沉默不语，她决定不再提及她刚才谈到的事情，想回避这个话题，然而她感到他们俩怎么也回避不开。她试图随便说点什么，借以表露表露自己的温情，于是本能地求助于京所崇尚的万物有灵论：一棵正对窗户的玛斯树，夜里已经开花；在这漆黑的夜晚，树上那些依然蜷缩着的叶子，被房间里的灯光映成了浅绿色。

“白天，这树把叶子藏在树干里，”她说，“而今天夜里趁人们不注意，它又把叶子展现出来了。”

她象是在跟自己讲话，可是京怎么会听不出她谈吐中的意味呢？

“你本该选择另外一个日子，”他喃喃低语道。

他一只胳膊撑着脑袋，也在镜子里照着——在白色被褥之间，他长得极象日本人。“假如我不是个混血儿……”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以便驱散那些充满仇恨的或见不得人的念头——他正闷着气，伺机发火。他看着她，他一直看着她，好象这张脸在他蒙受的痛苦之中又重新找到了他所失去的全部生命活力似的。

“可是，京，正是今天这件事才显得无关紧要……再说……”

她本想说：“他的要求太强了。在这生死关头，这算得了什么……”但她仅仅说：

“……我也一样，明天，可能就会死的……”

那太好了。京感到使他蒙受奇耻大辱的痛苦：这种痛苦使他自卑。事实上，她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这是她的自由。他自我意识到对于这种痛苦没有任何权利，而这种痛苦在他身上却有如此之大的权利，那么，他的这种痛苦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想当初，当你明白我……和你心心相印的时候，京，你有一天曾问我——虽不严肃，但也有点认真——我是否认为有一天会跟你一起去服苦役，当时我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过，要在苦役犯监狱里呆下去肯定是很困难的……然

而你当时认为我是会跟你一起去的，因为你和我也是肝胆相照的。那为什么你现在就不这样认为了呢？”

“去服苦役的总是同一类人。卡托夫是可能去的，尽管他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他是出于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的理解而去服苦役的。”

“京，这真是大丈夫的见识……”

他思索着。

“然而，”他说，“爱那些能够这样做的人，或许为他们所爱，除此之外，还想从爱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吗？……有人竟然还去责问他们，看有多气人！……即使他们是出于他们的……道德观念……”

“这不是出于道德观念，”她慢慢腾腾地说，“要是出于道德观念，我是肯定不会那样做的。”

“但是，”他也慢慢腾腾地说，“在你认为我会为此事——正如你刚才说的——而烦恼的时候，这种爱也并没有妨碍你同那个家伙睡觉呀？”

“京，我告诉你一个奇怪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想法……直到五分钟以前，我还认为你对这件事是不会在乎的。这样一来，我也许就想通了……有时总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向你召唤，特别是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对于别人的死，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京……），这样的召唤与爱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然而，嫉妒之心还是有的，尤其是它所激发起来的性欲是建立在温情的基础上，就更使他心烦意乱。他双目紧闭，依然是一只胳膊撑着头，力图把这一切都弄个明白——这可



是件苦差事。他只听到梅的抑郁的喘息声和小狗爪子的抓挠声。他的创伤首先（这么说还会有“然后”喽）是由这样的事实造成的：他认为刚才与梅睡觉的那个男人（可是京不能称他为她的情夫）对梅是蔑视的。那个男人是梅的老同学，京不怎么认识他。但京却知道，从根本上讲，几乎所有的男人对女人都是鄙视的。“他之所以跟她睡觉，那是因为他已经和她睡过觉，反过来他也许会这样看她：‘这个骚娘儿们’，一想到这里，我就很讨厌她。人们向来不都是只嫉妒那些你猜疑我、我猜疑你的东西吗？可悲的人类……对梅来说，性欲就是性欲，同什么也没有牵连。这一点应该让这个家伙知道。和她睡觉，那就睡，但却甭想占有她。我变得令人痛心了……”但他对此毫无办法，不过，关键不在这儿，他心里也清楚。关键问题，搅得他苦恼不堪的问题是，他和她之间突然产生了裂痕，这种裂痕不是出于怨恨——尽管他有些怨恨，也不是出于嫉妒（也许这就是嫉妒？），而是出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同时间或死亡一样具有毁灭性；他已经对她感到陌生了。他重新睁开眼睛，从后侧面望去，眼前这个熟悉的运动员型的身躯是何许人也？一只起自鬓角的细长的眼睛深深地陷在突起的前额和颧骨之间。这就是刚跟人睡过觉的那个女人吗？难道这不也是忍受着他的懦弱、他的痛苦、他的怒气的那个女人吗？这不也是同他一起治疗过受伤的同志们、同他一道为牺牲了的战友们守过灵的那个女人吗？……她那温柔的声音依然在空气中回荡……人们立意要做的事情是不会忘怀的。不过，这个身躯突然又变成了带着令人心碎的神秘色彩的老熟人的形象——哑巴、瞎

子、疯子的形象。

眼前这人却是个女人，不是什么男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她完全避开他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要同她亲密接触的狂热要求使他丧失了理智，在他看来，不论什么样的接触都行，恐吓也好，嚷叫也罢，敲打也可以。他起身向她走去。他很清楚自己正处于发作状态，他也晓得，或许明天，他就会觉得他现在的感受是不可思议的了，可是他站在她的面前就象站在一个临死的人面前似的：就象本能把他推向一个临死的人似的：接触，抚摸，拉住那些即将离开你的人，死死地抓住他们不放……他站在距她两步远的地方，她是那么惶恐不安地瞧着他……他终于恍然大悟自己想干什么：同她睡觉，在性生活里面消除这种晕眩。他就是在这种晕眩中完全把她失去了。当他们用尽全力相互搂抱时，并不需要再相互认识。

她猛地转过身去——门铃响了。卡托夫不会来这么早。难道起义的消息走露了？他们曾经说过的、感受过的、爱过的、恨过的，都一下子灰飞烟灭了。门铃又响了，他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枪，穿过庭院，穿着睡衣就去开门了：原来不是卡托夫，而是柯拉毕克，他仍然穿着他那身无尾常礼服。他们站在院子里攀谈起来：

“怎么样？”

“先让我把单据还给您，给。一切顺利。船挪地方了，它将停泊在法国领事馆前的江面上，紧靠着江的对岸。”

“困难吗？”

“没说的。靠既有的信任，否则，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年轻人，干这类事，越是不该信任，信任就越显得重要。”

这是暗示吗？

柯拉毕克点燃了一支香烟。京在这张模糊不清的脸上只影影绰绰看到那块黑绸方巾。他进屋去找钱夹子，梅还在等他；然后他出来按商定的数目付了酬金。男爵把钱票子卷了卷，连点也没点就塞进口袋里了。

“善有善报，”他说，“亲爱的先生，我今天夜间的经历构成了一部绝妙的道德经：它由施舍开始，以发财告终。没说的！”

他翘起食指，然后凑到京的耳朵上说：

“方朵玛<sup>①</sup>问你好！”说完转身走了。京好象怕回屋似的，目送着柯拉毕克远去，只见他的无尾常礼服在白墙根下不停地摆动。着。“穿上这身衣服，确实很象方朵玛。他是猜到的？还是想象的？还是……”别再出神入化了；京听到一声咳嗽，他很快就辨别出这是卡托夫的声音，他一直在盼着他的到来。今天夜里，每个人都是匆匆忙忙的。

京虽然看不见他，但猜想他穿着粗布工作服上装；再往上，黑暗中，是他的朝天鼻子……京尤其感觉到他的手在摆动。京迎了上去。

“怎么样？”他问道，跟刚才问柯拉毕克一样。

“行了。船呢？”

“在法国领事馆对面，离码头很远。半个小时以后。”

---

<sup>①</sup> Fantômas，恐怖小说和电影中的神秘人物。

“快艇和我们的人离那儿有四百米远。咱们走吧！”

“制服呢？”

“用不着你担心。我们的人都绝对准备好了。”

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就穿好了裤子和粗毛线衣，还穿上了绳底帆布鞋（他也许要攀登什么）。他正准备要走，梅向他鼓起了嘴唇。京本想去吻他，但嘴巴却不动，好象这张独立自主的嘴巴仍在积着怨似的。最终他还是吻了她，但是勉强得很。她眼睑低垂，忧伤地看着他；一旦表情发自肌肉，她那充满阴影的眼睛就变得极其富有表现力了。他走了。

他再次同卡托夫并排走着，但思想上却始终摆脱不掉她。“刚才我觉得她很象个疯子或者瞎子，我都不认得她了。我只能在我爱她的范围内，在我爱她的情况下，才认得她。我父亲说过，对于一个人，人们只能赢得他身上变化着的东西……以后怎么办？”他陷入了沉思，如同陷入了这条越来越昏暗的弄堂里一般——这儿，连电报局的绝缘子也不再向空中闪闪发光了。他再次变得焦虑不安，并回想起录音唱片来了：“人们听别人的声音凭借的是耳朵，听自己的声音凭借的是喉咙。”的确如此。他的生活也是一样，他凭借喉咙才能听到它，那么别人的生活呢？……他首先感到的是孤独，在这广大人群背后那种永恒的孤独，就象这充满希望和仇恨的寂静的城市，在原始的漫漫长夜里，在漆黑的低沉的夜空下伺机待发一样。“可我，对我来说，对喉咙来说，我究竟算是什么呢？是一种绝对的肯定，一种疯子般的肯定：这种肯定的强度比其他任何别的东西都大。别人看来，我的

所作所为就说明我是什么了。”只有梅认为，他并不是他的所作所为的总和；也只有他认为，梅的传记跟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两码事。人们通过拥抱，在爱情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解除孤独。但这种拥抱帮不了人的忙，只能帮疯子以及无与伦比的、比任何东西都理想的怪物的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这种疯子和怪物，而且打心眼里疼爱他们。自从母亲过世以后，唯有梅认为他并不是京·吉索尔，而是最亲密的推心置腹的人。“一个心甘情愿的、服服帖帖的、精心挑选的推心置腹的人”，他想。他与黑夜配合得格外默契，仿佛他的思想已不再适应光明了似的。“男人们不是我的同类，他们是监视我、评判我的人；我的同类是那些喜欢我，不监视我的人，是那些不顾一切地喜欢我的人，是尽管我名誉扫地、行为卑劣、背信弃义但仍然喜欢我的人，他们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过去的或将来的所作所为，正因为他们喜欢我，所以我也会喜欢我自己，甚至会喜欢到想自杀的地步……我只是和她才能共有这种已经破裂或者尚未破裂的爱情，如同其他一些人共有一些身患重病、随时可能死亡的孩子一般……”这肯定不是什么幸福，而是某种与黑暗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原始的东西；它使他周身感到一阵燥热，这燥热最后消失在一动不动的如同脸贴脸似的相互拥抱之中——这是他身上唯一与死亡同样有力量的东西。

屋顶上已经有一些人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了。

## 凌晨四点

老吉索尔把陈胡乱撕下来并在上面用铅笔写过名字的一小片纸，揉成一团放进室内便袍的口袋里。他急切地盼望着同他从前的学生会面。他的目光重新落到正在和他讲话的人的身上：这是一位非常年迈的中国人，样子很象东印度公司出品的中国官员的瓷制塑象，他身穿长衫，翘着食指，迈着碎步，朝门口走去，嘴里不停地用英语说着：“女人绝对服从的存在，姘居和妓女机构的存在，这都很有必要。我将继续发表我的文章，因为我们的祖先以为这些美丽的画幅就是这样存在的（他用眼睛瞟着那只蓝色的凤凰，头部却没有移动，犹如暗送秋波一般），您为此而感到自豪，我也不例外。女人服从男人，就象男人服从国家一样；不过伺候男人不象为国效劳那么艰难。难道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着的吗？若是那样，我们就太不值钱了。我们眼下是为国家而活着，为维护千百年来死者们的秩序而活着……”

他到底走不走呢？这个死死抱住自己过去不放的人，甚至在今天（难道那些军舰的汽笛声还不足以充斥夜空吗……），面对着已被血液浸染了的中国和它那些青铜祭器，他仍象某些狂人那样诗兴大发。秩序！无数穿着蓝绣长袍的骷髅一堆一堆地被遗弃在远古时期一动不动；对面，有成千上万纺织工人，还有庞大的苦力队伍。女人们都服从吗？梅每天晚上回来都讲述一些定婚女子自杀的消息……

最后那老头儿说了句：“秩序，吉索尔先生！……”，用头和肩膀频频致意之后就告辞了。

听到门一关上，吉索尔便把陈唤出来，两人一起回到凤凰厅。

当陈开始在吉索尔前面踱来踱去的时候，吉索尔正微侧着身子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回想起一只埃及铜质的鹰，京出于对陈的好感保存了这只鹰的一张照片，“因为它与陈极其相象”。这话一点不假，虽然陈那厚厚的嘴唇给人一种善良的感觉。“总之，一只被弗朗索瓦·达西兹<sup>①</sup>改宗的鹰，”他想。

陈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是我杀死了唐寅塔”，他说。

他看到吉索尔的目光里流露出某种温柔的感情。而他却鄙视温柔，甚至于害怕温柔。他那短短的脖子，走起路来向前探着的脑袋，弯曲的鼻梁骨，这一切都使他非常象鹰，尽管他的身材短粗。即使他那双几乎没有睫毛的细长眼睛，也使人联想到鸟类的形象。

“你来就是想跟我谈这个的吗？”

“是的。”

“京知道不？”

“知道。”

吉索尔思索起来。既然他不想根据偏见来答复，那他只能表示赞同。然而他这样做也是比较勉强的。“我老了，”他

<sup>①</sup> Saint Francois d'Assise (1182—1226)，生于意大利的达西兹，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

想。

陈不再走动了。

“我感到特别孤独，”他终于盯着吉索尔的面孔说道。

吉索尔感到局促不安。陈总这样缠着他，他并不感到奇怪；按照中国的说法，他曾是陈多年的师长——虽比不上陈的父亲，但却胜似他的母亲。自从陈的双亲去世以后，毫无疑问，吉索尔便成了陈相依为命的人。今天夜里，陈肯定见到过他的同志们，因为他刚才还看到过京。但有一点吉索尔不明白，陈好象与他们十分疏远似的。

“其他人呢？”吉索尔问。

陈见到过他们，那是在唱片商店的后间；随着灯的晃动，他们时而隐没于暗处，时而又显现于明处；蟋蟀唧唧地叫着。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是你干的？”

“这，他们知道，不过无关紧要。”

陈又沉默了。吉索尔尽量不再问下去。陈却又说道：

“……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头。”

吉索尔好象突然有些明白了，陈感觉到了这一点：

“不，您不明白。”

他说法文时，把所有只有一个鼻音音节的字都加上了很重的喉音，而且还时常掺杂一些从京那儿学来的惯用语，真是出人意外。他的右臂本能地沿臂部下垂；他再次感觉到那个被刺中的躯体在钢丝床床绷的作用下朝匕首反弹过来的滋味。这说明不了什么。他今后还会去行刺的。不过，在这之



前，他希望能有个藏身之处。这样一种无需作任何解释的深厚感情，吉索尔只对京才会有。陈对此是了解的。但是如何解释呢？

“您从来没杀过人，是不？”

这一点对陈来说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对这样明显的事实他今天竟也怀疑起来了。他突然觉得在吉索尔身上缺了点什么。他再次抬起头来，从上到下打量着吉索尔：由于他做了向后甩脑袋这个动作，看起来他的白发相当长。吉索尔对陈说话不加任何手势感到困惑不解，岂不知这是由于陈的伤口的缘故，陈只字未向他透露。陈并不是感到伤口疼痛（他的一个当护士的伙伴已经给消过毒，包扎好了），只是感到它妨碍自己的行动。如同平时思考问题时一样，吉索尔的手指缝里好象总在玩弄着一支肉眼瞧不见的香烟：

“也许……”

他停了下来，在他那刚刚刮过胡子的圣殿骑士团骑士般的面容上，两只明亮的眼睛在凝视着什么。陈等他说下去。吉索尔近于粗暴地开了腔：

“我不相信仅仅因为想起凶杀就使你这样坐卧不安。”

“很明显，他也不清楚他谈到的问题”，陈试图这样想；不过吉索尔还是触到了要害。陈坐下来，低头瞧着自己的双脚：

“不，”他说，“我自己也不相信仅仅回忆一下就会使我这样。还有别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一点他才来的吗？

“跟你睡觉的第一个女人是个妓女，不错吧？”吉索尔和气地问。

“我是个中国人，”陈怀恨地说。

“不，”吉索尔想。也许，除了性欲方面的特征，陈并不象是个中国人。充斥整个上海的各国侨民曾使吉索尔看到了男人是怎样以其民族特有的方式脱离自己的民族的，而陈不属于中国，甚至连他脱离中国的方式也不是中国式的：一种近乎非人道的完全的自由，促使他将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他的理想。

“而后你还感觉到什么？”吉索尔问。

陈把手指蜷缩起来。

“还感到骄傲。”

“为是一个男人而骄傲？”

“为不是一个女人而骄傲。”

他的声音里不再含有怨恨，但却带有一种极其复杂的蔑视成分。

“我看您是想说，”他接着说，“我想必有一种……离群的感觉吧？”

吉索尔避而不答。

“……是的，这种感觉极为强烈。再说您提起女人也不无道理。也许杀人者极其蔑视自己所要杀的人，但相比之下，却远不如对其他人蔑视得那样厉害。”

吉索尔极力想听懂这话的意思，但最后是否真的懂了，他自己也没有把握：

“是指那些没开过杀戒的人吗？”

“是的，是指那些没开过杀戒的人：那些童男童女们。”

他又踱起步来。最后这几个字就象卸车时把车上的东西一下子全掀翻在地上一样从他嘴里迸了出来。他们周围更加寂静。吉索尔也不无伤感地开始尝到了陈所谈及的那种离群的滋味。然而他怀疑陈有开玩笑的意思——起码有取悦于人的成分。他十分了解这类玩笑可能带来的致命后果。他猛然想起陈曾对他说过厌恶打猎的事来。

“你对血不感到厌恶吗？”

“厌恶。而且不仅仅是厌恶。”

他突然转过身子，注视着凤凰；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如同他死死盯住吉索尔一般。他问道：

“是吧？对于女人，当她们企图继续占有您的时候，我知道您是会怎样对付她们的：跟她们同居。可对于死亡怎么办呢？”

他说到这儿，越发悲伤起来，但目光依然停留在那只凤凰上。

“那是粘贴画吗？”

吉索尔的智能才智总是使他倾向于去援助谈话对方，何况他对陈还很有感情。但是他也开始明白了：突击组的行动已不再能满足这个年轻人的要求了，恐怖主义对他已产生了某种迷惑力。吉索尔总在捻动着他那支想象中的香烟，脑袋象欣赏地毯似地向前伸着，一绺白发耷拉在细长的鼻子上。竭力想使自己的话语带上超脱的语气，他说：

“你认为你已经不能自拔了……而你就是为了替自己的

这种……烦恼进行辩解……才来我这儿的。”

沉默。

“烦恼，不，”陈终于咕哝道。“是命运吧？”

依然是沉默。吉索尔感到自己连动也不能动了，他已不能再象往常那样拉住陈的手了。他也拿定了主意，仿佛突然染上了烦恼的习惯，厌烦地说：

“对，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应该对它相信到极端的程度。假如你想让命运主宰你的生活的話……”

“我不久就会遭到杀害……”

难道这就是他所希望的归宿吗？吉索尔的心里这样想。他既无沽名钓誉之心，也不渴望获得任何幸福。他能够赢得胜利，但却不能在自己的胜利中生活，除去死亡之外，还能有别的结果吗？毫无疑问，他想把别人赋予生活的那种意义赋予死亡。要死得无比高尚。这不正是那种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的灵魂吗？这种人头脑相当清醒，与人世相当隔绝，或者相当厌世，因此他们蔑视自己壮志企及的全部目标，乃至壮志本身。

“假如你让这种……命运主宰你的生活的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传下去。”

“谁配呢？”陈依然喃喃地说。

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仿佛这些话所唤起的有关凶杀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吉索尔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每个字的发音都是虚假的、无聊的、愚蠢的。

“谢谢，”陈说。

他向吉索尔行了个中国式的鞠躬礼（他从不如此行礼），

好象不想触动吉索尔似地走了。

吉索尔回身坐下，又开始捻动他的“香烟”。他这是第一次面对鲜血，而不是战斗。一如既往，他思念起京来。京已感到陈活动的天地是令人窒息的地方……难道这是真的吗？陈也讨厌打猎，陈也厌恶血液——以前是这样。在这个深度上，他对自己的儿子了解多少呢？当他的爱已不能再起任何作用，当他已不能再参照那许许多多的回忆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对京的了解也就到此为止了。再见他一面的强烈愿望搅得他心慌意乱——这是那种想在自己的亲人临死以前见上一面的愿望。但他知道京已经离去。

到哪儿去了呢？陈的出现也给这个房间带来了生气。陈已堕入凶杀世界而不能自拔；他以自己的顽强精神投身于恐怖主义的生活之中，如同投入监牢一般。不出十年，他就可能被捕——被拷打或被杀害；在这以前，他会象一个着了魔的人一样坚定地生活在这个决心和死亡的世界之中。他的理想促使他活下去；可现在，却要置他于死地。

京让人去杀人，那是他的职责。即使不是这样，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京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但是，吉索尔被这突如其来的感觉吓坏了，被这种对凶杀命运、对象他本人吸鸦片中毒一样可怕的中毒的坚信吓坏了——而他对自己已中毒是无所谓的。他意识到，在陈需要帮助时，自己所给予他的是多么微小，他去行刺是多么孤立——由于这种焦虑的心情，京现在跟他是多么疏远啊。他觉得，他过去经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口头禅“人与人之间无了解可言”，今天，第一次在他儿子的脸上流露出来了。

陈这个人他了解吗？他不太相信回忆有助于对人的了解。陈所受的启蒙教育是宗教性的，其父母是在张家口遭洗劫时丧生的。当吉索尔开始对这个内心深处桀骜不驯、孤苦伶仃的青年产生兴趣时，后者刚刚离开路德<sup>①</sup>教会学校。他在那儿的老师是一位身患肺病的知识分子，晚年才改做牧师，虽然已经五十岁了，但还坚韧不拔地力求以爱德教育去消除强烈的宗教不安。这位牧师被折磨奥古斯丁神的那个躯体的耻辱所纠缠——那是堕落的、在里面必须同基督生活在一起的躯体；被对中国礼仪文明的厌恶情绪所纠缠——它包围着他，又使他更加急切地呼吁真正的宗教生活。这位牧师曾忧心忡忡地描绘过路德的形象。有时他也跟吉索尔谈起路德，他说：“生命只属于上帝；至于人，由于其罪孽，已堕落到了那种地步，已是那样无可挽回地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以至一旦来到上帝面前，就成了某种渎圣罪犯。因此才有了基督，因此才有了不朽的耶稣受难像。”圣宠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根据希望的大小，存在无限的爱或恐惧；而这种恐惧又是一种新的罪孽。爱德也是存在的；然而爱德往往不足以消除烦恼。

牧师很喜欢陈。他并不怀疑，负责照料陈的那位舅舅把陈送到传教士那里只是为了让陈学习英文和法文，而对于他们的教育，尤其是对于他们的关于地狱的概念，这位儒家却有所怀疑，曾让陈严加防范。这孩子遇见的是基督，不是撒旦，也不是上帝——牧师的经验曾向他证明：人类从来只是

①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向调解人皈依——他象对待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以严谨的态度委身于爱。然而，他对老师相当尊重——这是中国反复灌输给他的唯一的東西——因此，尽管他的爱是别人教出来的，但他还是发现了牧师的烦恼，在他面前，还是出现了一个比人们提防的更加可怕、更令人信服的阴曹地府。

舅舅回来了。重新见到外甥，他感到惊骇。他对外甥体贴入微，十分满意，把一些玉石的和水晶的小树送给了校长、教师和其他几个人；八天之后，他把陈叫到自己的住处，又过一个星期，他把陈送进了北京大学。

吉索尔一直在双膝之间搓捻着他的“香烟”，嘴巴微微张开，极力追忆着当时的那个青年。怎样才能把那时的陈同现在的陈区别开来呢？“我想到了他的宗教精神，因为京从未有过这种精神，而他们之间此时此刻的一切重大差异都会使我得到解脱……为什么我会觉得对他比对我儿子还了解呢？”那是因为吉索尔很了解他到底在哪些方面使陈发生了变化：这种根本的变化，即他的作为，是很明显的，是可限制的，对于人，他最了解的就是他曾给他们带来些什么。他刚开始观察陈的时候，就深知这个青年不会靠一种不能立即变成行动的思想而生活。他得不到爱德，所以只好听任宗教将自己带进那种修身养性或内心体察的生活中去；然而他憎恨这种静修的生活，一心渴望使徒的职务。正因为得不到爱德，因而他失去了这个职务。为了活下去，那他首先就要从他信奉的基督教义中解脱出来。（吐露一点隐情：看来，由于结识了一些妓女和大学生，使得陈的意志所不能控制的唯一罪孽——手淫的毛病去掉了；由于这种罪孽，他思想上曾一再

感到烦恼和颓废。) 当他的新老师并不用一般的手段, 而是用另外一些高尚的方式来对付基督教的时候, 信仰就逐渐地、不慌不忙地从陈的手指缝里溜走了。由于这种信仰他才脱离了中国; 由于这种信仰他才习惯于与人世隔绝而不屈从于人世。通过吉索尔他明白了, 这一切已成为过去, 好象他生活中的这一段经历只不过是英雄主义的启蒙阶段而已: 假如没有上帝, 也没有基督, 该怎样安排一个灵魂呢?

这时, 吉索尔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儿子, 儿子对基督教冷漠无情, 但是日本式的教育(京八岁至十七岁曾生活在日本)也曾迫使京相信, 理念不应该只停留在思想上, 而应该付诸行动。京极其认真、深思熟虑地选择了行动, 如同其他人选择武器或海洋一样。他曾远离父亲, 去广州、天津谋生, 过着普通工人和人力车夫的生活, 为的是组织工会。在攻占汕头时, 陈的舅舅被捉去作人质, 无钱赎身, 被处决了。当时陈身无分文, 手持一张一钱不值的文凭, 在年方二十四岁的时候, 面对着中华大地。在北方的道路还很艰险的时期, 他当过卡车司机, 还当过化学家的助手, 别的什么也没干过。他希望出现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即使是粗茶淡饭, 但只要人人能够吃饱肚子就好(他禀性严肃刻苦, 这也许是出于自豪感的缘故); 能够痛痛快快地报仇雪恨, 能够无拘束地表达他的思想和发展他的性格。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着他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这种活动赋予他的孤独以某种含义。可是, 对京来说, 一切都显得格外简单。他认为英雄主义是一种纪律, 而不是对生命的一种解释, 因此, 他无忧无虑。他的生活具有某种意义, 他也十分了解这种意义, 让所有正



被慢性瘟疫似的饥饿折磨致死的人具有自尊心。他们是他们的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作为被白种人，特别是被白种女人所蔑视的混血儿，贱民，京从不想取悦于他们，只是在他们当中寻找过自己人，而且找到了他们。“对于一个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而又不知道为什么而工作的人来说，不可能有自尊心，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应该让这种工作具有某种含义，变成一种类似祖国那样神圣的东西。个人问题对京来说只在私生活中才有。

“可是，假如京进来后象刚才陈那样对我说：‘是我杀死了唐寅塔’，假如他真的这么说，我会认为‘我已经知道了’。在他身上可能存在的东西，在我身上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不管他对我说什么，我都会认为‘我已经知道了……’”他凝视着窗外寂静而又冷漠的夜色。“但是如果我真的知道此事，而且不是以这种靠不住的、令人恐惧的方式知道的话，那我将设法拯救他。”多么痛苦的断言，但他对此却一点也不相信。

自从京离家以后，他的思想就只用来判断他儿子的行动了。京首先在华中或华南各省的某些地方开始活动（往往一连三个月他都不知道儿子的下落），当时这些活动还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那些忧国忧民的大学生意识到他这位智者是以极大的热情和极深刻的洞察力在帮助他们的话，这绝不象当时北京那些老奸巨猾的人所认为的那样，他间接地玩弄与他的年龄相差悬殊的年轻生命，以便消遣；实际上，他是在所有这类悲剧当中，找到了自己儿子的悲剧。他告诉他那些几乎全是小资产者的大学生，他们没有别的抉择，要么同军阀结

合，要么同无产阶级结合；他对那些已经做了抉择的学生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信条，而是一种意志。对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对你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相互了解的意志，象无产阶级那样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意志，象无产阶级那样取胜的意志；你们不应该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正确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为了取得胜利而不背叛你们自己”。这些话他也都对京说过，而且为京辩解过。下课之后，每当他发现学生们按照中国的习惯在他的房间里摆满了白花时，假如他知道这不是京的严格精神给他的答复的话，但起码他心里也明白，这些给他带来山茶花同时又在准备杀人的手，明天将握住他儿子的双手，他儿子需要这些手。正因为如此，个性的力量才将他引导到这步田地；正因为如此，他才特别喜爱陈。但是，当他喜欢上陈的时候，他曾否预料到这个小伙子在这样一个雨夜里谈起刚刚凝结的血液时，会对他说“我对此不仅仅是厌恶……”这样的话呢？

一张矮桌子下面放着各类小仙人掌。他起身拉开桌子的抽屉，他的烟具盘摆在里面，烟具盘的下面，有一张京的照片。他抽出来一边看着，一边空泛地想着。他坚信，他所到之处，谁也不再了解谁；而京的出现——这是他刚才所热切盼望的——并没有改变什么，只不过使他们之间的离别更加凄楚罢了，就象是已过世多年只在梦中紧紧拥抱的朋友之间的离别一样。他手里捏着照片，这照片如同一只手那么温暖。他把照片重新放回抽屉里，拉出烟具盘，关上电灯，点上了烟灯。

他抽了两锅。昔日，每当他的热望得到满足的时候，他

就和善地看人，就认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做到的。可如今，在他心灵的最深处，那些可能做到的事情并未找到位置：他年已六旬，在他的回忆里充满了坟墓。他对中国艺术真正的鉴赏，对被油灯微微照亮的这几幅藏青色画幅真正的鉴赏，对在中国受到陶冶的、三十年前他就受益非浅的全部具有启示性的文化的真正鉴赏——他对幸福的鉴赏，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伪装，在这层伪装的下面，跟昏睡后张皇不安的狗一样，产生了烦恼的情绪和萦绕脑间的死亡念头。

然而，他的思想仍围绕着人类驰骋纵横，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热情仍不减当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首先是在他的身上，都有一种狂想的因素，长期以来，他都对此确信不疑。从前——光阴如流水……——他曾把自己想象成一位英雄。其实不然！这种力量，这种深藏于他自己脑海里的狂热的想象（“我是不是要发疯了”，他曾想，“我只剩下这点想象力了……”）象光似的即将以各种形式出现。几乎是出于和京同样的理由，他象京一样想到了京曾同他谈起过的唱片；而且，回想的方式也几乎同京一模一样，因为京的思维方法是从他那儿承袭过来的。京因为用喉咙听自己的声音而分辨不出自己的声音，与此相仿，吉索尔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无疑比他意识别人的存在更为艰难，因为这两种意识不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得到的。对自己的意识根本不是靠感官得来的。他觉得，凭借侵入自己灵魂深处的意识，他已闯进了一个不属于别人而是他个人专属的领域；他还焦虑不安地感觉到，自己正处在一种别人不能介入的孤独之中，任何人也休想再见到他。霎时间，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逃脱死亡

的命运……他那双正在团弄一个新烟泡的手在微微颤抖。他完全处于这种孤独之中，即使对索的爱也不能使他从中解脱出来。然而，假如说他不晓得怎样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他还是知道怎样自我解脱的：吸鸦片烟。

五个烟泡。多年来，他每次总吸这么多，当然，坚持这样做，也并不容易，有时不免还有些痛苦。他刮了刮烟枪上的烟斗嘴；他的手影子从墙壁向天花板滑去。他随手将油灯向外推出去几公分，影子的轮廓随即消失了。房间里的物品也在消失，不过，它们并没有改变形状，只是已不能再同他区别开来，并在他所熟悉的另一个世界的深处与他重聚，在那里，一种亲切的冷漠感将所有的东西都揉和在一起——这个世界比另外一个更加真实，因为它更为稳定，同他自己更为相似；它象友谊一样可靠，总是那么宽容，随时都能找到：外形，记忆，观点……一切都缓缓地隐没于一个已经超脱了的天地。他回想起九月的某天下午，灰白的长空将种植着大片睡莲的湖水映成了乳白色；从一个荒凉的、布满蛙痕的尖角亭子，直到那美丽而暗淡的地平线，他见到的只是一个满目凄凉而又庄严的世界。一个和尚不去照看他的圣所——他那布满尘土、充满木头燃烧后所散发出的芳香气味的圣所，也不摇铃，只把双肘支在亭子的栏杆上；采莲子的农民，正驾着小船无声无息地打这儿经过；船桨在最后一排睡莲花附近激起的两道长长的水纹，无精打采地消失在银白色的湖水之中。这时，那些睡莲花逐渐地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与此同时，还用它们各自的扇形花瓣收集着人间的一切煎熬，这种煎熬没有痛苦，被鸦片烟带到了一个极度纯真的世界。吉索

尔双目紧闭，被纹丝不动的巨大的翅膀托着，正在揣摩自己的孤寂：这是一种忧伤，在宁静的航迹无限扩展开来并逐渐复盖住死亡深渊的时候，这种忧伤正与神明联系在一起。

凌晨四点半。

几个人身穿政府军士兵的军服，披着防水衣，鱼贯登上被长江的波涛拍打得摇晃不定的大快艇。

“水兵里有两个人是党内的，要问问他们，他们可能知道武器放在哪儿。”京对卡托夫说。若不看长统靴子，军服倒是没怎么改变卡托夫的外貌。他穿的军服上衣同京一样，钮扣扣得也是马马虎虎。可是他感到很不习惯的崭新的军帽，却端端正正地戴在脑袋上，给人一种傻里傻气的感觉。京想：“一顶中国军官帽，加上这样一副嘴脸，实在令人吃惊！”夜还是黑沉沉的……

“把你的风帽戴上吧，”他还是这样说道。

快艇驶离码头，在黑暗中飞速前进，不久便消逝在一条帆船的后面了。巡洋舰探照灯的光束从天空急速地扫到模糊不清的港口上，如同无数把军刀相互交叉在一起。

卡托夫在快艇的前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似乎越来越向这边靠拢的“山东”号。港口的腐水味、鱼腥味和烟熏味逐渐取代了码头上的煤烟味向他袭来，就在这个时刻（他的身子几乎贴在水面上），每次迫近战斗时所唤起的回忆再一次涌上他的心头。那还是在立陶宛前线，他们一营人都做了白军

的俘虏。在临近暗绿色的黎明时分，被缴了械的士兵们，在朦胧可见的茫茫雪原上排列成行。“共产党员们出列！”死神在等待着他们，这一点他们很清楚。全营三分之二的人都站了出来。“脱下上衣！”“挖坑！”他们挖了起来，但是挖得很慢，因为地都冻了。白军守卫个个紧握手枪（因为铁锹也是有可能变成武器的），在左右两侧不耐烦地监视着这些俘虏——中间空着，因有机关枪对着他们。无限的沉寂如同广袤的雪原一样无边无际。只能听到冻土块以越来越快的频率落地的单调声音；尽管濒临死亡，俘虏们依然在加油干着，借以暖和身子。其中好几个人已开始打喷嚏了。“好啊！都停下来！”他们转过身去，只见在他们后面，在他们的同志们的那一边，村子里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聚拢过来了，他们衣不遮体，身上披着毯子。把他们召来，为的是杀一儆百。他们一个个摇晃着脑袋，好象在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去看似的；由于恐慌，他们都木然呆立着。“脱下裤子！”因为军服极为短缺。囚徒们踌躇不决，因为有妇女在场。“脱下裤子！”用破布包扎起来的伤口一个接一个地裸露出来了；机关枪曾扫射得很低，差不多每个人都在腿部受了伤。虽然他们的军大衣都是随便扔在地上的，但许多人都在叠裤子。他们重新排好队，这一回是在他们挖好的坑穴边上，面对着机关枪，站在雪地上，肌肉和衬衣的颜色都显得十分浅淡。由于受凉，他们一个个接二连三地打起喷嚏来。这些喷嚏在这执行死刑的黎明时分具有那么强烈的人情味，以至于机枪手们竟没有射击而等待起来——等到生命变得不再那么引人注目的时刻。最后他们还是下了决心。第二天晚

上，红军重新占领了这个村子，有十七个没被打中要害的人——其中包括卡托夫——被救活了。当年那些在黎明前的暗绿色的雪原上被痉挛性的喷嚏所震动的、显得浅淡而明晰的影子，此时此刻，却在雨夜中，在中国的雨夜中，面对着“山东”号的阴影。

快艇在继续前进，左右摇晃得相当厉害，好象那艘火轮的低矮而模糊的轮廓也在江面上轻轻地摆动似的。快艇上几乎没有什么灯光，在那阴暗的夜空中只能辨别出一个更加阴暗的轮廓。毫无疑问，“山东”号已有护卫。一艘巡洋舰上的探照灯发现了快艇，跟踪了一会儿方才罢休。于是，快艇来了个急转弯，向火轮的尾部稍微偏右的方向驶去，仿佛是冲着邻近的那条船开去的一般。快艇上的每一个人都穿着水手防水衣，风帽垂到军衣上。按照港口当局的命令，所有船只的舷梯都放了下来。卡托夫透过用防水衣遮掩着的望远镜朝“山东”号的舷梯看了一眼，只见它悬在距江面一米高的地方，被三只灯泡的微光照着。假如船长在允许他们上船之前跟他们要钱的话，他们拿不出，就只好一个接一个地从快艇上蹿上去；但让快艇停在舷梯下面不动可不是件容易事。如果有人企图从船上把舷梯拉上去，卡托夫将朝操纵绳索的人开枪；滑轮下面没有任何遮拦。不过，这样一来，火轮必将奋起自卫。

快艇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朝“山东”号驶去。这时，湍急的水流拍打着快艇的两舷；霎时变得无比高大的火轮（他们已来到火轮的跟前），犹如一条幽灵船在夜间飞速开起来一般。驾驶员将快艇加足了马力，这样一来，“山

东”号才好像减慢了速度，停了下来，甚至后退了。他们向舷梯靠拢过去。卡托夫顺手抓住了它，接着一个屈膝上冲，便爬到了舷梯的横档上。

“有单据吗？”把守舷门的人问。

卡托夫递上单据，那个人转交给另一个人后，仍持枪站在原地不动。看来他是想让船长辨认一下这是否是他自己开过的单据。这可能不成问题，因为当初柯拉毕克将此单据转报他的时候，他就验证过了。然而……在舷门下，深色的快艇随着江面的起伏上下颠簸着。

传令水手回来了：“您可以上来。”

卡托夫没有动窝，他手下一个佩戴中尉肩章的人（他手下人中唯一会讲英语的人）离开快艇，上了舷梯，跟着传令水手去见船长。

船长是个挪威人，留着光头，面孔绯红，正在他舱室的办公桌后面等他。传令水手退了回去。

“我们来提取武器，”中尉用英语说道。

船长惊愕地看着他，没有答话。将军们总是花钱买武器的；这批武器的出售是由一领事馆的专员派经纪人唐寅塔秘密谈判成交的，而且已付了合理的报酬。假如他们对秘密进口商不恪守诺言，那谁还会再向他们提供武器呢？但是，既然他只同上海政府打交道，那他就该尽量保住这些武器。

“Well①！这是钥匙。”

他泰然自若地在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摸索着，摸索着，霍

① 人趁夜时靠臂力撑起。

② Well，英语“好”的意思。



地把手枪掏了出来，对准同他只有一桌之隔的中尉的胸膛。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喊：“举起手来！”原来是卡托夫正从船的纵向通道里敞开的窗子上向他瞄准。这一下可把船长闹懵了，因为卡托夫是个白种人：眼下没有必要再坚持了，不值得为这几箱武器断送掉自己的性命。“这一趟算是没有指望了。”船长好象已预感到他和他的船员们再这样坚持下去会得到什么下场。他放下手枪，中尉上前抢了过来。

卡托夫进来搜了他的身以后，没发现有什么别的武器。

“既然身上只带一支手枪，那船上就绝对没有必要再放这么多手枪了”，卡托夫用英语说。他手下的六个人在他之后鸦雀无声地鱼贯而入。卡托夫步履笨重，体态健壮，脑袋仰着，加上淡黄色的头发，这都是俄国人的特征。是苏格兰人？可这口音……

“你们不是政府的人，对不？”

“这不关你的事。”

大副被带来了，脖子和双脚都用绳子妥善地捆绑着，他是在睡梦中突然被捉住的。卡托夫手下的人捆好了船长，两人留下来看守着他，其余的人同卡托夫一起下到船舱里。船员中的党员告诉他们武器藏在什么地方：当初澳门进口商所采取的唯一防范措施，就是在所有的武器箱子上都标上了“零件”两个字。开始搬运了。舷梯又往下放了放，搬运没费什么劲儿，因为箱子都很小。卡托夫先去破坏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然后又来对船长说：

“如果您急于下船的话，我事先可告诉您，不等您走到马路的头一个拐角处，您就会被打死。晚安。”

纯粹是吹牛，不过，紧绑着俘虏胳膊的绳索，却赋予这种牛皮以力量。

革命者由两名向他们提供情况的船员陪同返回快艇。这一次，解下拴在舷门上的绳索后，快艇不再兜圈子，径直朝江岸飞驰而去。由于颠簸，快艇上的人相互挤挤撞撞。他们换上了自己的衣服，虽然个个喜出望外，不免也有些惶惶不安：没有靠岸之前，就没有把握可言。

来到江边，一辆卡车正在等候他们，京坐在司机旁边。

“怎么样？”

“万无一失。这是初出茅庐的人都能干的事情。”

转装结束后，卡车开走了。跟车的有京、卡托夫和另外四个人——其中一人仍穿着军装。其余的人都散了。

卡车隆隆地驶过华界的每一条街道。每当车身颠簸时，那马口铁刺耳的摩擦声便掩盖了这隆隆声，原来卡车两侧靠近车帮的地方放着几只油桶。每到一个重要的组，如店铺、地下室、套房，卡车都要停下来，从车上搬下一只箱子，箱子的一侧插着一张由京标出数目字的标签，武器就是按这个数字进行分发的，其中一些武器应分发给下属战斗组织。卡车几乎每次停的时间都不超过五分钟，因为它还要到二十多个队部去。

他们不怕别的，只怕有人出卖：这隆隆作响的卡车是由一名身穿政府军军服的司机驾驶的，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途中，他们碰上了一支巡逻队。

“我成了流动送奶员了”，京想。

天已经亮了。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第二部分

三月二十二日

上午十一点。

费拉尔的汽车顺着滨江路飞驰着。他乘坐的这部车，是上海唯一的一部瓦赞牌汽车，因为法国商会会长绝不能用美国车。“糟了！”费拉尔想。马路右边是成千上万的纺织工人，他们举着长条幅，上面写满了“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准雇用八岁以下童工”等字样。他们聚集在人行道上，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躺着，呈现出一片极度混乱的景象。汽车绕到一群妇女的前面，她们簇拥在“给女工坐的权利”的标语旗下。兵工厂里一个人也没有，因为冶金工人在罢工。马路左边，成千上万穿着蓝色破旧工作服的船员沿江岸蹲着，等待着，他们没有打旗。游行示威的人群，从江岸一直延伸到与江垂直的大街小巷的深处。靠江这边，挤在栈桥码头上的人群，挡住了视线，使人看不到江水的边际。汽车离开滨江路，驶进了双共和国大街。汽车现在陷入了往前推移的人潮当中，几乎开不动了。这些中国人从四面八方涌

向法国租界这个庇护所。人流缓慢地不断地“超过”汽车，如同赛马时一匹马超越另一匹马的情景一样：先是头部超越，后来是颈项超越，再以后是胸部超越。马路上有独轮车——车上婴儿的脑袋杵拉在饭碗中间，有北京双轮车，有人力车，有毛茸茸的小马驹，有手推车。还有一些载着六十多人的四轮大车——放在车上的大床垫上，堆满了全部家当，桌子腿儿倒竖着；车上还有一些彪形大汉，提着一个乌鸛笼子，伸开双臂，保护着那些背着孩子的矮小女人……司机好不容易掉转车头，驶进了小巷，这里虽然还是阻塞，但一鸣喇叭，还是可以把车前几米处的人群驱散的。汽车在法国警署高大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

费拉尔几乎是跑上了楼梯。

尽管他梳着背头，穿着云纹料子的西装和灰色纺绸衬衫，但脸上仍保留着一九〇〇年他青年时代的某些气质。他讥笑那些把自己装扮成“工业巨头”的人物，而他自己却装扮成外交家，只不过是戴着单片眼镜罢了。近于灰白的下垂的胡子，好象是向下耷拉着的嘴角线条的延长，使他的侧面给人一种近乎粗野的感觉。鹰钩鼻子与有点细长而尖翘的下巴搭配得当，显得刚毅有力。今天早晨，下巴上的胡子刮得马马虎虎，因为自来水公司的职员在罢工，苦力们弄来的水含石灰质过多，肥皂不怎么起泡沫。他在一片问候声中消失了。

在警察署长马夏尔的办公室的深处，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力士模样的中国侦探问：

“就这些了吗？长官先生？”

“也还要尽力瓦解工会。”马夏尔背着身子回答说。

“你可不要再给我胡来了！本来应该把你轰出去，因为你的人有一半是搞阴谋的！你那儿还有四分之一的革命者，他们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不敢直接了当地说出来，我给你钱，可不是叫你去供养这样一帮人，警察署不是打掩护的避风港。凡是与国民党串通一气的侦探，都让他们给我滚蛋！别让我再跟你费话！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别光这样傻瞪着我！如果我对我的人的心理不如你对你的人的心理那么清楚的话，那可就怪了！”

“先生，这个……”

“解决了。说定了。结束了。给我滚，快给我滚！您好，费拉尔先生！”

这时他才转过身来：一副军人模样，他的肩膀更能说明这一点。

“您好，马夏尔。怎么样？”

“为了保住铁路，政府不得不投放好几千人。您知道，整个国家都动荡起来了，不动用象我们这样的警察，是抵挡不住的。政府唯一能够依靠的东西，就是配备白俄教官的装甲列车。这可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只有为数不多的一点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废物。算了，不提它了。”

“一切取决于前线。这里的人打算造反，不过他们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他们的武器少得可怜。”

费拉尔对于世界上他最憎恶的东西，只能听之任之。在租界的大饭店里，住满了经纪人。盎格魯——撒克逊<sup>①</sup>财团

<sup>①</sup> 日尔曼人的总称。公元六世纪侵入英国。

与日本财团的谈判，他参与的谈判，某些国家的领事们参与的谈判，虽经那些经纪人的调停，至今仍毫无结果。今天下午，也许……

假如上海落在革命军的手里，国民党最终只能在民主和共产主义之间进行抉择，而民主总是最有市场的，一个公司可以不依靠什么条约而照样获利。可是上海如果变成苏维埃化的城市，情况就不同了，“法国——亚洲康采恩”<sup>①</sup>连同上海所有的法属商业都将彻底垮台。费拉尔认为，列强们很可能效法英国在汉口的做法，抛弃他们的国民不管。他急于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在革命军到达之前，保住城池不要陷落，让共产党单枪匹马一事无成。

“除了装甲列车以外，共有多少军队，马夏尔？”

“两千名警察，一个步兵旅，费拉尔先生。”

“除了清谈还能做点事情的革命者，有多少人？”

“武装起来的，仅有几百人……剩下那些，我想就没必要说了。因为这儿的人不服兵役，他们连枪都不会放，请您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把共产党也算在这号人里边，二月份，他们是两三千人……现在肯定会多一点儿。”

二月份政府军还没有垮。

“追随他们的会有多少？”马夏尔接着说：“但是，要知道，费拉尔先生，这些情况对我们不会有多大意义，必须了解头头儿们的心理，下边儿人的心理……我倒是了解一点。中国人嘛，您看……”

费拉尔象现在这样看着署长的时候，足以使署长说不出

<sup>①</sup> 经济和金融股份集团。

话来。过去虽这样看过他，但很少。费拉尔表情中流露出的轻蔑、恼怒的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判断：“难道这会持续很久吗？”他虽然并没有用他那种粗暴而又带点刻板的声音说这话，可是这个意思却表达出来了。

马夏尔要把侦探们侦破的情报归功于自己的洞察力，他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马夏尔敢于这样干，费拉尔就将这样对他说：“这对你有什么作用呢？”他是被费拉尔控制的，费拉尔和他之间只能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费拉尔在国内的权势比他大得多；可是，费拉尔这样蛮横无理地摆出傲慢的架势，把他只当做机器人来使，一旦他不传递情报而作为个人开口讲话的时候，费拉尔就对他进行否定，这使他马夏尔也不能容忍。

费拉尔失败之前在议会委员会里的所作所为，现任议员们曾对他谈过。费拉尔长于辞令，他的演说条理清晰而富有煽动力，他在议会上哗众取宠，使他的同僚们每年对他的憎恶有增无减，因为他有否定他们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天才。而若莱士和白里安则让他们得到他们经常被剥夺的个人生存的权利，使他们去幻想求助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去幻想说服每一个人，去幻想把每一个人都拉进一种由生活和人类的共同经验使之团聚在一起的默契关系中去。在这种时候，费拉尔却把事情归纳起来，最后总是说：“这种状况，先生们，很明显，是荒诞无稽的……”于是他实行强迫手段，或用金钱进行收买。在马夏尔看来，这一点，他没有改变。

“汉口方面怎么样？”费拉尔问。

“昨天夜里，我们得到了情报。那儿有二十二万失业



者，那些人可能组成一支新的红军……”

几个星期以来，费拉尔控制的三家公司的货物，堆放在富丽堂皇的站台旁已经发霉了，就是因为苦力们拒绝搬运任何东西。

“关于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关系，有什么消息吗？”

“这是他最近的演说。”马夏尔回答说，“您知道，我是不大相信那些演说的……”

“我可相信，起码相信这类演说。不过，相信不相信也没什么关系。”

电话铃响了。马夏尔拿起了听筒。

“找您的，费拉尔先生。”

费拉尔坐到桌子上。

“喂？对，是我。”

“……”

“他朝您伸过一根杆子来，是想用它来打倒您。事实证明，他对调停是抱敌对态度的。问题只在于，是把他作为犯鸡奸罪的人攻他好呢，还是断言他已被收买。就这些。”

“……”

“毫无疑问，从哪个方面攻他都不合适。再说，我也不愿意让我的任何合作者认为，我的本事只能抓住一个在性生活方面有污点的人进行攻击。您把我当作一个伦理学家了吧？再见。”

马夏尔什么也不敢问他。费拉尔不让马夏尔知道他的计划，也不跟马夏尔讲他与国际商会最活跃的分 子、与中国最大的商业联营的经理们密谋什么，这对马夏尔来说，既是一

种侮辱，也是一种蔑视。如果说，作为一个警察署长，连他做什么都不知道就够窝囊的了；再要把职位丢了，那就更惨了！而费拉尔，诞生在亲如一家的共和国里，满脑子全是勒南<sup>①</sup>、贝特洛<sup>②</sup>、维克多·雨果这些老先生们的和善的面孔。他是声名显赫的法学家的儿子。二十七岁获得了在大学和中学教历史专业的学衔。二十九岁主编了法国第一部通史，相当年轻时就当上了议员，当上了“法国——亚洲康采恩”的董事长（普安卡雷和巴尔图四十岁前就当上了部长的时代造就了他）。尽管他后来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在上海，他现在比法国总领事的权势还要大得多，名望还要高得多，况且他又是总领事的朋友。

因此，署长当然就得对他毕恭毕敬竭诚相待了。他摊开了讲演词：

“我一共才花了一千八百万大洋，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六个省。如果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愿意的话，让他们去找另外一个总司令吧，看他能不能花这么点钱，办这么多事……”

“显而易见，钱的问题，在拿下上海之后可能会解决。”费拉尔说。“海关<sup>③</sup>每月可以给他七百万大洋，这个数字，差不多可以填补军队的亏空……”

“对。可是听说莫斯科给政治特派员们下达了命令，让他们自己的部队在上海城市打败仗，若是这样，这里的起义

① 勒南，法国十九世纪作家，怀疑论者，唯理论者。

② 贝特洛，法国化学家，十九世纪政治家。

③ 海关被西方国家控制。

就会以失败而告终……”

“为什么下达这样的命令呢？”

“为了打垮蒋介石，破坏他的声誉，进而用共产党的一个将军取而代之，这样一来，攻取上海的桂冠，就会落在这个共产党将军的头上。可以肯定，向上海发起的进攻，事先并没有征得汉口中央委员会的同意。提供这些情报的人还说，红军参谋部反对那套程序……”

费拉尔对此虽持怀疑态度，但还感兴趣。他继续读演说词：

“尽管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被大部分委员所抛弃，已经很不健全，但它毕竟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我清楚，孙逸仙接纳共产党，是让它来辅佐我党的。我没做过任何一点儿反对他们的事情，我倒是常常欣赏他们的活力。然而，现在他们不满足于他们的辅佐地位，竟拉开主人的架势，妄图以暴力和蛮横的态度来驾驭我党。我警告他们：这种奢望，已经超出了他们被接纳时的协定，对此，我坚决反对……”

利用蒋介石的时机到了。现政府如果不付诸武力（它的军队吃的败仗使之丧失殆尽），如果不抓住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带给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那它就是名存实亡。支持现政府的人微乎其微。而在蒋介石的背后，却有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和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

“没别的了吗？”他大声问。

“没了，费拉尔先生。”

“谢谢。”

当他下楼的时候，在楼梯中间遇到了一个女人：褐色的

头发，潇洒的衣裙，漂亮而又毫无表情的面容，很象智慧女神密涅瓦。这是俄国高加索的一个女人，一有机会，就来做马夏尔的情妇。

“你呀，我倒很想看看你在受用的时候，你这脑袋是怎么摆着的。”他想。

“对不起，夫人。”

说着，他向女人鞠了一躬，从她身旁走过去，登上了汽车。汽车开始钻进人群，这一回是逆着人流往前开。在声势浩大的逃难者面前，在千百万蜂拥而至的情绪沸腾的人群面前，汽车喇叭枉然地鸣叫着，根本不起作用。肩挑小贩好象天平，两头的天平盘在风中飘摇，中间的天平杆不断地颤悠。可与大唐皇帝的龙辇媲美的双轮车、独轮车，挂着鸟笼子，坐着残废人。费拉尔迎着车外这些焦灼不安的目光前进着。如果说他的有裂痕的生命行将崩溃的话，那他必将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在这些前来砸他车子的目瞪口呆的绝望的人群中崩溃！如同一个伤员思虑着他生命的意义一样，他思虑着他那受到威胁的事业，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是十分脆弱的。他过去很少参与这样的搏斗；他是出于不得已，才承攬了中国的商务，为的是给他的“印支”产品寻求新的销路。他在这上面耍了一个花招儿——等待，他的眼睛盯着法国。可是他不能等待太长的时间了。

他致命的弱点是缺乏国家的赞助。如此大规模的事业，离开政府是发展不了的。他在议会的时候还很年轻，但从那个时候起，就担任了电源和电器公司的经理，为法国制造电器材料。此后，他组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的改建工程。

他一直为政府工作。他廉洁奉公，接受订货而拒收佣金，正因为有这种值得骄傲的表现，他曾期待从亚洲殖民地那里得到一笔款项，这在他政治上失败以后会是很必要的，因为他不想再重新下赌注了，而要变换一下赌博的规则。费拉尔哥哥的个人影响，远远超过其“流动资金总署”<sup>①</sup>署长这一职务的范围。他仰仗他哥哥的名望，加上他自己是法国一个最大金融财团的领导人，所以，他说服了印支联邦政府，同意拨出四亿的款项，去实施公共工程；而他的对手们对于给他提供离开法国的财源也并没恼火。共和国是无法拒绝它的最高官员之一的弟弟去实施这个开发计划的。在这个到处都随随便便要花招的国度里，他这种实施计划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令人惊异。费拉尔办事很有计谋。善有善报。财团着手进行印度支那的工业化了，先后出现了金融和农业两家信贷银行；经营橡胶、热带植物、棉花和食糖的四家种植公司，把原料控制起来，直接加工成产品；开发煤炭、磷酸盐、黄金的三家矿业公司和一家“盐田开发”子公司；经营照明能源、电力、玻璃制造、造纸、印刷的五家工业公司；经营驳船、拖运和有轨电车的三家交通公司。而其中居于枢纽地位的公共工程公司，是这个吃苦耐劳、充满仇恨和受条约束缚的人民的“皇后”，是所有这些唯利是图的专门靠乱伦关系而生活的姊妹公司的“母亲”或“接生婆”，它很会使手腕，把“中部安南”的铁路建设工程弄到自己手里，这条铁路竟然布满了费拉尔财团的大部分租界地——这有谁会相

---

<sup>①</sup> 财政部所管辖的一个部门，即现在的国库。

情呢？“这倒不坏！”董事会副会长向费拉尔说，他一声不吭，专心把他的巨款投放出去，以此为阶梯向上爬，以便监督巴黎。

即便他的每个衣袋里都装满在中国建立新公司的计划，他心里也只是想着巴黎。等实力雄厚的时候，重返法兰西，把阿沃斯<sup>①</sup>收买过来或与它签约，重操政治故伎，小心谨慎地回到部里，想方设法使部里的人和被愚弄的公众联合起来，制造舆论对付议会。这样就可以使大权在握。然而，他的美梦再也做不成了：他在印支的企业迅速增长，使费拉尔财团渗透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可是现在蒋介石随同革命军一起，正气势汹汹地向上海进发。越来越密集的人群糊住了他的车门。“法国——亚洲康采恩”在中国所属或所控制的公司，没有一家不被触及：航海不安全，影响了香港的造船公司；由于战争和共产党的威胁，影响了公共工程、建筑、电力、保险等公司，影响了银行界。他们进口的东西都堆放在香港或上海港的仓库里，出口的东西都堆放在汉口的仓库里，有的甚至摊在码头上。

汽车停了下来。平时，中国人群本来是最爱吵闹的，现在却鸦雀无声——这是宣告世界的末日到了。传来了一声炮响。难道革命军已经近在咫尺了吗？不会的！这可能是报午的炮声。人群闪开了，可是汽车也发动不起来了。费拉尔拿起听筒。没人回话。他身边既没有司机，也没有听差了。

步履艰难的人群绕过这辆一动不动的汽车，他坐在里面。

① 法国重要的新闻出版机构。

愣愣地一动不动。离汽车最近的一家商店的店主扛着一块大护窗板走了出来，他一转身，差点儿把汽车的玻璃撞碎。他把店铺关上了。左右和对面其他店主和手艺人，也都扛着写满大字的护窗板走了出来，这说明：总罢工开始了。

这次罢工，可不是那种慢腾腾发动起来的史诗般的沉闷的香港式的罢工了，它纯属一种军事行动。在他视线所及的地方，没有一家店铺开门营业。必须尽快走开。于是他下了汽车，去招呼一辆人力车。那个苦力没理他，撒腿就往车座跑。现在，他站在这辆被扔下的汽车旁边，可能是马路上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人了。人群都散了，纷纷奔向各自的家中。

“他们害怕机关枪，”费拉尔想。孩子们不再玩耍了，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的人腿中间，穿梭般地溜掉了。寂静，远至天涯，近在咫尺，到处是充满无数生命的寂静，如同充满昆虫的森林那般寂静；一艘巡洋舰发出呼号，又消失了。费拉尔双手插兜，探着身子，伸着下巴，尽快往家走。“呜呜”又响起两声汽笛，比刚刚消逝的呼号高八度，好象某种深藏在这种寂静中的巨兽，以此宣告它的到来似的。整个城市都在伺机以待。

下午一点。

“还差五分钟，”陈说。

他这一组的人都在等待着。他们都是纱厂的工人，穿着蓝色粗布衣服；陈的穿着也和他们一样。人人都刮了脸，

人人都很清瘦，但人人都很健壮。在陈死之前，说不定死神会点到谁的身上。两个人腋下夹着步枪，枪口冲地；七个人带着从“山东”号上弄到的手枪；一个人拿着手榴弹；几个人把手榴弹揣在兜里；二十几个人手持火刀、棍棒和刺刀；还有八九个人，什么武器也没拿，蹲在一堆破布、油桶和铁丝卷旁边。一个少年从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些火头长钉子，象挑种子似的检查着，他说：“这肯定比马蹄铁管用……”这些来自“圣迹区”<sup>①</sup>的人们，看上去却个个都充满仇恨，个个都下定了决心。

陈并不是他们的人，虽然他行过刺，虽然他也出现在这里。如果他今天就死，那他也将是孤身而亡。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很简单：他们是为了吃饭和尊严而战斗的。而对陈来说……除了和他们谈谈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共同战斗之外，他和他们再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他至少还知道，和他们最亲切的联系是战斗，而战斗就在眼前。

他们背上口袋，提上油桶，挟上铁丝卷，站了起来。老天爷还没下雨。这条弄堂空空荡荡，十分寂静，十分凄凉。有一条狗三蹦两跳横穿了过去，似乎某种本能使它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从附近的弄堂里传来了五声枪响：先是三声，接着一声，又是一声。

“开始了！”陈说。继而又恢复了寂静，但似乎与刚才的寂静不同。一阵马蹄声响了起来，越来越急促，越来越近

<sup>①</sup> 原是旧时巴黎的圣迹区，该区乞丐聚集，他们装成残废出外乞讨，回区后马上恢复常态，好象因“圣迹”而愈。现泛指乞丐小偷集中的地区。



了。如同连绵不断的雷声响过之后，又一道闪电垂直撕裂长空一样，弄堂里一下子喧嚣起来了，但他们仍是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人的喊声当中夹着枪响，夹着战马的狂叫，夹着跌跌撞撞的声音。接着，嘈杂声平息下来，又陷入了使人无法摆脱的寂静当中，这寂静凝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这时，一只狗突然拼命叫了一声，又戛然而止——准是一个人被狗咬住了脖子。

他们跑步前进，几分钟后来到了—条比较重要的弄堂。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地上，躺着三具尸体；上边，电线纵横交错，滚滚浓烟掠过动荡不定的天空。弄堂的尽头，有二十几个骑兵（上海很少见到骑兵），就犹豫地在那儿打转儿，没有发现起义者们，他们紧贴墙根，手持家伙，眼睛盯着那些迟迟疑疑的马。陈不打算向这些人发起进攻，因为他手下人的装备太差了。骑兵们向右转弯，终于到了他们的哨位；步哨们毫无顾忌地从陈的背后溜过去了。

警察们正在玩牌，步枪和毛瑟枪都放在枪架上。指挥他们的一个士官，打开一扇窗户，冲着—个非常阴暗的院子喊道：

“你们大家都听我说：我们面临着暴力行为的威胁，你们都是见证。你们看，在这种力量面前，不让步是不可能的了！”

他想去关窗户，陈没让他关，向院子里看了一眼：里边儿一个人也没有。士官保全了面子，作戏的台词也说的正是时候。陈是了解他的同胞们的，既然那个人已经“进入了角色”，就勿需动他了。陈分发了武器。所有暴动者这一回都

有了武器。然后，他们出发了，因为这些小小的警察哨所已被解除武装，再去占领它们已毫无意义。警察们犹豫不决。有三个站起来想跟着，他们可能要去抢劫……陈也很难摆脱他们。其他警察拾起扑克牌，又打上了。

“如果他们打胜了，”其中一个说，“这个月我们还能开饷吗？”

“我看能……”那个士官回答。他在分牌。

“他们如果被打败，人们该说我们叛变了？”

“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们是向暴力让步。我们每个人都

都可以作证，我们没有叛变。”

他们陷入了沉思。由于背着思想包袱，都跟鸬鹚一样缩着脖子。

“我们没有责任。”一个人说。

他们都表示赞同。然而他们都站起来，到旁边的一家店铺继续打牌去了。这家老板也不敢撵他们。哨所里边只剩下了一堆军装。

陈又是高兴又心怀疑虑地向一个中心哨所走去。“一切顺利，”他心想，“可这些人几乎和我们一样是穷光蛋……”白俄罗斯人和装甲火车上的士兵之间可能会打起来。军官们也一样会打。远处的爆炸声，好象被密云低垂的天空减弱了似的，沉闷地拍击着气浪向市中心传来。

现在，队伍里所有的人，包括搬运油桶的人，全都武装起来了。他们在十字路口迟疑了一下，向周围看了看。巡洋舰和卸不下货来的商船冒出来的团团斜烟，被湿风吹向起义

者们正在奔跑的方向，好象老天也参加了这次起义似的。眼前这个新哨所，原来是红砖结构的两层楼旅馆，门两边各站着一名岗哨，枪膛上着刺刀。陈知道，三天以来，特警一直处于戒备状态，他的人被那些日夜巡逻的警察歼灭了。这里有一些领高薪的警官和五十多个手持毛瑟枪的警察，还有十个士兵。要活下去！至少要再活八天！陈在街角停下来。武器准是放在一层右边房间里的枪架上，那儿是警卫房，位于一个军官办公室的前面，陈和他手下的两个人，一周之内曾潜入过好几次。这一回他挑选了十个人，不带步枪，只让他们把左轮手枪藏在工作服里边。陈和他们一起往前走。走过街角以后，岗哨就发现他们过来了。岗哨对所有的人都怀疑，因而对谁也就都不怀疑了。平素常有些代表团来和军官交谈，送些东西来贿赂他——干这种事儿要有相当的保障和许多人才行。

“这是给随曦中尉的。”陈说。

前边八个人通过以后，最后两个人好象被轻轻一搔，一下子滑到了岗哨和墙的中间。前边的人走到走廊的时候，哨兵们已感到手枪筒顶到自己的肋骨上了。尽管他们比他们可怜的同事们挣钱多一点，但也不值得为此拿生命去冒险呀，他们乖乖地被缴了械。陈手下没跟第一组会合的另外四个人，可能把哨兵带到街上，顺着墙根儿走了。从窗户上什么也看不见。

陈从走廊里看到，枪架上挂满了枪支。在这个哨所里，只有六个警察有自动手枪，这些武器都带着套，放在他们身旁。陈把手枪举在胸前，跳到了枪架附近。

假如警察们决心抵挡的话，这次突袭就会失败。尽管陈很熟悉这个地方，但他还没来得及指派谁去收拾谁；很可能会有一两个警察开枪射击。可是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转瞬之间都被缴了械。陈手下另外一组人也进来了，又开始分发武器。

“此时此刻，”陈心里想，“全城有二百多个小组和我们一样在行动。他们若是也有这样的运气……”当他刚拿起第三支枪的时候，突然从楼梯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往楼上跑。陈想往外走，刚一出门，从楼上打来一枪，后来就没动静了。原来是一个军官，下楼的时候发现了起义者，从楼梯上开了一枪，立即退到了楼梯平台上。

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正对二层楼梯平台的房门控制着整个楼梯。是否可以按着亚洲人的方式，派一个谈判代表进去？陈作为一个神志清醒的中国人，对此疾恶如仇；是否可以强攻楼梯？警察手里肯定有手榴弹。根据京向所有小组传达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如果什么地方受挫，就放火烧，起义者退到临近的房子作阵地，向特别队求援。

“放火！”

扛油桶的人想一股脑儿把汽油都倒出来，但油桶的口儿太小，流量少得可怜。他们只好让汽油慢慢往外流，流到家具上，流到墙上。陈隔窗向外面看了一眼，对面店铺的门都关着，而窄小的窗户却控制着哨所的出口；上面是一片中国式房子的朽腐走形的屋顶，和没挂一丝青烟的无限静谧暗淡的天空，深邃而低沉的天空，笼罩着空荡荡的街巷。整个战

斗有点滑稽：在他作为生命存在的对面，似乎什么也不存在；但他很及时地恢复了镇静，听到了一种“哗啦哗啦……”的清脆响声和“嘟嘟嘟……”的射击声，伴随这种声音，窗玻璃和窗扇纷纷落地——啊！有人从外边在向他们开火！

又是一阵射击。现在，他们在这间流淌着汽油的房间里，遭到了两面夹击：一面是警察，他们已准备就绪，控制着二层楼；一面是看不见的新的进攻者。陈他们全部趴在地上，俘虏被绑在一个角落里。只要有一颗手榴弹爆炸，他们就会烧成灰儿。卧在地上的一个人用手指着一个方向，低声抱怨着——原来一个自由射手出现在一个房顶上，窗子尽左边的地方，有一个肩膀向靠后一点的地方滑去，一些非正规军小心翼翼地出现了。那是起义者，是他们自己的人。

“这些笨蛋，还没派个侦察兵就开枪。”陈想。他兜里揣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他把旗掏出来，向走廊冲去。刚一迈腿，随着一种直往肚里钻的巨大的爆炸声，他觉得腰部挨了又猛烈又奇怪的一击。为了站稳身子，他用力向后甩了一下胳膊，结果还是倒在了地上，处于半昏迷状态。一点声音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一个金属东西掉了下来，紧接着，阵阵呻吟声随着烟雾传进了走廊。他又站立起来了，其实并没有受伤。门不知怎么被炸开了，他踉踉跄跄地去把它虚掩上，左手从门缝里把旗伸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手上随时都可能飞来枪子儿。但没有，人们反倒都高兴地喊叫起来。通过窗户慢慢散出去的硝烟，遮住了他的视线，看不见左面的起义者们，可是右面的都在叫他。

第二次爆炸又差点儿把他轰倒。被包围的警察从二楼窗户往下抛手榴弹（他们怎么能够打开窗户而未被街上射来的子弹打中呢？）。把他轰倒的那第一颗手榴弹，是在房前爆炸的，弹片从敞开的门和震碎的玻璃窗飞进来，就好象在哨所里炸开一样。陈手下那些没有被炸死的人，惊恐万状地向外飞身逃命，可是硝烟淡薄，掩护不了他们，有两个人被警察从窗户射出的子弹击毙于街心，他们的胸脯贴着双膝，象两只翻滚的兔子；另外一个人的面部浸在一摊血泊之中，似乎从鼻孔里流着鲜血。非正规起义军认出了他们自己的人，但他们当中有人向陈打手势，使军官们明白了有人要出来，于是扔出了第二颗手榴弹，它落在街上，在陈的左边爆炸了，幸而墙壁保护了他。

他在走廊里观察着哨所的动静。缭绕的硝烟，缓慢地从天棚向下游动。地上躺着一些人，他们从地面上发出的呻吟声象小狗尖叫一样，充斥着整个房间。在一个角落里，有个断了一只腿的俘虏，冲着他的一伙人嚷道：“别拉了！”硝烟好象是看得见的厄运一样，仍旧盘旋在痛苦的人们头上，这个俘虏的气喘吁吁的喊声，似乎把它驱散了。这个喊叫的人，腿已被炸断，再也经不住这样捆绑了，再也忍受不了啦。然而，不是随时都可能有新的手榴弹飞来爆炸吗？“这不关我的事，”陈想，“这是一个敌人！”想是这么想，可这个人的腿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肉洞子，而且还被绑着。他现在的感情远远超过了同情心，他觉得这个被绑着的人就是他自己。“假如手榴弹在外面爆炸，我就趴在地上；假如它滚到这里，我就再把它扔回去。但十之八九我是脱不了险的，我

那是何苦呢？我那是何苦呢？”被炸死，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只是担心肚子受伤。然而，眼看着这个被绑缚的人这样受折磨，眼看着人处在痛苦之中这样无能为力，也就顾不上什么担心了。他拿着一把刀，向那个人走去，准备为他割断绳子。俘虏还以为是来杀他的，打算拼命喊叫，但声音越来越微弱了，最后，喊叫变成了嘘嘘声。陈用左手触摸了这个人一下，虽然衣服上粘糊糊的血沾了他一手，而他的眼睛却须臾不敢离开被打碎的玻璃窗，从那儿随时都可能飞进手榴弹来。他终于摸到了绳子，从下边伸进刀子把它割断了。这个人不再叫了，不是死了，就是昏过去了。陈又回到了走廊，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着被炸碎的窗户。他突然发现，气味发生了变化，伤员们的呻吟声也变了，变成鬼哭狼嚎了，他好象刚刚才听到他们呻吟似的；原来房间里浸透了汽油的残存物，被手榴弹炸着，起火了。

没有水。起义者拿下哨所之前，伤员们会被烧焦的（现在也顾不上去考虑俘虏了，他只想自己的人）……出去！出去！先考虑考虑，以便尽可能少打手势。他虽然浑身发抖，但他一心想跑出去的念头还不糊涂：应该往左走，那儿的门廊可作掩护。他用右手开门，用左手示意让大家安静。敌人在上边是看不见他的；可是外面起义者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脱他们的眼睛。他感到他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扇开着的门上，都集中在他这个位于走廊幽暗处的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矮胖身影上。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右手紧握手枪，身子紧贴着墙，开始向左挪动。他一步一步往前挪，一边挪，一边看着

头顶上那些窗子，其中有一扇，前边用一块披檐状的钢板挡着，起义者们无法向那些窗子射击，手榴弹就是从那个披檐下边扔过来的。“如果他们再扔，我会看见手榴弹的，也一定会看到胳膊。”陈这样想着，继续往前挪动。“如果我看见手榴弹投下来，要象接包裹一样把它接住，然后再把它扔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他不停步地象螃蟹似的横着走。“我不可能扔得太远；一些弹片会钻进我的肚皮的……”他继续往前走。一股浓烈的焦味和身后突然失去依靠（他并不回头）使他明白了：已经到了一层的窗户前边了。“如果抓住了手榴弹，我就趁它还没炸的时候，把它扔进哨所里去。如果能走过窗户，依靠厚厚的墙壁，我是可以死里逃生的。”哨所里并非空的，被他割开绑绳子的那个人以及他们自己的伤员，都还在里边，但这些他都顾不得了。他看不见起义者，即使从硝烟的缝隙里也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一时也不能离开那个披檐，可他仍感到人们在瞟着他。尽管起义者们向窗子射击使警察们受到阻碍，但使他惊愕的是，警察们竟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突然想到，警察们的手榴弹可能不多了，在投掷之前，都要进行仔细观察。这种想法很快被一个影子证实了——在披檐下出现了一个人头，起义者没看见，他却看见了。他欣喜若狂，放弃了走钢丝的姿势，估摸着向那个人打了一枪，然后纵身往前一跳，跳到了门廊里。警察们从各个窗口一齐射击，一颗手榴弹，正在他刚刚离开的那个位置爆炸了。他没射中的那个警察，想把手伸出披檐外甩手榴弹，但他踌躇了一下，生怕再打来第二枪。陈的左臂受过伤；在杀死唐寅塔之前被匕首刺的伤



口，对气流是很敏感的。这伤口又在流血，却不觉得疼。他用手帕又紧紧包扎了一下，通过院子与起义者们相会了。

指挥进攻的那些人，都聚集在一条阴暗的过道里。

“你们不能派几个侦察员来吗，嗯？”

组长是个大个子中国人，修过面，衣服袖子很短。他看到这个人影儿走过来，慢慢地扬起眉毛，显得很顺从。

“我已经叫人打了电话。”他简单地答道。“我们现在正等一辆装甲卡车。”

“其他支队都在什么地方？”

“我们已经攻下了一半儿哨所。”

“只攻下了一半儿？”

“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远处传来一阵阵枪声，这是他们的人在向北站集结。

陈喘息着，好象刚从水里钻出来，到了一个通风的地方似的。一个墙角挡着他们这些人。陈靠在墙上，渐渐喘匀了气以后，又想起了被他割断绳子的那个俘虏。

“我该把那个人放走才是。为什么只割断绑绳就不管了！这有什么用？”即使是现在，睁眼看着这么个被捆绑着的断了腿的人在挣扎，能视而不见吗？由于伤口，他又想起了唐寅塔！整整这一夜，整整这一上午，他的举动行为是多么蠢啊！其实再没有什么比杀人更简单的了。

在这个哨所里，残存物在继续燃烧着，伤员们在大火前继续吼叫着。他们那反复不断的叫声，在这低矮的过道里回荡。随着枪声在沉闷的空气里逐渐减弱，随着警报声和战争的喧嚣声远去，他们好象就在耳边叫一样。从远处传来“啞

当哐当”铁器相撞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它压倒了一切声响——装甲卡车来了。这辆装甲卡车是夜里装起来的，装得十分差劲儿，所有的钢板都晃荡。车一刹住，“哐当”声戛然而止，又重新听到了伤员们那种鬼哭狼嚎似的惨叫。

陈是钻进哨所里的唯一的人，他向援救队长讲述了里边的情况。这人过去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与他领导的这个资产阶级青年援救队相比，陈更喜欢卡托夫领导的那个小组。陈之所以没有能够和那些双膝顶着肚子死在马路上的同伴们打成一片，他明白，那是因为他恨透了中国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至少是他的希望所在。

军官很内行。“卡车什么事也不顶，”他说，“连个篷子也没有，只要往里面扔一颗手榴弹，它就整个爆炸了。我倒是也带来了些手榴弹。”陈率领的带手榴弹的人，都在哨所里——是不是都死了？第二组的人没能搞到手榴弹。

“我们从上面试试。”

“好吧！”陈说。

军官生气地望着陈，因为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他什么也没说。他穿着贫民服装，留着平头和小胡子，扎在上衣的皮带上，很得体地别着手枪——他，是个军人；陈是个矮胖子，穿着蓝布衣服。他们俩都在仔细查看着哨所。房门右边，越来越接近负伤同志们的烟火，机械地有规律地往外冒着，很象一阵一阵的喊叫声，那种带着稚气，并不叫人难以忍受的喊叫声。房门左边，什么也看不见。二层的窗户都被遮住了，一个攻击手还不时地向其中的一扇射击，崩掉的墙皮、碎片、棍子等，散落在人行道上，乌烟瘴气，一些玻璃

片闪闪发光，虽然阳光很暗淡。哨所那边，只有当他们发现有起义者离开掩体时才开枪。

“其他支队都在什么地方？”陈又问起了这个问题。

“几乎所有的哨所都拿下来了。最重要的那个，是一点半钟经过奇袭拿下来的。我们在那儿缴获了八百支步枪。我们已经能够派增援队伍去打那些负隅顽抗的敌人，你们这儿是我们援救的第三个小队。他们的人得不到增援，我们封锁了所有的兵营，封锁了南站和军火库。不过，这里应该尽快结束战斗，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发起攻势。现在还有一列装甲火车要解决。”

陈一想到二百多个小组和自己的小组一样，都在行动，既感到精神振奋，又感到心慌意乱。尽管又热又湿的风传来了响彻全城的枪声，但暴力仍使他产生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一个人从卡车上搬下来一辆自行车，骑上走了。在他跨上车座的时候，陈认出他是马，一个主要的宣传鼓动者。他是去军事委员会汇报情况的。他是一个排字工人，十二年来，一直在各地投身于创建印刷工人联合会，希望把全中国的排字工人都组织起来。他被追捕过，被判处过死刑，越过狱，但从没间断过组织工作。忽听一阵高兴的喊叫——原来其他人也和陈同时认出了他，都向他欢呼起来。陈瞧了瞧他们，和他们一起奋战争取的社会，同他们敌人的社会一样，都谴责他，谴责陈。在未来的工厂里，他躲在他们蓝色工装裤后面，究竟能做些什么呢？

军官分发了手榴弹，接着有十个人越过一些房顶，来到

了哨所房顶作为阵地。打这些警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从窗口往里边扔爆炸物；窗户只能控制街道，控制不了房顶，而且只有一扇窗户有披檐挡着。另一些起义者们，从一个房顶走到另一个房顶，身子在空中都显得很轻盈。哨所里的警察仍不改变射击方向；只有那些垂死的人，好象意识到了他们的来临，叫喊声突然变了，变成了呻吟声，不过还是听不大清楚。就在这时，传来了嘶哑的透不过气的喊声。房上那些身影，已到达了冲着哨所那面的屋脊上，接着一点一点往下走。他们的轮廓在空中不明显了，陈也就看不清他们了。象妇女生孩子的时候发出的一声尖叫压过了呻吟声；而呻吟声又如同回声似的响了起来，接着又消失了。

虽然有嘈杂声，但喊声骤然消失后的宁静，却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大火是不是烧到了伤员？陈和军官面面相觑，接着闭上眼倾听着——什么也听不见。两人又都睁开眼睛，互相都看到了对方的目光，沉默不语。

有一个人，用一只胳膊勾住房顶的一个琉璃彩兽，向街道上空甩另一只胳膊，照他下边的二层窗户扔出一颗手榴弹，但扔得太低，在人行道上爆炸了。他接着扔出第二颗，结果扔到了伤员所在的房间里，从窗户爆发出一阵喊叫声。不！这已经不是刚才听到的那种喊叫了，而是一种濒于死亡的断断续续的嚎叫，一种尚未熬尽的苦难的突发。此人又扔出第三颗手榴弹，可是仍没扔到窗户里去。

这个人是在卡车拉来的那些人其中的一个。他怕炸着自己，很灵巧地往后躲闪着。他又一躬身，扬胳膊扔出了第四

颗手榴弹。在他身后，陈手下的一个人滚下来了。他的胳膊没有放下来，整个身体好象被一个大球砸倒了一样。一次剧烈的爆炸响彻整个人行道，尽管硝烟弥漫，但墙上一米多长的血迹，依稀可见。硝烟散了。满墙都是血肉横飞的痕迹。第二个起义者失去依靠，全身的重量迫使他顺着房顶往下滚，把第一个人也撞了下来，两个人一块儿跌落到自己的手榴弹上，它们的保险销已经拉开了。

在房顶的另一侧——左侧，两组人，一组国民党的资产者，一组共产党的工人，都小心翼翼地来了。他们看到那两个人跌落下去，停了一会儿；现在，又开始慢慢地往下走了。二月大屠杀实在太残酷了，致使这次起义缺乏坚定分子。右侧，另一些人靠拢过来了。“一个拉着一个！”陈在下边喊道。临近哨所的起义者们，也跟着喊了起来。他们互相手拉着手，在最高处的那个人，用左臂紧紧地搂着屋脊上一个又大又牢靠的彩兽。又开始扔手榴弹了，被包围的人无法进行还击。

不到五分钟的工夫，从两扇窗户往屋里扔进了三颗手榴弹；又扔一颗，炸掉了那个披檐。只有中间那扇没炸着。

“往中间扔！”军校学生嚷道。陈看了他一眼。这个人体验到一种指导一项完美的体育运动的乐趣。他自己没有怎么隐蔽。毫无疑问，他是勇敢的，可是他没有和他那些人结合在一起，而陈是和他那些人结合在一起的，只是不那么紧密罢了。

不那么紧密。

他离开那个军校学生，通过被包围人的射程之外的里

弄，绕到了房顶。钩着房脊的那个人，越来越吃不住劲儿了，陈去替换了他。陈用受伤的那只胳膊，搂着用水泥和石膏制成的彩兽，用右手拉住“人链”的第一个人的手，但仍免不了有一种孤独之感。三个下滑的人的体重全部悬在他的一只胳膊上，好象一根棍子穿过胸膛一样难耐。手榴弹不断地在哨所内部开花，再也听不到里面还击了。“我们是靠楼顶隐蔽的，”他想，“但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它就会被炸掉的。”纵然陈与这些人有着同生共死的亲密关系，承受车裂之苦的兄弟般的情谊，但陈还不能算是他们的人。“难道连血都会白流吗？”

军校学生站在那儿，困惑不解地望着他。有一个人来到陈的背后，表示要替换他。

“那好，我自己也去扔。”

他把“人链”让给了那个人。他的疲惫不堪的肌肉，使他产生了一种绝望之感。他那长着一双细长眼睛象猫头鹰似的面孔，绷得紧紧的，一动不动；他愕然地感到，一颗泪珠顺着鼻子流了下来。“神经质！”他心里想。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手榴弹，抓着“人链”的一只胳膊往下走。但由于支撑“人链”时用力过猛，现在感到胳膊软弱无力，不听使唤。“人链”是靠连接两侧房顶的装饰品支撑的，因此很难到达中间那个窗户。到了房顶边缘，陈松开投手榴弹那个人的胳膊，抓住他的腿，悬在檐槽上，顺着垂直的管子下去——但要够着那扇窗户还差得很远。不过，往里扔手榴弹，毕竟近多了。他的同志们不动了。在一层楼的上方，有一个凸起部分，他停在了那儿。他感到奇怪的是，伤口反倒不怎么

疼了。他用左手抓住固定檐槽的一个铁钩，掂了掂第一颗手榴弹，拔下保险销：“它若是落在街上，在我的下边爆炸，我就一命呜呼了！”他以这种姿势所能使出的最大力气，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扔进了窗子里，在里面爆炸了。

楼底下，又射击了。

警察们从他们守卫的最后一个房间里被赶了出来，一个个吓得愣头转向，你推我搡地从哨所敞开的一个房门往外奔命的时候，乱放了几枪。起义者们从房顶上，门廊里以及窗户外开火，警察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门口尸体一大片；再远，也稀稀拉拉到处都是。

枪声停了。陈继续下，身体仍然悬在檐槽上，看不到自己的脚，往下一蹿，跳到了一个尸体上。

军校学生进了哨所，陈在后面跟着他，从口袋里抽出那颗还没扔出去的手榴弹。每往前走一步，他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伤员们已经停止呻吟了。哨所里的人全死光了。伤员们都被烧焦了。在二层楼上，也都是死人，只剩几个活着的伤员。

“现在到南站去！”军官说，“我们把枪都带着，其他小组会需要的。”

他们往卡车上搬武器。当所有的武器都搬上去了的时候，他们纷纷登上卡车，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引擎盖上，有的站在踏脚板上，还有的扒在后车帮上。那些没上车的人，小跑步穿过弄堂走了。那大摊的血迹，留在僻静的街头上，看上去令人难以解释。挤满人的卡车，带着马口铁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响声，在街角消失，向南站和兵营驶去了。

不久，卡车不得不停下来：马路被四匹死马和三具已解除武装的尸体挡住了。这是陈一大早看见的那些骑兵的尸体，他们准是被及时赶到的第一辆装甲卡车干掉了。满地都是碎玻璃片，只有一个留着一撮胡子的中国老头，在那儿悲叹。当陈走近他时，只听他清清楚楚地说：

“真是伤天害理呀，可悲呀！四具，四具呀，咳！”

“只有三具呀，”陈说。

“咳，四具！”

陈又看了一下，在那些同样死气沉沉的房子中间，在低云欲垂的天空下，只有三具尸体：一具侧身卧着，好象是突然被撂倒在那儿的；另外两具趴在地上。

“我说的是马。”老头儿看着陈手里拿着手枪，又轻蔑又恐惧地说。

“可我说的是人。有一匹马是你的吧？”

毫无疑问，这些马匹一定是今天早晨被征集来的。

“没有我的，可我是车夫。牲口，我知道心疼。四匹马被打死了，无缘无故被打死了！”

司机插进来问：“无缘无故？”

“别浪费时间了！”陈说。

陈在另外两个人的帮助下，搬开了那些死马，卡车开过去了。陈坐在一个踏脚板上，当卡车到了弄堂尽头的时候，他向后看了一眼：老车夫仍呆在尸体中间，肯定还在那儿抱怨。在灰暗的马路上，他已变成一个黑影了。



下午五点。

“南站失落！”

费拉尔把听筒挂上了。在他约人相会的时候，起义军节节取胜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向他传来。（“国际商会”的部分人员，反对任何形式的介入，但费拉尔支配上海最大的一家报纸。）他想单独打电话，于是又来到他的房间。马夏尔刚来，正与蒋介石的使者谈话，因为蒋介石既不同意在保安局也不同意在他家里会见警察署长。尽管有枪声干扰，但费拉尔在推门进屋之前，仍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您知道吗，我在这几代表谁的利益？代表法国的利益……”

“我能给予什么支持吗？”那个中国人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说道，“总领事先生亲自叫我听您具体谈这个问题，因为您非常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国家的人。”

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

“市议会失落，”马夏尔说。

接着，他变换了腔调：

“我不是说我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的心理没什么了解。了解人的心理和行动，是我的本行，关于这一点……”

“有一些家伙，对你们国家，和对我们国家一样具有危险性，对文明的和平也具有危险性，如果他们还象往常一样，都来租界避难怎么办？国际警察……”

“对，问题就在这里。”费拉尔这样想着，走了进来。他很想知道：“在决裂的情况下，马夏尔肯不肯让共产党的头目们到我们这里避难。”

“……国际警察答应一切为我们着想……那法国警察呢？”

“会有安排的。只是要注意一点：除了俄国女人以外，不要和其他白人妇女打交道，在这方面，我是有严重教训的。不过，我跟您说过，这完全是非官方的！完全是非官方的。”

这是一间现代化的房子，墙上挂着毕加索“玫瑰”时期<sup>①</sup>的作品和弗拉戈纳尔的一幅情画草稿。两个谈话人站在一尊观音菩萨大雕像的两旁。它是唐代黑石雕像，由于柯拉毕克的建议而买下的，吉索尔却认为是冒牌货。这个中国人，是个年轻的上校，鹰钩鼻子，平民打扮，上衣的扣子从上到下扣到底。他面带微笑瞧着马夏尔，脑袋向后仰着。

“我以我党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共产党纯属叛徒，他们背叛了我们，背叛了他们忠实的盟友。本来已经谈好，我们先一起合作，社会问题待中国统一以后再说。可是现在他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们不尊重已订下的契约。他们并不想建立一个中国，而是想建立苏维埃。部队将士为之流血奋斗的，不是苏维埃，而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因此，我想问问您署长先生，要保障将军的人身安全，法国警察该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

<sup>①</sup> 指毕加索1905—1907年间年轻时候的作品。

显而易见，他也向国际警察提出了帮忙的请求。

“甘愿出力，”马夏尔答道，“让您的警察局长到我这儿来吧。还是柯尼希吗？”

“还是他。请问，署长先生，您学过古罗马史吗？”

“那当然。”

“准是在夜校里，”费拉尔心想。

电话铃又响了。马夏尔拿起听筒。

“桥梁全被攻下了，”他放下听筒说，“再过一刻钟，起义军将占领整个华界。”

“依我看，”中国人好象没听见似的，继续说下去，“伤风败俗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况且，汉口的那些头面人物，根本不能与罗马帝国的人物相提并论，一个卖淫的专门机构，一个象警察局这样的西方机构，就会降服他们，这一点您难道不相信吗？”

“这倒是一种见解……但我看这未必能行得通。还要仔细斟酌斟酌。”

“对于中国，欧洲人从来只了解与他们相似的地方。”

沉默。费拉尔在自我消遣。这个中国人使他感到好奇：脑袋向后仰着，态度近于傲慢，又加上这般别扭劲儿……“想让汉口沉醉在妓女的桃情粉墨之中……”他想：“他了解共产党吧？而且他还可能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知识！这真是啧啧怪事！……”城里可能都在准备建立苏维埃了，而这个人还在对罗马帝国被诱骗而想入非非。“吉索尔说得对，他们这些人老是异想天开。”

电话铃又响了。

“兵营被封锁；”马夏尔说，“政府派不了援军了。”

“北站怎么样了？”费拉尔问道。

“还没攻下来。”

“这么说，政府可以从前线撤回一些军队喽？”

“有可能，先生，”中国人说，“政府军和它的坦克部队正向南京靠拢，它可以向这里派兵。装甲火车还正经可以打一气呢。”

“对，在火车和车站周围，是可以打一阵子。”马夏尔接过来，说，“所有被占领的地方，都逐步组织起来了。起义军里肯定有俄国或欧洲国家的干部；每一级行政机构都有革命职员领导着起义者。有一个军事委员会领导着一切。现在，所有的警察全被缴了械。红派<sup>①</sup>有了聚集的据点，起义军从那些地方出发，直逼兵营。”

“中国人的组织性是很强的。”军官说。

“是怎样保护蒋介石的？”

“他的车前边总有他的保镖车开路，而且我们还布署了侦探。”

这个中国人的脑袋老是这样傲慢地呆着，费拉尔已感到讨厌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最初，他老觉得，这个中国军官是从马夏尔头上瞧那幅俯视图摹仿的）。原来他的右眼长了一块角膜翳，迫使他必须从上往下看东西。

“这还不够，”马夏尔答道。“要再安排一下，越早越好。现在我该走了。问题在于选举执委会，担负起政府的工作。”

① 红派指共产党。

作。在这方面，我或许能做点事情。市长选举的问题，也不能等闲视之……”

只剩下费拉尔和军官了。

“这么说，先生，”中国人仰着脖子说，“从现在起，我们可以仰仗你们了？”

“刘悌禹还在等着呢。”他说。

刘悌禹作为上海银行家联合会会长、中国商会名誉会长，同所有同业公会的头面人物都有联系。起义军的各个分队肯定开始占领华界了，他在那里活动起来，比费拉尔在租界活动还要方便。军官躬身告退了。费拉尔上了二楼。这是一间很考究的办公室，摆满了中国远古时期的雕塑。刘悌禹身穿白麻纱衣服，里面套着一件没领的象他的平头一样白的粗毛线衣，坐在办公室的一角，两手扶着安乐椅的镀镍管子，确实在等他。在他的整个脸部，只见嘴巴和上下颌，活象一只劲头十足的老蛤蟆。

费拉尔没去坐。

“你们是决心甩开共产党了。”他不是发问而是断言。“我们当然也是如此。”他肩膀向前探着，开始踱来踱去。“蒋介石已做好了决裂的准备。”

费拉尔从来没有碰到过哪个中国人的脸上对他流露出怀疑。这个人相信他吗？费拉尔递给他一盒香烟。从他决定戒烟以来，这盒烟就一直开着盖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好象在显示他性格的坚定。

“必须帮助蒋介石，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维持现状是不行了。在军队的后边，在农村，共产党已

在着手组织农民协会了。农协的第一道通令，将是剥夺放债人（费拉尔不说“高利贷者”）的债权。你们资金的绝大部分都投放在乡下，你们银行的最主要的存款都是以土地来担保的。农民苏维埃……”

“共产党不敢在中国建立苏维埃。”

“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刘先生。协会也好，苏维埃也罢，反正这些共产党组织都将把土地国有化，都将宣布债权非法。这两招儿就取消了你们最主要的担保，而外国银行就是因为你们有这种担保才给予你们贷款的。包括我的日本和美国朋友在内，贷款的数目超过了十亿，这么一笔大的数目，是不能靠一种瘫痪的商业来担保的。即使抛开我们的贷款不谈，这些法令也足以摧毁中国所有的银行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国民党不会听之任之。”

“没有国民党，只有蓝派<sup>①</sup>和红派。一直到今天，他们的关系都很坏，因为蒋介石没钱。将来如果拿下上海，蒋介石基本上可以靠关税支付部队的开销，但也不能完全靠关税。他得靠我们。共产党到处鼓动要夺回土地。有人说他们又要尽量推迟夺地，可是太晚了。农民们听了他们的话以后，因为不是他们党的党员，所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除了武力，什么也阻止不了农民的行动。这一点，我已经向大不列颠总领事先生讲过了。”

费拉尔听出对方的调门儿，几乎和自己的调门儿一样，

---

① 蓝派指国民党。

他觉得对方已经被他说服了。

“他们曾试图夺取土地。蒋介石下决心不让他们这样干。他已下令，不准动军官或军官亲属的一寸地。必须……”

“我们都是军官的亲属。”刘微笑着说，“中国有哪一块土地不是属于军官亲属的呢？”

费拉尔了解中国的裙带关系。

电话铃又响了。

“兵工厂被包围了，”费拉尔说，“所有政府机关都被占领了。革命军明天要到上海。问题必须现在就解决，您要明白我的意思。经过共产党的宣传，好多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走了，蒋介石要么姑息，要么下令枪毙那些抢占土地的人。汉口的红色政府是绝不会接受这类命令的。”

“但他是会等待时机的。”

“您晓得汉口的英国租界被占领之后，英国公司的股票跌落到了什么地步；您也晓得土地——不管是什么土地，从拥有者手里被合法地夺走以后，您将会落到什么地步。蒋介石明白并且说过：他现在就不得不和共产党决裂。您干脆点儿，到底想不想帮助他？”

刘吐了口唾沫，脑袋缩在肩膀里。他的眼睛闭上，又睁开，这个在世上无处不放债的老高利贷者，眯缝起眼睛望着费拉尔：

“多少？”

“五千万美元。”

他又吐了口唾沫：

“光我们就这么多？”

“对。”

他又闭上了眼睛。装甲火车不停地开炮，压过了撕心裂胆的射击声。

如果刘的朋友们下决心，就一定还会斗下去；如果他们下不了决心，共产党就一定会在中国取得胜利，这是板上钉钉的事。“现在是决定世界命运的时刻……”费拉尔傲气十足地想着，傲气之中既有狂热，又含冷漠。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对方：老头子双目紧闭，象是睡着了；但他的手背青筋暴起，形状跟绳子一样，神经质地抖动着。“也得给他摆点个人利害。”

“蒋介石，”他说，“肯定不会看着他的军官们的利益被剥夺而袖手旁观。共产党则决定暗杀他，这一点他也知道。”

几天以来，人们就在议论这件事，但费拉尔对此表示怀疑。

“给我们多少时间？”刘问。接着，他闭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的右眼显得狡猾，睁着的左眼露出不安：

“您敢肯定，他拿到钱之后会履行诺言而不变卦吗？”

“还有我们的钱呢，而且这不是诺言不诺言的问题。他没有别的出路。您要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因为您给了他钱，他才去剿杀共产党；而是因为他要剿杀共产党，您才给他钱。”

“我去跟我的朋友们商量商量。”

费拉尔很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也了解这个讲话人的影响。



“您要提出什么建议？”

“蒋介石很可能被汉口人打倒，那儿有二十万失业者。”

“如果我们不帮助他，肯定是这个结局。”

“五千万……这……够多的了……”

他终于正面瞧了一眼费拉尔。

“这比您将来不得不给一个共产党政府的数目要小。”

电话铃响。

“装甲火车已被孤立，”费拉尔接着说，“即使政府想把前线的军队派去，也无济于事了。”

他伸出手。

刘跟他握手之后，离开了房间。费拉尔透过映着朵朵白云的宽大窗户，看见汽车开走了，一时间，发动机的声音压住了射击声。从前他即使是胜者，他企业的状况也可能迫使他求助于法国政府，但经常遭到拒绝，中国工业银行就刚刚吃了闭门羹；可今天不同了，他已成为主宰上海命运的那种举足轻重的人了。所有的经济力量，几乎每个领事馆，耍的都是和他一样的把戏：让刘出钱。装甲火车还在射击。是啊，另一方面的人第一次有了组织，他很想结识一下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他也很想枪毙了他们。

战斗的黄昏消失在黑夜里。地面上点起了灯火，看不见的长江，跟往常一样，给他唤来了城里尚存的一点活力。这条江，来自汉口，刘说的对，费拉尔也很清楚：“那里是危险的所在。在那里，红军正在形成；在那里，共产党统治着天下。自从革命军象扫雪器一样扫除了北洋军以来，所有左派分子都对那块乐土梦寐以求。即使在占领那些铸造厂、兵工

厂之前，革命的天国就已经孕育在它们绿色的轮廓里了。现在，左派已经掌握了那些地方，而那些可怜的步行者，却顺着长江的流向往前移动着，逐渐消失在粘糊糊的浓雾当中——那里的灯笼越来越多了。那些步行者好象也都来自汉口，他们那副被打得狼狈不堪的惨相，是他们将要被危险的夜晚驱赶到长江里去的预兆。

夜里十一点。自从刘离开这里，同业公会会长，银行家，保险公司和内河航运公司经理，进口商，纱厂厂主，等等，晚饭前后接踵而来。这些人不同程度地或依附于费拉尔财团，或依附于同“法国——亚洲康采恩”有过政治联系的某一外国财团。看来费拉尔不仅仅指望刘一个人。上海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心脏，中国有机体的所有部分，都与它息息相通。即使处在远乡僻壤的大部分地主，也都依附于银行——这些血管象渠道网一样，汇流于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重要城市。射击仍在继续。现在，必须等待。

瓦莱丽在隔壁房间里躺着。费拉尔想到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虚弱的聪明人，费拉尔对他的那些情妇很眼馋。有一天，他向瓦莱丽问起这个人，她说：“一个男子最着人喜欢的地方，莫过于强与弱的结合。”他深信，任何人的生活都不能表明他自己的真实思想，因此，她这句话给他留下的印象，超过了她向他吐露的有关她生活的一切真情。

然而，他知道，她对他并没有温存。他猜想，她是想仰仗他的威名，要从他对她的轻信中期待着更高贵的敬意；可是他却没猜到，她特别期待的是，这个独断专横的人会突然

表现幼稚，把她当作自己的情妇，并最终爱上她。她呢，她也不知道，费拉尔的本性，他目前面临的战斗，只使他沉溺于情欲，并不追求什么爱情。

这是一个特突难开的高贵阔气的女裁缝（至少现在是如此）。她认为：许多女人只在她意中情郎面前赤身露体时，方动风流之兴，而且只有一次能曲尽其趣。现在她已经是第三次跟他睡觉了。他感觉到她身上有一种和他自己相仿的傲气。“男人要闯荡，女人要放浪。”昨天晚上她曾这样说。象对待其他许多女人一样，他既对她冷酷无情又对她体贴入微，这样做是否能讨她欢心呢？他不是不知道，<sup>^</sup>自己是把一种最强烈的感情——高傲，带到这种事情里来了。她说过：

“亲爱的，任何男人都没有资格谈论女人，因为任何男人都不懂得，每一新奇的妆饰，每一件入时的衣裙，每一个新换的情人，都要求有一个新的灵魂……”她说这话时，脸上勉强流露出一丝笑意。遇上这样的对手，是不会那么顺当的。

他走进卧室。瓦莱丽正躺着，头发散落在浑圆的胳膊的弯曲处，微笑着看了他一眼。

这种微笑透露出，纵欲使她的生活既紧张而又放荡。静态的瓦莱丽充满一种忧郁的柔情。费拉尔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曾说她有一副模糊的脸庞，与她的秋波荡漾的灰色眼睛相得益彰。可是当她带着娇姿媚态进入风月场的时候，弧形朱唇轻启的微笑，多是挂在嘴角，而不是在面部的正中央，这与她蓬松的波浪起伏的短发，与当时稍欠温柔的眼睛，出乎意料地协调一致，不禁使人联想到被遗弃的猫的复杂的表情，尽管她的相貌清秀端正。费拉尔和那些孤高

自做到了极点的人一样，同人合不来，而喜欢动物，特别是猫。

他在洗澡间脱衣服。灯泡被打碎了，盥洗用品被战火一照，都染成淡红色了。他从窗子往外看了看：大街上人群在移动，如同千百万条鱼在动荡的黑水中浮游。他突然感到：这人群的灵魂，如同睡梦者的思想一样被丢掉了；这人群在这无边无际的大火中，充满欢乐地熊熊地燃烧着，把一座座建筑物照得通明。

等他回到卧室的时候，瓦莱丽已不再微笑，陷入沉思了。难道是因为他只想让面带笑容的女人爱他，因而就把这个没有笑容的女人当作陌生人与之疏远吗？装甲火车不间断地射击着，好象在显示着这样一种胜利似的：它连同兵营、兵工厂和俄国教堂，还都在政府军手里。

“亲爱的，”她问道，“您最近看到柯拉毕克先生了吗？”

所有在上海的法国侨民，都认识柯拉毕克。瓦莱丽是在前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遇到他的，他的奇思怪想，使她极为高兴。

“看见了。我托他给我买几幅嘉麻的水墨画。”

“在古玩商那儿能买到吗？”

“没问题。嘉麻从欧洲归来，再过半个月就到这儿。柯拉毕克很疲倦，他只讲了两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是说，有一个中国小偷，通过一个提琴形的洞穴，钻进‘当铺’行窃，被宣告无罪。另一个讲的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二十年来，一直养兔子。他的住房在海关里边一侧，他的那些兔子

窝在海关外边一侧，海关人员的更换不止一次了，但每次交接时，离班的人都忘记向接班人交代，这个人每天都过海关。他挎着装满草的篮子过海关。‘唉，过来！看看您的篮子！’在草的下边，<sup>①</sup>净是些手表、项链、电子管、照像机一类东西。‘您就是拿这些东西喂您的兔子吗？’‘是的，关务主任先生（一边吓唬着那些所谓的兔子），如果它们连这些东西都不喜欢吃，那就没什么可喂的了。’”

“哦，”她说，“这是一个科学故事，现在我全明白了。那些摇铃的兔子，那些击鼓的兔子，你知道，所有这些小漂亮的小野兽，在月亮上、在类似月亮的那些地方，生活得是那么美好，而在孩子们的房间里却生活得如此糟糕，原来是这么回事呀……这个‘德高望重’人的可悲故事，是不公道的，是令人痛心的。我想，革命报纸将会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事实上，请您相信，这些兔子是吃这些东西的。”

“您读过《阿里斯在奇迹国》<sup>①</sup>这本书吗，亲爱的？”

他叫她“亲爱的”时，带着一种近乎讥讽的口吻，瓦莱丽很生气：

“这你还要问吗？我都能把它背出来。”

“你的微笑使我想到猫的幽灵，它从来也没变成真猫，只能看到它的令人陶醉的微笑在空中飘忽。唉！为什么聪明的女人不抓住自己的东西，而老是追求别的东西呢？”

“她自己的东西是什么，亲爱的？”

“魅力和理解力，这还用说吗。”

---

<sup>①</sup> 刘易斯·卡罗尔 (Lewis Carroll) 1865年写的一本供青年人阅读的虚幻小说。

她考虑了一会儿。

“男人们所称道的这种东西，就是精神服从。对于女人，你所指的聪明，就是对你的赞扬。这是多么……多么称心呀！”

“女人委身于男人，男人占有女人——这是人们理解世上一切的仅有的两种依据……”

“亲爱的，女人们从来(或者几乎)不委身于人，男人们什么也没占有，这一点你难道不相信吗？什么我认为我占有了她，而她也认为被人所占有……对吗？真的吗？这是扯淡！我说得难听点儿，你不认为这和瓶塞自认为比瓶子更重要的故事一样吗？”

女人在风化方面的自由诱惑着费拉尔；可是女人在精神上的自由却触怒了他。他渴望重新让女人产生一种降服于他的感情：基督教徒的羞愧感，并承认这种羞愧感——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控制一个女人。如果她没猜到这一点，那她准是想，他要离开她，而她对他的欲火很敏感，她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控制他，这个想法使她觉得很好玩儿。她的嘴唇微微张开(既然他爱看她微笑)，含情脉脉地望着他，确信他会象所有男人一样，把她引诱他产生的快乐，当作她听任摆布的快乐。

他上床与瓦莱丽做爱。他的抚摸使瓦莱丽出现一种不明朗的表情，他想让这种表情产生变化。他以极其旺盛的情欲，促使她出现另一种表情，不希望快感把这一表情只固定在瓦莱丽的脸上。他认为他能撕掉假面具，认为她身上所具有的更深入、更秘密的东西，一定是他更喜欢的东西。因为

他从前只和她摸着黑儿睡过觉。可是他刚一用手轻轻地把她的两腿分开，她就把灯关上了。他又重新去开灯。

他摸索着去找开关，她以为这是个误会，所以他打开后她又关上了。他马上又打开了。她的神经非常敏感，她又想笑，又想生气，但她发现他在凝眸注视着她。他把开关挪开了，她断定，他主要是想从她的脸部肉感变化中寻求他的乐趣。她心里明白，只有在和人刚开始发生关系的时候，她才会有性冲动，而且还是突如其来的。当她觉得她再也够不着开关的时候，她所熟悉的一股暖流，沿着上身一直窜到乳峰，窜到嘴唇。在费拉尔的注视之下，她估计，嘴唇一定在慢慢地鼓起来。她利用这股暖流，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好象投入了远离沙滩的深水之中，脉搏缓慢地跳动着。她知道，原来不想原谅他的决心，过一会儿，将和她本人一起被抛向那里。

瓦莱丽正在睡觉。匀称的呼吸和香甜的睡眠，在她鼓起的嘴唇上留着温存；可是快乐时的表情却消失了。“一个人，”费拉尔想，“一个作为个体的、孤立的、独特的生命，跟我一样的生命……”他在占有她的肉体的时候，在琢磨着她，在她的位置上所感受到的快活，只能使他感到蒙受屈辱。“真蠢！她是靠她的性器官而感到受用的，如同我靠我的性器官感到受用一样，一点儿不差。她觉得自己是由欲望、忧愁和傲气组成的一种交织体，好象是一种命运一样……这是十分明显的。”但现在可不是这样，睡态和她的嘴唇使她充满了诱人的肉感，她似乎已经应诺，她不再是一个自由自在活着的人，而表示承认她只是一个被征服的肉体。充

满樟脑和树叶味儿的中国夜晚，万籁俱寂，一直到太平洋的一切，都进入了梦乡。没有一条船鸣笛，没有一支枪射击，寂静的黑夜包围着她，她似乎脱离了红尘。她没把他从没占有过她的回忆和永远占有不了她的希望带进梦乡，她只不过是她自己寻欢作乐的正负两极之一极罢了。她早就不是一个姑娘了，她从来就没做为一个姑娘生活过。

又传来了炮声：装甲火车又开火了。

翌日凌晨四点。

队部设在原来一家钟表店里，京从这里观察着装甲火车。火车前后二百米处，革命者们炸翻了铁轨，夺取了交道口。火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儿，挡住了街道，京只能看到车厢，有一节关着门，象是装牲畜的；另一节已被炸毁，象是拉的油罐。从炮塔下伸出一个小口径炮筒。看不见人，既看不见被包围的人，他们都藏在紧紧关着的车窗后面；也看不见进攻者，他们都躲在控制铁路的房子里。从京后面的俄国教堂方向，从商业印刷所的方向，还不断传来射击声。随时准备交枪的士兵已经解决；剩下的也都快完了。现在，所有的起义支队都武装起来了。政府军从前线溃退，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或坐着被打坏的火车，或踏着坑坑洼洼泥泞的道路，向南京方向逃窜。国民党军队再过几个钟头就要到达上海，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传令兵来报告。

陈走进来，还是工人打扮，坐在京旁边，看着火车。他



手下的人守在离这儿一百米远的一个街垒的后面，但不准进攻。

从侧面看，火车上的炮在移动。大火熄灭后的残存物冒出的滚滚浓烟，犹如低云，从他眼前掠过。

“我想他们的弹药不会有很大了。”陈说。

大炮从炮塔上伸出来，跟天文台的望远镜一样，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虽然有装甲保护，但它动作起来还是这样迟迟疑疑的，表明它是很容易出毛病的。

“一旦我们自己的大炮运到这儿……”京说。

他们所看到的那门炮，固定不动了，开射了。作为回敬，一阵排射打得火车上的装甲“劈啪”直响。灰暗的天空，正好在火车的上方出现了一角青天。一个通讯员交给京几份文件。

“我们在执委会里不是多数。”京说。

起义前，由国民党秘密召开的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由二十六名成员组成，其中共产党占十五席；这个委员会刚刚选出了执行委员会，由它来组织市政府，它才是最有实权的，而共产党在这里面，就不再是多数了。

第二个身着军装的通讯员进来，站在门框下：

“兵工厂拿下来了。”

“坦克呢？”京问。

“向南京开来了。”

“你是从部队来的吗？”

他是第一师的战士，这个师里的共产党员最多。京向他问了问情况。他的话很尖刻：人们都在想，一切都拱手让给

了国民党资产阶级，那“国际”是干什么吃的？战士们的亲属几乎都是农民，他们为前方战争被迫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而资产阶级所纳的税却很轻。农民们要夺取土地，上级下令禁止他们。共产党战士们想，夺取上海以后，这一切可能都会改变。而他，一个通讯员，对此却不十分相信。虽然他列举的理由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从中可以很容易地引出更能说明问题的理由。京回答说，在上海，将创建纠察队和工人民兵；在汉口，还有二十多万失业者。两个人都不时地停下话头，倾听着。

“汉口——”那个人说，“我知道有个汉口……”

颤抖的空气，也好象在等待轰炮似的，把他们俩的谈话声减弱，停在耳边响着。他们俩都在想着汉口——这座“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正在组织一支崭新的红军；此时此刻，那里的工人支队，正在学习打枪……

陈叉开两腿，攥紧拳头放在膝上，张着嘴巴，一言不发地望着通讯员们。

“一切取决于上海市长的人选，”京说，“如果选上我们的人，即使我们不是多数，也没什么要紧。如果落在右派手里……”

陈看了看时间。在这个钟表店里，起码有三十多个上着弦或停了摆的挂钟，指着不同的钟点。急促的射击声响成一片，势如雪崩。陈犹犹豫豫地想往外看一眼，但他的视线须臾不能离开这个在革命风暴中岿然不动的钟表运行的世界。通讯员们一离开，他得以解脱，终于决定看看自己的手表：

“四点了，可能有消息了……”

他去拨了战用电话，然后怒气冲冲地扣上耳机，转身对京说：“市长选了个右派。”

“首先扩大革命，然后向纵深发展……”京回答——与其说是回答，莫如说是提问题。“‘共产国际’的路线，象是要把这里的政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暂时看来……我们要被出卖。我见到过从前线下来的通讯员，他们说后方禁止一切工人运动。蒋介石下令，审慎地向罢工者开枪。”

一束阳光射了进来。黑暗天空中一角青天，逐渐扩展；街上洒满了阳光。尽管还能听到射击声，但这种光线一出现，装甲火车似乎被人遗忘了。它又开火了，京和陈现在不那么注意它了，因为敌人可能已接近他们了，到了他们这里。在刚露脸的太阳照射下，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大黑影，在人行道上延伸开来，京非常不安。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卡托夫。

“十五天之内，”他接着说，“国民党政府将要取缔我们的突击队。我刚看见了一些从前线派回来试探我们的蓝派军官，居心叵测地暗示我们，把武器放在他们那儿比放在我们这儿好。如果把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了，他们将拥有警察，执行委员会，市长，军队和武器。我们举行起义也无非是为了这些吧。我们应该脱离国民党，把共产党独立出来。如果有可能，就由共产党来掌握政权。这一切可不是下棋，而是严肃认真地为无产阶级着想。我们向无产阶级提出什么建议呢？”

陈赤脚穿着木底鞋，看着他自己的又瘦又脏的脚丫子：

“工人有理由举行罢工，可我们命令他们停止罢工；农

民想夺取土地，他们也是有理由的，可我们也禁止他们去夺地。”

他说话的重音，并不落在音节最长的词上。

“我们的口号和蓝派的一样，”京继续说下去：“不同的无非是比他们多了点许诺。蓝派应承给资产阶级的东西已经兑现；而我们应承给无产阶级的东西却没兑现。”

“得了！”陈说着，连眼皮也没抬。“首先，必须干掉蒋介石。”

卡托夫听着，一声不吭。

“这是以后的事。”他终于开口说。“眼下，人家在杀我们的人。确实在杀。可是，京，你要明白，我并不一定赞成你的意见。在革命初期，我还是一个革命社会党人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反对列宁在乌克兰实行的策略。当地的‘契卡’主席安东诺夫，逮捕了从事破坏活动的矿业主，只强制他们劳动十年，并没有进行审判。列宁以‘契卡’主席的名义自作主张，称赞了他；我们所有的人都表示抗议。你知道那都是些货真价实的剥削者，我们当中有好几个人，曾被他们当作犯人弄到矿上去做过苦力，所以我们想，必须给予他们以应得的惩处，以儆效尤；如果我们将来把他们放出来，无产阶级肯定不理解。但列宁做得对。虽然我们有理，可是列宁还是对的。我们当时还反对‘契卡’的特殊权力。要特别注意，‘首先扩大革命，然后向纵深发展’，目前这个口号是好的。列宁也没马上就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呀。”

“但他从来也没说过权力归孟什维克！在任何情况下，也休想让我们把武器交给蓝派，无论如何都不交！武器一

交，就意味着革命失败，那就只有……”

一个国民党军官走进来，小个子，直挺挺的，长得几乎象个日本人一模一样。敬礼。

“军队半个小时以后到达这里，”他说，“我们缺乏武器，你们能交给我们多少？”

陈来回踱着步。卡托夫等待着。

“工人民兵应该保留武器。”京说。

“我的要求是征得汉口政府同意的。”军官回答说。

京和陈微微一笑。

“我请你们了解一下。”他接着说。

京打电话。

“就是下命令……”陈大动肝火了。

“行了！”京喊道。

京听电话；卡托夫拿起第二个听筒。他们又都把电话放下了。

“好，”京说，“可是人还都在前线。”

“炮兵马上开到，”军官说，“那个我们会解决的……”

他指了指太阳地里晒着的装甲火车。

“……我们自己会解决的。明天傍晚，你们能不能把武器交给军队？我们急需武器。我们将继续向南京进发。”

“我看有多一半武器收不回来。”

“为什么？”

“共产党员肯定都不会交出他们手里的武器的。”

“即使汉口下命令也不交吗？”

“就是莫斯科下命令也不会交。起码，一时不会交。”

他们感到军官被激怒了，虽然他表面上不露声色。

“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他说，“七点钟我派个人来。”

他走了。

“你同意交出武器吗？”京问卡托夫。

“我想先把情况弄清楚。我看，无论如何应该先到汉口去一趟。‘国际’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要利用国民党的军队统一中国。然后再通过宣传和其他手段发展革命，使它由民主革命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必须干掉蒋介石。”陈说。

“蒋介石是不会容许我们那样做的，”京回答说，“他不能容许。他只有依靠海关和资产阶级的捐助，才能维持自己，而资产阶级是不会白白出钱的，蒋介石必须以屠杀共产党来酬报他们。”

“这都是废话。”陈说。

“你让我们消停点儿吧。”卡托夫说。“你也不想想，没有征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起码征得‘国际’代表的同意，你就想干掉蒋介石，这行吗？”

远处传来的一阵阵喧闹声，打破了寂静。

“你要到汉口去吗？”陈问京。

“那当然。”

陈随着继续走着的钟表的有节奏的“嘀嗒嘀嗒”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刚才的话非常简单，”他终于接着说，“那是要害。那是唯一应当做的事情。请你报告他们。”

“你等着吗？”

京明白，如果陈不回答他，表示怀疑的话，那就说明卡托夫没有说服他，因为‘国际’目前下达的所有命令，都不能满足他急于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强烈愿望。假如他作为纪律服从的话，那他就不能行动了。京望着挂钟下这个抱着敌对情绪的躯体，它为这次革命牺牲自己和别人；革命却很可能把孤独的他和他的行刺之举抛到九霄云外去。陈既是他的人，又反对他；既不能与他重归和好，又不能摆脱开他。尽管有战斗的情谊，可是就在他们望着有可能一起去攻打装甲火车的时刻，京仍感到决裂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如同和一个身患癫痫或疯病的朋友在一起，即使在他最清醒的时候，也会感到他随时都有发作的危险一样。

陈又走动起来，摇着脑袋好象是表示抗议，最后耸耸肩膀，说“好”，似乎表明，他之所以这样回答，只是为了满足京的某种天真的愿望。

又传来了喧闹声，声音很大，但乱得很，必须仔细听，才能辨别出是什么响。这声音似乎是从大地冒出来的。

“啊，”京说，“这是喊声。”

喊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

“是不是快攻下俄国教堂了？”卡托夫问。

有许多政府军固守在那里。可是喊声越来越近，象是从郊区传到了市中心。喊声越来越高，但听不清喊的是什么。京看了一眼装甲火车：

“他们是不是来了援兵？”

只听到喊叫，听不见什么内容。声音越来越近，好象在

人群里互相传播着重要消息似的。和这种声音比高低并取而代之的另一种响动，终于清晰可辨了：原来是震撼大地的整齐的脚步声。

“部队，”卡托夫说，“是我们的。”

一点不错。那是人们在欢呼，但难于同惊叫声区别开——京曾经听过，被洪水威胁着的人群就是这样喊叫的。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变成了“拍拍”的踏步声，接着又是行进的脚步声：兵士们停了一下，又朝另一方向开走了。

“他们事先知道装甲火车在这里。”京说。

与他们相比，火车上的人肯定更听不清人们喊的是什  
么，但由于装甲钢板的共鸣，对铿锵的脚步声，却会比他们听得真切得多。

一种震耳欲聋的混杂的响声，使他们三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火车上的每一门炮，每挺机枪，每支步枪，都在开火。卡托夫曾在西伯利亚的一辆装甲火车上呆过，他想亲眼看看眼前这辆装甲火车末日的到来。军官们命令自由射击。他们藏在炮塔里，一手拿电话，一手握手枪，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每一个士兵心里肯定都明白，这铿锵有律的脚步声意味着什么。他们在这艘永远不会再浮出水面的巨大“潜水艇”之中，是准备一起魂归西土呢？还是准备互相残杀呢？

火车本身已处于一种勃然大怒的状态中，它从各个角度不停地射击着，强烈地颠簸着，大有挣脱铁轨之势，就好象藏在里边的人们的绝望的怒吼，传进了这个被围困的铁甲之中，它也在拼死挣扎似的。在这狂怒之中，使卡托夫看得发呆的，不是火车里的人陷入癫狂，而是颤动的铁轨，它象紧



身衣一样，束缚疯子乱动乱叫。他向前伸了伸胳膊，看是不是麻木了。三十秒钟过后，喧嚣声消失了。一阵沉重的铁器相撞的隆隆声，盖过了低沉的脚步声和店里所有挂钟的“嘀嗒”声：革命军的炮兵开来了。

躲在每块钢板后面的火车上的每个人，听到这种声音，就象听到丧钟敲响了一样。

## 第三部分

三月二十九日

汉口就在眼前了，川流不息的舢板，几乎覆盖了整个江面。兵工厂的一些烟囱，渐渐地从一座山丘后面显露出来，但几乎又被它们冒出的浓烟吞没了。在近于蓝色的春天晚霞中，那清晰可见的黑色近景，是一片西方战舰，汉口城连同所有的圆柱式银行，在它们的缝隙中出现了。京乘船逆流而上已经六天了，没有得到一点关于上海的消息。

在紧贴船角下的水面上，一艘外国哨艇鸣了几下汽笛。京的证件是齐备的，而且他已养成了做地下工作的习惯。他到船首，只是出于谨慎。

“他们想干什么？”他向一个机械师问道。

“他们想了解我们的船上是不是装着大米，或者煤。这些东西是禁运的。”

“凭什么要禁运？”

“找一种借口。假如我们装的是煤，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船扣在港口，那就甭想再供应城市了。”

那边是密集的烟囱，升降机和油罐——这些东西都与革

命息息相关。京在上海听说，这是一个吞吐活跃的港口，可是他眼下看到的，除了帆船就是鱼雷艇。他拿起望远镜：一艘商船，二艘，三艘。又是几艘……他乘坐的这艘，停在了武昌的码头上。他还要改乘渡轮到汉口。

他下了船。一个官员在码头上监督下客。

“船为什么这么少？”京问。

“公司担心船被征调，都开走了。”

在上海，谁都知道早就开始征调了。

“渡轮什么时候开？”

“每隔半个小时一趟。”

还要等二十分钟。他信步走着。店铺里边的煤油灯都点上了。一些树木和房角的轮廓指向西天，不知从何处射过去的光芒在那儿闪耀着，好象是从温和的空气里照射出来，又消失在高空的静谧的黑夜一样。那些挂着蟾蜍招牌的江湖医生，卖草药和怪兽的商人，代写书信的先生，摇卦的，看星相的，算命的，就在士兵们和工人联合会会员的眼皮底下摆着摊子，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从事着他们那些虚无飘渺的职业。灯光之暗，已看不清那些斑斑的血迹了。所有的黑影，被一道浅蓝色的磷光一照，都不再扩展，消失在地面上了；从遥远的地方，从天涯海角的一个所在照射过来的最后一道黄昏的余辉，在一座巨大的拱形桥孔里微微闪光，它上面耸立着一座宝塔，长满了发黑的长春藤；只有一道反光映照在大地上。拱桥前面，一支队伍消失在接近江面的一片夜雾当中。在响着铃声和放着留声机的地方，是星罗棋布的万家灯火。京也走出码头，一直来到一个颓垣断壁的建筑工

地，高墙被夷为平地，标志着中国的解放。渡轮已在眼前了。

又在江上航行了一刻钟，眼看着夜幕降临城池了。汉口，终于到了。

人力车都在码头上等着拉客。可是，京由于心望七上八下，没法在车里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宁愿走一走。英国已于一月份放弃了英租界，世界各家大银行都关了门，但还未被占领……“一种比焦虑更为奇特的感觉：呼吸困难，呼吸和心脏跳动的节律一样快，好象是用心脏呼吸似的……”在马路拐角的地方，有一个大花园，里面的果树鲜花盛开，在夜雾里呈现灰色。从它的缺口处望去，只见西方人开办的工厂烟囱林立，但没有一个冒烟。在他所见的这些工厂中，只有兵工厂在生产。汉口，这座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期待它拯救中国的城市，难道也在罢工吗？兵工厂还在生产，红军至少是可以依靠它的吧？他不敢再乱跑了。如果汉口不象人们所估计的那样，那么，他在上海的同志们，就都有被处死的可能。包括梅，也包括他自己。

他终于走到了“国际”代表处。

整个别墅灯火通明。京知道鲍罗廷<sup>①</sup>在最高一层办公。一层的印刷机开满了转，象破旧的鼓风机一样，嗡嗡喳喳地响着。

京穿着一件高领灰粗毛线衣，门卫端详了一下他，把他

---

① 共产国际代表。

当成了日本人，他看了一眼京递过来的证件后，打手势叫来一个引导外国人的传令兵。穿过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之后，他被领到“国际”上海科。接待京的是一位秘书，京只知道他曾经组织过芬兰最早的起义，是一位同志。那人从办公桌上边伸过手来，说自己叫沃洛金。他的胖劲儿不象男子汉，很象个成熟的女性。他面容的肤色虽然很浅，却有点象地中海东岸人，细腻的脸庞轮廓突出而带有稚气，近于花白的绉绉长发本来是向后梳理的，现在却象女人发型似的直直地在中间分开，紧贴在两鬓上。

“我们在上海走错了路。”京说。

话一出口，他就觉得不满意，他的思维是很敏捷的。不过，这句话还是道出了下边他想说的话的意思：假如汉口不对各个支队进行他们所盼望的救援的话，那武器一交出，就等于自取灭亡。

沃洛金埋在安乐椅中，双手抄在土黄色军服的袖筒里。

“还有什么？……”他含糊糊问。

“你先说说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下去：‘我们在上海走错了路’是什么意思？”

“而我却要问问为什么——为什么这儿的手工工厂不生产了呢？”

“等会再谈！都哪些同志这样提出异议？”

“战斗小组的同志们。恐怖主义者也有这种看法。”

“恐怖主义者吗，不足挂齿。其他人……”

他瞧了京一眼：

“想干什么？”

“退出国民党，组织一个独立自主的共产党。把权力交给各联合会。千万不要交出武器，这是至关重要的。”

“还是老一套。”

沃洛金站起来，透过窗户向长江和岸上的小山望去，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凝滞的面孔同一个梦游者一样紧张而又呆板。他个头矮小，脊背上的肥膘不亚于肚囊，看上去很象个罗锅子。

“我问你：假如我们退出国民党，我们该干什么呢？”

“首先，在每个劳工联合会，每个工会，建立起民兵。”

“靠什么武装？此地的兵工厂操在将领们的手里；上海的兵工厂现在由蒋介石把持着；我们又被蒙古隔断，得不到苏联的武器。”

“上海的兵工厂已被我们占领了。”

“那是因为有革命军作你们的后盾，而不是站在前面与你们为敌。我们在这要武装谁呢？可能是上万的工人。除了‘铁军’<sup>①</sup>中的共产党中坚分子以外，也还有一万。每个人要发十颗子弹！而反对他们的敌人，仅此地就有七万三千人之多。姑且不去谈——这个……蒋介石，也不去谈其他人。只要一旦采取共产党的措施，他们就会欣然结成联盟，反对我们。那么，我们拿什么来供应我们的队伍呢？”

“铸造厂和手工工厂呢？”

“没有原料了。”

---

① 指精锐部队。

沃洛金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夜色渐渐浓了，只见他的发绺，不见他的轮廓。

他又继续说：

“汉口不是劳动者的首都，而是失业者的首都。

“没有武器，这倒可能是好事。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们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就会把枪口对准我们。而那些每天埋头干十五个小时工作的人，却没有提什么要求，因为，‘我们的革命受到威胁……’”

京好象陷入了梦境，越陷越深。

“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沃洛金接着说，“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将领们的手里。象蒋介石不接受他们一样，他们也不会接受‘苏维埃’。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但只此而已。而且还要特别谨慎。”

如果汉口只不过是一种血迹斑斑的装潢……京不敢再往下想了。“走的时候，我一定要去见见波索兹。”他心里盘算着。波索兹是京在汉口唯一可以信赖的同志。“我一定要去见见波索兹……”

沃洛金内心的不自在比他外露的更厉害。由于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党的纪律性大大加强了。沃洛金在这里，是为了贯彻那些比他、比京更有资格也更了解情况的同志们所作出的决定的。在俄国，他没三心二意过。他没有忘记，布尔什维克为了向没有受过教育的广大群众宣传真理，所表现出的那种不厌其烦的最大的耐心。列宁在演说的时候，为了阐明一个观点，有时候要翻来覆去讲六、七次，但一次比一次深刻。中国党的机构还远远不如俄国党那么有力量，一些

情况报告，一些指示，甚至命令，往往由于莫斯科到上海千里迢迢的路程而失落。

“……不要这样——这个……呆头呆脑地开口讲话。”他说，“外界认为汉口是共产党的天下，这也好，这说明我们的宣传有了效果。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实际情况果真如此。”

“最近有什么指示？”

“加强‘铁军’中共产党的中坚力量。我们可以往天平的一头加重砝码。但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在这里与我们一起共同作战的将领们，和蒋介石一样仇恨苏维埃和共产党。这一点我了解，我看得出来——这个……每天都看得出来。共产党的每一个口号都会把他们推向我们的对立面去，而且必定会使他们与蒋结成联盟。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利用他们来瓦解蒋；如果有必要，对于冯玉祥也要采取同样的对策。就象我们曾利用蒋瓦解了——这个……我们与之斗争至今的将领们一样，因为我们在宣传方面所赢得的人数与他们在战场上的胜利所赢得的人数不相上下。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是水涨船高，所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争取时间。革命终归不能停留在——这个……民主革命阶段。就它本身的性质而论，它应该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让它完成这个转变。应该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而不能是硬性堕胎。”

“说得对。但是马克思主义既讲必然性，也讲唯意志论。每当必然性超越意志力的时候，我就怀疑。”

“今天，一个纯属共产党的口号，就有可能促使所有的



将领们——这个……立即联合起来反对我们——那就是二十万对两万。因此，你们在上海必须和蒋介石搞好关系。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交出武器。”

“照你这么说，想当初就不该搞十月革命。当时布尔什维克有多少人？”

“‘和平’的口号，使我们赢得了群众。”

“还有别的口号。”

“为时过早。你指的是哪些？”

“立即取缔全部地租和债权。搞农民革命，不能投机，也不能迟疑。”

在乘船逆流而上的六天当中，京更加坚定了这样的想法：几千年来，在这些地处河口的粘土城市中，穷人们象追随工人一样追随农民。

“农民总是跟着别人走。”沃洛金说，“或跟工人，或跟资产阶级，反正是跟着走。”

“对不起。一个农民运动只有紧紧依靠城市才能持续下去……孤立的农民只能举行扎克雷式的起义<sup>①</sup>，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他们从无产阶级中分离出去。‘取缔债权’是个战斗口号，只有这样的口号才能把农民发动起来。”

“这个……平分土地，”沃洛金说。

“说得更具体点：许多赤贫的农民，也有土地，但他们是为高利贷者卖命，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此外，在上海，

<sup>①</sup> 指法国中世纪农民暴动。最著名的一次爆发于1358年，后被残酷镇压下去。

必须尽快地训练工联的纠察队，不能以任何借口解除他们的武装。面对蒋介石，要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

“一旦这个口号公诸于世，我们会立即遭到镇压。”

“不管我们怎么做，也得遭到镇压。即使我们放弃共产党的这些口号，这些口号照样会实现。发动农民起来索取土地，只需发表一些演说就行；但要让他们放弃对土地的要求，光靠演说可就不够了。要么，我们甘心同蒋介石部队合伙去镇压，你看这行吗？要这样，我们的声誉必将受到影响；要么，让他们把我们搞垮，不管他们是存心还是不存心这样干。”

“必须和他们——这个……决裂，党是同意的，但不能操之过急。”

“那么，如果问题的关键在于策略，那就不能交出武器。交出武器就等于出卖自己的伙伴。”

“假如伙伴们按指示去办，蒋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他们按不按指示去办，对事情的结果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委员会、卡托夫和我本人，我们一起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您如果把他们解散，那么，整个上海的无产阶级就会认为这是叛卖行为。”

“那就干脆解除他们的武装！”

“在贫民区，到处都组织起了工人联合会，难道您能以‘国际’的名义去取缔工会不成吗？”

沃洛金又走到窗前。带双下颏的脑袋耷拉到胸脯上。天开始黑了，满天的星斗闪着微光。

“决裂，”他说，“这肯定是一种失败。莫斯科绝不容

许我们现在就退出国民党。况且，中国共产党比莫斯科还赞成和解。”

“那只是高层领导的见解；在基层，您就是下命令，同志们也绝不会把全部武器都交出去。你们断送了我们，可又安抚不了蒋介石。鲍罗廷可以向莫斯科说明这一点。”

这是京唯一的希望。象沃洛金这号人，是没法说服他的。顶多，他能给转达一下……

“这些情况莫斯科都了解，可是前天仍然下达了交出武器的命令。”

京惊呆了，半晌没回答。

“各支队都把武器交出来了吗？”

“刚刚有一半儿……”

前天，当他在船上思索或者说睡觉的时候，他也估计到，莫斯科可能要坚持他们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陈的计划就值得怀疑了。

“还有一件事——可能与刚才谈的是一回事：我们那儿有个叫陈塔尔的，他想干掉蒋。”

“唔，是为这件事呀！”

“怎么？”

“你还没到的时候，他捎来一张字条，说等你来了以后，他要求见我。”

他从桌上拿起来一张字条。京还从来没见过他这双教士的手。京想：为什么没让他马上就上来呢？

“……问题严重……（沃洛金读着字条）他们都说：问题严重……”

“他在这里吗？”

“他不该来吗？所有的人都不例外，他们的看法老是变来变去。他到这儿——这个……有两三个钟头了，你搭乘的船晚点时间太长了。”

他打电话叫陈来。他很不愿意跟恐怖主义分子谈话，他认为他们狭隘、傲慢而又缺乏政治头脑。

“在列宁格勒，当尤登尼奇<sup>①</sup>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情况更糟。但最后还是摆脱了困境……”

陈进来了，他也穿着粗毛线衣。从京身边走过去之后，坐在了沃洛金的对面。在沉寂之中，只听到印刷机开动的声音。天全黑下来了，两个人的侧影分别映在办公室的大落地窗上。陈胳膊支在办公桌上，双手托着下巴，执拗地绷着脸，一动也不动。“一个人要孤注一掷的时候，往往会变得失去某些人性，”京看着陈，心里想，“这个看法是不是由于我们经常接触，很容易感到对方的弱点的缘故？”惊讶之余，判定陈确实呆在那儿。夜空，布满星斗。沃洛金站在另一侧，头发一绺绺地耷拉到脸上，两只肥胖的肉手交叉在胸前，也在等待着。

“他跟你说过了吗？”陈问，脑袋向京歪了歪。

“你很清楚‘国际’对恐怖行动的意见，”沃洛金回答说。“我不想对这个问题——这个……跟你多费口舌！”

“现在是特殊情况。能够使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只有蒋介石一个人。他还相当得人心，相当有势力。您

---

①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叛军的首领之一，沙皇俄国将军。

反对干掉他是不是？”

他仍然一动不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巴。京心里明白，这种争论对陈毫无作用，虽然他来了。只有破坏，才能使他心安理得。

“‘国际’不能同意这个计划。”沃洛金有板有眼地说。“退一步说，即使从你的观点来看……”陈还是一动不动，“时机——这个……成熟不成熟？”

“您宁愿干等着蒋屠杀我们的人？”

“他至多颁布些法令，如此而已。你不要忘记，他的儿子还在莫斯科。这个……加朗手下的俄国军官没有能离开他的参谋部，假如蒋被杀掉，他们肯定会吃苦头。加朗也好，红色参谋部也罢，都不会接受这个计划……”

“到底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起来了。”京想。在争论中，使他糊涂的是，不知是什么东西不能令人信服：他认为沃洛金在命令交出武器时可比他谈论刺杀蒋介石果断得多。

“俄国军官吃苦头，”陈说，“就让他们去吃好了！我也是，我也免不了吃苦头，这没什么关系。千百万中国人怎么也抵得上十五个俄国军官。得了，蒋介石会抛弃他的儿子的。”

“这方面你知道一些什么情况？”

“你呢？”

“他对他儿子当然不如对他自己那样珍重，”京说，“而且，他不搞垮我们，他自己就会完蛋；他不扼杀农民运动，他手下的军官们就会脱离他。因此我担心，他在听了西方领事们的许诺或其他什么无足轻重的话之后，会抛弃他的

小家伙的。他一旦解除了我们的武装，沃洛金，你想联合的小资产阶级，第二天就都会跑到他那边去，这些人我很清楚，哪边风硬往哪边倒。”

“不见得。不是光有一个上海。”

“你说你们饥肠辘辘，如果上海丢了，谁再来供养你们？冯玉祥把你们和蒙古隔断，如果我们被搞垮，他就会背叛你们，这就意味着，长江指望不上，苏联也靠不住。你们向农民保证实施国民党的纲领——减少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租，瞎扯，纯粹是瞎扯——他们为供养红军而让自己饿死，你们认为这可能吗？与以前相比，你们得更加听任国民党的摆布。现在提出真正的革命口号，依靠农民和上海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蒋介石进行斗争，还是有指望的，并不是办不到的，因为第一师从它的师长起，从上到下，几乎全是共产党员，他们和我们战斗在一起。而你竟埋怨我们保存了一半武器。不进行斗争就等于束手待毙。”

沃洛金本来是摆着一副和蔼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争论到这个地方，他也火了。可是，京在他面前为之辩护的上海那种人心所向的力量，他也不是不知道。

“国民党是客观存在，它不是我们创建的，它是客观存在。国民党暂时比我们强大。要征服它，可以从基层入手，把我们属下的共产党员都安插进国民党，使它的大多数成员都成为激进分子。”

“你跟我一样清楚，靠民主取得多数反对领导机构，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说国民党之所以被利用，是在利用它的过程中，

而不是在空发议论的时候。两年来，我们没有一个月，没有一天，不在利用它。”

“那只是因为你们接受了国民党的宗旨，可他们一次也没接受你们党的。你们引导他们党接受的礼物，诸如军官啦，志愿兵啦，金钱啦……他们早就垂涎三尺了。至于战士苏维埃，农民协会，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是还开除了反共分子吗？”

“那是因为蒋介石还没把上海搞到手。”

“不出一个月，我们会使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失去法律保护。”

“等那时他已经把我们镇压了。那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将领们杀不杀共产党，究竟会起什么作用呢？还是对他们有利！难道你真的不相信恼人的经济厄运妨碍中国共产党，也妨碍莫斯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吗？”

“这是机会主义。”

“得了！按照你的观点，列宁根本就不应该把平分土地作为革命的口号，况且，这个口号，在革命社会党人的纲领上——根本没有实现——比在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上体现的更突出。平分土地，就意味着形成私有制；他不应该平分土地，而应立即实现集体化，搞国营农场。因为列宁获得了成功，你才明白这是一种策略。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就需要讲究策略。你们正在丧失群众的监督。”

“你不认为——这个……列宁只把这种监督用于二月到十月这段时间吗？”

“他有时是放弃过群众监督，但他总是体现他们的意

志。而你们呢，你们的口号是背逆潮流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走弯路，而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要做到象你们所希望的那样对群众施加影响，必须在掌握政权以后才行，目前还谈不到。”

“谈这一套全没用。”陈说。

他站了起来。

“你们不要阻止农民的行动，”京接着说，“目前，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向群众发号施令，他们只会认为是出卖他们。您以为群众会理解你们提出的‘等待’的口号吗？”

在沃洛金的声音里，第一次流露出一点热情：

“我认为，即使是上海港的苦力，只要他是共产党的活动分子——这个……他唯一正确的态度也是服从党，把所有的武器都应该一件不落地交出来！”

陈又站了起来：

“被人杀也好，去杀人也好，都不是出于服从。那些胆小鬼例外。”

沃洛金耸了耸肩膀：

“不应该把暗杀——这个……看作是实现政治真理的主要道路！”

陈出去了。

“我们将向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立即平分土地的问题，”京说着向沃洛金伸出了手，“取缔债权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是不会通过的。”沃洛金微笑着回答。

陈的矮胖的身影映在人行道上，在等着京。京在弄到了他朋友波索兹的地址之后追上了他。波索兹是港口的负责



人。

“你听着……”陈说。

印刷机如同船上的发动机一样，有控制带节奏地抖动着，通过大地的传导，从他们的脚跟一直震到头顶。在这座沉睡的城市里，“国际”代表处所有的窗户还都亮着灯，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边一些人的上半身的轮廓。他和陈往前走，两个相似的影子映在他们的眼前：身材同样高矮，粗毛线衣的领口也同样显眼。

在远处的街道上，那些多灾多难的茅舍的轮廓，在深沉静谧而又近乎庄穆的夜色当中，在充满鱼腥味和油脂燃烧味当中，消失了。机器的抖动，从地面一直传导到京全身的肌肉里，使他无法摆脱——好象这些制造真理的机器，把沃洛金的犹豫不决和武断专横都聚集在他身上了似的。当他乘船逆江而上的时候，他就不断地意识到，假如他不是无条件地干脆地接受“国际”所作的指示，他所提供的情况会是多么没有说服力，他要据此确定行动计划会是多么困难。可是“国际”错了。想争取时间，已不可能了。共产党的宣传势如破竹，已为群众所接受，因为它符合群众的利益！不论莫斯科怎么小心谨慎，这种宣传也已经煞不住了。蒋介石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从现在开始，准备消灭共产党，这个事实才是明摆着的。也许，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引导革命，可惜为时太晚了：不管莫斯科愿意不愿意，农民共产党员将要夺取土地；工人共产党员将要寻求另一种劳动制度；士兵共产党员只有知道为什么打仗才肯去打仗。在这个夜晚，莫斯科和西方敌对首都，可以怀着截然相反的激情，在那里创造各自

的世界。这里的革命，已经是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的时候了。现在的问题是让它分娩呢，还是让它窒息。当今天晚上的同志之情使他更接近陈的时候，他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与陈相依为命的情感，但那仅仅是做为一个人而感到忧虑，仅仅是他自己感到忧虑。他想起了他见过的中国穆斯林，也是在这种夜晚，拜倒在充满熏衣草焦味的荒原上，嚎着那些教歌——千百年来，它使身陷苦海并且意识到必死无疑的人肠断心碎。他到汉口来干什么呢？是让共产国际了解上海的形势。共产国际的态度跟他一样强硬。此间他耳闻目睹的事实，比沃洛金所讲的多得多：工厂一片死寂，充满忧虑的城市正在灭亡，尽管它是一座光荣的革命城市，但也并未减缓灭亡的速度。它如同一个垂死的人，宁可把自己这具尸体投入下一次起义的洪流中去，也不让它在诡计权术之中自行瓦解。很显然，他们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白干。此时此刻，陈，还有他自己，和这个“垂死的人”存在着一种囚徒之间的友谊。

“不知道！……”陈说，“如果是关于杀蒋介石的事，我知道。我想，这个沃洛金也同样知道。不过在他看来，与其杀人，不如服从。我们这号人活着，就得要有坚定的信念。我认为，他执行命令，肯定象我去进行暗杀一样坚决。做事必须坚决。必须。”

他停了片刻，又接着说：

“你常做梦吗？”

“不，起码我不怎么记得都做过些什么梦了。”

“我几乎每夜都做梦。也有心不在焉的时候，也有幻想

的时候。地上有一只猫的影子……在暗杀的时候，难的不是动手去杀，难的是不要心软，难的是要比当时心里所想的東西……更强有力。”

悲酸？从他的语气里是没法判断的，京也看不清他的脸。在僻静的马路上，远处一辆汽车沉闷的“轰隆轰隆”声随风消失了，充满夜空的樟脑味，吞没了果园的芳香。

“如果只有这个……不。做梦真糟糕，净梦见些动物。”

陈重复说：

“净梦见些动物……尤其是章鱼。我老是反复琢磨。”

虽然夜空广袤无边，但在他身边，京觉得好象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似的。

“很长时间都是这样吗？”

“很长很长时间了，从我记事的时候就做这类梦。最近梦的倒是没那么勤了。我只记得……这类事情。一般我是讨厌回首往事的，可是不想又办不到，因为我不是生活在过去，而是生活在眼前。”

沉默。

“……我唯一害怕——害怕的事情，就是睡着了，可我都每天都睡着。”

十点敲响了。在沉沉的黑夜中，有人在吵嘴，可以听到中国人那种短促的尖叫声。

“或者怕变成疯子。这些章鱼，不分白天黑夜，整个一生……人一变疯，好象永远不会想自杀……永远不会。”

“你就没梦到过别的吗？”

陈明白京问话的意思。

“我在……蒋以后再跟你说吧。”

京最终不得不承认，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且正生活在那些知道自己生命处于朝不保夕状态的人们中间，因此，他们的勇敢并不使他感到惊讶。然而，死亡在这个朋友身上产生如此大的迷惑力，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跟前这个看不大清楚的朋友，操着毫不在意的腔调讲话，似乎这些话是由于黑夜的力量激发出来的，如同他自己的焦灼不安是由于内心极度的忧虑，寂静和疲倦而形成的一样……可是，他刚才说话的腔调变了。

“你想到这件事是不是有些……不安？”

“不。而是……”

他迟疑了一下，接着说：

“我想用一个比‘快活’更重的词，但找不到，即便在汉语里恐怕也找不到。一种……全然的平静。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我不知道。只有一种东西至今还是比较深远的，它距人较远，它接近于……你吸过鸦片吗？”

“不怎么吸。”

“那我就大容易给你解释清楚了。它接近于一种你们称之为心醉神迷的东西。对，但它更浓重，更深远，不是轻飘飘的。一种……近乎于使人心醉神迷的往下沉的东西。”

“是不是某种想法使你产生这种感觉？”

“对，在想到我自己死的时候。”

他还是操着毫不在意的腔调。“他要自杀，”京心里想。京常常听父亲说，那种顽固地追求绝对存在的人，他只

能在感觉中才能找到。渴望绝对存在，渴望长生不老，自然就会贪生怕死，那么说，陈就成了胆小鬼。可是，跟所有神秘主义者一样，他只有在当前，才能感到他的绝对存在。因此，他对一切缠绕着他的、使他头晕目眩而又与当前无关的东西，肯定表示蔑视。从京看不到的这个躯体里，放射出一种模糊的力量，它主宰着这个躯体，它是决定他命运的无形的物质。这个同志现在沉默着，他脑子里常常出现司空见惯的可怖的幻觉，他身上潜藏着某种使人发狂的东西，同时也潜藏着某种神圣的东西——无情的表现总是带着某种神圣的东西。他杀蒋介石也许只是为了自杀而已。京在黑暗中很想再瞧瞧他的脸，他的这张长着很好看的嘴唇的尖尖的脸，极度的苦恼使陈既象个人睡的章鱼，又象个死人，京感到自己也因极度的苦恼而颤抖了。

“我父亲认为，”京慢腾腾地说，“人生的本质就是苦恼，就是对自己命运的了解，一切恐惧，包括对死亡的恐惧无不由此而产生……但一吸鸦片就可以从中解脱，鸦片就有这种作用。”

“人老是前怕狼后怕虎。其实只要往深里想想，就想开了，好在人是可以活动的嘛！莫斯科同意我干，我去干；莫斯科不同意我干，我照样去干，干脆就当不知道！我要走了，你还想留下吗？”

“无论如何我还是想见见波索兹。不过你也走不了，你没签证。”

“我要走，一定要走。”

“怎么个走法？”

“不知道。反正我要走，非走不可。”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京感到陈的意志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说什么地方存在命运的话，那么，今天夜里它就在这儿，就在京的身旁。

“你觉得非由你安排刺蒋不可吗？”

“不……不过我不愿意让别人去干。”

“因为你不相信别人？”

“因为我不愿意自己所爱的女人被别人亲吻。”

这句话，把京已经忘掉的痛苦又一下子勾起来了——他突然感到要和陈分开了。他们到了江边，陈割断停泊在那里的一只小船的缆绳，驾船走了。很快就看不见陈了，但可以听到双桨有节奏的划水声，它压过了微波冲击陡岸的声音。他是了解恐怖主义者的：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他们同属一类人，都是些致人死命的虫子，在一个狭小的胡蜂窝里友好相处。可是陈……京继续想着，但步子未变，向港口领导机关的方向走去：“陈划小船走的时候，很可能被扣下……”

他来到由军队守卫的高楼群，与“国际”的楼房相比，这里显得空空荡荡。在走廊里，士兵们有的睡着，有的玩着动物牌。他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他的朋友。波索兹有一副圆苹果似的和善的面孔，一个种葡萄人的酒糟鼻子，一撮高声人的胡须，穿着一身黄褐色的衣服。他原是一个工人，拉周德封<sup>①</sup>一个无政府主义派的工团主义者，战后去俄国，旋

<sup>①</sup> La Chaud-de-fonds，瑞士的一个城市。

即成了布尔什维克。京在北京与他结识，对他很信任。他们平平静静地握了握手，因为在汉口，来访者是久别重逢的朋友乃是常事。

“卸货工人来了。”一个士兵说。

“让他们进来吧！”

士兵出去之后，他转身对京说：

“你发现我无所事事吧，小伙子？有人通知港口领导说，要来三百艘船，其实连十艘也没有……”

港口各处的窗子都敞着，它已经入睡了，听不到汽笛，只有荡漾的水波不断地拍击着江岸和舵落。房间的墙上闪过一大片微弱的白光——那是远处炮舰的探照灯在横扫江面。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波索兹把手枪从枪套里抽出来，放在办公桌上。

“他们用铁棍攻击纠察队。”他对京说。

“纠察队有武器。”

“危险不在于他们痛击纠察队，小伙子，危险在于纠察队已经站到他们那边去了。”

探照灯的白光又晃了一下，把他们巨大的身影投射在里边的白墙上。就在探照灯光消失在夜空的时候，卸货工人们进来了：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他们穿着蓝色工作服，有一个打着赤背。都戴着手铐。因为在暗处，看不清他们不同的面孔。共同之点是，个个都怒气冲冲。两个中国看守腰间别着纳甘手枪，跟着他们。卸货工人站在那儿，紧紧挨在一起，愤怒之中也带着几分恐惧。

“纠察队员都是工人。”波索兹用汉语说。

沉默。

“他们当纠察队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为了吃饭！”一个卸货工人说。

“把粮分给作战人员是公平合理的。你们想用它干什么？用它来赌动物牌吗？”

“配给所有的人。”

“现有的口粮供应不了几个人了。尽管无产者误入了歧途，政府还是决定对他们采取最宽容的政策。假如纠察队到处被杀害，那些将领们和外国人就要和从前一样重新掌权，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怎么样，你们希望那样吗？”

“以前，以前人们还有饭吃呢。”

“不对，”京对工人们说，“以前工人们吃不上饭，这我知道，我当过码头工人。如果不得不挨饿的话，至少得作为人活在世上。”

一听这话，他们那露着一点点微光的白眼珠，稍稍睁大了一些，他们想仔细看看这个具有日本人的风度，穿着粗毛线衣，说话带着北方口音，自称当过苦力的人。

“但愿如此，”他们其中一个嘎囔着。

“对，”另一个说，“我们有挨饿的权利，更有罢工的权利。我有个兄弟在部队。为什么把那些要求成立士兵协会的人从他们师里给赶出来了？”

嗓门儿越来越高了。

“你们以为俄国革命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吗？”波索兹问道。



“俄国人做到了他们想做的事情！”

争论是白费口舌，问题是要弄清他们造反造到什么程度了。

“攻击纠察队实属反革命行动，是应该判处死刑的，这你们是知道的。”

停了片刻，他接着说：

“如果放了你们，你们打算干什么？”

他们相互望了望。因为太暗，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尽管一方持着手枪，一方戴着手铐，京还感到，一番中国式的讨价还价又要开始了，这是他在革命中经常碰到的现象。

“给工作吗？”其中一个囚犯问。

“有工作就给。”

“在等待工作期间，如果纠察队不让我们吃饭，我们就要攻击他们。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颗粒未进。”

“在监狱里真的能吃上饭吗？”他们当中一个始终没开口的人问道。

“你很快就会知道。”

波索兹再没说什么，按了按铃，民兵们把这些囚犯带了下去。

“就是这类事叫人头痛。”他接着说，这次用的是法语：“他们以为监狱会让他们吃饱穿暖，过舒适日子。”

“你既然让他们来了，为什么不尽量说服他们呢？”

波索兹沮丧地耸了耸肩膀：

“小伙子，我总是希望他们能谈点别的什么才让他们来的。有另外一些小伙子不同，他们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

时，不提任何要求，干得一直使我们很放心，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过得硬……”

他用的瑞士熟语使京感到惊奇。波索兹微笑着，在乱蓬蓬的小胡子下面露出的白牙，好象方才卸货工人的眼睛一样，在模糊不清的灯光下闪耀。

“你还真运气，在农村生活牙齿还这么白！”

“不，小伙子，不是那么回事！这是我在长沙安的假牙。看来那里的牙科大夫还没受到革命的冲击。你呢，你是代表吗？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京向他说明了来意，但并未提到陈。波索兹听他说着，越听越不安。

“小伙子，你讲的这些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是令人遗憾的。我在钟表店工作过十五年，我很了解齿轮是一个咬一个的。如果你对‘国际’失去信任，那就不必在这个党。”

“‘国际’有半数人认为，我们应该创建苏维埃。”

“有一条指引我们的总路线，我们要遵循它。”

“要我们交出武器呢？引导我们向无产阶级开枪的路线，肯定是一条谬误的路线！农民们现在争取土地了，将领们就让共产党的某些队伍，贸然去对他们进行镇压。向农民开枪，你同意不同意？”

“小伙子，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假如出现那种情况，我可以向空中开枪，同伴们也可能这样做。但愿不发生此类事情。这并非主流。”

“老兄，你要明白：这就好象我看到有人正把枪口对准你，而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他手枪的子弹的危险一样

……蒋介石不屠杀我们是不能过日子的，而这里的将领们，我们所谓的‘盟友’们，与蒋介石也是一丘之貉！他们这样干是合乎他们的逻辑的，可是我们的人，却放手让他们去屠杀，连党的尊严都不去维护，整天和一伙将领去逛窑子，仿佛这就是尊严之所在！”

“如果每人都各行其是，那将一事无成。如果‘国际’成功了，人们将会欢呼喝彩！‘国际’的人是不至于搞错的。但，如果我们用卑劣手段破坏它，那它就注定失败。至为重要的是让它成功……说到让共产党人向农民开枪，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你相信吗？你既然没亲眼看到，你就真的相信吗？不管怎样——我知道你不会成心说‘国际’的坏话，不过，你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它会左右你的理论，使你相信这种说法……”

“我们之间这样说说就算了，现在还不是着手对六个月工作进行调查的时候。”

有什么讨论头呢？京本来就不打算说服波索兹，他是想说服上海的人；毫无疑问，他们现在已经被说服了，连汉口作出的决定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刚刚目睹的场面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走！

一个中国士官走了进来，他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拉得很长，身子微微向前探着，很象根据象牙的自然曲线雕成的人物。

“抓到了一个偷登客船的人。”

京等着下文。

“他声称，他离开汉口是得到您许可的。他是一个商

人，名叫董屯。”

京松了口气。

“我没给任何人许可。”波索兹说，“别望着我，送警察局！”

被捕的有钱人仰仗权贵，有时得以单独见到他，答应出钱。这比束手待毙明智得多。

“等一下。”

波索兹从吸墨垫板上抽出个名单来，低声念着名字。

“行了，他正好在这上面。他早就被告发了。让警察局对付他吧！”

士官退了出去。这张名单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放在了吸墨垫板上。京老在想着陈。

“这是被告人的名单，”波索兹看到京老是盯着那张纸，说：“后边这几个是船起锚前——不，是在开船的时候，有人在电话里告发的……”

京伸手接了过来。共计十四个名字。陈没在上面。沃洛金肯定不会不知道他想尽早离开汉口；即使出于起码的警惕，也该指出他走的可能性，以防万一。”看来‘国际’是不想承担谋杀蒋介石的责任的。”京想，“但是，‘国际’也许对这场灾祸的到来并不感到遗憾吧……沃洛金那样模棱两可的回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他把名单还了回去。

“我要走，”陈曾经这样说过。他的意外的到来，沃洛金的含糊其词，名单，这一切，京全都明白了。但，陈的每一个举动，都使他更接近于谋杀，而一切事物的安排又似乎都取决于他的命运。一群蜉蝣围着小灯泡嗡嗡地转着。

“陈可能就是一只蜉蝣，发出亮光，而自己就将在这亮光中灭亡……可能人也是如此吧……”人是不是从来就只看见他人的命运？他本人现在急于回上海，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支队，是不是也象一个蜉蝣一样？那个士官又回来了，这使他得以抽身，离开波索兹。

他又重新感到，夜空是那样恬静。没有一声汽笛响。除了水声，万籁俱寂。在沿江的马路上，夜虫撞着路灯，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一些苦力，象鼠疫患者一样睡在地上。在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圆圆的小红标语，很象下水道的盖子，上面只写一个字：“饿”。又象刚才和陈在一起时的感觉一样：就在今天夜里，从整个中国，到西方，一直到半个欧洲，许多人被同样的痛苦折磨着，都象他一样踌躇不前，一方面受纪律的约束，另一方面他们的亲人惨遭杀害。那些卸货工人起来反抗，但他们心里并不明白。然而，即使心里明白，在这里，在这座西方所期待着的四亿人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内接受命运安排的城市里，在这座由于饥馑而在江边不安地昏睡的城市里，在虚弱、贫困、仇恨当中，又怎能选择献身的道路呢？

## 第四部分

四月十一日

中午十二点半。

在格罗韦诺尔小旅店的酒吧间里，可以看见光滑的核桃，一瓶瓶酒，镍栏杆和旗子。这里除了柯拉毕克，可说没什么人了。他把烟灰缸放在伸直的食指上转动着。他等候的克皮莱夫斯基伯爵，走进来了。柯拉毕克把一个字条儿揉成了一团儿：在那上面，他刚刚写上了赠给每个朋友的假想的礼物。他对伯爵说：

“您的生意在这个阳光普照的小村子里还兴隆吧，老兄？”

“不大兴隆。但到月底会有转机的。我销售食品，当然啦，是在欧洲人居住点儿上销售。”

虽然克皮莱夫斯基穿着简朴的白色衣服，但他尖细的弯钩鼻子，光秃的前额，银灰的背头，突出的颧骨，总是使人觉得他象一只鹰。戴上单片眼镜，更增加了一种漫画感。

“亲爱的朋友，您瞧，现在的问题自然是筹集两万左右

法郎的款子了。弄到了这笔钱，我就可以在食品行业中举足轻重了。”

“投入我的怀抱吧，老兄！您想在食品行业占一席之地——不，占一个体面的地位？太好了！……”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有这么多……偏见！”

柯拉毕克用眼角瞟着这只“鹰”：他在克拉科夫曾获得下级军官排的刀劈冠军。

“我有偏见？去你的吧！您说这话我可要发火了！您不想一想，假如我趁这笔钱，我就用它去效法一个驻苏门答腊的荷兰高级官员了，他每年回国路过阿拉伯半岛海岸的时候，都去摆弄他那些郁金香。老兄，这使他产生了到麦加去盗窃珍宝的念头（应该说明，这事发生在一八六〇年前后）。听说那地方珍宝多极了，都是金光闪闪的，藏在一些巨大的黑洞洞的地窖里。那都是到麦加朝圣的人不断地扔到里边去的。我呀，就是想在这种地窖里生活……我那位郁金香爱好者终于继承了一笔遗产，到安第斯群岛搜罗了一个海盗船员队，准备偷袭麦加城。他们用的大多是现代化的武器：什么双响枪啦，能装能卸的刺刀啦，还有什么啦？他把这些武器装上船——没说的，就往那里开去……”

柯拉毕克把食指贴在嘴唇上，看到这个波兰人这样好奇，他心里乐滋滋的，好象这个波兰人也与他们串通上了似的。

“可倒好！那些海盗造了他的反：他们小心翼翼地抹了他的脖子，驾船在海上到处横行，疯狂地进行海盗活动。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富有道德教育意义的故事。但是，我

跟您说，您要是想靠我去弄这两万法郎啊，我跟您说这是发疯，发疯！您想让我去见一些人吗？即使是上面说过的那种人，也让我去见吗？好，我将去见。再有，既然每用一次计谋，我都得买通您的该死的警察，那我倒不如把钱给您，不给别人。但是，我去见的那些人，就是房子着了火，他们也念念不忘鸦片和可卡因。”

他又转起烟灰缸来了。

“我跟您谈这些，”克皮莱夫斯基说，“那是因为，我要想获得成功，自然应该告诉每个人……我本来该——至少，再等一等。但是，我请您来提供给我这些白酒——是伪造品——仅仅是想帮您一点忙。是这么回事：明天您就离开上海吧！”

“哦！哦！哦！”柯拉毕克提高了嗓门应着。外面一辆汽车的喇叭，好象回声一样，也连续响了几下。“因为？”

“因为，因为您提到的我的警察，有好处。走吧！”

柯拉毕克明白，他不能再固执了。不过他心里又闪过一个念头：“克皮莱夫斯基为了弄到这两万法郎，也许在耍什么花招儿吧？噢，神经病！”

“我必须明天走？”

他望着这个酒吧间，鸡尾酒调和器，镀镍栏杆，感到象看古董一样亲切。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但您不打算走，这我看得出来。我可事先跟您打招呼了。”

柯拉毕克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感激之情（倒不是由于怀疑，而是由于对对方建议性质的考虑，由于



不了解是什么在威胁着自己)。

“我的运气是不是比我想象的更好些？”波兰人接着问。他挎起柯拉毕克一只胳膊：“走吧！有一件关于船的麻烦事……”

“真把我闹蒙了！”

“走吧！”

“您能不能告诉我，是不是牵连到吉索尔老头？”

“我想不是。倒是牵连到小吉索尔。走吧！”

很明显，波兰人肯定是知道内情的。柯拉毕克把手放在他的手上：

“我十分遗憾，没有这笔钱为您买的食品杂货付款，老兄！您可能救了我一条命……我还有点没主的東西——两三尊雕像，请拿去吧！”

“不……”

“为什么？”

“不。”

“怎么……一定不要？也好。我倒想知道一下您为什么不要我的雕像？”

克皮莱夫斯基看着他：

“过我这种日子的人，如果不捞点外快，谁还干这种——这个……行当呢？”

“说有许多行当不搞外快，我怀疑……”

“是这样。例如，您想象不到那些商店看管得是多么不……”

他与商店有什么关系？柯拉毕克差点儿问出口。但经验

说词，让他的话这样接着说下去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他肯定无疑要帮这个人的忙，让他讲下去好了。可是，柯拉毕克却感到别扭，十分不自在，终于还是开口了：

“您看守商店吗？”

在他看来，警察局是玩弄权术和进行讹诈的混合体，是负责抬高鸦片和赌场地下税的一个机构。和他打交道的那些警察（尤其是克皮莱夫斯基）、和他一向既是对手，又是同谋。但他既讨厌又害怕告密。克皮莱夫斯基回答说：

“看守？不，不完全是看守，这个，这个……恰恰相反。”

“啊！您为自己往回拿东西吗？”

“仅仅是些玩具，您明白吧。我再没那么多钱给我的小儿子买玩具了，可我受不了。事实证明，只有当我……这个……这个……让他高兴的时候，小家伙才讨我喜欢；而我又没别的法子叫他高兴，真是难办。”

“那么您就把我的雕像拿去吧。不愿意都拿，就随您拿好了。”

“别客气，别客气……于是，我就到商店去，我说……（他把头向后一扬，靠近单片眼镜的前额和左颊肌肉收缩了一下，但没有奚落的意思。）‘我是发明家，自然是发明家兼设计师了，我来看看你们的样品。’于是人家就让我看。我从中拿一件，从来不多拿。有时有人监视我，但并不经常。”

“万一您被人识破怎么办？”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皮夹子，把它半打开，让柯拉毕克看

他的警察证。又把它合上，然后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

“有时我可能得到钱……有时我也可能被撵出来……反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柯拉毕克很惊讶，他突然发现自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他从不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所以，他对此感到很意外。

“我一定要事先去告诉小吉索尔！”他心里想。

下午一点。

陈提前出来，腋下夹着公文包。沿着码头走着，一张张他所熟悉的欧洲人的面孔迎面而过：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到上海俱乐部或附近旅馆里的酒吧间喝酒聚会去的。陈走着走着，忽然觉得有一只手从后面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吓了一跳，赶快去摸藏在暗兜里的手枪。

“好久不见了，陈……您愿意不愿意……”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史密森牧师——他的第一位老师。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有点象印第安人似的美国人漂亮的面孔，如今却显得那么饱经沧桑了。

“……我们一块儿走一走？”

“好吧。”

陈这时倒是很愿意找个白人搭伴儿走，这样会更安全些，也更带有嘲讽的意味儿；他在公文包里藏着一颗炸弹。今天上午穿上这件笔挺的西服之后，他从里到外都感到不自

在；可是有这样一个同伴儿在一块儿，也就看不出什么漏洞了。而且，出于一种模糊的迷信观念，陈并不愿意伤害这位牧师。上午，他数了一分钟路过的汽车，预卜是否有成功的指望（奇数或是偶数）；结果是个吉兆。他对自己很气愤。同史密森谈点什么也好，免得自己同自己一个劲儿地生闷气。

陈的精神状态没有逃过牧师的眼睛，但是他误解了：

“陈，您不舒服吗？”

“没什么。”

他对自己的老师怀有感情，但也不是没有怨恨。

老人挽起陈的胳膊。

“陈，我每天都为您祈祷。您找到了什么来替代您所抛弃的信仰吗？”

牧师注视着陈，目光里充满了深沉的爱，好象他已经为陈献出了一切似的，但目光里没有丝毫的父爱。

陈迟疑了片刻，然后说：

“……我不是能够获得幸福的那类人……”

“不只有幸福，陈，还有安宁，而且，有时还有爱……”

“不，这些都没有我的份儿。”

“人人都有份儿……”

牧师闭上眼睛，陈却觉得自己正挽着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

“我要的不是安宁，我要的……是它的反面”。

史密森边走边盯着他：

“当心，不要太傲气了！”

“谁跟您说我没有找到信仰？”

“那么，什么政治信仰能够分析人间的苦难呢？”

“苦难吗，与其进行分析，我倒宁愿想办法解除它一些。您说的话充满了……人道，可我不喜欢这种只叫人在苦难面前忏悔祈祷的人道。”

“您确信还有另外一种人道吗，陈？”

“很难跟您说清楚……但确有另外一种人道，它起码不只是叫人忍受苦难……”

“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可以消除死亡呢……”

牧师的语调不象是提问，而是带着悲伤。陈想起了吉索尔的一次谈话，后来他一直就没有再见到他。吉索尔把他的聪明才智都贡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为了侍奉上帝。

“我跟您说过，我要的不是安宁。”

“安宁……”

牧师不再作声。他们继续走着。

“我可怜的孩子，”他终于又开口了，“你与我都只了解各自的痛苦。”他把陈的胳膊挎得更紧了。“难道您不相信，一个真正教徒的一生，不是每天都皈依吗？”

他俩看着人行道，好象除了他们的胳膊之外，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每天……”牧师有气无力地重复着，好象他的话只是盘据在他脑海里的一种念头的回声。陈没有回答。这个人谈的是他自己，也是他的真实思想。跟陈一样，这个人以自己的生活考验着自己的信仰；他与那种贪婪的可怜虫不一样。在左腋下，是公文包和炸弹；在右腋

下，就是这只拷得很紧的胳膊。“……每天都皈依……”这种用神秘的语调讲出的内心话，使牧师突然具有一种深奥的悲怆意味。马上就要去杀人了，陈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

“陈，以后每天夜里我都要为您祈祷，愿上帝把您从妄自尊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我特别喜欢在夜里祈祷，夜里是祈祷的最好时刻。）倘若上帝赋予您谦逊的美德，您就得救了。现在，我终于看到了您的眼神儿，而且，在特别注意着您的眼神儿，可是方才您却躲闪着不看我……”

陈理解牧师的痛苦，但不同意牧师所说的话。牧师的最后一句话，很象一个垂钓的人感到鱼已上钩了，使陈一时怒不可遏；但又无法完全排除暗中对牧师怜悯的感情。

“请听清楚，”他说，“再过两个钟头，我可要去杀人了！”

这一次，是他盯着牧师的眼睛。他下意识地把手举到面前，哆哆嗦嗦地揪住自己笔挺的西服前领：

“您看到了我的眼神儿吗？”

没有。他是孤独的，仍然是孤独的。他把手从自己的衣服上松开，抓住了牧师的西服领子，象是要摇晃牧师；而牧师抓住了他的手。他们就这样站在人行道中间，一动不动，仿佛就要动武似的。一个行人停了下来。是一个白种人，他以为这两个人在吵架。

“这是令人胆寒的谎言！”牧师低声说。

陈放下胳膊。他觉得可笑，但又笑不出来。“谎言！”他冲着行人喊道。那个人耸耸肩膀，走开了。陈猛地转过身去，几乎是跑着离开了。

他在一公里开外的地方总算找到了他的两个伙伴儿。那两个人，头上都戴着中间捏褶的帽子，穿着职员的服装，样子很“体面”。他们选择这种打扮，为的是与腋下夹的公文包在身份上相称。他们的公文包里，一个装着炸弹，一个装着手榴弹。孙长着鹰钩鼻子，是黑红皮肤类型的中国人。他在低头沉思，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去理会。而裴呢？他的面孔哪一点象个青年人呢？也许是他戴的那副玳瑁镜框的圆眼镜使他显得年轻了些。他们来到“双共和国”大街。这条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在开门营业，在这动荡的时日里，这条大街又热闹了起来。

蒋介石乘坐的汽车在到达这条大街之前，将通过一条与此成“丁”字形的小弄堂。一定要在车子转弯减速的时候看到它，把炸弹扔出去。蒋介石因为午饭吃西餐，他的汽车每天都在一点至一点一刻之间从这儿经过。因此，监视这条弄堂的人，一看到汽车，就必须向其他两个人发出信号。一个商人正好对着这条弄堂开了个古玩店，假如这个人不是警察署派的，倒是可以利用一下。陈要亲自去监视这条弄堂。他把裴安排在大街上，靠近汽车转弯后重新加速的地方；孙呆的地方离这儿稍远一点。陈将首先扔出第一颗炸弹。如果汽车不停，不管它被击中与否，另外两个人都要紧接着扔出自己的炸弹和手榴弹。要是汽车停下来，他们就都冲上去，因为弄堂窄得很，汽车没法掉头。倘若蒋介石的卫兵们不被炸死，站在车踏板上开枪射击，谁也不能再靠近汽车，那就将失败。

陈和他的伙伴儿们应该分手了。沿着蒋介石的汽车所经

过的路上，人群里肯定混有密探。裴要去一家中国小酒吧间等候陈的信号；孙要去更远一点的地方等着裴出来。也许他们三个人当中至少要牺牲一个人，如果这样，那毫无疑问是陈了。他们都不敢吭声，甚至连手都没握一握就分开了。

陈走进古玩店，提出要看小巧的出土青铜器。商人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方方正正的紫缎小盒放在柜台上，把它们摆好。看上去这个商人不是上海人，象是北方人，或土耳其斯坦人<sup>①</sup>——那稀疏而又散乱的胡须，又细又长的眼睛，以及那张善于阿谀奉承的嘴巴，都象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伊斯兰教徒；可有的地方又不象，他的面孔没什么突起，很象一只鼻子扁平的公山羊。如果有谁能检举一个在将军行车路上手持炸弹的人，他就会发一笔横财，就会在他的同人中飞黄腾达。这个富有的商人，很可能就是蒋介石忠实的党羽。

“您到上海很久了吗？”他问陈。这个古怪的顾客是个什么人呢？他的拘谨，他对眼前的古玩缺乏好奇心，这些都引起了商人的怀疑。这个年轻人也许不大习惯于穿西服。尽管他的侧面有些尖削，但是他的厚厚的嘴唇还是给人以好感。可能是内地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然而这类富人并不收藏古青铜器。是不是为一个欧洲人买的？可他既不象仆人，也不象邮差。如果是一个古玩爱好者，那他怎么对柜台上这些东西如此兴味索然呢？看来他是有什么心事。

这是因为陈已在监视着那条弄堂的动静了。从这个古玩店可以看二百米远的地方。汽车在他的视野里究竟会有多长

<sup>①</sup> 即现在的新疆人。



时间呢？在这个蠢货好奇的目光下，他又怎么能计算时间呢？但，不管怎样，还得应付商人，象刚才那样沉默不语实在太愚蠢了。于是他说：

“我本来住在内地，因为打仗，那儿呆不下去了。”

商人还要问什么。陈觉察到对方对自己起了疑心。这时，古玩商心中猜想：这个人会不会是个小偷，到这里来察看虚实，一旦发生动乱，便来抢劫？而这个小伙子却无意看那些最珍奇的古玩，他看的只是青铜器或狐狸饰针<sup>①</sup>之类的玩意儿，都不怎么值钱。日本人喜欢狐狸，而这个顾客并不是日本人。要巧妙地盘问他一下。

“那您一定住在湖北了？听说华中一带的生活越来越糟了。”陈思量着：要不要装聋作哑？不行！那样，恐怕会引起他更大的怀疑。

“我不住那儿了。”他只这样回答了一句。他的语气，他说出的句子，就是在汉语里也显得过于简单；他开门见山，不讲客套。但他还是想到了讨价还价。

“这要多少钱？”他指着一枚镶嵌狐狸头的饰针问道。这类饰针是最常见的殉葬品。

“十五块美金。”

“我看八块就不少了……”

“这么好的成色才给八块？您怎么想得出来？……我买它就花了十块……您自己说说，我该赚多少钱？”

陈不去回答，却望着裴。裴坐在露天酒吧间的一张小桌

<sup>①</sup> 镶有狐狸头的装饰品。

子前面，眼镜在阳光下闪着光。由于隔着古玩店的玻璃窗，他肯定看不见陈，但是，陈如果从里面出来，他是一定会看到的。

“最多九块，再多我就不买了。”他终于开了口，象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这我还得省吃俭用才行呢。”

这类话纯属套语，他说起来并不费劲儿。

“今天刚开张，”古玩商说，“也许我该赔个块儿八毛，因为做成第一笔买卖就是开市大吉呀……”

弄堂里空空荡荡。远处，有一辆人力车穿过。接着，又是一辆。走出两个行人。一只狗。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向右拐了；人力车穿过了弄堂。弄堂里又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了那只狗……

“难道您就不能给九块五吗？”

“那好吧，为了表示我对您的好感。”

又为一只瓷狐狸讨了价。买过东西之后，陈逐渐赢得了对方的信任，能够从容不迫地思考问题了。一方面，他思量着该出什么价钱，得与货色恰到好处；另一方面，他对重要问题的思考一点也不让它受到干扰。“汽车在这条弄堂里行驶的速度是四十公里，一公里多的路程，用两分钟。我能看到汽车的时间还不到一分钟，太短了！裴的两只眼睛可要紧紧盯住这扇门啊！……”弄堂里一辆汽车也没有……只有几辆自行车……为一只玉带圈他又同老板讨价还价了一番，他不肯出老板要的价钱，说要再考虑考虑。一个伙计端来了茶水。陈买了一只水晶狐狸头，老板只要了三块美金。然而，

老板对他的怀疑并未完全消除。

“我还有些非常好的东西，都是真货，上面嵌有玲珑剔透的狐狸。不过，价钱都很贵，不在店里。我们可以约个时间……”

陈未置可否。

“……如果您要，也可以让一个伙计去取……”

“我对那些高价的东西不感兴趣。再说，我也没那么多钱。”

看来他不是个小偷，那些东西他连看都不想看。老板象触摸木乃伊那样，小心翼翼地重新拿出玉带圈来给他看。尽管老板的话句句讲得天花乱坠，尽管老板的眼里流露出难以割舍的目光，但是这位顾客依然是无动于衷，若即若离……然而这只玉带圈是他亲自选中了的。讨价还价，宛如谈情说爱，也要同心协力；但是这个商人却好象在同一块木头疙瘩谈恋爱。那，这个人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呢？突然，他想到了：这个青年人同其他可怜的青年人一样，准是让闸北的日本妓女把幼稚的心灵给迷住了。这些妓女很迷信狐狸。这个顾客大概是为某个女招待或某个低级艺妓买这些东西的。他对这些东西那么心不在焉，也正说明不是给他自己买的。（陈始终在计算着汽车到达的时间，以及打开公文包、掏出炸弹和扔出去的速度。）不过，日本艺妓并不喜欢出土文物呀……也许小狐狸对她们是例外？要不，这个小伙子刚才怎么还买了一件水晶的和一件瓷的狐狸呢？……

柜台上摆满了小巧的古玩盒子，有的开着，有的合着。

两个侦探胳膊肘支在柜台上，也在端详着；其中一个年轻的把胳膊肘靠在陈的公文包上，因为他双腿交叉，身子左右摆动，就把陈的公文包向柜台外边拉去。炸弹就在公文包的右侧，离柜台边儿只剩三公分了。

陈不能挪动脚步。但他后来伸出手去，毫不费力地把公文包拉到了自己身旁。这些人谁也没有意识到死神的降临和暗杀计划的破产。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只不过是一个伙计动了一下公文包，它的主人，又把它拉回到自己身边而已……突然间，陈觉得一切都是出奇的容易，什么事儿，什么行动都不曾发生。这一切犹如一场使我们透不过气来的梦，因为我们赋予它力量，但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使它化为乌有……就在这时，陈听到汽车的喇叭声：蒋介石！

他象抓起武器一样抓起公文包，付了钱，把那些小包往口袋里一塞，就冲了出去。

老板手里拿着刚才陈没买的那只玉带圈追了出来：

“日本娘儿们特别喜欢这些玉器古玩！”

这个笨蛋还不赶快滚开！

“我下次再来！”

哪个商人不理解这句客套话的意思呢？汽车来了，前面由一辆卫士乘的“福特”车开路。陈觉得比往常都快。

“滚开！”

汽车朝他们飞驰而来，由于路上有些排水沟，车身连同站在踏脚板上的两个侦探一起颠簸起来。“福特”车过去了。陈停下来，打开公文包，伸手去掏用报纸裹着的炸弹。这时，古玩商却满脸堆笑，把玉带圈塞到开着的公文包的空

袋子里。公文包的这个袋子离古玩商最远，他伸着手，正好挡住了陈的两只胳膊：

“您给多少钱都行。”

“滚开！”

商人被这喊声吓懵了，目瞪口呆地望着陈。

“您不太舒服了吧？”陈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感到四肢瘫软，就象要晕倒似的；汽车过去了。

他没有及时摆脱商人的纠缠。“这个顾客要生病了，”商人这样想着，竭力去搀扶他。陈一下子甩开伸在他面前的两只胳膊，向前走去。商人疼得停住了脚步。陈却几乎跑了起来。

“我的玉带圈！”商人喊道，“我的玉带圈！”

玉带圈仍在公文包里。陈觉得莫名其妙。他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最细微的神经，都在期待着那响彻整个街道、沉闷地消失在低空下的爆炸声。一切都完了！汽车已经拐弯，毫无疑问，这会儿连孙呆的地方都过去了，而那个昏头昏脑的商人却仍然怔怔地站在那里。没什么危险了，因为一切机会都错过了。他们俩干什么了呢？陈奔跑起来。古玩商高声喊道：“快抓小偷！”好些商人出来了。陈这时才明白过来，他气得要命，本想带着这只玉带圈跑掉，再把它随便扔到什么地方。可是，又有许多闲逛的人凑了上来。他把玉带圈朝古玩商的脸上扔去，也就在这时，他才发现公文包没有扣上。从汽车过去之后，公文包就一直开着，那笨蛋和其他行人肯定都已瞅见了这颗炸弹，因为连原先裹炸弹的报纸都掉了。他十分小心地把公文包重新扣好（他几乎是一下子把

它和上的)，并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古玩商赶快回到了自己的店铺。陈又跑了起来。

“怎么样？”他一看见裴就问。

“你呢？”

他们两人气喘吁吁地相互瞪着，都想让对方先开口。这时，孙走了过来，看到他们一动不动地侧身站在那些模糊不清的房屋前，样子犹犹豫豫，十分狼狈。尽管有浮云，强烈的阳光仍然把陈那憨厚的鹧鸪般的侧影及裴的圆脑瓜儿的轮廓勾画了出来，同时也将他们这两个身影短小的人，同其他忙忙碌碌、惶惑不安的行人分隔了开来，陈、裴二人抖着双手，痴痴呆呆地立在正午刚过的阳光下。他们三个人一直带着公文包，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在那儿停留太久。饭馆儿也不保险。其实他们在这条大街上只不过聚会、分手的次数太多了些，何必过虑呢？不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吗……

“到海默里希那儿去！”陈还是对他们说。

他们走进弄堂里去了。

“怎么回事？”孙问。

陈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裴呢，当他看到陈不是一个人从古玩店里出来时，就慌了手脚。他来到离街拐角几米远他该投掷的地点。上海的习惯是左侧通行，汽车通常都尽量拐小弯，因此，裴站在左侧的人行道上，想等汽车靠近时再扔炸弹。然而，由于当时“双共和国”大街上没有其他车辆，汽车开得很快，司机紧贴另一侧人行道来了个大拐弯。这时，恰好一辆人力车把裴和汽车隔开了。

“就算那辆人力车倒霉吧，”陈说，“还有成千上万别

的苦力，他们只有在蒋介石死后才能有活路。”

“那我可就扔不准了。”

孙呢，他的手榴弹也没扔出去。因为他见伙伴们没出击，就以为蒋介石不在汽车里了。

他们默默地往前走，走在被昏暗的、充满了浓雾的天空映成灰白色的墙壁中间，走在遍地是瓦砾和电线的荒僻的道路上。

“炸弹还完整无缺，”陈低声说，“咱们等一会儿再干！”

可是他的两个伙伴却泄了气。自杀未遂的人很少有第二次自杀的勇气。他们一度异常紧张的神经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了。随着他们的脚步向前移动，失望逐渐代替了惊慌。

“这是我的过错。”孙说。

裴重复道：“这是我的过错。”

“得了！”陈讨厌地说。他一边懊丧地迈着步子，一边思考着问题。再干也不能这样干了。这个计划不好，但也很难想出一个别的计划来。他曾想……他们已经到了海默里希的家。

海默里希在他的店铺里，听到外面一个人用汉语讲话，另外两个人应着。他们说话的声音和不安的顿挫，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心想：“昨天我就看见有两个人在这儿晃来晃去，那难受的样子，象是得了难以治愈的痔疮似的，绝不是来消遣散心的……”楼上，孩子叫嚷不休，所以很难听清他们讲些什么。他们突然不吭声了。只见人行道上出现了三个矮小的身影，说明那儿有三个人。警察？……海默里希站

起身，心里想：他的扁平鼻子和犹如精疲力尽的拳击手似的向前探着的肩头，可能会使来犯者产生一点惧怕之感，于是他向门那边走去。他的手还没伸到口袋里，就认出陈来了：他把本来想去摸手枪的手向陈伸了过去。

“走，咱们到后屋去。”陈说。

三个人都从海默里希面前走了过去。他仔细地端详着他们：每人一个公文包，他们不是随随便便地夹着，而是绷紧胳膊的肌肉，牢牢地夹着。

“我们来，”等店门刚一关上，陈说，“是请你看在我们和公文包里东西的份上，能让我们呆几个钟头，行吗？”

“炸弹？”

“对。”

“不行。”

楼上的小家伙继续嚎叫着。最悲痛的喊叫变成了呜咽，有时候还变成“咯——咯——”的叫声，好象叫着玩儿似的，这就更叫人肠断心碎。唱片、椅子、蟋蟀，这些东西跟陈杀完唐寅塔来到这儿时的光景一模一样，海默里希和陈不约而同地都回想起了那个夜晚。陈没说什么，但海默里希猜想到了：

“藏炸弹，”他接着说，“此时我办不到。假如他们搜出来，他们一定会杀死我的老婆孩子的。”

“好，那咱们到夏家去吧。”那是一家灯具店，起义的前一天，京曾到那儿去过。“这个时候，店里只有伙计在。”

“请你体谅我，陈。小孩病得死去活来，孩子他妈身体



也不好……”

他跟望着陈，手在打哆嗦。

“你不能了解，陈，你不能了解，你这样自由自在是多么幸福……”

“了解，我很了解。”

三个中国人走出了店门。

“真他妈的！”海默里希心想，“我难道永远也不能象他那样无牵无挂吗？”他平心静气地在心里诅咒着自己的处境，好象放慢的镜头似的。他慢腾腾地朝楼上的卧室走去。他那个中国女人坐在那儿，两眼直盯着床，并没转过头来。

“那个太太今天可好啦。”燕子说，“她没叫我疼……”

太太指的是梅。海默里希回想起她的话：“乳突炎……可怜的老兄，必须敲碎骨头……”这孩子几乎成了个婴儿，煎熬殆尽的生命力只够承受生命带来的痛苦了。应该“向他解释一下”。可又向他解释什么呢？告诉他锯断他面部的骨头，是为了保全生命吗？是为了得到一个和他父亲一样宝贵一样脆弱的生命吗？“倒霉的青年时代！”他念叨了二十余年。距离讲“倒霉的晚年”，距离把生命中的这两个“美称”过渡给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有多少春秋？上个月猫爪子脱了臼，在中国兽医给猫爪子复位的时候，它嗷嗷直叫，拼命挣扎，于是只好按住它。它懂什么，它认为这是在折磨它。猫吗，毕竟不是孩子，它不会说“她没叫我疼……”他又下了楼，太阳昏昏沉沉，尸体发出的臭味从附近的里弄里传到了商店里。毫无疑问，狗见了尸体一定会争红眼的。“苦海无边……”

他心里想。

把陈他们拒之门外，他不能自恕前愆。如同一个因受苦刑而吐露了秘密的人一样，他知道今后虽然在言谈举止方面可以依然故我，但他总免不了感到内疚。他辜负了他的青春，辜负了他的愿望和幻想，但又怎么能不辜负呢？“重要的是立志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象这种做不到的事情他不去想人非非；把陈庇护起来，然后跟他一块出去，通过炸弹或其它什么暴力手段去抵偿一个凶恶的生命。从他呱呱坠地的第一天起，他就受着这个凶恶生命的残害，它还要残害他的孩子们，对他们还要更甚。他自己的痛苦，他是可以忍受的，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孩子们的痛苦没法忍受。

“孩子生病以来变得更聪明了。”梅曾这样说过。好象很意外……

和陈一块出去，操起藏在公文包里的一颗炸弹，把它甩出去——这是有理性的行动，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目前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事情。三十七岁了。也许还能再活上三十年。怎么活法呢？他和娄有顺靠库存的唱片艰难地度日，但他们俩谁靠这个也活不下去，而且，等他老朽了的时候呢……三十七岁了；人们说什么追溯记忆所及的一切往事，他的往事没有什么可以追溯的，从头到尾都充满苦难。

他上学的时候，是个坏学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母亲为了能安安稳稳地自我陶醉，为他物色了个工作：在工厂干粗活。他秉性执拗，在军队里常蹲禁闭；在战场上，中过毒气。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为他的国家吗？他不是什么比利时人，而是一个悲惨的人！但话又说回来，在战争时期，

混饭吃容易，不用干很多活。后来解甲，顺便来到印度支那。“这里的气候一点都不适于从事体力劳动……”倒是很容易死于痢疾，尤其那些以执拗著称的人更容易招病。

他最后来上海落了脚。炸弹，我的天那，炸弹！

他除了有个老婆，生活对他无所施舍。她被卖了十二块美金，买主玩够之后，就把她一脚踢出门外。为了糊口安身，她心惊胆战地来到他的家里。起初，她很怕他，吓得睡不着觉，因为人们总是对她说，欧洲人很恶毒。但他待她倒是很好，于是她一点点爬出了恐惧的深渊。当他有个头痛脑热的时候，她体贴他，替他操劳，分担他由于无法报仇雪恨而引起的烦恼。她以一条受害瞎狗一样的爱情紧紧依附于他；在她看来，他是另一只受害的瞎狗。现在呢？他们有了个小家伙。他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呢？几乎养不起他。他只剩下一点经受痛苦的气力了。人间的痛苦多于天上的繁星，但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他可能加在他妻子身上的痛苦：看着她危在旦夕而抛开她不管。这就好象离他家不远的那个忍饥挨饿的俄国人一样：他是个卖苦力的，由于极端贫困，有一天寻短见自尽了。他的妻子发疯似地抽尸体的嘴巴，恨他抛下她们妻儿老小不管走了，四个孩子呆在屋角，其中一个问妈妈：“你们为什么打起来了？……”海默里希不让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去死。但这毫无意义，任何意义也没有。假如他趁钱。假如他能给他们留下一些钱的话，那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杀身成仁了。好象天地万物都不待遇他，在整个一生的旅途中，对他拳打脚踢，甚至剥夺他唯一拥有的也是他唯一能够拥有的尊严——他的死亡。在停滞的太阳下，一些尸体被阵阵刮来的

风一吹，臭气熏天。他嗅着这种气味，和其他一切活着的东  
西一样反应强烈，虽然他已经习惯了。陈象一个临终的朋友  
似的萦回在他的脑际，他带着一种满足的恐怖感闻着这钻入  
五脏六腑的臭气，思索着主宰陈的荣辱，博爱，或者一种什  
么强烈的欲望，这好象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似的。

陈和他的伙伴们又离开了大街——死巷和弄堂监视得没  
那么严了，因为蒋介石的汽车不从这些地方经过。“需要改  
变计划，”陈心里想着，低头盯着自己穿着阔人那种体面皮  
鞋的双脚，在眼下一前一后地向前迈着。能不能从对面开另  
一辆汽车去撞蒋介石的汽车？可是所有的汽车都可能被军队  
征调了。为了保护他们使用的汽车，在上面可以插上公使团  
的小旗——这也不保险，因为警察认识所有公使的司机。用  
一辆大车把路挡上呢？蒋介石前边总有保镖的开着“福特”  
车开道。如果因遇到可疑情况而停车，站在脚踏板上的卫兵  
和警察不论发现谁往前凑，都一定会开开枪射击的。陈在听  
着，他的伙伴们讲了一会儿了：

“如果很多将领意识到他们很可能被害，那他们就会抛  
开蒋介石。”裴说，“只有我们才有信义可言。”

“是这样，”孙说，“可以把被判死刑者的儿子造就成  
勇敢的恐怖主义者。”

“至于那些活下来的将领，”裴补充说，“即使他们为  
反对我们而要创建一个中国，他们也可能把中国变得强大起  
来，因为他们将会为它付出自己的鲜血。”

“不对！”陈和孙异口同声地反驳说。

他们俩都很清楚，在共产党员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

民族主义者的数目是非常大的。裴在几家很快就被取缔了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内容都是反映含辛茹苦的故事，并撰写了一些文章，最后一篇是这样开头的：“在帝国主义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不止一次地想恳求它开恩，要求它把穿在鼻子上的金环换成镣环……”此外，他还在创立一种关于恐怖主义的理论。在他看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获得新生。

“我不想创建中国，”孙说，“有它也好，没它也好，我只想确立我们这号人的地位。穷人，我就是为了他们才去献身，去杀人的。仅仅是为了他们而已……”

这次是陈回答：

“如果我们老是一味想着扔炸弹，那就肯定会坏事。十有八成要失败。今天该就此作罢了。”

“别的干法也不见得容易。”裴说。

“有一个办法。”

浓密的低云，在淡黄色的空中，顺着他们三个人前进的方法向前翻滚着，如同命运一样变幻莫测而又不可抵挡。陈闭上眼睛思考着，却也在一直不停地往前走着；他的同伴们在等待着他走下去，同时瞧着他那佝偻的身影，跟往常一样在顺着墙根儿走。

“有一个办法。我想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不要扔炸弹，而要抱着炸弹扑到车下面去。”

他们穿过已打通的死巷，继续往前走着。那里再也见不到孩子们玩耍了。三个人都在思索着。

到了。伙计把他们领到店铺的后屋。他们挟着公文包在

灯群中间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了下来。孙和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蹲了下来。

“你为什么笑，陈？”

他没笑，只是略带笑意而已，而且笑意里边丝毫没有讥讽裴的不安情绪的意思。他如痴如呆，是因为体验到了一种惬意。虽然他的同志们都英勇无畏，但他明白什么东西使他们慌乱，这就是：扔炸弹，甚至用最危险的方式去扔，这是冒险；而下决心去赴死，这是另一回事，甚至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他开始踱来踱去。只有从店里透进来的一线阳光照着店铺的后屋。天空灰暗，满天都是暴风雨到来之前那种铅灰色。从灰暗的雾霭当中射进来的阳光在防风灯的灯肚上闪烁者，好像一系列平行的颠倒过来的问号。陈的非常模糊的轮廓，在其他伙伴不安的眼睛上方往前移动着。

“京说得对，我们所缺乏的是剖腹自杀的精神。但对一个日本人来说，自杀很可能成神，这是卑劣行径的开始。不，必须把血洒在人的身上，并且保留血迹。”

“与其希图一次谋杀而后死去，我倒更愿意进行多次成功的——”孙说，“成功的——谋杀！”

然而，陈说话的嗓音——他的嗓音极其紧张，比他说的话的意思更为震撼人心，他的弦外之音，使孙感到一股电流通过全身。

“我必须扑到汽车底下去。”陈回答说。

孙和裴俩人挺着脖子，只用眼珠子跟着他转；他呢，一会儿走过去，一会儿走回来，连一眼也不再瞧他们。他被摆在地上的一盏灯绊了一下，扑倒在墙上；那盏灯“啪的”一声被

踢倒，摔得粉碎。他的影子又重新直立起来，模模糊糊地显现在他的脑袋上方的最后几排灯罩上。这时候，孙明白了陈所期待于他的是什么。可是，出于对他自己的怀疑，或者出于一种事先的防备，孙问：

“你想干什么？”

陈发现孙不理解他。他似乎不反对孙本人，而是反对他回避自己的思想。他终于说：

“不要让这次行动归于失败。”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许下诺言都效仿你？是不是这样？”

“我期待于你们的不是一种许诺。这样做是一种需要。”

灯上的反光消失了。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光线暗了下来，毫无疑问，外面的乌云一定愈来愈浓了。陈想起了吉索尔说过的话：“人临近死亡，这种赴死的欲望本身渴望传播。”他恍然大悟。孙也有所领悟：

“你想把恐怖主义变成一种宗教吧？”

用这句话回答陈对他们的期望，是空洞的，荒谬的，是过于软弱无力的。

“不是宗教，而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他的手痉挛地做了一个紧捏的动作，他的思想也好像呼吸一样喘息着。

“……是对自己命运的完全主宰。”

手一直在捏着：

“捏紧捏紧，就好象这只手捏着另一只手一样（他用尽

全力捏着那只手)，这还不够，象……”

他拾起一块碰碎了的灯罩玻璃片，这是一块三角形的闪光的碎片，一下子把它扎进了大腿的肌肉里。他说话的声音一顿一顿的，确实充满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自信。但，他却没被这种狂热冲昏头脑，他能在狂热之中保持冷静。他一点没疯。其他两个人几乎看不见他了，然而却又感到房间里到处都是他。孙有点儿怕了。

“我没你聪明，陈。但要说是为我，为我个人，这不对。我亲眼看见人们把我父亲捆上双手吊起来，用藤条抽打他的肚子，逼他供出他主人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实际上他主人并没有钱。我是为了我们的人，而并非为我个人而战斗。”

“如果是为了我们的人，最好的行动莫过于去献身。任何人的作用都不能与作出这种抉择的人相比。如果当初我们就决意献身的话，刚才我们就不会把蒋介石放过去了。”

“对你来说，你可能需要那样做，但我不知道……”他辩解道。“如果我同意那样做，你明白，我就觉得我牺牲不是为了大家，而是为了……”

“为了谁？”

几乎全暗下来，下午的坏天气还没真正好转，真是没完没了。

“为了你。”

一股强烈的汽油味，使陈想到起义的第一天哨所里那些燃烧的汽油桶。但是，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包括孙在内，既然他不愿跟随自己。而他头脑中唯一没有化为乌有的意念，



就是要造就这类被判罪的“法官”，这种复仇者。他产生的这种想法和其它想法一样，使他心撕胆裂，使他狂热亢奋，难以自控，他再也不能承受什么影响了。

“你会写文章？”他冲着裴说：“你一定要解释一下。”

裴在擦眼镜。陈卷起裤腿儿，用一条手帕把大腿扎上，伤口连洗都没洗——洗它干什么？在他出去之前，伤口是不会感染的。“人总是干一样的事。”他心绪不宁地思量着，又想到了那把扎进自己胳膊里去的匕首。

“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他说，“我一个人就够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做些安排。”孙回答说。

“那就太晚了。”

在店铺门前，裴跟着陈。陈发现，这个年轻人，用手拿着眼镜——在他这张没戴眼镜的稚气的脸上，充满着人情味儿。他在偷偷地哭泣。

“你到哪去？”

“我要去了，”

陈停住了脚步。他一直认为裴和孙的意见是一致的；于是他用手向留在门前的孙指了指。

“我跟你一块儿去。”裴接着说。

嗓音变了，他尽量少说话。由于哽咽，喉头上下滚动着。

“不必了。今天，你就作个见证吧。”

他的手指在裴的胳膊上抽搐着。

“作个见证吧。”他又重复了一遍。

他走开了。裴留在人行道上，张着大嘴，总是擦着他的眼镜片，滑稽得很。他从来没想到人会如此孤独。

下午三点。

柯拉毕克本以为会在家找到京，但却扑了个空。在铺着地毯的宽敞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画儿，一个穿着日本和服的画家的弟子正在收拾。吉索尔和他的内弟——画家嘉麻谈话。

“您好哇，老兄，让我拥抱您！”

他慢条斯理地坐了下来：

“很遗憾，您的儿子不在。”

“您可以等他一下吗？”

“等等看吧。我十万火急要见他。烟桌底下那盆小仙人掌没见过，是什么品种？要把各个品种都收集起来可就带劲了。赏心悦目，朋友，赏心——悦目！我非得买一盆不可。您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是一件礼品，一点钟以前刚送来的。”

柯拉毕克去看写在仙人掌扁平支柱上的文字，一个大字是“忠”，三个小字是署名：陈塔尔。

“陈塔尔……陈……不认识。遗憾。这个小伙子对仙人掌倒是在行。”

他想起来了，他明天应该走人。现在的问题是筹措路费，而不是买什么仙人掌之类的东西。在被军事占领的城市

里，想顺手就卖掉艺术品是办不到的。他结交的朋友都很穷。不管以什么理由去向费拉尔求借，他也是一毛不拔的，费拉尔曾托他再买几张这位画家的水墨画，但他只肯出十几块钱的手续费……

“京该回来了，”吉索尔说，“他今天有很多约会，是不是……”

“他还是不去赴这些约会的好。”柯拉毕克低声抱怨着。

他一句不敢多说，他不清楚吉索尔到底了解京的哪些活动。但任何问题都不提，柯拉毕克又感到丢脸。

“您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凡是涉及到京的事情，对我都是重要的。”

“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立即赚到或借到四、五百块美元？”

吉索尔苦笑了一下。柯拉毕克也知道他穷，他的艺术品，即使他同意卖掉……

“那我们还是去赚几个钱吧，”男爵想。他往近走了走，瞧了一眼散落在长沙发上的水墨画。如果不把日本传统的绘画艺术去和塞扎纳和毕加索的画相比，那它还是相当细腻的。然而今天他对这种艺术却很反感，这是因为一个被追捕的人没什么闲情逸致。满山遍野的点点篝火，雨水浸透的乡村小路，雪地晴空飞翔的仙鹤……在这些意境里，忧郁之中孕育着幸福。咳！柯拉毕克很容易地意想到天堂就在眼前，可是他只能停留在天堂门口而不能逾越，因而他对它的存在感到恼怒。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柯拉毕克说，“赤身裸体，处于兴奋状态，但却系着一条贞洁的腰带。这是费拉尔要的，可不是我要的！见鬼去吧！”

他选了四幅画，向画家的弟子口授了地址。

“这是因为您想到了我们的艺术，”吉索尔说，“而这种艺术的作用和您想的可不一样。”

“您为什么作画，嘉麻——瓚？”

年迈的老师跟他的弟子一样，身着和服，秃秃的头顶闪着亮光，好奇地看着柯拉毕克。

弟子放下画儿，为老师翻译：“老师说：首先是为我的爱人，因为我爱她……”

“我不是问为谁，而是问为什么？”

“老师说，这很难跟您解释清楚，他说：‘我到欧洲去的时候，参观了一些博物馆。画家们越是画苹果，甚至画一些不表示任何东西的线条，他们就越是津津乐道。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客观世界。’”

嘉麻又补充了一句，他的宽厚的老太太似的脸上，稍稍显露出一一种仁慈的表情。

“老师说：我们国家的绘画就象你们国家的慈善事业一样。”

第二个弟子是厨子，端上来了几碗米酒，又转身走了。嘉麻又接着说下去。

“老师说，如果他不作画，好象瞎了眼睛，甚至比瞎了眼睛还难以忍受——他会感到孤独。”

“等一下！”男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竖起食指

说：“假如医生跟您说：‘您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最多还能活三个月，’那您还继续作画吗？”

“老师说，如果他知道自己要死的话，他认为他只会画得更好，而不会有什么别的变化。”

“为什么会画得更好呢？”吉索尔插进来问。

他每时每刻都挂念着京。柯拉毕克进来时所说的话更加使他担心，如果今天让他泰然自若，等于对他进行辱骂。

嘉麻作了回答，吉索尔自己翻译出来：

“他说：‘有两种微笑——我爱人的和我女儿的微笑，由此我可能会想到我再也看不见她们了，我就将更加喜欢忧伤。世界就如同我们的文字一样，如花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是花本身，这种花（他指着一幅水墨画），它代表着某种东西，这就加深了对世界的认识，这就是向上帝走去。’他想，死亡的来临……请等一下……”

他又问了问嘉麻，然后接着翻译：

“对，是这样。他想，死亡的来临，也许会使他对什么事情都更加虔诚，对什么事情都更带有悲伤的感情，这就使他的各种各样的画儿成为更容易使人理解的符号，使它们所代表的东西（以及它们的内涵）更加清楚地显露出来。”

面对一个否认痛苦的人，柯拉毕克感到难过。当吉索尔翻译的时候，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嘉麻这副苦行僧的宽厚仁慈的面孔。等他的面孔一呈现出理智的神态，柯拉毕克就把两手捏合在一起，胳膊肘紧贴身子，活象一个悲哀的怕冷的猴子。

“可能您的问题提得不好。”吉索尔说。

他接着又用日语简短地向嘉麻说了一句什么。直到现在，嘉麻几乎都是毫不迟疑地回答问题。他考虑了一下。

“您刚才给他提了个什么问题？”柯拉毕克低声问。

“假如医生宣判他妻子死刑的话，他可能怎么样呢？”

“老师说，他将不相信医生的话。”

当厨子的那个弟子又进来把碗放在托盘上端下去了。他身穿西服，笑容可掬，得意忘形，乃至他的毕恭毕敬，所有这一套，连吉索尔看了也觉得他怪里怪气。嘉麻小声说了句什么，另一个弟子并没有翻译。

“在日本，这些青年对酒是不沾边儿的，”吉索尔说，“这个弟子喝醉了，老师很不痛快。”

外面的门开了，接着是脚步声——吉索尔的目光模糊了。但进来的不是京。他的目光又变得清晰了，紧紧地盯着嘉麻的眼睛。

“假如她真的死了呢？”

这位老画家还肯和这样一个欧洲人继续谈下去吗？这可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苦笑了好一会儿，他这种苦笑用的是眼皮而不是嘴唇。

“人甚至可以和死亡相通……这是最难最难的，但这大概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吧……”

他抽身回到了卧室，他的弟子跟在后面。柯拉毕克坐下来，

“没说的！……出类拔萃，老兄，出类——拔萃！他象一个教养有素的幽灵似的离开了这里。您知道，年轻的幽灵教养甚差，年老的幽灵教他们吓唬人最费劲不过了，因为这

些年轻的幽灵什么语言也不通，只会吱——吱——地乱叫……这……”

他说着说着停了下来；又传来门环碰撞的声音。寂静之中忽听得吉他演奏的乐曲，曲子由高到低，宛如水花四溅的瀑布轻缓而下，直到最低沉的旋律，经久不息，最后消失在肃穆静谧之中。

“他弹的到底是什么呀？”

“他弹的是日本三弦。身居日本国外异邦，每当心情烦躁的时候，他总是拿它作为寄托……他从欧洲回来曾对我说：‘现在，即使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了……’”

“装腔作势吧？”

柯拉毕克听着乐曲，漫不经心地问道。在他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虽然他很少考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真正受到威胁），听着如此美妙的乐曲，酷爱音乐的年轻时代的往事和随着青春消逝而破灭的一切幸福，都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但同时也使他心烦意乱起来。

再一次听到脚步声，原来京已经进来了。

他把柯拉毕克领到他的卧室。长沙发，椅子，写字台，四面白墙：这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苦行僧生活。屋里很热，京把上衣扔到长沙发上，只穿一件背心。

“是这么回事，”柯拉毕克开口道，“我刚得到一个无足轻重的情报，但是您如果不予以特别重视的话，却要铸成大错；假如我们明天晚上以前不离开此地，我们就完蛋了。”

“这个情报是从哪儿来的？警察局？”

“一点不错！没必要向您表白我不能跟您多说。可情况很严重。船的事泄露了，但您要冷静，四十八小时之内一定要离开这里。”

京本来想说：我们既然胜利了，船的事情也谈不上什么违法不违法。但他没吭声。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他早就预料到了，所以他并不感到惊讶。现在的问题是要决裂了，这是柯拉毕克想象不到的。如果他被追捕，那是因为“山东”号上的武器已被共产党得到，人家认为他与共产党有瓜葛。

“您打算怎么办呢？”柯拉毕克接着问。

“三思而后行。”

“见解深刻！如果要逃，您有钱吗？”

京微笑着耸了耸肩膀。

“我不想逃走，”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您的情报对我不是至关重要的。”

“哼，不想逃走？那您就等着被砍头好了。”

“可能。您呢，您是不是想走？”

“我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呢？”

“您需要多少钱？”

“三、四百……”

“我大概可以给您一部分。我很愿意帮助您。过去您曾帮过我的忙，可您别以为我只想以此来酬报您……”

柯拉毕克苦笑了一下，他没有误解京对他的体贴，而是有些感动。

“今天晚上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京接着问。

“随您。”



“不，不要去。”

“那就到Black Cat。我得千方百计弄点钱。”

“可以。因为这个夜总会位于租界的地盘上，没有中国警察，不象这里人多，不用担心被绑架……我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去，不能再晚，因为尔后我还有一个约会……”

柯拉毕克把视线移开了。

“……一个我绝对不能耽误的约会。Black Cat在那个时候肯定不会关门吗？”

“真荒唐！那时正是蒋介石的军官们济济寻欢的时刻。他们将穿着堂堂正正的军装，搂着交际女郎翩翩起舞，真可谓花团锦簇！那我就一边等您，一边凝神光顾这种场景好了，一直到十一点半左右。”

“您估计今晚您有没有可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试试看吧。”

“您可能会帮我的大忙，您想象不到的一个大忙。我被指名道姓了吗？”

“对。”

“我父亲呢？”

“没有。要是没有他就告诉他了。他与‘山东’号的事毫不相干。”

京明了，该挂虑的不是“山东”号，而是敌人的镇压。梅呢？她的角色微不足道，用不着问柯拉毕克。至于他的伙伴们，如果他受威胁，那所有的人都必属在劫之列。

“谢谢您。”

他们一起回到了凤凰厅，梅正与吉索尔谈着：

“这很难办：被虐待的妇女提出离婚，妇联会同意她们离吧，她们的丈夫就要退出革命联合会；不同意她们离吧，她们就会对我们完全失去信任。她们没有错……”

“关于组织起来的问题，”京说，“我既担心过早，又担心过晚。”

柯拉毕克要走，不想听下去。

“和往常一样，大方点儿吧，”柯拉毕克对吉索尔说：“把您的仙人掌送给我吧。”

“可是我非常喜欢送我仙人掌的那小伙子……若是其他什么人给的，我心甘情愿奉送。”

这是一棵长满毛刺的小仙人掌。

“那就算了。”

“一会儿见。”

“一会儿……不。也可能。再见，老兄。已经不存在的唯一的一个上海人——没说的，肯定已经不存在了的一个人——向您致意。”

他走了。

梅和吉索尔焦急不安地望着京，京马上解释说：

“他从警察那儿得知我已被注意上了，他建议我不要出去。除非两天之内出逃。此外，镇压迫在眉睫，而第一师的最后一批部队已撤离了城市。”

第一师是共产党唯一可以依靠的部队。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有数的，于是他命令该师师长率部重返前线。这位师长曾建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逮捕蒋介石。有人劝他抱病等待时机，于是他很快就接到了最后通牒。在没有取得党同意的情

况下，他是不敢擅自开火的，他只能在撤离城市的时候，留下一部分部队。而这些部队刚刚也开走了。

“这些部队还没走远，”京接着说，“如果我们在城里能坚持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师甚至有可能再回来。”

门又开了，有人探了探头，声音深沉地说：“德·柯拉毕克男爵已经不存在了。”

门又关上了。

“汉口方面没有什么消息吗？”京问。

“什么消息也没有。”

他从汉口回来以后，一直在秘密地组织对付蒋介石的战斗小组，就象当年对付北洋军阀一样。共产国际拒绝一切反对派的口号，可是却同意维持共产主义突击小组。京和同志们都想把新的活动分子小组培养成群众的组织者，这些群众现在每天都向各个联合会涌来。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演说和它主张同国民党联合的宣传，却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只有军事委员会和他们站在一起。并非所有的武器都交出去了，但蒋介石今天还让交出那些尚未交出的武器。军事委员会的最后号召电已发向汉口。

老吉索尔这次了解了情况，他忧心忡忡。他和京的判断是一样的：蒋介石肯定会镇压共产党人。他和京的想法也一样：刺杀蒋介石，是击中了反动势力的要害。然而他讨厌他们这次行动所带有的阴谋性质。杀死了蒋介石，甚至占领了上海政府，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冒险行为而已。他向共产国际的几个成员表示过，他希望铁军和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派系重新回到广州，在那里，依靠一个革命的城市，依靠一个

积极生产和供给充足的兵工厂，红派可以站稳脚跟，等待有利时机，以便发动一场新的北伐运动——虎视眈眈的反动派也在深入地进行这种准备。汉口那些醉心于攻占地盘的将领们，对中国南方的地盘不太感兴趣，因为那里忠于孙中山遗嘱派的各个联合会，会迫使他们进行那种持久的收效甚微的游击战。红军本该去攻打北洋军阀，然后去打蒋介石。他们没有这样做，而让蒋介石随心所欲地去打北洋军阀。嗣后，红军不论在广州遇到的敌人多么弱小，也只能干看着而已。“毛驴太贪恋胡萝卜<sup>①</sup>了，”吉索尔谈到将领们的时候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插到胡萝卜和它们中间去，我们就会被它们挟住……”但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看法太“武断”，莫斯科也可能这么看。

京跟他父亲想的一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回广州。此外，他还想过，通过大量的宣传，动员一无所有的工人一批批地从上海移居到广州。这会是非常困难的，但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只要南方各省的市场销路有保证，工人群众可以使广州迅速实现工业化。这对上海来说，可是一个危险的策略：纺织工人都或高或低地具有技术，而如果不提高工资，培养新工人就等于培养革命者。费拉尔曾说过：“鉴于中国工业目前的状况，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把上海人倾城转移到广州，颇象一九二五年香港的情景……从香港到广州只有五个小时的路程；而从上海到广州则需要五天！这真是困难之举啊！这可能比束手待毙难得多，但却不至于那

<sup>①</sup> 法国人认为驴特别喜欢胡萝卜。

么愚蠢。

自武汉回来以后，他确信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在共产党遭到蒋介石军队进攻的情况下，即使柯拉毕克不事先告诉他，他也认为形势发展非常令人失望，因此，任何事变的发生，甚至连刺杀蒋介石将军（不管后果如何），他也认为对形势是有利的。如果把联合会武装起来，在紧要关头就可以对付那些乌合之众的军队。

门铃又响了，京拔腿向门口跑去：终于盼来了邮差，带来了汉口的回音。他父亲和梅看他走回来，一声没吭。

“命令把武器都埋藏起来。”他说。

他把来的电报撕碎，揉成团儿，攥在手心里。他重新又展开这些碎纸片，在鸦片烟桌上摊开，拼在一起。对于自己的幼稚行为，他耸了耸肩膀：这确实确实实是让收藏武器或掩埋武器的命令。

“我要马上到那儿去。”

“那儿”——他指的是地方委员会。也就是说，他得离开租界地。吉索尔心里清楚他什么也不能讲。他儿子可能去赴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只能忍痛和保持缄默。他对柯拉毕克提供的情况异常重视，因为在北京的时候，柯拉毕克曾向他透露包括他在内的干训团将遭屠杀的消息，因此使一个名叫柯尼希的德国人得救，此人现在指挥着蒋介石的警察。吉索尔并不认识克皮莱夫斯基。当京的眼睛碰到他的目光的时候，他强作微笑，京也如此。他们俩都在互相欺骗，而这种欺骗也许是他们的最亲热的感情交流。

京又走回他的卧室，去拿放在那儿的上衣。梅也穿上自

己的大衣。

“你到哪儿去？”

“跟你去，京。”

“为什么？”

她不回答。

“我们在一起比我们分开更容易被人认出我们来。”他说。

“不会的，为什么更容易？反正你也被告发了，还不是一样……”

“你去什么事也不顶。”

“这种时候，我呆在这儿又有有什么用呢？男人们都不晓得等待是什么滋味……”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转身对她说：

“听我说，梅：涉及到你的自由的时候，我是认可的。”

她明白他影射的是什么，她感到可怕。本来她已经把这档子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又用低沉的语气补充道：

“……你也很会运用你的自由。现在该轮到我的了。”

“但是，京，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凭我的经验，承认他人的自由，就能减轻自己的痛苦。”

“我是你所指的‘他人’吗，京？”

他又沉默不语了。是的，此时此刻，她就是“他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这么看来，”她接着说：“因为我……说到归总，是

不是就因为那件事，我们连同舟共济都不能了呢？……想一想吧，京，你简直是在报复……”

“不再能同舟共济和徒劳无益地想同舟共济，这是两码事。”

“你如果对我怨恨到这个份上，你就干脆去找个情妇好了……噢！这不行！我干吗说这个呢？没那么回事，我并没有找情夫！你心里明白，你想跟谁睡就可以跟谁睡……”

“别跟我来这一套！”他严厉地答道。

他的目光使梅感到惊愕：那里面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感情，最使人困惑难解的是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他自己觉察不到的令人不安的快活的表情。

“这种时候，”他接下去说，“我想的不是跟谁睡觉。我不是说你错了；我是说我要一个人走。你承认我的自由，也就是你的自由。是干使你高兴的事情的自由。自由不是一种交易，自由就是自由。”

“这是一种遗弃……”

沉默。

“京，如果不是为了同生死共患难，那为什么人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都相亲相爱呢？”

她估计，他可能不再争辩拔腿就走，于是她站到了门前。

“想当初不应该给我这种自由，”她说，“如果它现在要把我们分开的话。”

“你没有要求这种自由。”

“可是你起先就承认过我有这种自由。”

“当时不应该相信我，”他这样想。确实如此，他一直是承认她的自由的。而让她在这个时候争论权利问题，会使她离他更远。

“有些权利，”他严厉地说：“就是为了不让行仗才给的。”

“难道我承认这些权利，只为了是让你在这个时候抓住不放吗？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吧……”

他们之间这一刹那产生的隔阂甚于诀别：她的眼皮、嘴唇、鬓角等所有流露温柔的部位，看上去都好象长在一张死人的脸上似的；高高的颧骨和长长的眼皮，也已属于另一个陌生世界了。最挚深的爱情的创伤足以引起十分强烈的仇恨。现在她离死亡如此之近，难道她还向已为她发现的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的门槛里退缩吗？她说：

“我什么也不坚持，京，就算我错了，我过去错了，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现在，此刻，马上，我要跟你一块走，我求求你。”

他沉默不语。

“即使你不爱我，”她接着说，“让我跟你一起走，这对你来说也是无所谓的……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折磨呢？”

“好象现在是互相折磨的时候似的。”她不耐烦地补充道。

京感到心里有一些熟悉的魔鬼在乱蹿乱动，使他感到相当讨厌。他真想打她一顿，确切点说，是出于爱她才打她。她是对的，如果他不爱她，她的死活对他有何干系？可能因



为在这个时候她迫使他理解这一点，才使他和她对立得这么厉害。

她想哭吗？她闭上了眼睛，和她的呆若木鸡的面部表情迥然不同的是，她的双肩在不断地无声无息地抽动着，好象在表达人类的忧伤一样。使他们疏远的因素不仅出于他的意愿，而且还由于痛苦。这种既使他们亲密又使他们疏远的痛苦的表情，又一次出现在她的脸上：眉梢一点点挑起，好象在赞叹什么似的……在闭着的双眼上面，前额不动了，眼皮低垂着，这张紧绷着的脸一下子变成了一副死人相。

梅的大部分表情对他来说太熟悉了，因此对他一般不起什么作用。可是他从来没见过她这种死人的面相：闭着的眼睛不是在睡觉，而是陷入痛苦之中。死亡近在咫尺，这种幻觉变成了凶兆。她又睁开了眼睛，但并不看他，而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房间的白墙出神。面部肌肉一动不动，一滴眼泪顺着鼻子流下来，挂在嘴角上；由于她那如同动物一样痛苦的、隐约不明而又令人心碎的生活，才暴露了这样一种跟刚才一样非人的死气沉沉的脸相。

“把眼睛睁开。”

她看了看他：

“睁开了。”

“我以为你死了呢。”

“死了怎么样？”

她耸了耸肩膀，用一种十分忧郁的疲惫的声音继续说：

“如果我死，我觉得你就可以死了……”

现在他明白了什么样的真情在支使着他：他想安慰她。可是只有同意她和自己一起走才能安慰她。她又闭上了眼睛。他把她抱在怀里，吻她的眼睑。当他们松开的时候，她问：

“咱们走吗？”

“不。”

她太老实了，掩饰不了自己的天性。她又以牛一样的固执劲儿坚持她的要求。她这种性格常常引起京的反感。她离开了房门，但是他发现，他肯定是过不去的，想过去那是痴心妄想。

“梅，我们要出真不意她分离吗？”

“难道我是作为一个被人保护的女人而生活的吗……”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但又忍受不了这无声的沉默。他们心里都清楚，此时是他们一生中最为严峻的时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严峻。京的心思没在这儿，而在委员会。他的思想深处由急躁情绪主宰着，她用头向他指了指门。

他看了看她。他用双手捧着她的头，充满柔情地紧紧地捧着它，但并不去吻它，好象他能把一切男性爱情举动所具有的既温存又粗野的东西，都体现在捧托面颊这个动作中去了似的。他终于把手松开了。

两道门都关上了，梅还在听：好象她会接着听到第三道门关上的声音似的，实际上这道门是不存在的——她松软的嘴巴张着，饱含着忧伤，因为她意识到她之所以示意让他一个人走，那是因为她想使出这最后一招儿，而且只有这一招

儿，才会促使他决定带她走。

京刚走了一百多步，就遇到了卡托夫。

“陈没在吗？”

他用手指了指京的家。

“没有。”

“你绝对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

卡托夫是平静的，但这张带着偏头疼的脸……

“蒋介石的车有好几辆。陈不知道这个情况。或许是由于警察事先就得到了情报，或许是他们已有所怀疑。如果他不知道，就会自投罗网，扔炸弹就毫无意义了。你瞧瞧，我在他后面追了他好半天了。炸弹本该是一点钟扔出去的。什么事也干不成，这一点我们是可以预料的。”

“他一定去双共和国大街了。最好到海默里希那儿去看看。”

卡托夫旋即去那儿。

“你有氰化物<sup>①</sup>吗？”京回过头问卡托夫。

“有啦。”

他们俩，以及其他许多革命领导人，腰带上都有一个象盒子一样能打开的扣环，里边装着这种氰化物。

与梅的分离并没有使京得到解脱，梅虽然同意留下，可是在这条僻静的马路上，他感到梅对他的牵扯，反倒比站在他对面反对他更大。他已经进入华界地面，这一点他并不是

---

① 致人突然死亡的毒药。

没有察觉，只不过没在意罢了。“难道我是作为一个被人保护的女人而生活的吗？……”对于一个同意他走的女人，他有什么权力对她进行可怜的保护呢？他是以什么名义离开她的呢？他能保证其中没有报复的成分吗？毫无疑问，梅一定还坐在床上，忍受着超出心理学范畴的痛苦的折磨……

他赶紧往回跑。

凤凰厅里空无一人；他父亲出去了。梅依然呆在卧室里。在打开屋门之前，他停住了。他发现，如果出生人死的友爱成了压倒一切的东西，与这种一致相比，人的肉体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尽管他火气还没消。现在他才恍然大悟，拖着他所爱的人同归于尽，这也许是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任何东西都不能超越的。

他打开了屋门。

她赶紧把大衣披在肩上，什么也没说，跟着他就走。

下午三点半。

海默里希看着这些没人买的唱片有好半天了。有人接着约定的暗号敲门。

他把门打开：卡托夫来了。

“看到陈了吗？”

“悔恨莫及！”海默里希低声埋怨说。

“什么！”

“没什么。对。我看见他了。一两点钟的光景。这关你

的事吗？”

“我绝对需要见到他。他讲什么了？”

从另一个房间里，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叫声和妈妈极力想哄他安静的听不太清楚的话语。

“他是跟两个伙伴一起来的，一个是孙，另一个不认识，戴眼镜，人平平常常，但样子庄重。他们腋下都挟着公文包，你懂得什么意思吗？”

“对，我就是为这个才急于要找他的。”

“他向我提出要在这儿呆三个小时。”

“啊，太好了！他在哪儿？”

“住口！听着人家跟你说什么：他向我提出要在这儿停留，我没同意。你听清了吗？”

沉默。

“我跟你说我没同意。”

“他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什么也没说。跟你一样。今天，到处都是一片沉默……”

海默里希站在房子中间，身子缩成一团儿，眼里放出近乎仇恨的光芒。卡托夫不去看他，平心静气地说：

“你太爱责骂自己啦。我看，你是为了自我辩解才这样责骂自己的。”

“你懂什么？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请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一绺头发象小鸡冠子一样，张着两手象耶稣基督让人钉钉子似的……”

卡托夫并不把手合起来，而是搭在海默里希的肩上。

“上边孩子总不见好转吗？”

“更重了。这就够了。可怜的孩子……瞧他那个瘦骨嶙峋的样子和那个大脑壳，很象只剥皮的兔子……让他……”

这个比利时人突然从卡托夫手下解脱出来，停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孩子般古怪的动作向房间尽头走去，好象赌气似的。

“最坏的事情，”他说，“还不是这个。你不要这样，不要想去干又故作姿态地装出扭扭捏捏的样子，我并没有向警察告发陈。行了。至少现在还没有……”

卡托夫忧伤地耸了耸肩膀。

“你最好还是讲清楚。”

“我想跟他走。”

“跟陈？”

卡托夫断定，现在他不会再找到陈了。他是操着被打败的人那种平稳而又疲惫的腔调讲话的。蒋介石到夜里才回来，在这之前，陈什么也别想干成。

海默里希用大拇指从肩上向传来孩子哭叫的方向指了指：

“瞧，瞧！你能让我干什么呢？”

“等待……”

“因为孩子会死，不是吗？请你听清楚：整个一上午，我都盼着他死；可是真的要死了，我又会盼着他活下来，盼着他不死，即使病着也好，残废了也好……”

“我知道……”

“什么？”海默里希抢过来说，“你知道什么？你连婚

都没结过！”

“我结过婚了。”

“我倒想瞧瞧。就凭你这副德行……不，你看见在街上转游的那些极标致的做爱的青年男女，都与我们毫不相干……”

他感觉到卡托夫在想着楼上照顾孩子的女人。

“她是个忠贞的女人，是的，她已经竭尽了全力。她没做的，她所不具备的，正是权贵富豪们所需要的那一套。当我看到一些人相亲相爱的样子，我真想让他们饱尝一顿我的拳头。”

“忠贞，这就足够了……唯一要紧的就是别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而你就是为了这个，才留在这儿的，是不是？为了帮助我？”

“对。”

“出于恻隐之心？”

“不是恻隐之心，是出于……”

卡托夫没有找到恰当的字眼儿，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词儿。于是他便转弯抹角地解释道：

“这个我了解，或者说近乎于了解。也了解你为什么发火……不通过回忆往事你怎么叫人明白这些事情呢？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没生你的气。”

卡托夫走近他，脑袋缩进肩膀里，说话时总吃掉一些音节，用眼角斜着他；他们二人都这样，缩着脑袋，好象要在唱片中间格斗起来似的。但卡托夫知道他自己是个强者，虽

然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由于他说话的语气，他的不动声色，甚至他所表现出的友谊在起作用吧？

“一个对什么都嘲弄的人，当他真的感受到了忠贞感情，牺牲精神，感受这类品质的任何一种，他就完蛋了。”

“别瞎扯了。那他会做什么呢？”

“施虐，”卡托夫心安理得地看着他答道。

蟋蟀。脚步声，在街上渐渐消失了。

他接着说：“用发针施虐，很少见了；而言语又很难达到施虐的目的。但是，一个妇女如果绝对地接受，如果她有能力强过……我认识一个人，他把他老婆多年积攒准备到疗养院治病的钱拿去赌了，这可是性命攸关的钱哪！结果他把它输光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不输的）。回来的时候蔫了，无精打采的样子就跟你现在这副德行差不多。她看着他走近她的床边，马上就明白了。你瞧后来怎么样了？她还极力安慰他……”

海默里希慢腾腾地说：

“安慰别人比安慰自己容易……”说着，他突然挑起了眼皮：

“那个人就是你吧？”

“够了！”卡托夫用拳头击着柜台，“如果是我，我就说是我，而不说别的什么人了。”但他的气很快就消了。

“我还没到这个份上，也没必要这样做……如果人们对什么都不相信，正是由于人们什么都不相信，那就只好相信良心了——如果真有良心的话，这是顺理成章的。你正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没有妻儿拖累，你一定会出去的，对此我深信



不疑，是这样吧？”

“正因为人活着只是为了良心，所以良心就吃掉你。既然总得被吃掉，那就让良心吃吧。我不忍心把陈拒之门外，又不敢把他隐蔽在家里。”

“只能向同志们提出他们力所能及的要求。我只需要同志们，不需要圣人，我不相信圣人……”

“你陪工人到铅矿去做苦工，真的是出于自愿吗？”

“那是在集中营，”卡托夫有点不自在，“矿山和集中营是一码事……”

“一码事？这不可能！”

“你知道什么呀？”

“这不可能！你本该看住陈的。”

“我没有孩子……”

“我觉得，如果没孩子，我的标准……会少一些。我的孩子如果没病，我甚至还想让人把他弄死……我是个笨蛋。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笨蛋。我可能连劳动者都算不上！以后怎么办？我就好象一块绊脚石一样，什么人都可以往上撒尿。”

他那扁平的脸又往楼上扬了扬，因为孩子又叫起来了。卡托夫不敢说：“死亡马上会把你解脱出来。”对于卡托夫，死亡已经把他解脱出来了。从海默里希开口讲话以来，卡托夫就回忆着他的爱人，她浮现在他们俩中间。他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悲观失望，穷途潦倒，医学也停修了，无奈到工厂当了工人。他断定自己在瞑目之前，肯定看不见革命了。他忧郁地意识到，他的生命存在一天，就只能给爱着他

的一个小女工带来一天的痛苦，但是，她一旦情愿忍受他给她带来的痛苦，他就被这个甘愿为他受苦的人的震撼心灵的脉脉温情征服了，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她了，他一如既往地参加革命活动，但这个痴情的姑娘时时萦绕在他的脑子里，他念念不忘她的缠绵的柔情，这种柔情藏在情兴酷浓的云雨当中，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抚摸她的头发，他们整天整天地睡在一起。她死了，而从那时候起……他和海默里希之间就存在这个不同。这种区别并不太大。

通过语言，卡托夫几乎什么也不能表达；但除了语言，还有他的举动，他的眼睛可以表达，这是他唯一的表达方式。经验告诉他，他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处在摆脱不开的孤寂当中。表达出来也能解脱一点，很难再找到为人所知的人类语言能表达他们深切的痛苦了。表达不当，或者说假话，都会引起海默里希新的波动，会使他更加自卑，因为他特别痛恨自己。卡托夫忧郁地看了他一眼，但并不去死盯着他，他又一次察觉到体现男性爱的举动，是多么贫乏，多么笨拙。

“我即使什么也不说你心里也该明白。”他说，“没什么好说的。”

海默里希举起手，又沉重地放下来，好象他的一生只能在忧伤和荒诞之间抉择似的。但他在卡托夫的面前，受到了感染。

“我马上就可以再去找他了。”卡托夫这样想着。

下午六点。

“钱昨天已经交了，”费拉尔对上校说，他这次穿着军装。“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军政府向蒋介石将军打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询问在发生暴动的情况下，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他要求保护吗？”

上校用他角膜翳眼珠的上边部分看着费拉尔，只回答：

“请看译文吧。”

费拉尔读文件。

“我还得到了答复。”上校说。

他递过来一张照片，在蒋介石签字的上方写着两个字。

“什么意思？”

“枪毙。”

费拉尔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上海地图，上面的一些大红点，表示工人群众和劳动大众——他们是同一类人。“工会有三千纠察队，”他想，“在他们背后可能就是三十万，可是他们敢轻举妄动吗？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和军队……”

“他是不是想在暴动发生之前就枪毙共产党的革命干部？”他问。

“肯定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暴动发生了，因为共产党几乎全部都被缴了械，蒋介石却拥有自己的军队。第一师在前线，这是唯一的危险。”

“谢谢，再会。”

费拉尔到瓦莱丽那儿去。听差在司机旁边等着他。他的膝盖上放着一个镶金的大鸟笼子，里面养着一只乌鸫。瓦莱丽曾经向费拉尔索要这件礼物。汽车刚一起动，他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重读了一遍。一个月来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美国给他的贷款就要中断。

对于工厂的生产能力来说，光靠“印度支那联邦政府”的订货再也不够了，这些工厂的创建是为了适应本应当逐月扩大的市场需要，而实际上这种需要在日趋减少。因为“康采恩”的工业企业是亏损的。在巴黎，由费拉尔各个银行以及与它们有关系的法国金融财团所控制的股票行情特别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从法郎稳定以来，一直在下跌。可是“康采恩”银行的势力靠的就是种植业的利息，尤其是橡胶公司的利息。“史蒂文森计划<sup>①</sup>”把橡胶的市价从十六美分提高到一百一十二美分。作为印度支那橡胶树的种植者，既然不属于英联邦管辖之内，所以他既可得到提高橡胶价格之惠，又不用限制橡胶生产。美国是橡胶的主要消费者，凭经验它知道自己要为“史蒂文森计划”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所以美国银行心甘情愿地为橡胶种植业提供贷款。可是荷属印度当地的生产，美国自己在菲律宾，巴西和利比里亚新开辟的种植园，现在都构成了橡胶牌价暴跌的因素。美国出于同提供贷款时一样的考虑，中断了贷款。费拉尔同时遭到来自几个方面的打击：一是他赖以支撑门面的唯一原料种植的破产，他之所

<sup>①</sup> 因为橡胶亏本，在橡胶产地——英联邦各国限制橡胶生产，以提高橡胶价格。

以贷款，并非为了在生产价值上，而是在种植本身的价值上进行投机；一是法郎的稳定，致使他们所有的证券价值下跌（其中很多是属于他那些严格控制市场的银行的）；一是美国取消了给他的贷款。他不是不清楚，一旦美国取消这些贷款的消息公诸于世，巴黎和纽约的投机分子就会采取使他的证券价值下跌的立场，他们采取这种立场是肯定无疑的……他只能在道义上求得救助，这样一来，他只能求救于法国政府。

濒临破产，使所有的金融集团都对他们所属国家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虽说政府看惯了“剥夺储蓄金”，但却不希望储蓄金被剥夺；储蓄是赌徒带着押宝取胜的顽固侥幸心理，想有朝一日重新得到失去的金钱，这是一种聊以自慰的储蓄。因此对于法国来说，在放弃中国工业银行之后，就很难再放弃“康采恩”了。为了使费拉尔有求于它，一定不能让他绝望，因此，首先必须在中国消灭共产党。让蒋介石控制一些省份，这才有条件在中国修建铁路。预计贷款三十亿金法郎，这就意味着一笔数目巨大的纸币法郎。当然，费拉尔不是独自一人接受订购物资，正如今天不再是他独自保护蒋介石一样，但是他要参加。况且，美国银行也害怕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共产党的败落会使他们的政策发生变化。做为一个法国人，费拉尔在中国拥有特权。“‘康采恩’不会不参加铁路的修建”。为了维持局面，他有充分理由请求政府给予帮助；而政府呢，宁可帮助他，也不希望出现一次新的股票暴跌：他的贷款是美国的，可他的存款和股票却是法国的。在中国十分危机的时期，想使他的牌全赢是不可能的。

了。但是，正如“史蒂文森计划”当时保住了“康采恩”一样，今天国民党的胜利也必然会救他的驾。法郎的稳定对他不利；中国共产党的败落对他有利……

世界经济的推动力开始时如同供品，终结时却象脑袋在肚子里冲撞——难道他的一生就总是等待着这种推力的到来而从中汲取力量吗？今天夜里，尽管他处在抗争之中，但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他觉得这完全取决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力量。但有这么个女人，他倒不依赖于她，过一会儿她反倒要依赖于他。她那张温顺的令人着迷的脸蛋，好象一只手一样蒙住了他的眼睛，为他掩盖了约束他生命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东西。他在一些沙龙里又重新见到了她（她刚从京都回来三天），她那温情脉脉又桀骜不驯的娇姿媚态使他欲火燃烧，使他每次都受到刺激，但他每次都克制着。她答应今天夜里再来找他。他有一种无止境的需求——让人最喜爱他（两性之间是比较容易互相倾心仰慕的），如果这种仰慕之情靠不住的时候，他就求助于色情，使仰慕之火燃烧得更旺。她愈是反对他，就愈刺激他的性欲。所有这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出于他的地位，从一开始触摸她的肉体时起，他就在想象中按照他需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但是，他早就认为，一个被征服的肉体，比那种送上门来的肉体，比任何其他别的什么肉体，都更有情有味。

他下了车，走进拉斯托饭店，听差在后面跟着，手提鸟笼子，显出十分庄重的样子。世上有成千上万个影子——成千上万个女子都不曾拨撩他的春心，而只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对手——一个女子，他想博得她的钟情。他的傲慢招来对手

的傲慢，如同一个着了魔的赌徒招来了另一个赌徒，并非是为了和好，而是为了跟他干。起码今天晚上的赌局已经安排就绪，既然他们首先要一块睡觉。

他一走进前厅，一个欧洲籍的雇员便迎了上来。

“塞尔日夫人让转告费拉尔先生，她今天晚上不回来了。那位先生会向您解释的。”

费拉尔一愣，看了一眼“那位先生”，背冲外坐在一扇屏风旁边。那个人扭过头来：原来是一家英国银行的经理。一个月来他一直在向瓦莱丽献殷勤。在屏风后面，一个听差手持装有鸟鹑的鸟笼子站在他身旁，那一本正经的劲头，一点不亚于费拉尔的听差。英国人站起来，目瞪口呆地握了握费拉尔的手说：

“您应该向我解释，先生……”

他们都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俩都被愚弄了。在两个听差不露声色的微笑当中，在白人雇员十分不自然的庄严表情当中，他们俩面面相觑。

现在是喝鸡尾酒的时刻<sup>①</sup>，全上海城都在喝这种酒。

费拉尔觉得自己最可笑，因为这个英国人还可以算是个年轻人。

一种和他的愤怒情绪同样强热的轻蔑之感，立即补偿了他所处的劣势。他感觉到，他被人间真正的蠢事包围着，它们粘附在肩头，压在肩头：那些眼睛盯着他的人们算是地球上最可恨的傻瓜了。然而，他不清楚他们到底知道些什么。

<sup>①</sup> 通常喝鸡尾酒的时间为下午五时前后。

假定他们了解全部底细，面对他们的讥讽，他觉得自己被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压垮了。

“是不是要来场比赛？”他的听差问另一个听差。

“说不好。”

“我的是公的。”

“对，我的是母的。”

“这么看来就是为的这个。”

英国人向费拉尔鞠了一躬，转身向门房走去。门房交给他一封信。他接过来读了以后，招呼他的听差，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名片，别在鸟笼子上，对门房说：“交给塞尔日夫人。”说完便走了。

费拉尔努力思索着，自我辩解着。她捅到了他的痛处，这就好象在睡梦中见她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一样——她否决了他。他所能想的，所能做的，所能期望的，全都成了泡影。这可笑的一幕，无非是由于她的不在。在这魑魅魍魉的世界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而他，正是他，却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此外，他不考虑后果，只想到了他一连串的失败，象他的狂热使他成了受虐色情狂<sup>①</sup>一样；此外，他也没有可能和她睡觉。在那些呆头呆脑的人们面前，在他那个手持鸟笼麻木不仁的听差面前，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那儿，要向这个嘲弄人的肉体进行报复的欲火在他的胸中愈烧愈烈。这只鸟对他始终是一种侮辱。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呆下去。于是他要了一杯鸡尾酒，点上一只香烟，然后一动不动

<sup>①</sup> 一种以受异性虐待为快的病态色情狂。



地呆在那儿，手指却在上衣兜里不断地折着火柴棍。他看到一对男女，男的一头灰发，加上年轻的面孔，看上去很帅；女的温存，颇为时髦，用一种充满温情和肉感的爱慕的眼光瞧着他。“她爱他，”费拉尔嫉妒地想着，“可是毫无疑问，这是傻瓜一个，他或许还属于我的哪个企业呢……”他打发人把门房叫了来：

“您那儿有我一封信，请给我。”

门房愕然，但又不失郑重地把信递了过来。

“亲爱的，您了解波斯妇女吗？当她们被惹火的时候，就用带钉子的拖鞋痛打她们的丈夫，这是不能怪罪她们的。随后，她们又过上了那种平庸的生活，当她们和男人哭哭啼啼的时候，她们的生活还是自由的；但当她们和男人搂着睡觉的时候，生活便出卖了她们——您相信吗？在这种生活当中，男人‘占有’女人。我可不是那种被人‘占有’的女人，您想象蒙骗小孩或病人似的，在一个痴愚的肉体上寻求欢乐，这办不到。您通古博今，亲爱的，可是一直到您进坟墓的那一天，您也不会发现女人也是人。我老是碰到一些男人（可能今后我只能碰到这类人，该我倒霉，您可不知道我说过多少次‘倒霉’了！）他们发现我富有魅力，他们便费尽心机做出感人的姿态以激发我销魂摄魄的狂热；然而一旦涉及到人间正事的时候，他们很懂得去找他们的朋友（当然他们需要安慰的时候除外）。我对您的短暂

的爱情，不仅仅是为了讨您的喜欢，而且为了您能听得进去我的话。您可要知道我迷人的爱情狂热的价值——它很象您的温情。假如在您想左右我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痛苦，您可能连承认都不会承认。

“我碰到过相当多男人，很善于应付那些短暂的风流事；如果一个男人一旦在这种事情中也要摆出一副高傲的架式。那么，对他来说，世上办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不高傲了。而‘快乐’这个词则可以使他比较快地比较经常地得到满足。我拒绝成为一个肉体，就如同您拒绝成为一本支票一样。您跟我在一起好象跟妓女在一起一样：‘说吧，给钱……’我也只不过是您所指望的那种‘肉体’罢了；好了，好了……要想打消人们对我的看法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您的到来使我气愤地同我的肉体更接近，宛如春天使我欢快地同我的肉体更接近一样。谈到春天，您尽情地同鸟玩吧。总而言之，下一次可不要再碰电灯的开关了。

瓦……

他断定，自己跟封建主一样，跟皇帝的钦差大臣一样，修筑了公路，改造了一个地区，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脱离了田间茅舍，栖身于他们工厂周围的波浪起伏的白铁皮屋子里。鸟笼子里的鸟鸪显出要寻开心的样子。费拉尔的力量，他清醒的头脑，他改造印支的胆识，以及他刚才从美国来信中领略到的印度支那的千钧重力，这一切如同宇宙万物似的，都

以这只可笑的小鸟为归宿，而它正在真真切切地嘲弄他。“一个女人竟如此举足轻重。”这倒不关女人的事，女人只不过是一条被扯掉的头带而已：它全力挣脱了他的意志的束缚。他的性冲动没有得到发泄使他的火气更盛——把他置于了窒息的瘫软状态中，一想到被人当作笑柄，就不由得怒火中烧。只能在肉体上可以很快地进行报复。柯拉毕克给他讲过阿富汗一个头领的野蛮残忍的故事。这个人的妻子被邻近的另一个头领强奸后带回这样一封信：“我把你的妻子还给你。她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好。”后来他捉住了这个强奸他妻子的人，把他绑在裸体的妻子面前挖他的眼睛，对他说：“你见她的时候蔑视她，现在你倒是可以发誓永远不再见到她了。”他在想象，在瓦莱丽的卧室里，她被绑在床上，拼命喊叫以至呜咽，与欢快时的哼哼声是多么相近。她被紧紧地捆绑着，既然她不能有另外的抉择，只能痛苦地扭动着……门房在等待着。“要和这个傻瓜一样不动声色，可是我还想扇他两耳光子。”傻瓜倒不是世界上最不爱笑的人，只是以后再笑罢了。费拉尔说：“我回头就来。”他没付鸡尾酒钱，把帽子留下就走了。

“到最大的鸟店！”他对司机说。

鸟店离的不远。然而店铺已关门上板儿了。

“在华界，”司机说，“有一条鸟店街。”

“那就去那儿。”

在汽车行进过程中，费拉尔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忏悔录，这是在一本医书上读到的：这个女人通过一封信和一个陌生人赴约，她发疯似的要求鞭笞她。但就在她躺到旅

馆的床上，手持鞭子的男人把她的双臂完全压在撩开了的裙子下面的时候，她惊恐地想要逃掉。她的面孔看不清，但那是瓦莱丽的。停在眼前的第一家中国窑子门口吗？没劲！任何一个肉体，也不能把他从被嘲弄的一直折磨他的性的高傲中解脱出来。

汽车不得不在铁丝网前停下来。对面是华界，一片漆黑，很不安全。这样倒好。费拉尔下了车，把手枪放进上衣口袋里，希望干掉点什么，因为现在可以遇到什么杀什么。

动物商店区已经关门入夜。听差轻轻地敲了敲第一家的门板，喊道：“买东西。”商人们怕兵。五分钟之后，门打开了。在中国店铺的那种漂亮的赭红色的光影中，在一盏灯的周围，有几只猫或猴子在有节制地跳动，接着听到翅膀扑棱的声音，这说明动物都醒了。灯影中可以看见一些长长的不鲜艳的玫瑰红斑点——是些鸚鵡绑在几根棍子上。

“所有这些鸟一共多少钱？”

“光要鸟？八百美元。”

这家店铺很小，并没有什么珍禽奇兽。费拉尔掏出支票本，迟疑了一下：商人愿意要现钱。听差领会了。“这是费拉尔先生，”他说，“汽车在那边。”商人走出去，看到了铁丝网后面的汽车车灯。

“可以。”

这种信任，证明了他的权威，可也更使他恼火：他的威力所及是如此显而易见，连这个小店主都知道他的名字，可他却玩不转她，真是荒唐之至。然而，他采取的行动和夜晚的冷空气助长了他的傲气，而这种傲气又反过来帮了他的

忙：施虐者的愤怒和幻想化为反感，虽然他知道他并没有从这种愤怒和幻想中摆脱出来。

“我还有一只袋鼠，”商人说。

费拉尔耸了耸肩膀。但这时一个小孩也醒了，已经抱着袋鼠走了过来。这是一个很小的动物，毛茸茸的，用惊恐的母鹿似的眼睛望着费拉尔。

“要了。”

又一张支票。

费拉尔慢条斯理地向汽车走去。如果瓦莱丽讲鸟笼子的故事的话（她是不会不讲的），但只讲讲故事的结局就够了，免得被人抓住笑柄，这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商人、孩子和听差先把小笼子搬来，放在汽车里，然后又回店里搬别的笼子；最后去拿袋鼠和鸚鵡等余下的动物，它们都装在几个圆柳条筐里。从华界传出几声稀疏的枪声。打吧，打得越激烈越好！汽车开动了，岗哨看着他们发愣。

到了拉斯托饭店，费拉尔让人把经理叫来了：

“请跟我一起上楼到塞尔日夫人的房间走一趟。趁她没在，我想送她一件她意想不到的礼物。”

经理掩饰着他的惊愕，更不敢外露他的谴责之意，因为拉斯托饭店是从属于“康采恩”的。跟费拉尔搭话的这个白人，是把他从被侮辱的天地解脱出来的唯一的人，这个人使他重新回到了“他人”中间。中国商人和黑夜把他置入摆脱不开的烦恼境地，现在虽说还没有完全摆脱出来，但至少他不完全被这种烦恼所主宰了。

五分钟之后，他让人把鸟笼子放进瓦莱丽的房间里。所

有贵重的东西都井井有条地放在衣柜里，其中一个没有关门。他去拿堆在床上的睡衣，准备把它扔进衣柜里。但是当他刚一触摸这柔软的丝绸的时候，就觉得一股暖流通过胳膊传导到全身，还觉得他抱着的这块丝绸正好盖住了自己的身体；这些挂在敞开的衣柜里的连衣裙、睡衣，可能包含着比瓦莱丽的肉体更富有肉感的某种东西。他差一点把这些风采依存的衣服撕掉。假如他能拿走这件睡衣，他就拿走了，但他最终还是把它扔进了衣柜，听差把柜门儿关上了。就在睡衣离手的一瞬间，他忽然想到关于赫拉克勒斯<sup>①</sup>和奥姆法勒<sup>②</sup>的传说：赫拉克勒斯穿着女人的起皱衣服，和刚才的丝绸一样质地柔软，受着凌辱却又因此而洋洋得意。他想尽力回忆刚才他满脑子的那些施虐的场面，但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因为被奥姆法勒和德雅尼尔<sup>③</sup>毒打的那个男人占据了整个脑海，使他沉浸在一种受凌辱的快乐之中。门外有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摸到了兜里的手枪。脚步声在门外又走远了，费拉尔的手换了一个兜，神经质地把手帕掏了出来。他让人把鸚鵡解开但这些怯生生的鸟却跑到屋角里或躲到窗帘的后面。袋鼠跳到床上，站在上面。费拉尔顺手关上大灯，只留下通宵点着的小灯。鸚鵡有粉的，有白的，只见

---

① 赫拉克勒斯 (Hercule)，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

② 奥姆法勒 (Omphale)，相传是古代小亚细亚奴隶国家吕底亚国的王后，她强迫赫拉克勒斯在她脚下纺线之后，与这位英雄结亲。

③ 德雅尼尔 (Dejanire)，埃拉克莱斯的妻子。她的丈夫穿上她给的毒长衫之后被毒死。

它们装作东印度公司出产的凤凰的样子，弯曲的翅膀做出各种优美的动作——开始在屋里乱飞起来，发出阵阵粗野的不安的响声。

装满蹦蹦跳跳小鸟的笼子，都横七竖八地摆在家具、地板和壁炉上。他觉得很别扭。到底为什么，他也说不出。出去。又回来。哦，明白了：这房间似乎已被搞得乌烟瘴气。今天夜里他可以不做蠢事吗？他不由自主地留下迹象，明显地表明心中的怒火。

“把笼子都打开，”他对听差说。

“那会把房间弄脏的，费拉尔先生。”经理说。

“塞尔日夫人会改换房间。您把帐单给我吧。”

“花呢，费拉尔先生？”

“除了鸟，什么都不要，谁也别让进来，即使仆人也不让进来。”

为了挡蚊子，窗户镶着铁纱窗，鸟类是跑不出去的。经理打开窗子：“免得房间里有动物的腥臊气味。”

现在来自海岛的各种鸟类在家具上，窗帘上以及天花板的各个角落之间飞来飞去，它们在这微弱的光线中，显得和中国壁画上的鸟一样，身上都失去了光泽。他出于仇恨，将赠给瓦莱丽一份最漂亮的礼物……他控制着床头灯的开关，关上灯，又打开，再关上，再打开。在他家和瓦莱丽最后一夜同衾共枕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差一点儿把这个开关拔下来，那她以后不管和谁也都永远没办法再用它了。但他不愿意在这儿留下任何恼恨的痕迹。

“把这些空笼子拿走，”他对听差说，“把它们统统烧

掉！”

“假如塞日尔夫人问是谁送来的这些鸟，”经理必恭必敬地接着费拉尔问道，“要不要对她说呢？”

“她不会问的，有签字。”

他走出了房间。今天夜里他必须找个女人睡觉。然而，他并不想马上就到中国饭馆去。有把握得到女人的肉体，这一点也就够了，哪怕是临时性的也好。经常有这种情况：当噩梦突然把他惊醒的时候，他常常还想接着睡下去，虽然还可能再作噩梦；同时他也想完全清醒过来，摆脱恶梦的缠绕。一入睡就是噩梦，可那是他；醒了倒是平静，可那是人世。今天夜里的色情变态就是噩梦。他终于决定从噩梦中清醒过来，让人开车到“法国俱乐部”走走，找个人谈谈，和他建立某种关系，哪怕只是交谈的关系也好，这才能真正清醒过来。

酒吧间里的人满满当当，这是最乱的时候。吉索尔披着本色粗毛线披风，一个人近乎孤独地坐在半开的窗子旁边，面前摆着一杯甜鸡尾酒。京曾打电话告诉他，一切平安无事。于是他就来到酒吧间，听听小道消息，听来的东西虽然常常是荒诞不稽的，但有时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今天听到的却毫无价值。费拉尔在四座一片问候声中向他走去。他清楚他的行情的本质，但他对此并不太关注。他还不知道京目前已经到了上海。他认为向马夏尔询问关于人的情况是低三下四的，况且，京起的作用没有一点政府的性质。

所有那些带着胆怯而又含有责难眼光望着他的白痴，都以为他和这个老头儿有关系是由于抽鸦片。错了。费拉尔只



是装模作样地抽一两个烟泡，总是在鸦片烟劲儿上来之前，就不抽了，因为他在烟雾缭绕中，在一口一口吸着的烟枪中，看到了一种对付女人的办法。对于献殷勤，对于以重大代价去换取一个女人所给予的乐趣，他心里感到厌恶。只要能避免这些，他去干什么都在所不辞。

不久前，在北京的时候，由于一种很复杂的好奇心的驱使，他有时也到老吉索尔的床板上来躺躺。首先是为了从丑闻中寻求乐趣。其次，他不满足于只当“康采恩”的董事长，他想有别于他的股票，这是他认为超脱股票的方法。他对艺术、对思想、对他称之为“头脑清醒”的犬儒主义<sup>①</sup>咄咄逼人的爱好，成了他的一种辩白：费拉尔既不出身于大银行世家，也非“流动资金总署”的成员，更不属于什么金融督察者流的豪门。费拉尔的家族与共和国的历史联系太密切了，因此人们不会把他看作一个不老实的商人，而会把他当作一个兴趣广泛的业余爱好者，尽管他有钱有势。他聪明过度，使他无法填补他与周围世人隔绝的鸿沟，反而倒把它加宽了。吉索尔高深的文化修养，他总是为对方效劳的才智，他对习俗的轻蔑，以及他那几乎总是奇特非凡的“见解”，使费拉尔即使在离开他以后，也从不放过机会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些特点使他们的关系更紧密，任何其它东西也不会使他们分离了。关于政治，吉索尔只跟费拉尔谈哲学方面的问题。费拉尔说他需要智慧，但只是在这种智慧不触犯他的时候他才需要，确实如此。

---

<sup>①</sup> 原指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哲学一派，后来泛指玩世不恭。

他向周围看了看，就在他坐下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向他投来。今天晚上，他情愿娶他的女厨师为妻，哪怕只是为了做给这些人看看也好。让这些白痴们去以为他这样做会使他恼火吧。看到他们的机会越少越好。于是，他向吉索尔提议到外面花园前边的平台上去喝酒。尽管已是凉意习习，但侍者们还是把几张桌子搬到了外面。

“您看可以认清——认清楚一个活人吗？”他问吉索尔。他们坐在一盏小灯前，灯光被逐渐充满夜空的浓雾吞没了。

吉索尔看了看他，心想：“假如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把意志强加于人，他对心理学就不会感兴趣。”

“一个女人吗？”他问。

“男女有什么关系？”

“想要认清一个女人，这就意味着有某种色情的因素……要认清一个女人，是不是？这向来是占有她或是报复她的一种方式……”

邻桌一个轻佻的少女对另一个说：“我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我跟你说吧，这个女人连我的狗都忌妒。”

“我想，”吉索尔接着说，“求助于精神，可能会弥补这种情况；对一个人的了解是一种消极的感情，事实上，积极的感情是对他所爱的东西永远陌生而产生的苦恼。”

“人们历来都爱吗？”

“时间有时能消除这种苦恼，只有时间能消除。人们永远不会了解一个人，但人们有时对这种不了解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我想到了我的儿子，不是吗，我也想到了……另一

个小伙子)。想不通过时间而靠聪明来了解，那是痴心妄想。”

“靠聪明也并不排除其他因素。”

吉索尔看着他：

“您说聪明是什么意思？”

“一般地说？”

“对。”

费拉尔思索了一会儿。

“有左右事情或人的办法。”

吉索尔淡淡地一笑。每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都总是看着他的脸色或凭对他的印象来回答他。可是费拉尔的眼睛却一下子亮了起来。

“您可知道，在最古老的帝国里，对一个触犯主人的女人应该给予她什么惩罚吗？”他问道。

“知道，不是有许多种吗？我想，最重要的是，切断她们的手腕子，剜出眼睛，把他们绑在一个木筏上，就让她们……”

吉索尔说着，发现费拉尔越听兴致越高，可能对他讲的很满意。

“……顺着奔流不息的江水漂流，一直到她们饿死或精疲力竭为止；而且要把她们的情夫同他们并排绑在同一个筏子上……”

“她们的情夫？”

说说这一类消遣事怎么会引起这样的注意，这样的目光？吉索尔想象不到，费拉尔的脑子里并没认为她们会有情

夫；但，他已经恢复了常态。

“最奇怪的是，”他接着说，“这些由圣贤们编制出来的残酷的法典，根据我们对他们私生活的了解，一直到四世纪，还似乎被看作是人道的，慈悲的……”

吉索尔看了看这张双目紧闭的尖锐的脸，因为小灯是从下往上照的，胡子上闪着亮光。远处传来了枪声。在夜雾朦胧中，有多少人的生命处在生死关头？他望着这张由于来自体内和精神深处的某种屈辱而绷得紧紧的臉，这张脸正用人类之恨的那种微乎其微的力量为屈辱进行辩解；两种之间的仇恨超过了它，好象流着的鲜血勾起了最早的陈怨旧恨似的，这些鲜血在已经浸透血迹的这块土地上继续流着。

又传来了枪声，这次离得很近，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都震得直响。

吉索尔对于每天来自华界的枪声已经习以为常了。尽管京曾经给他来过电话，但这枪声突然使他不安起来。他不晓得费拉尔能释放的政治能量究竟有多大，但这种能量只能为蒋介石效劳。他认为坐在他身旁是自然的（他从来不搞“折衷”，即使对自己也不），但他再也不想帮助费拉尔了。又传来枪声，这回比较远了。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不知道。蓝派的和红派的领袖们一起发表了一项重要的联合声明，看来问题有解决的意思。”

“他在撒谎，”吉索尔心里想，“他了解的情况起码不比我少。”

“红派也好，蓝派也罢，”费拉尔说，“苦力终究还是

苦力，除非他们死了。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而已，而有人竟能为一种思想去丢掉生命，您不觉得这是人世间那些笨蛋们的一种特有的愚蠢行为吗？”

“一个人很难承受住……怎么说呢？他自己命运的摆布……”

他想起了京的一种见解：人们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的那一切，远远超出了自身利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掌握这种命运，使它建立在尊严的基础上：对奴隶来说是为了基督教，对公民来说是为了国家，对工人来说是为了共产主义。但，他不想和费拉尔讨论京的一些见解。他又接着对费拉尔说：

“要永远处于中毒状态：这个国家有鸦片，穆斯林有大麻，西方有女人……可能西方人是用爱情来作为摆脱人的命运的主要手段……”

话语之间，一系列模模糊糊隐隐约约的脸面，象一股逆流似的在眼前闪过：陈和凶杀，柯拉毕克和癫狂，卡托夫和革命，梅和爱情，他自己和鸦片……在这些方面，他认为，只有京独自一人抵制。

“如果女人们能在垂直的位置上，听到她们所需要的那种要求她们上床时的恭维话，”费拉尔回答说，“那么，她们当中就很少有人躺下了。”

“有多少男人呢？”

“但男人能够而且应该否定女人：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证实生命的存在，才能满足白人的要求。如果有人跟我们谈到一个不作画的大画家，我们会怎么看呢？一个男人是他

的行动的总和，是他已经做的和可能做的事情的总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我的一生中，我不追求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天机良缘，我走我的路，我的……”

“但必须有路可走才行。”

自从最后几声枪响，吉索尔决心不再扮演辩护士的角色了。

“这路如果不是由您开辟，那么，就是由另外的人开辟。这就好象一个将军说：‘我和我的战士们可用机关枪一起扫平城市。’可是，假如他真的能扫平城市，他就不可能是将军了……况且男人对权力也许是无所谓的……知道吗，在这方面，迷惑他们的，不是实际的权力，而是对骨醉神糜的快乐的幻想。国王的权力是统治，对吧？然而，男人是不想统治的；正如您说过的，男人是想强制。生活在男人的世界里，他要超脱男人，要摆脱人类的命运，我曾这样跟您说过。他还不够强大，他要超凡的强大。这是空想病，空想病患者的权力欲只是精神上的东西，这是一种神的意志：每个男人都梦想成神。”

吉索尔说的这些话把费拉尔搞糊涂了，他本来就没有接受这些说法的思想准备。如果老头儿不解释清楚，费拉尔就再也不能从纠缠不清的问题中把自己解脱开来：

“依您的意思，那为什么诸神所统治的女性属民只以人和禽兽的形态出现呢？”

费拉尔站了起来。

“您需要把您自己的精华投入进去，以便比较强烈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吉索尔说，但并不去看他。

费拉尔没有猜想到，吉索尔的洞察力之所以那么敏锐，是因为他在与他谈话的对方身上能辨认出他本人生活的一些片断；费拉尔也没有猜想到，人们集中了最能表现他特点的实例，体现出他的微妙的精神面貌。

“神可以占有，”老头儿狡黠地一笑，继续说着，“但是它不能征服。一个神的理想是要变成人，不是吗？同时他也深知自己会重新获得权力；人的梦想是变成神，但又不丧失人格……”

费拉尔绝对需要找个女人睡觉。于是他告辞了。

“在色情方面，何谓奇特的受骗上当，”吉索尔想，“今天晚上似乎可以解释为一个浪漫的小资产者对色情的感受。”战事刚一结束，当他开始接触上海经济巨头的时候，他对于资本家的看法一点也不符合实际，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惊讶。那时几乎所有他碰到的人，都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而且差不多总是通过结婚这种形式来固定他们的感情生活的。当一个人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财产继承人的时候，他便冥思苦想如何成为巨商，这样他就很难适应分散的爱情生活。“现代资本主义，”他曾对他的学生们解释道：“与强权意志相比，它更热衷于组织意志……”

费拉尔在汽车里想，他和所有女人的关系，统统都是荒唐的。从前，他可能爱过人，只是从前而已。是哪个醉生梦死的心理学家的发明——竟把现在正给他生活带来烦恼的感情叫做爱情？爱情是一种亢奋不安的烦恼；女人们使他不得安宁，对——就好象怀有一种复仇的愿望似的。应该让女人们对

自己做出估量，而他，是不接受任何对他的估量的。欣赏他的女人是自我奉献，而未经他征服的女人却并非为他而生存。他只能投身于风骚女人和妓女中间去，有肉体可寻。幸亏有。假如没有……“一直到您进坟墓的那天，您也不会发现女人也是人……”在她看来，女人可能是人；他可不这样看。一个女人，竟然是人？女人是一次休息，女人是一趟旅游，女人是一种敌人……

他在路过南京路的一家妓院时，弄到了一个中国高等妓女。这个姑娘的脸蛋儿甜美温柔。在汽车里她坐在他身边，两只手乖乖地放在齐特拉琴上，她的姿态犹如唐代的一尊小型像。他们终于到了他的家。他在她前面爬上楼梯，平时迈的大长步子此时变得很沉重。“我们先睡觉去吧，”他想……睡觉，这是入静。他生活过，战斗过，创造过。透过这一切表面现象，在这一切的深处，他找到了这个唯一的现实，找到了这种自我陶醉的乐趣，找到了把每天都需再创造的生命——他的自身放在沙滩上的喜悦，就如同把溺水的同伴的躯体放在沙滩上的那种喜悦。“睡觉，这是我一向所盼望的唯一的一件事，的确，多年来就是这样……”

这个年轻女人穿着皮拖鞋跟在他的后边，登一步台阶响一下，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催眠作用呢？他们走进吸鸦片烟的房间：这房子很小，沙发床上铺着蒙古毯子，这里与其说是梦游虚幻之境，不如说是云雨淫荡之所。墙上挂着嘉麻早期的一幅很大的水墨画，一面西藏的军旗。女人把她的齐特拉琴放在了一张沙发床上。在烟具盘上放着古式玉把烟具，装饰得甚是好看，但并不实用，看来主人并不用它们。她伸手



去拿，但他用手势制止了她。从远处传来的一声枪响，把烟盘上的烟杆子震得抖动起来。

“您不想让我唱个歌吗？”

“现在不想。”

透过她穿的淡紫色的紧身绸衣，他瞧着她那半隐半露的身体。他知道她会感到奇怪的：跟一个高级妓女做爱，不让她唱歌、闲聊、把盏、准备烟枪，这是不合乎常规的。要不，他为什么不去找一般的娼妓呢？

“您不想吸鸦片烟吗？”

“不吸。你脱衣服吧！”

他想让她一丝不挂，可是她拒绝了。他只留了一盏床头小灯。“好色，”他心里想，“使他本人或他人丢脸，也可能使二者都丢脸。就是一个念头，这是非常明显的……”她穿着中国式的紧身衬衣，她这种装束是颇有刺激性的；但是，他冲动不起来，也可能只有靠等待他的这个温存顺从的肉体才能冲动起来，他却一动不动。只有当他处在别人的地位的时候——处在这个被强迫的而且是被他强迫的女人的地位的时候，他才能产生快感，这是很明显的。总之，他向来只是和他本人睡觉的时候，但只有在他并非孤独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做到这点。他现在才明白了吉索尔一直所怀疑的东西：对的，他的强权意志永远达不到目标，只有更换目标才能维持下去；但是，如果他一生只捞到一个女人，那么通过这个正等着和他交欢的中国女人，他已经捞到和将要捞到的他唯一渴望的东西就是：他自己。他需要用别人的眼睛才能看到自己，需要通过另一个女人的感官才能感觉到自己。他看

了看西藏的这幅画：在一片退了色的背景上，有一群流浪的游民，其中两个十分相象的骨瘦如柴的人发疯似的搂抱在一起。

他向那个女人走去。

十点半。

“但愿汽车再不要晚了，”陈想。他觉得在一团漆黑中来干，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成功的把握。那最后一批路灯马上就要关了。笼罩着中国稻田和沼泽地的悲凄的夜幕，降到了荒凉的大街上。雾城中，从半开着的百叶窗的缝隙和被遮掩的玻璃窗透出的模模糊糊的灯光，一个接一个地灭了；从潮湿的铁轨和电报局的绝缘体上映照过来的几道亮光，渐渐地暗淡下来。一眨眼工夫，陈只能在竖立着的写满镶金字的标语牌上看到点儿亮光了。这个雾色苍茫的夜晚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夜晚了，但他心满意足。他马上就要和汽车一起被炸掉，那球状的闪光将要把这丑恶的大街照亮一刹那，他的一腔热血将溅满街墙。中国一个最古老的传说使他折服：人类是大地的寄生虫。必须使恐怖主义变成神秘主义。首先，就要孤独，让恐怖分子独断独行；警察的全部力量来自告密，行凶者独自行动，是不会告发自己的。这是最后的孤独了，因为一个脱离尘世而生活的人，很难不去寻找自己的亲人。陈很了解人们反对恐怖主义，警察会采用法西斯手段对工人进行镇压，镇压之残酷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法西斯也会

更加猖厥。也许京和他不是在为同一类人着想，为了拯救他们这个阶级，问题不在于把被压榨的人当中的精华保留在该阶级中，而是使人意识到他们受压榨这个本来的事实：让每个人都以主人翁身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和仲裁者。给那些失望的人马上指出个方向，这就要多方面进行谋杀，但不要通过什么组织，而是要用这样一种思想去动员：使殉难者永生。说，他能写文章，会有人听他的，因为陈自己就要死了。他知道，为这个完整的思想抛头颅、洒热血，会对这个思想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凡是与他的果敢行动不相干的东西，都消失在夜色里了。而隐没在夜色背后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到了。轮船冒出的烟气形成的浓雾一点一点地在吞噬着大街深处的尚有人走的人行道，忙忙碌碌的行人一个接一个秩序井然地走着，很少有人赶到前边去，好象战争给这个城市下了一道强令似的。他们安安静静地往前走着，给他们的烦躁不安带来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都没带包裹，没背货筐，没推小车，就好象他们今天晚上的行动没有任何目的似的。陈看着所有这些黑影，都以一种莫名其妙地持续不断的动作无声无息地向江边流动着。是不是“天命”这个力量把他们推向大街深处的呢？那漆黑江边上的刚刚能分辨出来的招牌上亮着的弧形灯，不很象鬼门关吗？镶嵌在远景中的模糊的大字消失在这悲惨的天地中，好象消失在多少个世纪的烟云里一样。蒋介石的汽车上的军用喇叭，已经在远处行人稀少的马路上瓮耳欲聋地响起来了，它也一样，它的响声好象不是来自参谋部，而是来自菩萨时代。它庆幸地把炸弹紧紧地夹在腋下。浓雾中，只见汽车的灯光照射过来，几乎与

此同时，蒋介石的汽车由“福特”警卫车在前边开路，从雾中钻了出来；陈再一次感到汽车跑得太快了。三辆人力车突然把马路阻塞了，这两部汽车放慢了速度。他试图平息一下呼吸。阻塞已经排除了。“福特”车过去之后，接着另一辆开过来了：这是一辆美制大型汽车，两个警察站在两旁踏板上保镖。这部汽车使人望而生畏，陈感到，假如他不往前走，假如他只是等待，他会身不由己地躲开它。他象握牛奶瓶似地握住了炸弹的把柄。蒋介石的汽车只有五米远了——这是个庞然大物，他欣喜若狂地向它奔去，闭上眼，扑到了它上面……

几秒钟之后，他苏醒过来了：他既没感到也没听到所预料的骨头的折裂，他只觉得陷入了一个眼花缭乱的球体中。上衣已经没了。他的右手握着一块沾满泥水或血液的发动机防护罩片。在几米以外的地方，有一堆红色的残片，一块碎玻璃闪着最后一道光……别的什么他已经辨别不清了。他起码在醒过来一分钟之后才感觉到疼痛，他再也看不清楚了。然而，他觉得现场还是没人，难道警察们是怕再有第二颗炸弹？他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肌肉不疼，除了痛苦还是痛苦。有人向他走过来了，他想起来应该掏他的手枪。他试着去摸裤兜——兜没了，裤子没了，腿也没了。只剩下一堆烂肉。另一支手枪放在衬衣兜里，衣服扣子已经崩掉了。他抓住了枪筒，也不知道是怎么掉过个儿来的，本能地用大拇指扳动扳机。他终于睁开了眼睛，觉得天旋地转，在慢慢地转，不可抗拒地转，转着大圈儿，尽管如此，除了疼痛之外别的什么也都觉得不存在了。一个警察就在他身旁。陈很想

问问蒋介石死了没有；但他想到另一个世界去问。在这个世界上，即使蒋这样死了，对他来说也已是无关紧要的了。

警察使尽全身力气冲他肋下踹了一脚，把他翻了个个儿。陈吼叫起来，偶尔向前挪动挪动，而这一折腾，使他更感到无限痛苦。他就要昏厥过去或死过去了。他使出平生最骇人的力量，终于把手枪筒拉到了自己的嘴里。他预料到还可能第二次被折腾，他就不再动了。另一个警察用脚跟狠狠地踹了他一脚，使他全身的肌肉都抽搐起来；他开枪了，可是他已经感觉不到了。

## 第五部分

深夜十一点一刻。

汽车穿过薄雾，钻进了一条直通一家赌场的长长的砂石小路。“在去Black Cat之前，”柯拉毕克想，“上去看看还来得及。”他决意再会会京，想从京那儿得到一笔钱，因为这一次他不仅仅是通知京，也许还要搭救他。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京曾向他打听的情报：侦探们得知，蒋介石的特种部队预定十一点采取行动，所有的共产党委员会将被包围。只对他说明“反动派就要下手了”已远远不够，还必须对他明说“今晚不要到任何委员会去”。他没有忘记京将在十一点半以前离去。这么说，今天夜里共产党要开什么会议，蒋介石打算进行破坏。侦探们搞来的情报有时是假的，但这一次却十分巧合。京得到消息后可以推迟会议的召开，假如来不及的话，他可以不到会，“如果他付给我一百块美金，那我的钱数就相当可观了；一百块加上今天下午通过友好的然而同样是非法的渠道而获得的一百一十七块，总共就有二百一十七块了……但是，他有可能一个钱也不给，因为这一次没有武器可谈。首先让我们自己尽力设法摆脱困境好了。”汽车停了下来，身穿无尾常礼服的柯拉毕克给了司机两块美

金。光着脑袋的司机满脸堆笑地向他道了谢，因为这一趟本来只应付一块美金。

“小意思，你用它买顶圆顶小礼帽戴吧。”

他翘起食指，活象一位真理预言家：

“我是说圆顶小礼帽。”

司机开车走了。

“因为从形体观点来看——所有的才子佳人都讲究形体美，”柯拉毕克站在砾石小路中央继续说，“象他这样的人物需要戴一顶圆顶礼帽。”

汽车早已开走了，他只是在对夜空讲话；这夜空好象在回答他，湿漉漉的黄杨和卫矛的芳香气味从花园里阵阵飘来。这种苦涩的香味是欧洲特有的。男爵摸了摸右边的口袋，没有摸到钱夹子，却触到了手枪，原来钱夹子在左边口袋里。他瞅了瞅难于分辨的不见灯光的窗户。“让我们想想……”他知道自己只是想竭力拖延时间，因为这时赌博还没开始，逃走还为时不晚。“要是后天下雨，这儿可能还会有这种气味，可是我也许就死了……死？我说什么？我简直疯了！没说的：我是永远不会死的。”他还是进去了，上了二层楼。筹码的响声和收付钱的人的喊叫声随同层层烟云时起时伏。仆人们都睡着了；但秘密警察局的俄国侦探们却没有睡觉，他们把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右边口袋里藏的是左轮手枪，所以有些下坠）。有的背靠在门框上，有的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柯拉毕克来到大客厅，客厅里烟雾腾腾，墙壁的岩状砌面隐隐约约地闪烁着，无尾常礼服构成的黑色斑点和肩膀构成的白色斑点，相互交错地向绿色的桌面上倾俯。

“喂，托托！”几个人喊了起来。

男爵在上海经常被人称为“托托”。然而他只是偶尔陪朋友才到这地方来，他不算是赌客。他张开双臂，摆出一副与儿女欢聚一堂的慈父的样子：

“好哇！能参加这样一次小型的家庭式的聚会，我太激动了……”

可此时庄家又把圆球掷了出去，人们也就不再注意柯拉毕克了。他在这儿已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这些人不能分心，他们面部呆滞，目光都毫无例外地集中到那个圆球上了。

他身上有一百一十七块美元。赌号码太危险。他事先就选好了：赌偶数和奇数。

“来几个讨人喜欢的小筹码。”他对庄家说。

“押多少？”

“二十。”

他决定每次押一个筹码，总押偶数。他至少应该赢三百美金。

他下了赌注。圆球停在5上，他输了。些许小事，不足为虑。他又下了赌注，而且押的依然是偶数。2：赢了。再来，7：输了。接着是9：输了。4：赢了。3：输了。7和1：输了。他输掉了八十块。只剩下一个筹码了。

他下了最后一次赌注。

他用右手押上了赌注；他不再用左手了，好象这个静止不动的圆球已将这只与其相连接的手固定住了似的。然而，这只手却把他引回到他自己的身上。他猛地想起：使他心绪不宁的并不是这只手，而是戴在手腕上的手表。十一点二十



五分了。要到京那儿去，只剩下五分钟了。

在下倒数第二次赌注时，他满以为自己会赢；即便输，也不应输得那么快。看来他对于头一次失败没有给予重视是错误的。那肯定是个不祥之兆。但是，最后一次赌注一般总是会赢的；而且，刚才曾连续出现过三次奇数。可是，他来以后，奇数出现的次数比偶数多，因为他输了……改换一下，押奇数？但是，现在有某种东西促使他要盲从，要忍受：他好象就是为此而来的。他的一举一动本来就是一种渎圣行为。最后他还是把赌注下在了偶数上。

庄家再次把圆球掷了出去。它象往常一样，缓缓地滚动着，好象有些踌躇。从一开始，柯拉毕克既没看到红颜色，也没看到黑颜色出现。这些小格格现在最有运气了，圆球在继续滚动。为什么当初不赌红色呢？圆球转得慢了，停在2上。赢了。

应该把四十块美金转押到7上，来赌一个号码。显而易见，从此他应该放弃轮盘边上的那些小格格<sup>①</sup>了。于是，他押上了两个筹码，赢了。当庄家把十四个筹码推给他的时候，当他触摸到它们的时候，他惊愕地发现自己是能赢的：这绝不是幻想，也绝不是，虚无飘渺地赌彩票没有把握中彩。他突然觉得庄家欠他的钱，这并不是由于他把赌注下在了该赢的号码上，也不是由于起先他输过，而是由于长期以来，他思想上一直反复无常、放荡不羁的缘故；在他看来，这个圆球正在为他碰运气，借以偿还命中注定的全部债务。

---

① 押轮盘边上的那些号码，赢则不会大赢，输则不会大输。

然而，假如重新赌一个号码，那他很可能会输掉。他把二百块美金押在奇数上，结果又输了。

他气愤极了，离开了桌子，走到窗前。

窗外一片漆黑。汽车的尾灯在树下闪着红光。尽管隔着玻璃，他仍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笑语喧哗。突然，他听到一句话，从语气上判断，是一句气话。情感……所有这些在薄雾中行走的人，他们过的生活已愚蠢、松弛到什么地步了呢？连他们的影子都看不见，只能听到他们在黑暗中说话的声音。血液就是从这间大厅里倾注到生命中的。不会赌博的男人算不上男子汉。难道他的全部经历只能算做是长时间的精神错乱吗？他再次回到桌子旁边。

他又把六十美金的赌注押到了偶数上。这只即将减速的圆球是一种命运，首先是他的命运。他并不反对某种造物，而是反对某种神；而这种神同时也就是他本人。圆球又开始转动了。

顷刻间，他又处于一种他所寻求的盲目惊慌的状态：他好象重又抓住自己的生命，把它悬系在这只嘲弄人的圆球上了。多亏了这只球，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同时满足了构成他本人的两个柯拉毕克的要求，一个柯拉毕克想活下去，一个柯拉毕克想把自己毁掉。为什么要看表呢？他把表抛到一个梦幻世界中去了；他好象不再是用赌注，而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见不到表，也就失去了重新弄到钱的一切机会——和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维持着这个圆球的旋转；然而那另一个人对此却一无所知，这就赋予这个曲线变得越来越缓和的圆球以活力，赋予日月星辰相合的活力，赋予致人死命的疾病的活

力，赋予人们认为悬系着他们命运的一切东西的活力。这只圆球在那些如同动物嘴巴的小洞洞边缘上徘徊着，而他则通过这只圆球紧紧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是他所找到的自己克制自己的唯一方法，这样说来，这只圆球同金钱又有什么相干！赌赢了，也不再是为了溜走，而是为了留下，为了冒更大的风险，为了让已经获得自由的赌注使他的举动变得更加荒唐！他把头靠在前臂上，甚至连转得越来越缓慢的圆球也不去看，小腿及肩部肌肉在一个劲地颤抖，这时他才发现赌博的真正含义，输钱的狂热。

圆球停在 5 上。

几乎所有的人都赌输了；烟雾笼罩着这个充满忧伤松弛气氛、充满小耙子收拢筹码声音的大厅。柯拉毕克知道自己还没有输光。为什么还要留下十七块美金呢？他把十块美金的票子掏出来重新押在偶数上。

他是那么肯定自己要输，故此没有倾囊押赌注——颇象是为了使输的感觉拖的时间更长一点。当圆球刚刚开始晃悠的时候，他的右手就跟在它的后面，左手仍然一动不动地放在桌子上。他现在才知道，赌具具有强烈的生命力：这个圆球跟其他球——那些不用来赌博的球不同，它运转时游移不定的本身就说明它富有活力，这种不可阻挡而又无精打采的运转就这样颤抖着，因为不少人的生命都与之紧密相关。在圆球转悠的时候，没有一个赌客去吸那已经点燃的香烟。圆球滑进了一个红色的小格格，接着又转了出来。它继续转悠着，最后钻到了标号 9 这个小格格里了。柯拉毕克用他那只放在桌上的左手做了一个别人难以察觉的动作：想把它抓

出来。他又一次输了。

他把五块美金押到了偶数上，又是最后的一个赌注。

掷出去的圆球绕着大圆圈，转得还不算快。然而，手表却在转移柯拉毕克的视线。他没把手表戴在手腕的外侧，而是戴在了内侧号脉的位置。于是，他把手平放在桌子上，这样他看到的就只是圆球了。他发觉赌博是一种慢性自杀：只须把钱放在那儿，瞧着这个圆球，等待着，如同吃了毒药之后那种等待一样；毒药在不断地更换，吃了还令人感到自豪。圆球停在4上。赢了。

这次赢，他无动于衷。然而，输了呢……他又赢了一次，输了一次。这样一来，他又有了四十块美金，可是他还想重新体验一下押最后一个赌注时那种慌乱不安的心情。赌注都集中押在很久都没出现过的红颜色上。这个小格格上几乎聚集着所有赌客的目光，当然也吸引着他；如果离开偶数，对他来说也就意味着放弃战斗。他保留了偶数，押上了那四十块美金。从未有过哪个赌注的分量能与这种赌注相比。京也许还没走，再过十分钟，他肯定就碰不上他了。现在兴许还能见到他。现在，现在他在赌他最后的几个钱，在赌他自己的生命和另一个人的生命，尤其是在赌另一个人的生命。他知道自己正在出卖京，正是京被拴在了这只圆球上，拴在了这张桌子上。而他，柯拉毕克，则是这只主宰着大家、也主宰着他自己的圆球——可此时他在盯着它，好象他从未这样生活过似的，被一种奇耻大辱弄得精疲力竭，完全丧失了自制的能力。

一点钟的时候，他走了出来：“俱乐部”关门了。他还

剩下二十四块美金，户外的空气犹如大森林中的空气一样使他的心绪平静下来。夜雾比十一点钟的时候稀薄多了。也许还下过雨，因为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尽管在夜里他看不见黄杨，也看不见卫矛，但他却能通过它们苦涩的气味猜测出它们那深暗的枝叶。他想：“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常说，赌徒所以要赌，是希望赢；这正如人们所说的：男人们所以进行决斗，是因为他们都想成为击剑冠军……”但是，夜晚的宁静好象已把人间的一切焦虑和痛苦连同夜雾一起驱散了。不过远处仍有阵阵射击声。“又开始枪毙人了……”

他离开花园，向前走去，尽量不去想京。树木已经稀疏了。突然，透过尚未散尽的薄雾，在万物的表面，显露出一片昏暗的月光。柯拉毕克举目仰望，发现这月光刚刚从被静止不动的乌云所切割的沙岸那边钻了出来，并逐渐地扩展到一个巨大、阴暗而透明的如同底部嵌满星斗的湖泊似的洞穴之中。越来越明朗的月光使所有那些门户紧闭的房屋，使完全处于被遗弃状态的城池都披上了一层世外桃源的生活色彩，仿佛月球上的气氛随同其光亮一起降临到这突然沉静下来的环境之中似的。然而，在这死气沉沉的天体背景的后面，还是有人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酣睡，而梦中那令人不安的生活却与这座被吞噬的城池的被遗弃状态协调一致，仿佛也曾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生活似的。“在《一千零一夜》里就有一些小城市，那里贪睡的人比比皆是，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小城市同它们的清真寺一起被遗弃在月球下面，那是一些沉睡的——人迹罕至的——城市……尽管如此，我可能还会死去。”在这如此缺乏人情味的气氛中，他觉得自己是个不速

之客，死亡，他本人的死亡，也显得不太真实。而那些尚未睡觉的人呢？“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自寻烦恼（多美的词儿呀！），有的在谈情说爱。”未来的生活在这寂静的背后微微地颤抖。狂热的人类，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从自身中解脱出来！华界里死尸的臭味随着重新刮起来的风吹了过来。柯拉毕克只得吃力地呼吸着；焦虑不安又袭上他的心头。对他来说，想着死亡倒比嗅这种尸体的气味更为容易些。这气味逐渐充满了这个将人间的荒唐事都隐藏在一种永恒的静谧之中的空间。风一直在无声无息地吹着，月光已移到对面的沙岸上，万物又堕入了黑暗的深渊。“犹如梦境一般……”然而，极其难闻的气味重新把他抛到生活里来了，抛到惶恐不安的夜晚中来了——刚才还模糊不清的路灯，在被雨水洗去脚印的人行道上勾画出一个个摇曳不定的巨大圆圈。

到哪儿去呢？他踌躇起来。即使他想去睡觉，也无法把京忘掉。这时他正走在一条布满酒吧间的街道上，这些挂着沿海诸国文字招牌的小酒吧间，实际上是些小妓院。他走进第一家酒吧间。

他靠玻璃窗坐了下来。三个女招待——一个混血儿，两个白种人——正跟客人们坐着，其中一位客人准备要走。柯拉毕克等候着，眼睛朝窗外望去。窗外什么也没有。一个水手也不见。从远处传来一阵枪声。壮的金发女招待脱身之后，刚刚坐到鲁宾斯<sup>①</sup>的画儿，”他想，“可又不

---

①② 鲁宾斯和乔丹斯均为比利时伊



的。”

“你也是北方人？”

他给了她一盒，没有答话。碰上一个老乡，又得到这样的馈赠，她心里十分感激他。

“对我来说，这仍然太贵了……不过这一盒倒花不了我多少钱。今天夜里我就吃。”

“你不喜欢抽吗？”

“这么说你以为我有烟枪罗？你想到哪儿去了？”

她苦笑了一下，可是依然很高兴。不过，她又习惯性地怀疑起来。

“你为什么要把给我这个？”

“这你别管……我高兴这样做。我也曾是‘帮’<sup>①</sup>里的人……”

其实，他不象是嫖客，也肯定早就不是“帮”里的人了（有时他需要编造一些完整的传记，不过他很少这样做）。她在长凳上向柯拉毕克靠拢过来。

“我只是请你乖一点，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女人睡觉了……”

“为什么这么说？”

她智力迟钝，但并不愚蠢。

“你愿意杀？”

他并不是第一个说这种话的人。她把柯拉毕克放在桌子上的手挪到自己手里亲吻着，动作笨拙又近于母性。

① Le milieu：在法国该指妓女、走私谋生的流氓帮。



“遗憾……”

“那么，你想上楼？”

她曾听说过，男人们临死前有时会有这种欲望。可是她不敢第一个起身，她认为这样会促使他更快地去自杀。她仍然把他那只手捧在自己的手里。他双腿交叉，就象一只怕冷的昆虫似的双臂紧贴着身子，头朝前伸着，萎靡不振地坐在长凳上。虽然他们两人的身体贴在一起，但他却象是在远处看她。尽管没喝什么，他却被这谎言，被这热情，被他编造的虚幻世界所陶醉。他说他要自杀的时候，他自己并不相信；她既然信以为真，他也就进入了一个真理不复存在的世界。这既不真，也不假，而是实际经验。既然他刚刚胡编的经历不存在，既然体现他与这个女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假定是十分亲昵的动作也不存在，那就什么也不存在了。世俗生活对他已不再有任何压力。解脱之后，他仅仅生活在他刚刚创造出来的传奇式的世界里，在那里，他依赖的是由人类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一切同情心所建立的关系。陶醉的感觉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他的手都哆嗦起来了。那女人已有所觉察，还以为由于心情焦虑引起的：

“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没法挽回了。”

放在桌角上的帽子好象在用讥讽的目光瞅着他。他轻轻一弹就把它弹到长凳上了。

“是爱情纠纷吗？”她又问道。

远处响起了一阵枪声。“仿佛今晚要死的人还不够多似的！”她想。

他站起身来，没予回答。她以为是自己的问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尽管好奇，她还是想请他原谅，可是又没有胆量。她也站了起来，两人一起上楼去了。

当他出来时——他没有回头，但却知道她正隔着玻璃窗目送着他——不论精神上还是性欲方面，他都没有得到满足。又下雾了。他往前走了一刻钟之后（夜晚的新鲜空气并没使他平静下来），在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酒吧间前停住了脚步。酒吧间的窗户上不是毛玻璃。在远离顾客的地方，一个棕色头发、大眼睛、身材瘦削的女人，双手象保护乳房似的放在胸前，正望着夜景出神。柯拉毕克呆呆地看着她。“我就象那些不晓得一个新的情夫到底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的妇女一样……干脆去和这个女人一起自尽算了。”

### 深夜十一点三十分。

在Black Cat夜总会的一片嘈杂声中，京和梅一直在等候着。

只剩最后五分钟了。已经是该走的时候了，柯拉毕克还没有来，京有些奇怪（他为柯拉毕克凑了差不多二百块美金），但还没十分奇怪到极端的程度，因为柯拉毕克每次干这类事儿，都跟他的性格特点十分吻合，那些了解他的人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意外罢了。京起初把他看成是一个有趣的怪僻人，但对他通知自己这一点表示感谢；后来逐渐地对他产生了真正的好感。可是，眼下京对男爵向他提供的情报

已开始有所怀疑了，这次失约就更使他疑云难消。

狐步舞还没结束，但是刚刚进来的一名蒋介石的军官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成双成对的舞伴们停下舞步，纷纷向这位军官走去。京虽然什么也没听见，但他猜得出这肯定是与一桩非同小可的事件有关。这时梅已向人群走去：在Black Cat，女人干什么都会引起怀疑，因而她也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她很快就回来了。

“一枚炸弹扔在了蒋介石的汽车上，”她低声对他说，“但蒋介石没在汽车里。”

“凶手呢？”京问。

她又返回到人群里，等她再次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人，执意要跟她跳舞，但一见她不是独自一个人，也就作罢了。

“跑了，”她说。

“祝福他……”

京知道这些情报往往是不那么准确的。即便如此，蒋介石被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如此重大的死亡消息，这位军官是不会不知道的。“到军委会准能知道，”京说，“我们说去就去。”

他热切地希望陈能够逃脱，并对此深信不疑。蒋介石目前还在上海也好，已去南京也罢，未遂的行刺都使军委会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还能指望它解决什么问题呢？今天下午，他已把柯拉毕克的断言向一个持怀疑态度或者说顽固持怀疑态度的中央委员会做了转达。这一暴力行动已充分证实了京的论断，因此他想亲自去证实一下的作法已失去了

应有的价值。况且，这个委员会玩弄联合的把戏，而不去进行斗争。就在几天以前，红派的政治领导人和蓝派的一个头头还都在上海发表过感人肺腑的讲话。在汉口，民众夺取日本租界的失败已经表明红派在中原地区已处于瘫痪状态；满洲的军队正向汉口进发，因此，汉口在对付蒋介石的军队之前必须先同满洲的军队作战……京在夜雾里走着，梅在他的身旁，两人都沉默不语。假如共产党人今晚必须投入战斗，那他们只能勉强自卫。不管他们最后一批武器交没交出去，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有分歧的情况下，他们怎能以一对十，对付一支由资产阶级志愿兵组成的、既拥有欧式武器装备又具有进攻优势的部队呢？上个月，全城都拥护革命联军；因独裁者曾代表外国的利益，所以全城一致排外；庞大的小资产阶级是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军队这一次就在那儿，并没有向南京逃窜，具有很大的威胁性；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来说，蒋介石不是“二月惨案”的刽子手，而是一位民族英雄。上个月，大家都反对警察；而今天，共产党人却反开军队了。这个城市将取中立态度，更确切地说，对蒋介石将军有利。他们勉强能防卫工人区；闸北，可能吗？其他地方呢？……如果是柯拉毕克搞错了，如果反动派的行动再推迟一个月，那么，军事委员会，京和卡托夫一定能把二十万人组织起来。由坚定的共产党人新组成的突击队掌握着所有的“联合会”；但是，为了创建一个能够调动群众的精干的组织，至少还需一个月的时间。

这样一来，武器的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关键不在于缴获两千支还是三千支枪，而是在蒋介石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应

知道如何去武装群众。照这样争论下去，人们终将被解除武装。中央委员会深知托洛茨基分子攻击它与国民党联合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委员会不管怎样要求武器，中央委员会都会感到惊恐不安，因为持这种态度也可能与俄国反对派有联系。

尚未消散的夜雾迫使京在人行道上行走，以免被汽车撞着。已经看到军事委员会所在房屋那昏暗的灯光了。由于天黑雾大，他只好打亮打火机看时间。已经晚了几分钟了，他决意加快脚步，于是挎起梅的胳膊。梅温顺地靠在他的身上。向前走了几步之后，他感觉到梅的体内有打嗝声，一下子瘫软了。“梅！”京踉跄了一下，趴在了地上。就在他想重新爬起来的时候，颈背上遭到橡皮棍狠命的一击，他直挺挺地再次向前扑倒在梅的身上。

从一所房子里走出来三名侦探同刚才下手的那个人会合了。一辆空汽车停在不太远的地方。他们把京拽进汽车里，等车子开动之后，他们才动手将京捆绑了起来。

当梅苏醒过来时（京原来把橡皮棍在她肋下的一击当成打嗝了），一队蒋介石的士兵正把守着军委会的大门。因为有雾，她走近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她又朝原来的方向走去（她呼吸困难，挨打的地方疼痛难忍），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吉索尔家中。

午夜。

海默里希一听说有人向蒋介石扔了颗炸弹，就到处去打听消息。有人告诉他将军已被炸死，凶手在逃。但在引擎盖已炸飞的翻倒的汽车前面，他却看到陈的尸体横在人行道上：只见他身材矮小，血迹斑斑，浑身上下已被雾气打得湿漉漉的。一名士兵坐守在旁边。他还得知将军当时并不在汽车里。他荒唐地认为拒绝让陈在他那儿躲避是陈死亡的原因之一。他跑到共产党区委会，在那儿他感到心灰意冷，徒劳无益地就这起谋杀案争论了一个小时。一位同志走了进来。

“闸北纱厂厂主联合会刚刚被蒋介石的士兵查封了。”

“同志们没有反抗吗？”

“凡是反抗的都立即枪毙了。在闸北，还枪毙活动分子，或放火烧他们的房子……市政府刚刚被解散。所有的联合会都被查封。”

中央委员会还没有下达指示。已婚的同志们很快跑了回去，疏散他们的老婆孩子。

海默里希刚一出来，就听到了一阵一阵的枪声。他有被认出的危险，但无论如何也得把孩子和老婆带走。两辆装甲汽车和许多满载着蒋介石士兵的卡车在雾霭中从他面前通过。远处枪声持续不断；近处也有枪声。

“双共和国”大街上没有士兵，由他的店铺构成拐角的那条街上也没有士兵。没有了，再也没有士兵了。店门开着。他跑进去一看，地上到处都是散乱在大摊大摊血泊中的唱片碎块。店铺象战壕一般被手榴弹“扫荡”了。妻子瘫倒在柜台下边，就象蹲着似的，胸前血肉模糊一片。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只孩子的胳膊，那只如此孤零零的手显得更小

了。“但愿他们都已死去！”海默里希想。他特别害怕经历别人临终前的场面，那场面甚至比这些血迹斑斑、布满唱片碎片的货架子还让他胆寒；这一次也象往常一样，他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忍着内心的痛苦。隔着鞋底，他感到地上粘糊糊的。“他们的血。”他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一个劲儿地看啊，看啊……他终于在门旁发现了被房门挡着的孩子的躯体。远处响起了两颗手榴弹的爆炸声。满屋子的血污所散发出的腥气味迫使海默里希几乎不敢呼吸。“顾不上掩埋他们了……”他锁上房门，站在门前。“如果有人来，或是有人认出我来，我也就完了。”但是他却怎么也拔不动腿。

他知道自己很痛苦，但是一种冷漠的光轮——继各种疾病和头上挨打之后产生的那种冷漠的光轮正环绕着他的痛苦。以往他从未有过什么痛苦，总而言之，这一次命运给他的打击比任何一次都要大。他对死并不感到惊愕，因为死了比活着还省心。唯一使他心慌意乱的，就是他想到了在这扇门的里面，痛苦和血液是一样的多。然而这一次，命运不灵了，它剥夺了他至今所拥有的一切，但同时也使他变成了一个毫无牵挂的人。他再次进到屋里，关上了房门。尽管情绪颓唐，尽管脖子根儿因被棒击而一阵阵的疼痛，尽管双肩软弱无力，然而他却不能把解脱之后那难以控制的、深沉的、发自内心的快乐从自己的注意力中驱散。他既恐惧又心满意足，感到这种快乐象一条地下长河似的在他身上咆哮翻滚起来。尸体就在眼前，他那附着在地上的双脚已被他们的血液粘住了，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杀害更为卑劣的了，杀害一

个病孩子尤为卑劣。在他看来，孩子比他妻子更无辜。现在他自己也可以去杀人了。他突然发现，生活并不是人类进行交往的唯一方式，而且不是最好的方式。他还发现，他在复仇之际比他在生活之中更能了解他们，更能喜爱他们，更能赢得他们。他再一次感到自己的鞋底被粘住了，自己的身子晃悠起来：肌肉本身是不受思想支配的。但是一种亢奋的激情扰乱了他的思想，这是他平生感觉最强烈的一次；他整个身心都陷入了这种可怕的陶醉之中。“人可以有人人的嗜好，嗜好，他妈的！”他用拳头敲着柜台重复说道——大概是在诅咒天地万物吧……他立即把手抽了回来，喉咙哽噎，几乎抽噎起来，原来柜台上也是斑斑血迹。他瞅着手上已经变成褐色的血迹，这只手象是歇斯底里发作，不停地哆嗦着，小块小块的血嘎巴儿从上面脱落下来。大笑也好，哭泣也罢，总而言之，必须摆脱这种胸腔气闷和绞痛的状况……什么都一动不动，人世间那种无限冷漠的气氛随同静止不动的灯光，包围着唱片、尸体和血泊。“用烧红的钳烙刑具截断犯人的肢体”——这句话在他的脑海里上下翻腾。从迈进了学校的大门，他对这句话就不再那么熟悉了；但是他从这句含义模糊的话里意识到，他该走了，他也该脱身了。

最后，不知怎么，他竟可以离开这儿了。他走出了家门，带着充满无数仇恨漩涡的难以忍受的欣快感开始向前走着。他刚走了三十米远便停了下来。“门我还给他们敞着呢。”于是他又返身往回走。离房门越近，他就越发感到呜咽正在喉咙下面的胸腔里酝酿、形成并滞留在那里。他闭上眼睛，带上房门。门锁响了，房门锁上了。他重又走开了。



“这并不算完，”他边走边低声抱怨，“这刚刚开始。这刚刚开始……”他活象个拉纤的，身子向前探着，用肩膀和大脑拖着他的死难者们的全部重量——终于，他们不再妨碍他前进了——朝着一个渺茫的地方走去，在那里，他只知道人们正在进行杀戮。

他双手颤抖，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在他那可怕的自由感的驱使之下，十分钟便来到了队部。这是一栋只有两层的楼房。窗户后面，肯定都挂着垫子。虽然没有百叶窗，在夜雾中也看不到发亮的长方形，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垂直的光带。近于一条弄堂似的街道，死一般的寂静，光带在那里变得燃点低而光度强。他按了按门铃。门微微打开了，里面的人都认识他。门后四名活动分子，手持毛瑟枪，目送他走了进去。宽敞的走廊好象一个昆虫世界，弥漫着一种意识模糊而动作明确的生活气息：一切都来自地下室；楼上死气沉沉。孤单单的两个工人在楼梯顶上架了一挺机关枪，控制着整个走廊。纵然这挺机关枪并不闪光，但它却象教堂里的圣体龛一样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一些大学生和工人来来回回地奔跑着。他从几捆铁蒺藜（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呢？）前面走了过去，上楼以后，绕过机关枪，来到楼梯的平台上。卡托夫正从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用疑惑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他一言不发，伸出了那只血迹斑斑的手。

“受伤了？下面有敷料。小家伙藏起来了吗？”

海默里希说不出话来。他呆呆地、执拗地伸着手。“这是他们的血”，他想。但话又不能这么说。

“我有把刀子，”他终于开口说道。“给我支枪。”

“枪不多了。”

“给几颗手榴弹。”

卡托夫犹豫不决。

“你以为我会胆怯吗，蠢家伙！”

“到楼下去，手榴弹箱子里有。不多了……你知道京在哪儿吗？”

“没看见。我看到陈了，他死了。”

“这我知道。”

海默里希来到楼下。这里有几个同志正把双臂深深地插在一个打开的箱子里翻寻着。这么说，弹药眼看就要用完了。乱哄哄的人们在灯下来来回回地忙碌着——这里没有气窗。在看到一些人影晃动之后，又在箱子周围遇到了这些膀大腰圆的躯体，他感到十分惊奇，仿佛这些人在死亡面前突然有权过一种比其他人更为紧张的生活似的。他装满了口袋之后又上楼了。其他的人，那些影子，架好了机关枪，在门后拉上了铁蒺藜。铁蒺藜放得离门稍远一点，这样还可以把门打开，因为门铃不时地响着。他透过窥视孔向外看了一下，浓雾笼罩着的街道上依然鸦雀无声，空空如也。同志们是从屋顶投射下来的阴影里赶到这儿来的，他们的身影在雾镜中如同鱼儿在浑浊的水流中一样模糊不清。他转身回去找卡托夫。这时，两下急促的铃声，一声枪响和一种窒息的声音同时传进耳朵，紧接着是一个躯体倒地的声音。

“瞧，他们来了！”在门口守卫的人当中，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道。走廊里沉寂下来，但这沉寂却被来自地下室的说话声和武器的撞击声慢慢地打破了。所有的人都已进入

各自的战斗岗位。

凌晨一点半。

柯拉毕克在他住的那家中国旅馆的走廊里走着，象一些人想醒酒一样，他想从谎言中解脱出来。旅馆的一些男仆趴在信号牌下面的一张圆桌上，正围着痰盂嗑着葵花籽。他晓得自己睡不着觉。他忧郁地打开房门，把上衣扔在他所熟悉的一本《霍夫曼<sup>①</sup>短篇小说集》上，自斟了一杯威士忌。这房间里的东西似乎有些变样了。他竭力不去想它，但某些物品不翼而飞，这委实令人不安。他终于逃脱了人们所赖以生存的一切：爱情，家庭，工作等；但却未能摆脱恐惧。这时，一种恐惧感骤然袭上他的心头，如同他已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一般。为了驱散这种恐惧感，平时他总是跑到邻近的Black-Cat去。但今天夜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谎言和一时的友情已使他恼火、讨厌了……他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于是朝镜子走去：

“不过，亲爱的，”他冲着镜子里的柯拉毕克说，“其实有什么必要溜呢？这一切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你有过老婆；噢，算了！算了！有过情妇，有过钱；当你需要用幻想来嘲弄你自己的时候，你总是可以想想这一切的。没说的！正如人们所说，你有天赋，你富于幻想，你具有当一个门客

<sup>①</sup> 恩斯特·特奥尔多·阿马迪乌斯·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1776—1822），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

的一切品质：当你年富力强的时候，你总可以在费拉尔那里当个贴身仆人。还有绅士流浪汉的职业，也有警察和自杀。做靠妓女生活的权杆儿？依然是一场荣华富贵的黄粱梦。我对你说，只有自杀了。可是你又不想死。你不想死，小坏蛋！然而，你还是看看吧，看看你长着一副多么漂亮的嘴脸，你这副嘴脸跟死人的没什么两样……”

他又向前靠了靠，鼻子几乎碰到镜子上。他龇牙咧嘴，做了一个檐槽喷口上所饰的那种奇兽的怪相，变换了的脸谱似乎在回答他说：

“不是每个人都会死的吧？当然不是，必须创造一个世界。啊，你死后必定会升天堂的。难道仁慈的上帝会与你这号人相伴不成……”

他变换了面部表情，嘴唇紧闭，嘴角向下巴方向牵动，眼睛眯缝着，活象个滑稽可笑的武士。刹那间，话语都不足以表达的焦虑好象自己已经强有力地直接表现了出来。他做起鬼脸来了，他扮做猴子、白痴、恐惧病患者、牙龈肿瘤患者，总之人的一张面孔所能表现出来的一切奇形怪态他都装扮过。这还不够，他还用手扯眼角，把嘴巴扒成笑面人那种癞蛤蟆嘴，揪耳朵。在这夜雾笼罩窗口的僻静房间里，竟然肆无忌惮地大出洋相，真是荒唐之至。他听到了自己的笑声——只有一个音调，跟他母亲的完全一样；当他突然看清了自己面孔的时候，不禁向后一退，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扶手椅上有一叠白纸和一支铅笔。他自己为自己写道：

“你终将成为国王，我的‘托托’。作为一个国王，暖暖和和地呆在一个舒舒服服的疯人院里，这多亏了你唯一的朋

友——震颤性谵妄，如果你继续喝下去的话。然而，此时此刻你到底醉没醉呢？……你把那么多的事情都想象得如此美好，那你为什么就不认为你自己已经很幸福了呢？你认为……”

有人敲门。

他蓦地坠回到现实中来了。他虽已解脱，但依然目瞪口呆。门再次敲了起来。

“请进。”

毛料大衣，黑毡帽，白头发：是吉索尔。

“可是，我……我……，”柯拉毕克结结巴巴地说。

“京刚刚被捕了，”吉索尔说。“你认识柯尼希，是不是？”

“我……可是，我一点责任也没有啊……”

“但愿他没有喝得烂醉，”吉索尔想。接着，他又问道：

“您认识柯尼希吗？”

“是啊，我，我……认识他。我帮过……他的忙，帮过他大忙。”

“那你能让他帮一次忙吗？”

“为什么不能？可是，是什么样的忙呢？”

“作为蒋介石的保安长官，柯尼希能够让京恢复自由。或者，起码不要枪毙他；这是燃眉之急，对不……”

“那好……那好吧……”

然而，他对柯尼希是否会知恩报恩表示十分怀疑，因此，他认为去见柯尼希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也许是不谨慎

的，即使是在克皮莱夫斯基指出之后这样做。他坐到床上，脑袋耷拉着。他不敢开口说话。吉索尔说话的口气表明，他一点也不怀疑柯拉毕克对京的被捕负有什么责任，柯拉毕克下午来给京送过信儿，所以吉索尔把他看成是朋友，并没有把他当做失约去赌博的人。但柯拉毕克本人却不能以此来说服自己。他不敢看吉索尔，他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吉索尔感到纳闷，不知他到底发生过什么悲剧、做过什么荒唐事，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出现正是他气喘吁吁的原因之一。在柯拉毕克看来，吉索尔是在指控他，他说：

“您知道，亲爱的，我还没有……总而言之，还没有疯到那种程度；我，我……”

他没有办法不结巴，他有时认为吉索尔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人。但有时又认为吉索尔是个滑稽可笑的人。老人默不作声地瞧着他。

“我……您认为我怎么样？”

吉索尔没心思跟他聊天，倒想抓住他的膀子把他带到柯尼希那里去。可是，吉索尔认为他所以如此烦乱不安，是因为他喝醉了酒，这样一来，自己不敢不过问。

“有些人需要写作，有些人需要幻想，有些人需要说话……反正都一样。戏剧不庄重，斗牛才庄重，小说不庄重，谎语癖才庄重。”

柯拉毕克站起来。

“您胳膊疼吗？”吉索尔问。

“有些酸疼。没说的……”

柯拉毕克笨拙地翻转了一下胳膊，为的是不让吉索尔瞅

见他的手表，好象在赌场曾给他指示过时间的这块表出卖了他似的。

“您什么时候去见柯尼希？”

“明天上午怎么样？”

“为什么不现在去呢？警察局夜间是不睡觉的，”吉索尔忧伤地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柯拉毕克真是求之不得，倒不是由于内疚——如再赌起来，他仍会在赌场里再次呆下去的——而是为了补偿。

“那我们快走吧，亲爱的……”

柯拉毕克刚才进来时就发现房间里变样了，现在，这种变化再一次使他不安起来。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为自己没能尽早地发现这一变化而感到惊愕：他的一幅道家肖像画“梦幻图”以及两尊最漂亮的塑像不翼而飞了。只见桌子上有一封信，是克皮莱夫斯基的笔迹。这是他的推测。但他不敢相信，因为克皮莱夫斯基事先曾告诉过他京有危险：倘若他不慎谈到克皮莱夫斯基，那他也许会情不自禁地把一切和盘托出。柯拉毕克把信拿起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了。

他们一出门，就碰上了好几辆装甲汽车和满载士兵的卡车。

柯拉毕克还没有完全镇静下来，为了掩饰自己无法摆脱的不安情绪，他又象往常一样装疯卖傻了。

“我很想成为一名魔法师，送给哈里发<sup>①</sup>一只独角兽，我说的是一只独角兽，它浑身象太阳一样火红，出现在宫殿

---

<sup>①</sup> 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伊斯兰国家的君主。

里，吼叫着：‘要知道，哈里发，第一夫人欺骗了你！没说的！’我自己也将变成独角兽，我将因为我的鼻子而变得不可一世！当然，这不会是真的。好象谁也不晓得，能过上一种在他人看来与自己所过的完全不同的生活会有多么快活。尤其在一个女人看来……”

“哪一个女人没向那些在街头勾引她的男人们当中至少一个编造过虚假的身世呢？”

“您……以为所有的人都有谎语癖吗？”

柯拉毕克的眼皮神经质地眨巴着，脚步也放慢了。

“不，您听着，”他说，“请坦率地告诉我：您为什么会认为他们没有谎语癖呢？”

他这时感到自己头脑里产生了一种愿望，尽管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但却异常强烈，那就是他想问问吉索尔对赌博到底有什么看法；然而，假如吉索尔谈起赌博，那他肯定会供认不讳的。吉索尔会谈起赌博吗？沉默会迫使他这样做的。幸而吉索尔答话了：

“也许我这个人是最不适合回答你问题的人……鸦片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除去肉体的痛苦之外，再也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可言了。”

“痛苦，对……不过……还有恐惧。”

“恐惧？”

“您在吸……鸦片的时候，从未有过恐惧感吗？”

“没有。为什么？”

“啊……”

其实，吉索尔想的是：如果世界上没什么真实可言的



话，那么，人们——尤其那些同世界抗衡得最厉害的人们，却具有一种极其明显的真实性；而柯拉毕克，确切地说，是属于那些没有一点真实性的极其罕见的人物之一。认识到这一点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他正是把京的命运交到了这个虚浮之人的手里。从一个人对待世事的態度中能触摸到他的深浅，而想想他的痛苦，则可揣测出这种痛苦的本质。柯拉毕克的痛苦跟一个孩子的痛苦一样，是不受他本人制约的：他对此并不负有什么责任；这痛苦能够将他毁灭，却不能使他改弦易辙。他可以停止生存，在堕落与偏狂中消亡，但却成不了一个男子汉。“心善而内空。”他发觉柯拉毕克的内心深处象其他人一样，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孤独感，只有感觉而已。吉索尔有时按衰老程度来判断一个人，而柯拉毕克绝不会衰老：岁月不是使他积累人生的经验，而是把他引向中毒——色情或吸毒，在这些方面，他终将使出他无视生活的一切手段。男爵想：“假如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他也许还会觉得都很正常呢……”这时，华界处处都响起了枪声。柯拉毕克请吉索尔在租界线外止步，因为柯尼希不会见他。吉索尔目送着他那消瘦而邈邈的身影消失在了雾霭之中。

蒋介石的特别警卫排驻扎在一九二〇年前后修建的一座普通别墅里。这座别墅是贝孔-雷-布鲁艾尔风格，但窗框上却是些黄色和近蓝色的怪诞的葡萄牙装饰。两名哨兵和实属多余的那么多的传令兵，个个都荷枪实弹。别的也就没什么了。在一名秘书递过来的卡片上，柯拉毕克填上了“托托”

两个字，然后等待着。来访事由这一栏空着没填。自从离开自己的房间以来，这还是头一回来到一个有灯光的地方，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克皮莱夫斯基的信读了起来——

亲爱的朋友：

由于您再三恳求，我只好让步。我的顾虑是有理由的，但我经过考虑，您这样会使我放下心来；再说，目前我的买卖可能赚回的利润又是那么可观、那么有把握，我一定能提前一年赠送给您一些同类的、更好的物品作为酬谢。这个城市的食品生意……

紧接着有四页纸的说明。

“事情不妙，”柯拉毕克想，“非常不妙……”可是这时，一名哨兵来把他带了进去。

柯尼希正坐在办公桌上，面对着房门等他。柯尼希身材矮胖，头发棕红，鼻子在那张四方脸上斜歪着。他迎上前来，急促有力地同柯拉毕克握了握手，这种握手的方式与其说使他们两人更加接近，倒不如说使他们之间的距离更大了。

“您好吗？好！我知道今天一定会见到您。我很高兴我也能为您做点什么。”

“您太令人生畏了，”柯拉毕克半开玩笑地说。“我只是想，我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误会，因为您知道我是不介入政治的……”

“没有什么误会。”

“更确切些说，他是屈尊表示谢意的，”柯拉毕克想。

“您有两天时间，可以想办法离开这里。您过去帮过我的忙，如今我也曾让人事先给您透过信儿。”

“怎……怎么？是您让人通知我的？”

“您以为克皮莱夫斯基敢那样做吗？您跟中国的保安机关打交道，但那儿管事的已不再是中国人了。别再说废话了。”

柯拉毕克开始钦佩克皮莱夫斯基了，但也并不是一点不气愤。

“那好吧，”柯拉毕克说，“既然您还想着我，那就请允许我求您另一件事。”

“什么事？”

柯拉毕克不再抱多大希望了，因为柯尼希的每一次回答都说明他所指望的交情并不存在，或者说已不复存在。既然柯尼希已经让人通知了他，那就说明不再欠他什么了。他只是由于良心的驱使而并不抱希望地说：

“对小吉索尔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我想，您办这点事是不在话下的……”

“他是什么人？”

“共产党，我想。”

“首先要弄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会是共产党？他的父亲是吗？因为他是混血儿？因为他找不到工作？一个工人成为共产党，这已经够蠢的了！他到底是为什么？”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柯拉毕克想：

“混血儿，可能……不过，他的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他母亲是日本人。但他并没有那样做。他好象说什么‘出于尊严……’”

“出于尊严！”

柯拉毕克惊呆了：柯尼希在叱责他。他没有想到“尊严”这两个字竟会惹出这样的麻烦。他想：“我是否说了蠢话？”

“您先说说，这是什么意思？”柯尼希问，他晃动着食指，好象对方没有听见似地继续说着。“出于尊严，”他重复道。他说话的口气柯拉毕克是不会听不出来的：那是仇恨的口气。他在柯拉毕克的右侧，看上去，他那斜歪的大鹰钩鼻子，使他的面孔的轮廓更明显地突出出来了。

“喂，我的小‘托托’，您相信尊严吗？”

“对别人来说……”

“相信吗？”

柯拉毕克沉默不语。

“您晓得红色分子怎样对待我们这些被俘的军官吗？”

柯拉毕克始终避而不答。事情变得严重了。他感觉到这句话是柯尼希为自己所做的一种准备，所找到的一种托词。他不等回答，接着说：

“在西伯利亚，我曾在一个战俘营里当过翻译。后来到西蒙诺夫的白军里服役才得以离开那里。什么白军，红军，我根本不在乎！我想的只是重返德国。可我被红军捉住了。我当时冻得半死不活。他们一边称我为上尉（我当时是中尉），一边用拳头打我的脸，直到把我打翻在地还不肯罢休。他们

又把我拖了起来。那时我没穿西蒙诺夫军队那种饰有小死人头的军服，我的两个肩章上各佩有一颗星花。”

他停了下来。“他满可以直截了当地拒绝，何必这么罗嗦，”柯拉毕克想。然而听他那气喘吁吁的沉重的话音，看来还有必要把事情弄个明白。

“他们穿过肩章上的星花，在我的每个肩膀上都钉了一颗钉子，那钉子足有手指这么长。好好听着，我的小‘托托’。”

柯尼希抓住他的胳膊，用模模糊糊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

“我曾象一个女人，象一头牛犊那样哭泣过……我是在他们面前哭的，您明白吗，啊？好啦，我们说到此为止。这样谁都不会吃亏。”

可以肯定的是，每当他心起杀机之时，他总要对人或对自己讲述这个故事，仿佛这个故事能够把始终折磨着他的奇耻大辱刮得一千二净，甚至可以刮出血来似的。

“我的小宝贝，最好不要过多地向我谈起尊严……我的尊严，就是把他们全都杀光。中国，中国与我有何关系！哼！中国，别扯淡了！我所以呆在国民党里，就是为了能让他们杀人。只有在杀人的时候，我才能象过去一样，象个男子汉一样，象任何别的人一样，象从这个窗前走过的最愚蠢的人一样，获得新生。这就如同烟鬼与火烟之间的关系一样。您是来我这儿替他求生的吧？那您得救我三次命才行……”

他嘟嘟囔囔地说着，身子一动不动，双手插在衣袋里，每迸出一个字，他那刷子般的头发便颤抖一下。

“有时难免会有所遗忘……”柯拉毕克低声细气地说。

“一年多来，我没跟一个女人睡过觉！您看这够说明问题了吧……”

他陡然而止，又压低了嗓门儿接着说：

“那您说说看，我的小‘托托’，小吉索尔，小吉索尔……您刚才谈到误会；您是否一直想知道您到底为什么被定罪？我这就告诉您。‘山东’号上那批枪支生意不正是您去商谈的吗？您可知道那些枪支是给谁的吗？”

“干这一行是不刨根问底的，没说的！”

他用食指封住了自己的嘴巴，这纯属他特有的习惯。但他很快就对此感到别扭起来。

“是给共产党的。您是在拿生命当儿戏，本来早就该提醒您了。那是诈骗！他们利用您赢得了时间：就在那天夜里，他们把那条船抢劫一空。假如我没弄错的话，是您目前所保护的人把您卷进这一事件当中去的吧？”

柯拉毕克险些回答说：“不管怎样，我已经领了手续费。”然而，对方刚才向他透露的情况已使对方的脸上显露出十分得意的神情，男爵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虽然京恪守诺言，但自己却背着他拿他的生命冒险。他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吗？不会。京喜爱自己的事业甚于他柯拉毕克，这是对的，而他对京不予关心也是对的。何况事实上他也确实无能为力。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这么说，我要逃离此地，还有四十八个钟头的时间？”

“是的。您不再坚持您的要求，这很对，再见。”

“平时，他对那些要死的人大概才如此推心置腹，”柯

拉毕克一边顺着楼梯的台阶往下走一边想：“无论如何，我还是走为上策。”柯尼希在说“为了象一个男子汉，象任何别的人一样地生活……”这句话时所操的腔调仍然在缠绕着他。他被这种唯血液才能使之满足的毒化透的人搞得愚笨不堪了。在中国和西伯利亚，由于国内战争而变得穷途潦倒的人他见的不少，他了解哪种否定世界的方式会招致奇耻大辱；唯有顽强献出的热血，麻醉剂和神经官能症才能维持这样的孤独。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柯尼希过去那么喜欢同自己来往，他也并非不知道，他周围一切事物的真实性都越来越差了。他慢慢腾腾地走着，很怕再见到在铁丝网另一侧等候着他的吉索尔。怎么跟他说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吉索尔，已从雾中迎了过来，站在距他两米远的地方，正用疯子般惊恐万状的尖利目光瞧着柯拉毕克。柯拉毕克吓得停住了脚步。吉索尔上前抓住他的胳膊：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他用一种忧伤但尚未变调的声音问道。

柯拉毕克没有开口，只是否定地摇了摇头。

“咱们走吧。我再去求求另一位朋友看。”

看到柯拉毕克从雾霭中走出来时，他就觉得自己的精神已经错乱了。他刚才想象的男爵与柯尼希之间的谈话，看到男爵归来以后，就显得荒唐了：柯拉毕克既不是代言人，也不是使者，而是一张牌。打出去的牌——输了，这从柯拉毕克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应该另选一张牌了。他陷入了极度忧伤和万分苦恼之中，然而在这悲痛的深渊里，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他想到了费拉尔，但费拉尔是不会介入这类纠

纷中来的。

柯尼希叫来一名秘书：

“明天，把小吉索尔带到这儿来！”

凌晨五点。

夜色将尽，卡托夫和海默里希从二层楼的窗口看到，在转瞬即逝的暗黄色枪弹流光的上方，天空已经破晓，它给邻近的屋顶蒙上了一层青灰色的光泽，与此同时，房屋的轮廓也变得清晰起来。雨水顺着他们的头发往下淌着，灰白发亮。他们相互间已能辨认出了对方的脸，也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最后一天了。几乎弹尽粮绝了。人民群众对他们尚未采取任何援救的行动。闻北方向的枪声持续不断：那里有一些同志也象他们一样被包围了。卡托夫曾向海默里希说明过他们为什么会失败：蒋介石的部下早晚会调来将军的卫队所拥有的小口径炮；只要有一门炮被拖到队部对面的房子里，那么垫子和墙壁就会象庙会上射击游戏中的靶子一样倒下来。共产党的机关枪仍然控制着这所房子的大门，当子弹打光以后，也就控制不住了。真的刻不容缓。他们被一种抢先复仇的欲望所驱使，曾疯狂地扫射过，既然已被定罪，那么“杀戮”就是他们能够赋予最后一息生命的唯一含义。然而他们对此也开始感到厌倦了。隐蔽得越来越巧妙的敌人很少再露面了。战斗的激烈程度随着夜色的消逝似乎也在逐渐



减弱，而且十分荒唐的是，连敌人影子都不见一个的黎明时分似乎使他们获得了解放，如同黑夜使他们受到了监禁一般。映照在屋顶上的光亮变成了灰白色；在已停止战斗的战场的上空，阳光好象正在吞噬大块大块的夜幕，只是在房屋前面还残留着一个个黑色的长方形。各种各样的影子在逐渐地变短；看着这些影子可以使人忘掉那些濒临死亡的人们。这些影子跟往日一样，以各自永恒的运动收缩着，今天显得不合惯例的庄严郑重，因为从今往后他们就再也看不到这种运动了。突然，对面所有的窗户都亮了起来，子弹如同飞起的乱石朝大门的周围打来；原来他们的一个同志把一件上衣挑在一根棍子上了。敌人对自己的潜伏十分得意。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海默里希数着——他在数街上能看得到的尸体。

“这算不了什么，”卡托夫尽量压低声音答道：“其实他们只要再等一会儿，白天对他们更有利。”

房间里只躺着五个伤员，他们没有呻吟，其中两个一边吸烟，一边瞅着从墙壁和垫子中间透进来的阳光。再远一点儿，孙和另一名战士守卫着第二扇窗户。几乎听不到射击声了。难道到处都有蒋介石的伏兵吗？上个月，共产党人作为战胜者，时时掌握着自己的进程；可今天他们一无所知，和当时的战败者一模一样。

好象要证实一下卡托夫刚说过的话似的，敌人所占房屋的大门打开了（两条过道正好对着），霎时间，一挺机关枪“嘟嘟嘟”的射击声为共产党人通报了情况。“这挺机关枪是从屋顶上过来的，”卡托夫心里这样想。

“打这儿走！”

这是他的那些机枪手在呼喊。他和海默里希跑了出去，这时他们才明白：肯定是敌人那边由铁甲防护着的机关枪仍在不停地扫射着。队部的过道里没有共产党人，因为它正处于他们自己的机关枪的火力之下。这挺机关枪从楼梯最高的几级台阶上控制着敌人的入口处。可是，现在铁甲防护着敌人。首先必须保持火力。机枪射手侧卧在那儿，准是死了；刚才是副机枪手在呼喊。他压上了子弹带后进行点射。子弹打在楼梯台阶和墙壁上，木块跟灰泥四处飞溅，在瞬息间的沉寂之中所听到的那些沉闷的响声，表明有些子弹已钻进了活人或死人的皮肉。海默里希和卡托夫冲上前去。“你别来！”比利时人嚷着，一膀子把卡托夫撞倒在过道里，自己跳到了机枪射手的位置上。这时敌人射来的角度比较低，但为时不会很长。“还有子弹带吗？”海默里希问。副机枪手没有回答，只见他向前探着脑袋奔下了楼梯。这时海默里希才发现自己不会装子弹带。

他一个箭步窜到了过道上，感到眼睛和腿肚子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擦了一下。在位于敌人射击角上方的过道里，他停了下来；他的眼睛只被子弹迸起来的一块墙皮擦了一下；腿肚子的表皮被另一颗子弹划破了一道口子，流着血。他来到卡托夫所在的房间，后者趴在地上，一只手在往自己身边拉垫子（不是用来保护自己，而是为了隐蔽），另一只手拿着一捆手榴弹；只有逼近敌人用手榴弹爆破，才能对付铁甲。

应该把手榴弹从窗口扔到敌人的过道里。卡托夫把另一捆手榴弹放在了自己的身后，海默里希抓起来，与卡托夫同

时从垫子上边扔了出去。一排子弹横扫过来，卡托夫再次扑倒在地板上，象是被手榴弹炸倒了似的。他们俩人的头和胳膊刚一露出垫子，敌人的子弹便从各个窗口一齐向他们射来。那种擦火柴般的爆裂声如此之近，不是从他的两条腿上发出来的吧？海默里希心里想着，及时地弯下了身子。子弹不停地从窗口射进来，但由于两人已经卧倒，墙壁可以保护他们：窗子离地板还有六十公分高。尽管有步枪还在射击，海默里希却有一种安静的感觉，因为两挺机关枪都成了哑巴。他匍匐着朝一动不动的卡托夫爬去，拽住卡托夫的肩膀用力地拖着。拖出射程之后，他们两人默默相对：虽然有垫子和其他防卫设施遮掩着窗户，但这时阳光还是撒满了整个房间。卡托夫昏厥了过去，他大腿上的伤口红糊糊一片，鲜血滴在方砖地上好象滴在吸墨纸上一般，越淌越大。海默里希还听到孙在喊：“炮！”继而是一声巨大而沉闷的爆炸声。他刚一抬头，鼻端处挨了一击，他也昏厥了过去。

海默里希渐渐苏醒过来，犹如从万丈深渊爬上了这块十分奇异的沉静的地面，在他看来，正是这块地面使他恢复了知觉。不再打炮了。墙壁东倒西歪。卡托夫和其他人或是昏迷不醒，或是中弹身亡，都躺在地上，身上盖满了灰泥残片。他口干舌燥，浑身发热。腿肚子上的伤势并不重。他爬到门口，在过道里吃力地站起来，倚在墙上。除了脑袋被飞起的一块灰石打中还在疼痛以外，别处已感觉不到什么疼痛了。临街的楼梯口肯定一直埋伏着敌人，他没有从那儿下去，手扶着栏杆从通向院子的楼梯下去了。枪击停止了。过

道入口的墙壁上挖了一些壁龛，不久前这儿还摆着几张桌子。他蹲在第一个壁龛里察看院子里的动静。

在一所看上去没人住的（其实肯定有人住）的房子的右边，是一间铁皮库房；远处是一幢带尖角的房子和一排越来越矮小、向那肉眼看不到的向下伸延过去的电线杆子。门前横七竖八的铁蒺藜给这毫无生气的场面和灰白的天空划上了不少黑色的线条，酷似一件陶器上碎裂的花纹。一个影子在铁蒺藜后面出现了，活象一只狗熊：这个人面对着他，大弯着腰，抓住了铁丝。

海默里希一颗子弹也没有了。他凝神注视着，这个影子从一根铁丝走到另一根铁丝，他一时尚猜测不透这家伙到底想搞什么名堂（铁丝冲着亮处，清晰可见，但分不清层次）。这影子攀上去，又下来，再攀上去，颇象是一只巨大的昆虫。海默里希沿着墙根靠了过去。很明显，那个人就要过来了；可就在这时，他的衣服被铁蒺藜钩住了，他试图摘下来，嘴里发出古里古怪的抱怨声。海默里希还以为，这个巨大的、蜷缩着的、奇形怪状的昆虫可能要永久地悬吊在那灰白的天空上了呢，可是那手又举起来了，它是黑颜色的，可以分辨的，张开的，五指分开的，企图抓住另一根铁丝，而且他的身躯也重新活跃起来。

这一下完了。后面是马路和机关枪。楼上是躺在地上的卡托夫及其手下的人。对面那幢空房子肯定被占领了，而且毫无疑问是被那些仍有子弹的机枪手们占领了。倘若他出去，敌人准会朝他的膝盖开枪，以便捉获他（他突然感觉到髌骨这些小骨头的脆弱性……）；但他至少可能把这个家伙

干掉。

由狗熊、人和蜘蛛组合而成的怪物在继续往下摘着身上的铁蒺藜。在他身体背阴的那一侧，一道寒光显露出他的手枪背儿。海默里希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坑底，与其说他被这个如同死神一般慢慢向他接近的人所吓呆，倒不如说是被随他而来的那一切所吓呆，也就是如同把一个活人用棺材盖扣在棺材里并用螺钉钉住那样，要把他再一次憋死的那一切；这也就是曾使他每天的生活透不过气来，如今又来这儿想把他一下子憋死的那一切。“他们敲打了我整整三十七年，现在又想干掉我。”向他逼近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苦难，还有他那被剖腹的妻子和他那病中惨遭杀害的孩子的苦难：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干渴、发烧和仇恨的云山雾罩似的感觉。他连看也没有看，就再次感觉到自己的左手血迹斑斑了。既不同于灼伤，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只是知道那儿有血，知道那个人终将挣脱铁蒺藜。那个人打头阵来杀害楼上那些正在极力挣扎的人们，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一种理念，为了一种信仰；对于那个正停在铁丝网屏障前的影子，海默里希从思想上憎恨它；这些变了运的家伙杀害他们还嫌不够，还得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时，重新直立起来的影子在这座灰暗的房院里伸展开来，在这些隐没在无限静谧的春雨之晨的电线上伸展开来。从一个窗口传来了呼唤声，那个人作了回答；他的答话充斥了整个走廊，响在海默里希的耳边。手枪已装入枪套，踪影消失了，被一根在黑暗中呈现白色的扁平铁条所代替；那个人已拔出了刺刀。他不再是人，而是海默里希至今为之痛苦的那一

切。在这漆黑的走廊里，对那些埋伏在大门外的机枪手和这个越来越逼近的敌人，比利时人恨得咬牙切齿，而且，他觉得亲人们的血液在他手上并没有凝结，仍然是流动着的，热乎乎的。“他们将要我们每个人的命，但这个家伙将要偿还这笔血债，他将要偿还这笔血债……”那个人刺刀冲前，一步步紧逼过来。海默里希蹲下身子，一下子看到那个身影高大起来，但上身却在那木桩般粗壮的大腿上变得短小了。就在刺刀到达海默里希头顶的这一刹那，他腾地站起身来，用右手卡住了那人的脖子，而且卡得越来越紧。这一来，刺刀落到了地上。用一只手卡，这脖子委实太粗了，只要那个人的呼吸不停止，他的拇指和其他手指的指尖就越是痉挛着往肉里钻；他的另一只手则象发了疯似地在那张气喘吁吁的脸上狂乱地揉搓着。“你要偿还这笔血债！”海默里希吼叫着。“你要偿还这笔血债！”那个人蹒跚着，本能地扶住了墙壁。海默里希用尽全身气力将他的头往墙壁上撞击，随后又躬了一下身子。那个中国人感到有一个长家伙扎进了自己的腹腔内，撕裂了肠胃：原来是刺刀。他张开双手，捧住肚子尖声尖气地呻吟了一下，身子冲前跌倒在海默里希的两腿之间，一下子伸腿了。一滴血从刺刀上滴到了他那伸展开来的手上，接着又是一滴，好象这只鲜血越积越多的手已替海默里希报仇雪恨了似的，这时他才敢瞧自己的手，发现上面的血迹早已被擦得干干净净。

这时，他发觉自己也许不会死掉。他急急忙忙地扒着这个军官身上的衣服，对这个能使他得以解脱的人既怀有深情，又十分恼怒，因为衣服不能很快地扒下来，好象被这个

人拽住不放似的。他摇晃着这个救命的躯体，象是把它放在毯子上蹦跳一样。他终于穿上了死者的军服，出现在临街的窗口，大盖帽的帽檐遮住了他那歪斜的脸。对面的敌人打开窗户向他喊叫。“在他们还没来这儿之前，我得赶紧走。”于是，他从马路这一侧走了出去，跟被他杀死的那个人刚才的走法一样，向左拐弯，好象是要回到自己小组那儿去似的。

“俘虏呢？”敌人从窗口喊道。

他向那些以为他要去和他们相会的人胡乱作了个手势。他们不朝他开枪，虽说愚蠢，却又合乎情理：因为他身上已不再有什么使人生疑的东西了。他再次左转弯，朝租界的方向走去。租界虽有士兵把守，但他对“双共和国”大街上那些有两个出入口的房子了如指掌。

国民党士兵一个个鱼贯而出。

## 第六部分

十点。

“临时的。”看守说。

京很清楚，自己被关进了普通执法监狱。

他一走进监狱，甚至在没看清东西之前，就被那可怕的气味熏得头晕目眩了：那是一种屠宰场的气味，犬粪展览会的气味，粪便的气味。他刚刚迈进来的房门冲着一条走廊，跟他刚刚走过来的那条走廊相仿；这扇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全都是又粗又长的木棍子。在这些木头牢房里，关押着许多人。看守坐在正中间一张小桌前，桌上放着一条鞭子，鞭把很短，鞭身扁平，宽如手掌，厚如舌头——这是一种武器。

“呆在那儿，兔崽子！”看守说。

对黑暗已习以为常的看守正在记录他的体貌特征。京依然感到头痛，再加上这样一动不动地呆着，他觉得马上就要昏厥过去似的，于是，他将身子靠在了木栅上。

“您怎……怎……怎么样？”有人在他背后喊道。

这令人不安的声音很象一只鸹鹑，但听得出是个男人的



声音。这里特别阴暗，京根本辨别不出人的面孔，他只看见在离他脖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些攥着木栅栏的痉挛的粗手指。后面，是一些长长的身影，有的躺在木板上，有的站着：这都是些人，但跟蛆虫一样。

“会好的，”他应着走开了。

“住口，王八蛋！假如你不想挨嘴巴的话。”看守说。

京听到过好几次“临时”这个字眼儿，他断定自己在这儿呆不长。因此他打定主意对一切辱骂不予理睬，能忍受的便忍受；重要的是离开这里，是重新参加战斗。然而，他蒙了一个受人摆布的人所能蒙受的一切耻辱，这种耻辱使他感到恶心——面对这个手持皮鞭的卑劣的身影无能为力，说明他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尊严。

“您怎……怎……怎么样？”那人又喊叫起来。

看守打开一扇门，幸好是在左边的木栅里：京走进了牲口棚。在尽里面的一块长木板上只躺着一个人。门重又关上了。

“政治犯？”那个人问。

“对。您呢？”

“不是。满清帝国时代，我做过官……”

京对黑暗开始适应了。原来，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一只几乎没有鼻子、胡子稀稀拉拉、耳朵尖尖的老白猫。

“……我贩卖女人。买卖好时，我就给警察点钱，他们就不找我的麻烦，买卖不好时，他们以为我留着钱舍不得给他们，就把我投进监狱。但是，生意萧条的时候，我情愿到监狱里来找饭吃，也不愿当自由人而挨饿……”

“这儿？！”

“您知道，我们习惯了……外面也不怎么样，特别是象我这样一个年老体弱的人……”

“您怎么不跟其他人在一起？”

“我有时给门口的书记官一点钱，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享受‘临时的’生活待遇。”

看守送来了吃的——他从栅栏中间递进两小碗稠糊糊，颜色象烂泥，散发着和空气一样的恶臭味。他用一把长柄勺把锅里的稠糊糊“啪”“啪”地盛到每一只小碗里，然后又依次分给另一个牢房里的囚犯。

“不必了，”一个声音说：“我是明天的。”

“他明天处决。”那个满清官员对京说。

“我也是，”另一个声音说。“不过，你完全可以给我双份猫狗食，它呀，反倒引起我的食欲。”

“你是不是想让我打你的嘴巴子？”

一个士兵进来问了他一句什么。他走进右边的牢房，懒洋洋地拍打着—一个躯体：

“他还在动，”他说。“肯定还活着……”

士兵走了。

京全神贯注，试图弄清楚这些话到底是出自哪些影子，他们可能和他一样，死神已经临头了。简直无法辨别这些人，他觉得他们在临死之前，是些别的什么东西，而不是说话的人。

“您不吃吗？”他的难友对他说。

“不吃。”

“开始总是这样……”

他拿过京的碗。看守进来，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拿起碗，一言不发地又走了出去。

“他为什么没动我？”京低声问道。

“我是唯一的罪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因为您是政治犯，是临时的，何况您穿着讲究，他想从您身上或从您亲人那里榨点油水。不过，尽管如此……等着瞧吧……”

“金钱一直把我追逐到这个鬼地方来了。”京想。尽管看守的卑劣与传说的极其相似，但在他看来，并不完全相符。同时，他觉得这种卑劣似乎是一种邪恶的命运，仿佛权力足以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牲畜。糜菜在栅栏后面那些令人不安的模糊身影，很象他童年时代所梦见过的那些巨大的甲壳类与昆虫，他们就再不象人了。他们忍受着极端的孤独，天天的耻辱。“当心”，他想，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浑身更加软弱无力了。他意识到，如果连自己的死亡都不能主宰，那他在死亡面前势必会感到恐怖。他解开腰带扣，把氰化物拿出来放进口袋里。

“你怎……怎……怎么样？”那个声音又喊了起来。

“够了！”另一间牢房里的囚犯一起嚷叫起来。京这时已适应了黑暗，所以对这么多的声音一起喊叫并不感到惊讶：在栅栏后的木板上躺着十多个躯体。

“你还不把嘴闭上？”看守喊道。

“您怎……怎……怎么样？”

看守站了起来。

“这人爱开玩笑还是固执任性？”京小声问道。

“都不是，”那满清官员回答：“是疯子。”

“怎么疯了……”

京不再问了：他的邻居已把耳朵堵起来了。一声嘶哑的尖叫——充满痛苦和恐怖的尖叫，充斥了整个黑暗的牢房。就在京观察那个满清官员的时候，看守提着鞭子走进了另一间牢房。皮鞭“啪”“啪”地响着；同样的叫喊声又传了过来。京不敢堵住自己的耳朵，只是抓住栅栏上的两根木棍子，等待着那使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声音再一次传过来。

“狠狠地揍他一顿，”一个声音说，“也好让我们安静安静！”

“别打了！”四、五个声音异口同声地说，“让我们消停点儿吧！”

那皇朝遗老一直用手堵着耳朵，他俯下身子对京说：

“七天来，好象这是第十一次打他了。我来这儿两天，已经是第四次了。怎么着也能听见一点……我不能闭上眼睛。您瞧，我觉得这样看着他，就等于在帮助他……”

京也在瞧，但什么也瞧不见……“是同情怜悯还是冷酷无情？”他惊恐地思索着。在每个人身上所暴露出的既卑鄙而又有迷惑力的东西全都狂热地汇集到那里，京却在挖空心思想同人类所蒙受的耻辱进行搏斗；他回想起自己为避开那些不期而遇的遭受折磨的躯体而一贯所做的十分必要的努力，他完全应该从中摆脱出来。人们竟忍心看着一个并不作恶、从声音判断无疑很年迈的疯子挨打，甚至纵容这种酷刑，这种现象使他产生了一种恐怖感，这同那天夜里陈在汉口吐露隐情后所引起的恐怖感一样：“章鱼……”卡托夫曾告诉过

他，一个学医的大学生，他第一次打开充满生机的器官的腹腔时，他要做出很大很大的努力。这同样是一种与一般的害怕截然不同的使人瘫软的恐怖，一种威力大到甚至连头脑都来不及判断的恐怖。京见此情景，极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所处的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地位，因此，这种恐怖更使人尖魂落魄。然而，他那双眼睛适应黑暗的能力比起他的难友来还差得多，他只能看清象钩子一样钩得犯人嗥嗥直叫的皮条的闪光。从打第一鞭子时起，他就动也没动：他呆立在那儿，双手紧紧地抓住与面部一般高的栅栏。

“看守！”他不由得喊了起来。

“你想挨一鞭子吗？”

“我有话跟你说。”

“是吗？”

当看守怒气冲冲地插上粗大的门闩时，他刚刚离开的那些囚犯便捧腹大笑起来。他们对“政治犯”都十分厌恶。

“去吧！快去，看守！让我们开开心！”

看守站在京的对面，身体被一根栅栏棍垂直地分成了两瓣儿。他的脸上露出了极其卑劣的怒容，一个低能儿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怀疑时的怒容；可是他的长相并不算粗俗：端正，无特征……

“听着，”京说。

他们两人相互怒目而视。看守比京高大，他看到京那双痉挛的手始终握着脑袋两侧的栅栏棍不放。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他的左手突然爆裂了呢：原来是看守藏在背后的鞭子重重地打了下来。京禁不住大叫起来。

“好极了！”对面的囚犯们嚎叫着。“不能总打那些受伤人。”

京的双手受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意识到的本能的畏惧感所支配，沿着躯干垂落下来。

“你还有话要说吗？”看守问。

这时，鞭子就垂在他们两人中间。

京如同憋足了劲儿要搬起一个沉重的东西似的，用力咬紧牙关，眼睛紧盯着看守，双手再次向栅栏棍伸去。就在他慢慢地抬起双手的时候，那家伙让人难以察觉地向后退着，以便拉开架势。鞭子响了，不过这次打在栅栏上了。条件反射胜过京的意识：他把手撤了回来。但是他靠肩膀那使人精疲力尽的张力又把双手放了回去，看守从对方的眼神可以看出，这一回他是不会再撤回去了。于是看守朝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慢慢腾腾地举起了鞭子。

“倘若你……不再鞭打那个疯子，”京说，“等我出去以后，我……一定给你五十块美金。”

看守踌躇起来。

“好吧。”他终于说道。

看守的目光移开了。京从一种他以为已经晕厥过去的紧张状态中解脱了出来。他的左手疼得五指都合不拢了。他把左手和右手同时往上举，只举到肩膀的高度，左手便僵直地停在那儿了。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你要跟我握手吧？”看守也打趣地问。

说着，他便握住了京的手。京觉得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一次握手。他把手抽回来，一屁股坐在了木板上。看守迟

疑了片刻，用鞭把蹭了蹭自己的脑壳儿，然后回到自己桌子那儿去了。疯子呜咽着。

这类卑劣的行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末了，几个士兵来了，要把京带到特别警察局去。他或许就要死了，然而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出去了，他是那样的兴奋，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在他看来，他已把自己污秽不堪的那一部分留在那里了。

“进来！”

一个中国看守用肩膀把京轻轻地顶了一下。在看守们看来，他们必须粗暴，但和外国人打交道（在一个中国人的眼里，京是日本人或是欧洲人，总之，肯定是外国人），他们的粗暴行为总是有所收敛。在柯尼希的示意下，他们都留在外边。京朝办公桌走去，他把肿胀的左手藏在衣袋里，两眼直盯着这个也在瞧他的人：瘦削的脸庞刚刚刮过，鼻子歪斜，留着平头。京想：“一个肯定要让人杀害你的人，同别的人一点也没什么两样。”柯尼希把手向放在桌子上的手枪伸去：不，他拿起来的是一盒香烟。他把烟盒递给京。

“谢谢。我不吸烟。”

“一般说来，监狱里的伙食肯定是很糟糕的，跟我一起用餐好吗？”

桌子上有咖啡、牛奶、两个杯子、几片面包。

“来点面包就行了，谢谢。”

柯尼希微微一笑：

“我们俩用的可是同一把咖啡壶，您知道……”

京站在（没有座位）办公桌前，象个孩子似地咬着面包。见识过监狱里的卑劣行径之后，在他看来，<sup>①</sup>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的轻松。他知道这关系到他的生命，但即便是死，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个人如此彬彬有礼是出于一种无所谓的心理也不是不可能的：他作为白种人，干上这一行，也许是出于偶然或贪财。这是京所希望的。京对他并无半点好感，只是想轻松一下，想从那种使他疲惫不堪的紧张的监狱生活之中解脱出来。他刚刚发觉：迫使自己把一切都隐藏于内心深处是多么令人难耐啊。

电话铃响了。

“喂！”柯尼希说：“是的，吉索尔，京地<sup>①</sup>。好极了。他在我这儿。”

“有人问您是否还活着，”他对京说。

“您为什么让我到这儿来？”

“我想我们之间是会谈成的。”

电话又响了。

“喂！没有！我正在跟他说，我们之间肯定会谈成的。枪毙了？您再来电话吧。”

柯尼希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过京的眼睛。

“您以为如何？”他放下耳机问道。

“没什么可说的。”

柯尼希低下头，接着又抬了起来：

“您想活吗？”

---

① 是京的全名，京是缩写字。



“那要看怎么个活法。”

“死也可以有不同的死法。”

“我们无法选择……”

“您以为怎么个活法总是可以选择的吗？”

柯尼希在想他自己。京下定决心绝不在主要问题上妥协，但也毫无惹翻他的意思：

“我不知道。”

“有人对我说，您是出于……什么来着？噢，出于尊严才成了共产党，是真的吗？”

京起初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等柯尼希打电话时，精神颇为紧张，他暗自思量：这古怪的审讯，目的究竟何在呢？他终于问道：

“您对此真的感兴趣吗？”

“您简直想象不到我是多么感兴趣。”

他的话里带有威胁的口吻。京答道：

“我认为共产主义有可能给那些与我共同战斗的人带来尊严。反对共产主义的东西，归根到底，都是不让他们得到尊严。您既然不听我的回答，那为什么又要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呢？”

“您所指的尊严是什么？它一点意思也没有！”

电话响了。“关系到我的生死吧？”京想，柯尼希并没有接电话。

“指的是与耻辱相对的东西。”京说。“假如您是来自我所来的地方，也就会感到有意思了。”

电话铃又响了。柯尼希把手放在电话上。

“武器藏在哪儿？”他直截了当地问。

“您不必再打电话了。我总算明白了。”

京认为电话铃声纯粹是在作戏。他迅速地弯下身子——柯尼希差一点儿把两支手枪中的一支朝他的头上砸来；不过，最后还是把它放回到桌子上了。

“我有更好的办法，”柯尼希说。“至于电话，您马上就会明白是不是弄虚作假，我的小伙子。您已经见过拷打了吧？”

在衣袋里，京试图握紧肿胀的手指。氰化物就在左边这个口袋里，他担心在需要往自己嘴里放时弄不好会掉到地上。

“起码，我见过一些遭受拷打的人。为什么您问我武器在哪里？这您知道，或者将来肯定会知道。还有什么？”

“共产党到处都遭到镇压。”

京缄默不语。

“他们全都遭到镇压。好好想想吧：如果您为我们效劳，那您就得救了，而且谁也不会知道。我可以让您越狱逃走……”

“他本应该从这儿开始，”京想。神经质使他产生了幽默感，尽管他并没有幽默的意思。然而他晓得，警察是不喜欢空头支票的。可是，交易已突然强加到他的头上，似乎他只有按常规办事才不会被指控了似的。

“知道这件事的，”柯尼希继续说，就我一个人。只此而已……”

京心想，“为什么会有‘只此而已’这番好意呢？”

“我是不会为你们效劳的。”他平平淡淡地说。

“当心：我可以把您同十来个无辜者一起关进秘密牢房，并告诉他们：他们的命运将取决于您，假如您不交待，他们将一直关押在监狱里，他们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自由……”

“交给刽子手们，这更简单。”

“您错了。恳求和暴行交替使用更糟。不要说那些您不知道——起码是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

“我刚才大致也看到了你们是怎样拷打一个疯子的。”

“您可晓得您冒的是什么险吗？”

“这我知道。”

柯尼希认为，尽管京那么说，但看来他对这种威胁的含义并不了解。“青春的活力在帮他的忙，”他想。两小时之前，他对一名为契卡效力的犯人进行了审讯，只用了十分钟，他就感到那个人亲如手足了。他们两人所处的世界已不再是人类的世界了。如果说京是由于缺乏幻想而无所畏惧的话，那就得耐心点儿……

“您就没寻思寻思：我为什么还没把这支手枪照您脸上砸去吗？”

“您说过：‘我有更好的办法。’……”

柯尼希按了按铃。

“也许今天夜里我会来问您对人类的尊严究竟是怎么想的。”

“带到风雨操场①，A组，”他对进来的看守们说。

---

① 把某学校的风雨操场当了监狱。

下午四点。

柯拉毕克混进了租界里涌向铁丝网的人群当中，看到刽子手在“双共和国”大街上走着，肩上扛着大弯刀，一队毛瑟枪手紧跟在他后面。柯拉毕克立刻转身往回走，钻到租界里去了。京被捕，共产党的防卫被摧垮，就连欧洲租界里的大批同情者也惨遭杀害……柯尼希给他的期限只到今天晚上，他受保护的时间不会再长了。几乎四面八方都有枪声。他觉得这些随风而来的枪声离他越来越近，随着枪声而来的就是死亡。“我不想死”他喃喃地说，“我不想死……”他发觉自己竟跑了起来。他来到了码头上。

没有护照，也没有足够的钱买票。

三艘客轮，其中有一艘是法国的。柯拉毕克不再跑了。藏在蒙防雨布的救生艇里？那就要先上船，可是把守舷门的人是不会放他过去的。况且这样做也未免太愚蠢了。藏到货舱里？愚蠢，愚蠢，实在是愚蠢！冒昧地去找船长？他一生都是这样摆脱困境的，但这一次，船长会认为他是共产党而不让他上船。船在两小时之后即将起航，这不是打扰船长的時候。假如船出海以后他在船上被发现了，那他是没有办法对付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必须上船。

他想象自己蜷缩在一只木桶中，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可是，这一回幻想却救不了他的命了。如同向一位陌生神的代理主教们毛遂自荐一般，他好象正在向这些巍然耸立、装

载着一些人的命运、对他冷漠无情乃至怀恨在心的客轮毛遂自荐。他在法国船前停住了脚步。他对舷梯着了迷，两眼直盯着上上下下的人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想到他，没有一个能猜到他的苦恼，为此，他很想把他们一个个全都宰了），只见他们走过舷门时都出示了船票。造一张假船票？荒唐。

一只蚊子叮了他一下。他赶跑了蚊子，顺手摸了摸脸：胡子长出来了。好象任何梳洗对出走都吉利似的，于是他决定去刮刮脸，但又不想离船太远。在棚子那边的酒吧间和古玩店中间，他看到一家中国人开的理发店。这个店的老板还开一个很不象样子的咖啡馆，他这两个店铺只有一席相隔。柯拉毕克在靠近席子的地方坐下来等候，同时继续注意着轮船的舷门。从席棚另一侧传来了说话声：

“这是第三家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有这么个小家伙，谁也不会收留我们。去找一家阔气点的旅馆，怎么样？”

搭腔的是个女的。

“就凭我们这身穿戴？不等我们进门，那佩饰带的家伙就会轰我们的。”

“在那儿，孩子们是可以喊叫的……再试试看，不管哪儿都行。”

“只要一看到小孩，店主准会拒绝。只有中国旅馆才会接待我们，可是小家伙吃他们那些不干不净的饭食是会生病的。”

“如果能把孩子带进一家简陋的欧洲旅馆，只要进到里面，也许他们不敢把我们轰出来……无论如何总可以混一宿

的。得把孩子捆包起来，他们会以为是衣物……”

“可衣物不会叫啊！”

“把奶瓶塞到他嘴里，就不叫了……”

“这也许可以。我去跟那个家伙交涉交涉，你随后就来。你从他眼前经过的时候必须快点。”

寂静。柯拉毕克注视着舷门。只听纸张的响声。

“象这样抱着他，你想象不到我有多么吃力……我觉得这对他今后整个一生都是不吉祥的……再说我怕这样会弄痛他……”

又一次静了下来。他们走了吗？理发的顾客离开了椅子，理发师向柯拉毕克示意，他过去坐了下来，但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艘客轮。舷梯上空无一人。可是，当柯拉毕克脸上刚刚涂上肥皂的时候，一个水手走了上去，手上拎着两只新桶（可能是新买来的），肩上扛着几把笤帚。柯拉毕克目送着他一级一级地上了舷梯——他甚至想变成一条狗，好爬上舷梯，逃离这个地方。水手从舷门前那人身旁走过时一声没吭。

柯拉毕克把几枚硬币往洗脸池上一扔算是付了钱，扯下身上的围布，带着满脸肥皂沫走了出去。他知道哪里有旧货商。人们都在看他：他走了十来步，返身回来，把脸洗了洗，然后又走了。

他到第一家旧货商那里，没费多大事儿就弄到了蓝色的水兵服。他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旅馆，换了衣服。“还得来几把笤帚，或是别的什么类似的玩艺儿。向仆人买些旧笤帚？荒唐：一个水手为什么要扛着笤帚在陆地上闲逛呢？为了使

举止更加风雅吗？愚蠢之至！如果他扛着笤帚经过舷门，那应该是刚刚在陆地上买的，因此笤帚应该是新的……那就快去买吧……”

他以他惯常的“柯拉毕克风度”走进了一家商店。在英国店员那轻蔑的目光下，他嚷道：“到我的怀抱里来吧！”说着，把笤帚扛到肩上，一转身竟把一只铜灯碰掉在地上，然后扬长而去。

尽管他故意地胡言乱语，但“到我的怀抱里来吧”这句话却表达了他当时的感受：为了对得起良心，同时也由于胆怯，一直到现在他都在表演一出惊恐不安的喜剧，但却始终避不开他可能会失败这一隐讳的想法；店员的蔑视表明他能够获得成功，虽然不修边幅的柯拉毕克并不象个水手。他扛着笤帚，朝客轮走去。一路上，他察颜观色，很想从人们的眼神里找到对他这种新身份的确证。当他在舷门前停下脚步时，他极其惊愕地感觉到他的命运对别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它只不过是為了他才存在罢了，正因为如此，刚才那些旅客上船时才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也许是为了寻死才停立在码头上的人。这时，行人们则在冷漠地瞧着他这位水手，但没有一人走出人群表示诧异或与他相认，甚至连一张表示惊奇的面孔也没有……这一次，这一虚假的生命并非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强加于他的，并且他的真实生活也许要取决于它。他感到口渴，于是在一家中国酒吧间门前停下来，把笤帚放在了地上。刚喝了一口，他就发觉自己并不渴，而是想再验证一次。老板找他零钱时的神态已足以说明问题。自从他换衣服以来，他周围的目光也随之改变了。他的谎语癖通常的

对话者已变成熙熙攘攘的人群了。

出于自卫的本能或出于寻求乐趣，人们普遍承认了他这种新身份，同时这也感染了他自己。突然，他意外地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成就。不，既然只需一套衣服就可以失去本象自我超脱，在他人的眼里就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生命，那说明人类是不存在的。说得深刻点儿，这与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民众中时所感受到的迷惘与幸福是一样的。“真想不到，这正如法语里所说的：编撰一部历史，就是写一部历史，并不等于亲身经历这样的历史！”他象扛枪一样扛着笤帚，蹬上了舷梯，两腿发软地从舷门旁那个人面前走过去，来到纵向通道上。他疾步走到船首甲板上的旅客当中，将笤帚放在一捆缆绳上。在到达第一个停靠港之前不会有任何危险。可是他仍然不得安宁，甲板上一个旅客，一个长着一颗蚕豆形脑裂的俄国人走近他：

“您是船上的吗？”

他不等回答又接下去问：

“船上的生活舒适吗？”

“这个吗，小伙子，你是很难想象的。法国人喜欢旅游，这是事实，没说的。军官们令人讨厌，但老板们比他们更讨厌。我们睡得不好（我不喜欢睡吊床，这是个人爱好问题），但吃得很好。我还见过不少世面。我在南美洲的时候，看到传教士们整日整日地教那些尚未开化的人用拉丁文诵唱一些短小的感恩歌。主教来的时候，传教士打起拍子，人们安静下来，那些未开化的人对主教肃然起敬，都痴呆了。但是，没说的！感恩歌自己来了，亲爱的，由于树林里



的鸚鵡听到的只有这么一支歌曲，所以此时竟然虔诚地唱了起来……你想，十年以前，我在西里伯斯海面上见到过一些漂流的阿拉伯快帆船，船体如同雕镂过的椰子，船上装满了死去的鼠疫患者，他们的胳膊都这样沿着舷墙往下耷拉着，他们的头上疾飞着无数只海鸥……完全如此……”

“您真有运气。七年来我一直都在旅游，可从未见过如此景象。”

“应该把艺术的手法引用到生活中来，亲爱的，不是为了把这种手法也变成艺术，啊，我的上帝，绝不是！而是要把它进一步变成生活。没说的！”

他拍了拍对方的肚子，谨慎地转过身去：一辆他所熟悉的汽车停在了舷梯下面——费拉尔要回法国了。

一个伙计开始在一等舱的甲板上边走边摇铃，这是起航的信号。这当啷当啷的铃声，声声都在柯拉毕克的心中回响。

“欧洲，”他想，“好日子结束了，现在该回欧洲了。”仿佛欧洲伴随着这越来越近的铃声也已来到他面前似的。这铃声不再象是解脱的铃声，倒象是监狱的铃声。并没有死亡的威胁，于是他又到下面去了。

“三等舱的酒吧间开着吗？”他问俄国人。

“开了有一个小时了。在驶到海上之前，谁都可以去。”柯拉毕克挽起他的胳膊：

“让我们去开怀畅饮吧……”

## 下午六点

在大厅里——原是一个学校的风雨操场——二百名共产党伤员正在等人来结束他们的生命。卡托夫混杂在最后运来的一批伤员里，用一只胳膊肘支着脑袋，向四下里张望着。所有的人都躺在地上，其中有不少人在非常有规律地呻吟着；还有几个人在抽烟，如同当初队部里有人抽烟时的情形一样，烟云所组成的各种图案消失在天花板上，尽管有欧式大窗户，但由于天近黄昏，加上外面有雾，天花板已经模糊不清了，在躺着的人们头上显得很高。虽然白昼尚未消失，气氛却已经是夜晚的了。“是由于受伤，”卡托夫寻思着，“还是由于我们都躺着，怎么象是躺在一个车站里？这是个车站。不过我们从这儿哪里也去不成，而这……”

四个中国哨兵在伤员中间走来走去，枪上上着刺刀，刺刀在这些无定形的躯体上方显得清晰而笔直，奇异地反射着晚霞的余辉。外面，在云雾深处，一些淡黄色的灯光——那无疑是些煤气灯——似乎也在关照着他们。从外面传进来一声呼啸，这呼啸好象来自那些灯光（因为它也来自云雾深处），压倒了一些低语声和呻吟声，原来是一个火车头的汽笛响了。他们距闸北火车站不远。在这间宽敞的大厅里，有某种极其危急的东西，但并不是对死亡的等待，卡托夫自己的嗓子告诉他：那是渴和饿。他背靠墙壁，左右观察着：许多面孔是熟悉的，因为大批伤员都是各组的战士。沿着大厅

狭窄的一侧，有一块三米宽的地方空着。“为什么伤员们在这儿人攥人，”他放声问道，“而不到那儿去呢？”他是最后一批抬来的。他扶着墙壁站了起来。尽管他的伤口使他疼痛难忍，但他觉得还是能够站立得住的；可是他仍然躬着腰停在那里。其他人一句话也不说，他感到四周笼罩着一片十分令人胆寒的恐怖气氛，他连动也不能动了。恐怖是目光里流露出来的吗？但他几乎辨别不出这些目光来。是神态表现出来的吗？那首先是忍受着自身痛苦的伤员们的神态表现出来的。然而，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传递的，恐怖气氛确实存在——这不是一般的害怕，而是恐怖，是兽类、人类孤身在残酷无情的人面前所表现出的恐怖。卡托夫依然扶着墙壁，跨过了他身旁那人的身体。

“你疯了？”紧贴地面的一个声音问。

“为什么？”

是发问，同时也是命令。但谁也不回答。离他五米远的一个看守并没有把他打翻在地，只是惊愕地瞧着他。

“究竟是为什么？”他再次问道，语气更加生硬。

“他不知道，”另一个紧贴地面的声音说；与此同时，又传来一个更低的声音：“他会知道的……”

他第二次提问时嗓门很大。这一群人的犹豫不安表明，此事的后果对他是极其可怕的。这堵墙本来对所有的人都是个威胁，而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对他的威胁就更大。

“快躺下，”其中一个伤员说。

为什么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喊他的名字呢？为什么看守

又不加以干涉呢？他刚才明明已经看到过看守用枪托把一个想换位置的伤员一下子打倒了……他靠近最后一个跟他搭话的人，躺在他的旁边。

“他们总是把要拷打的人放在那儿。”这个人低声说。

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要么因为他们害怕提到此事，要么因为不敢告诉他。一个声音就曾说过：“他会知道的……”

门打开了，好几个士兵手提着灯，簇拥着一些担架队员进来了。担架队员们象滚包裹一样把伤员们掀翻在距卡托夫很近的地方。夜晚来临了，它是从传来呻吟声的地面上慢慢向上扩展的，这种呻吟声好象东蹿西跑的耗子此起彼伏，并混杂着一种可怕的气味，因为大部分伤员都不能动了。门又关上了。

时间在流逝。只有哨兵的脚步声和刺刀在各种类型的痛苦呻吟声上方所闪现的最后的寒光。突然，从极其遥远的地方传来了火车头的更加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好象黑暗使雾气更加浓重了似的。一个刚来的伤员趴在地上，用痉挛的双手堵住耳朵，嚎叫起来。其余的不喊不叫，但恐怖气氛却重新在那儿——在紧贴地面的地方蔓延开来。

那人抬起头，用双肘支撑着身子。

“坏蛋！”他嚎叫着，“杀人犯！”

一个哨兵走过去，朝他肋下就是一脚，踢得他翻了个个儿。他不再吭声了，哨兵也走开了。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嘟囔起来了。这时天色极其阴暗，卡托夫根本看不清他的目光，但能听清他的声音。卡托夫预感到他还会出声。果然不

出所料。“……不是枪毙，他们把那些人活活扔进机车炉膛里了，”那个人说。“这会儿，是他们在呼嚎……”哨兵又过来了。除了痛苦之外，一片沉寂。

门再次被打开了。又是一些刺刀，这时正自下而上被手提灯照得闪闪发亮，可是没有伤员。一个国民党军官独自走了进来。虽然只能看到模模糊糊一群肉体，但卡托夫觉得每个人都是直挺挺的。进来的那个军官，没摆架子，在这日暮时分，手提灯照不清他什么样儿，他正向一个哨兵下命令。哨兵走进来寻找卡托夫，他找到了。这哨兵既不碰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彬彬有礼地示意他起来。他吃力地走到对着牢门的地方，军官仍在那儿继续下命令。哨兵一手端枪，一手提着灯，站在他的左侧。他的右侧只有那块空地儿和白墙。哨兵用枪指了指那块空地儿。卡托夫苦笑了一下，露出一副绝望的自豪神情。但是任何人都见不到他的面孔：哨兵是有意不去看他，而死神还没降到头上的那些伤员，有的用一条腿撑着，有的用一只胳膊支着，有的用下巴颏挺着，都在目送着他那在酷刑墙上愈来愈大、还不算太黑的身影。

军官出去了。牢门敞开着。

哨兵们行了持枪礼：一个平民打扮的人走了进来。“A组”，外面一个声音喊道，随后门又关上了。一个哨兵陪着平民向墙壁走去，嘴里不停地咕哝着。到了跟前，卡托夫惊呆了，他认出来人是京。因为京没有受伤，刚才进来时又见他走在两个军官中间，所以哨兵们就误认为他是蒋介石的外国顾问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于是远远地责骂起他来。京躺到了卡托夫身旁的黑影里。

“你晓得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吗？”卡托夫问。

“他们关照过我了，我不在乎，我有氰化物，你有吗？”

“有。”

“你受伤了？”

“腿上，但还能走。”

“你来这儿很久了吗？”

“不久。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晚上。这儿有法逃吗？”

“一点办法也没有。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重伤。外面到处都有士兵。你看见门前架的机枪了吗？”

“看见了。你在哪儿被捕的？”

两个人都需要脱离这个阴郁之夜，都需要说话，说话：卡托夫要说他在队部如何被捕；京要说监狱，要说与柯尼希谈话的内容，以及从那以后所得知的一切；甚至在进临时监狱之前他就得知，梅并没有被捕。

卡托夫紧挨着他侧身躺着，他们之间仅仅被痛苦构成的空间所分隔。卡托夫嘴巴微微张开，快活型鼻子下方的嘴唇鼓着，眼睛几乎闭着；但那毫无保留、无需检验、只有死亡才能赋予的纯真友谊却将卡托夫和他联系在一起；这个已被定罪的生命在这处处是威胁和伤痕的黑暗之中，在所有这些加入革命的托钵修会<sup>①</sup>的兄弟们中间，同他的生命紧紧地贴在

<sup>①</sup> 托钵修会，又译“托钵僧团”、“乞食僧团”。十三世纪上半叶在教皇扶植下成立的天主教僧侣组织，标榜不占有任何财产，以托钵乞食为生，故名。

一起。上述那些兄弟当中的每一个人在其生命的途程中都死死地抱住唯一能属于他们自己的崇高的东西不放。

看守带进来三个中国人。这三个人既没和伤员们在一起，也没和墙根下的人在一起。他们是在战斗打响之前被屈的，草草审理之后，就等着枪决了。

“卡托夫！”他们之中的一个喊了一声。

原来是娄有顺，海默里希的合股人。

“什么事？”

“你知道枪毙的地方离这儿远不远？”

“不知道。反正听不见。”

较远的一个人说：

“听说刽子手以后要偷你的金牙。”

另一个人说：

“我不在乎，反正我没镶金牙。”

那三个中国人一口接一口，没完没了地抽着烟卷。

“你们的火柴多吗？”一个较远的伤员问。

“多。”

“扔一盒过来。”

娄把自己的一盒扔了过去。

“我很希望有人能够告诉我的儿子，说我死得很勇敢，”娄低声说道。接着把声音压得更低：“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卡托夫暗自庆幸：他既无妻室，又无儿女。

门开了。

“来一个！”看守喊道。

那三个人你挤我，我挤你。

“喂，怎么！”看守说，“快决定呀……”

看守没什么选择。突然，那两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中的一个向前跨出一步，扔掉刚刚点燃的香烟，划断两根火柴又点上了另一支，然后急速地朝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把上衣的扣子一个个都扣好了。牢门随即又关上了。

一个伤员拾起地上的火柴棒。他和身旁的几个人把娄有顺给的那一盒火柴折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抽起签来了。不过五分钟，门又打开了。

“下一个！”

娄和他的同伴臂挽臂地走向前去。娄亮大他那并不嘹亮的嗓门儿，背诵着一出名剧中的英雄赴死的台词；然而，旧有的中国共同体已经完全瓦解了，谁也不听他的。

“到底是哪一个？”士兵问。

他们不回答。

“早晚会轮到的！”

士兵说着，一枪托就把他俩分开了：娄离他比另一个离得近，他就抓住了娄的肩膀。

娄挣脱开来，往外走去。他的同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躺下了。

二京觉得那第三个人比前两个先死的人死起来要难多了，因为只剩下他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此人同娄一样勇敢，因为他曾同娄一起挺身而出。但是现在他趴在地上，蜷缩着双腿，两臂紧抱着身躯，显出一副非常害怕的样子。果然，当看守触他的时候，他的神经质就发作了。两个士兵一个拽



脚，一个拽头，把他抬走了。

京仰面朝天地躺着，双臂收在胸前，合上了双眼：这正是死人的姿势。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双目紧闭，安详的面容泰然自若，似乎在遐想——所有刚死一天的尸体差不多都是这副面容，仿佛要把那最为悲惨的人的尊严表现出来似的。死亡，他目睹的太多了，而且，由于所受的日本教育，他一向认为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死，用一种与自己的生存方式相类似的方法去死是适宜的。况且，死亡是被动的，自杀才算得上自己的行动。一旦有人来提他们之中的第一个人去枪毙，那他就会心悦诚服地自杀。一想起留声机唱片，他的心脏似乎都停止了跳动。那时，还曾有过一线希望！他再也见不到梅了。他唯一应该受责难的地方就是给她带来了痛苦，好象他自己的死是个错误似的。“为死感到内疚了，”他厌烦而自嘲地想。这跟他的父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父亲给他留下的印象一直是刚强，而不是软弱。一年多以来，梅将他从极端的孤独，乃至各种辛酸中解脱了出来。唉！在他已与人世隔绝的情况下，一想起她，希望重温第一次云雨之乐的缠人的念头儿便油然而生……“现在应该让她忘掉我了……”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她，那只会伤害她，甚至会使她与自己更加难舍难分。“那就告诉她去爱另外一个人吧。”啊，监狱，时间停滞的地方——然而在别的地方依然在流逝……不！就是在这个用机关枪与众人隔开的风雨操场里，革命——不管它的命运如何，不管他在何处复活——终将遭受致命的打击；那些在痛苦中，在愚蠢中，在耻辱中干活挣钱的人，不管在哪里，都会象教徒作祈祷一样思念他们这类囚犯的，

况且，在城里，人们已开始爱上了这些垂死的人，好象他们已经离开了人世似的……在最后这个夜晚所笼罩着的大地上，这个充满嘶哑喘息声的地方，男性爱无疑是最为深沉的。同这群躺卧着的人一起呻吟，同这些献身的人共患难，甚至同他们一起低声抱怨……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嘈杂声将这痛苦的低语声一直延续到深夜：与海默里希一样，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有子女。然而，为他们这些伤员所接受的命运伴随他们所发出的嘈杂声在升腾，很象夜晚宁静的气氛一样把京包围了起来——京在一首庄严的挽歌声中，双目紧闭，两手交叉在被遗弃的躯体上。他本想为那个时代最有意义和最有希望的东西而斗争，本想同那些他打算共同生活的人一块儿去牺牲，本想象这些躺卧着的每一个人一样，为赋予生命以某种意义而去牺牲。假如他不愿为自己的生命去牺牲的话，那么，这个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不是独自去死，这种死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这是充满兄弟般颤抖的、将战败者汇集在一起的死亡，民众将在这种死亡当中辨认出他们的先烈。这是血淋淋的传说，而圣徒传就是依据这类传说写成的！怎么，一旦被死神盯上了，难道就听不见这人类献身时的议论了吗？他们在向他呐喊：男子汉有魄力的心不是为一种精神而死的人的庇护所吗？

这时，他把氰化物拿在手中。他曾多次问过自己，他曾不时地想过，自己到底能否轻而易举地死去。他知道，一旦决定自杀，他还是能杀身成仁的；然而，当了解到生活中的孤僻的冷漠态度剥去了我们的伪装之后，在死亡企图以最大的压力压垮他的思想并使之永不复返的时刻，他也并非那么

坦然自若。

不，死亡也许是一种狂热的举动，是一个生命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死亡与生命十分相象；死亡也就是避开这两个踉跄向前的士兵。他照他曾经说过的那样把毒药塞到嘴里嚼碎了，这时他仍然听到卡托夫在焦灼不安地问讯他、捅他，而就在他试图抓住卡托夫的时候，他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他感到他的全部力量都已超越了他的自身，被拽拉到他的身躯之外，以对付一次极其强烈的痉挛。

士兵们到人群中来寻找两个已经爬不起来的囚犯。毫无疑问，既然要被活活地烧死，那就有权享受某些特殊的荣誉，虽然这些荣誉是有限的：他们被一个摞一个或者差不多是一个摞一个地放在同一付担架上，然后便被倾卸到卡托夫左侧的地面上了；已经死去的京躺在他的右侧。士兵们围着手提灯蹲在那块将卡托夫他们与已判死刑的人分隔开的空地上。渐渐地，脑袋和目光重又陷入了黑暗之中，只是偶尔才转向灯光，它照出了大厅深处囚犯们所占据的地方。

京至少喘息了一分钟。京死后，正因为卡托夫周围全都是自己的同志，所以他更感到自己被抛进了更深沉、更痛苦的孤独之中。那个要被带出去杀害、由于神经质发作而全身哆嗦的中国人，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然而，在这放弃一切的气氛当中，他却有一种安息的感觉，似乎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所盼望的。不过，他是在一生中最不幸的时刻才逢临并得到这种安息的。他不知在哪儿读过这样一段话：“一直为我所羡慕并始终在吸引着我的，不是那些新发现，而是那些探险家们所经历的苦难……”象是呼应他的想法似的，远方的

汽笛声第三次传进了大厅。左边紧挨着他的两个人吓了一跳。这是两个十分年轻的中国人：一个是孙，卡托夫只因同他在队部里一起战斗过才认识他；第二个人，不认识。

（不是裴）。为什么他们不和其他人在一起呢？

“是因为组织战斗小组？”他问。

“因为谋杀蒋介石，”孙。

“和陈一起？”

“不。他是想一个人去扔炸弹，但蒋介石没在汽车里。我呢，我在很远的地方等汽车过来。炸弹没扔出去我就被捕了。”

回答的声音哽得厉害，卡托夫便仔细地打量起这两张面孔来：两个年轻人哭了，但并没抽噎。“言语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卡托夫心想。孙企图动动肩膀，但痛得他龇牙咧嘴——他也伤在胳膊上。

“被烧死，”他说。“被活活烧死。眼睛也一样，眼睛，你懂吗……”

他的同伴这时抽噎起来了。

“出个什么意外事故也可能会烧死的，”卡托夫说。

似乎不是他们俩在相互对话，倒象是在跟某个看不见的第三者讲话。

“这不是一回事。”

“不，那反倒不如这样好。”

“眼睛也一样，”孙用更加低沉的声音重复着，“眼睛也一样……每一个手指，还有肚子，肚子……”

“别说了！”另一个拼命提高嗓门儿说道。

他本想喊叫，但却喊不出来。他的手在孙那肌肉已经收缩了的伤口附近抽搐着。

“人的尊严”，卡托夫咕哝着，想起了京会晤柯尼希时的情景。没有一个囚犯再说话了。手提灯那边这时已是漆黑一片，但仍可以听到伤员们的吵嚷声……他向孙及其同伴身边靠了靠。一个看守正在给其他看守讲故事：他们呆在手提灯和囚犯们中间，脑袋都聚拢在一起。那些囚犯们相互间甚至都看不清楚。尽管人声嘈杂，尽管周围有这些曾象他一样战斗过的人，但卡托夫依然是孤独的，他在他死去的朋友的尸体和这两个被吓呆了的同伴中间是孤独的，他在这大墙和那消失在夜空中的火车汽笛声中间是孤独的。然而，一个男子汉还是可以比这孤独，甚至也许可以比那残暴的汽笛声更有力量：在他身上，恐惧正同他生命中最可怕的念头搏斗着。他解开了自己腰带上的扣环，终于开口说道：

“喂，得了，”他用极其低沉的声音说。“孙，把你的手放在我胸脯上，我一碰到你的手，你就接着：我要把我的氰化物分给你们俩。仅仅只够两个人用的。”

除了说只够两个人用的之外，他就不打算说别的了。他侧身躺着，将氰化物掰成了两块儿。看守们挡住了灯光，只有一轮模糊的光环围绕着他们，难道这些家伙就不会挪动挪动吗？看什么也看不见。卡托夫把这件比生命还宝贵的赠品放到了递在他胸前的这只热手里了，既没有交给躯体，也没有交给声音。这只手象个动物似地抽搐了一下，随即就离开了他。他等待着，全身绷得紧紧的。突然，他听见其中的一个声音说：

“掉了！丢了！”

由于恐慌，这声音几乎有点走调儿，仿佛这样的灾难本来是不可能发生似的，仿佛一切都本该顺利解决似的。在卡托夫看来那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一股按捺不住的怒火涌上了他的心头，但是他已不可能发火了，火气又平息下去了。可终究还是真丢了呀！难道把那玩艺儿交给这个白痴就是为了让他丢掉吗？

“什么时候？”他问。

“还没到我身前就丢了。孙递过来我没拿住，我也是手上受的伤。”

“他把两份都掉了，”孙说。

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他俩中间寻找着。接着，他们又在卡托夫和孙中间寻找，看来另外那个人很可能快趴到孙的身上了，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卡托夫却感觉到自己旁边象是有两个躯体。他也找了起来，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烦躁情绪。他把手平放在地上，十公分十公分地向前摸索着，能摸的地方都摸到了。他们俩的手轻轻地触及到他的手了。突然，其中的一只抓住了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不放了。

“即便我们一块儿也找不着……”其中一个声音说。

卡托夫也握着对方的手，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他被这种看不见面孔的，几乎听不出本来声音（所有的低语声都很类似）的可怜的友情打动了。他们在一片黑暗之中向他表示这种友情，是为了报答他平生从未做过的、这次也许是枉费心机的最伟大的馈赠的。虽然孙还在继续寻找，但这两只手却始终握在一起。紧握着的手猛然一收缩：

“找着了！”

噢！复活了！……但是：

“你能肯定那不是石块吗？”另一个问。

地上有许多灰泥块儿。

“给我！”卡托夫说。

卡托夫在指尖上摸了摸，辨出了外形。

他把氰化物还给了他们——还给了他们——更紧地握住了在重新寻找自己手的那只手。然后便开始等待，他肩膀抖动，牙齿咯咯作响。“虽然外面有一层锡纸，但愿氰化物不要分解”，他想。忽然，他握住的那只手，使劲地拧起他的手来，好象他就是通过这只手同那个陷于黑暗之中的躯体取得联系似的，他感到这躯体绷得越来越紧了。他想望这痉挛性的窒息。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也哽咽地叫了一声，但谁也没有在意。接着，便无声无息了。

卡托夫觉得自己被人遗弃了。他转过身来趴在地上等待着。他的双肩始终没有停止抖动。

午夜时分，军官又露面了。六个士兵在一片武器的撞击声中向囚徒们走来。囚徒们全都被惊醒了。这只新的手提灯同样也只照出某些模糊的长长的身影——简直象是些已经培上土的墓穴一样，只是眼睛里有点反光。卡托夫终于站立起来。押送队长拽起京的胳膊，觉出已经僵硬了；接着又去拉了孙，也僵硬了。喧闹声从囚徒的前边几排一直蔓延到最后几排。押送队长抓着头一个人的脚把一条腿抬了起来，接着又抬起第二个人的一条腿；两条腿都直挺挺地落到了地上。他把军官唤了过来。军官也照此动作了一番。囚徒们发出的

喧嚣声有增无减。军官打量了一下卡托夫：

“都死了？”

为什么要回答呢？

“把离他们最近的六个犯人隔离起来！”

“无济于事，”卡托夫答道：“是我给他们的氰化物。”

军官蹒跚起来：

“那你呢？”他终于又问道。

“只够两个人用的，”卡托夫十分得意地回答。

“我脸上准会挨一枪把子，”他想。

犯人中的喧闹声几乎变成了大喊大叫。

“咱们走吧，”军官只这样说了一句。

卡托夫没有忘记，他已被判处死刑，他看到过对准他的机关枪，还听到过扫射的声音……”一到外面，我就要想法掐住一个敌人的脖子，掐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先处死我。他们一定会用火烧我的，但烧的却是死的。”恰在这时，一个士兵将他拦腰抱住。另一个士兵把他的双手背剪过来捆上了。“算这些小子运气，”他心想。

“得！就算我是在一场火灾中烧死的吧！”他开始迈步了。寂静犹如一扇翻板活门一下子又降临了，虽然还有呻吟声。这时，手提灯把卡托夫黑影投射在夜间的大窗户上，就象刚不久投射在白色的墙壁上一样。他由于伤口疼痛，步履沉重，一步一停。当他蹒跚着挪近手提灯时，他脑袋的影子便消失在天花板上了。整个黑暗的大厅都活跃起来了，人们目送着他一步一呆地走去。大厅内是那样的安静，以至于每当他那沉重的脚步落地时，都会发出咚咚的响声；所有的脑袋



都跟随着他迈步的节奏一上一下地点动着，充满了爱慕、恐惧、屈从之情，仿佛在经历这场折磨的离别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暴露得十分充分，尽管他们的动作都大同小异。所有的人都抬着头呆呆地望着，门又关上了。

从地面上开始发出一种睡眠时那种深呼吸的声音，那是因为所有尚未死去的囚犯都在用鼻子进行呼吸的缘故，他们上下颌骨被忧虑粘得紧紧的，正在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火车的汽笛声。

次日。

吉索尔凝视着自己的烟枪已有五、六分钟了。他面前摆着一盏点燃的烟灯——“它可以使人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一个开盖的小烟剂盒和几根擦得干干净净的烟枪杆子。屋外是黑夜；屋内是小烟灯的灯光和一个明亮的大长方形。隔壁房间的门敞着，里面停放着已被运回来的京的尸体。风雨操场已为新来的囚犯腾了出来，把那些扔在外面的尸体搬走是没有人反对的。卡托夫的尸体没有找到。梅如同运送一个重伤员似的小心翼翼地将京的尸体运了回来。京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不象自杀前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安详，由于窒息时的抽搐，他已完全不象人样了。在整容之前，梅一边给他梳头，一边在心里跟这副面孔进行最后一次交谈，她说的都是些使人听了不舒服的慈母般的话语，这些话，她不敢说出声来，生怕被她自己听到。“我心爱的”，她咕哝

着，就好象说的是“我的亲骨肉”似的，因为她深知这是属于她自己的，不是外人的，是从她心上夺走的：“我的命根子……”她意识到了自己是在跟一个死人说话。但是，很久以来，她已经不再流眼泪了。

“凡帮不了任何人忙的痛苦都是荒唐可笑的”，被烟灯所吸引并被迷惑住的吉索尔这样想着。“那里宁静。宁静。”但他却不敢伸手。他是不相信死后会继续生存的，他对死人也一点不敬重；然而，他却不敢把手伸出去。

她走近他，松软的嘴唇在她那张目光呆痴的面孔上歪斜着……她把自己的手指轻轻地搭在他的手腕上。

“请来一下，”她用一种不安的，近于低沉的声调说。“我觉得他身上又有点热气了……”

吉索尔在这张极端痛苦但丝毫也没有丧失理智的脸上看着她的眼睛。她并非心绪不宁地望着他，目光里恳求多于希望。毒药的效力总是没准儿的；而且她本人就是个医生。他起身跟在她的后面，但对此也不愿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沉溺于这种希望之中的话，一旦这个希望从他的心头抹掉，那他可就经受不了了。他摸了摸京那永远不会再有皱纹的发青的前额：前额冰凉，毫无疑问是死亡的寒气。他不敢将手抽回，也不敢正视梅的目光，于是他把目光停留在京那张开的手上，手纹已开始消失了……

“没有热气了，”他说，重又陷入了悲痛之中。其实他一直处于悲痛之中。他发觉自己一开始就没相信梅的话。

“那就算了……”她无可奈何地说。

她目送吉索尔犹豫不决地走进隔壁的房间。他在想什么

呢？只要在那儿，想什么都与京紧密相关。京的死期待着她一种什么东西，期待着一种她不了解但却并非不存在的答复。噢！别人用祈祷，用悼念之花交上了令人卑鄙龌龊的运气啊！一个超越了焦虑的答复，这种焦虑从她手中夺走了慈母般的抚爱，没有一个孩子从她那儿得到过这种抚爱；一个超越了可怕的呼唤的答复，这种呼唤让人用生活中最温柔的形式同那些死者说话。这张嘴昨天还对她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可它再也不能说话了；不是要同微不足道的生命所残留在这儿的的东西——一个尸体相通，而是必须同死亡本身相通。她呆在那里一动不动，竭力回忆无可奈何地沉思过的如此之多的极度苦恼，在狂烈而徒劳地迎接死亡的过程中，由于情绪消极，她显得过于紧张。

吉索尔重新躺到了长沙发上。“再过一会儿，我一定能清醒过来……”以后每天早晨他这样“死亡”，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呢？烟枪就在那儿；宁静。只要伸出手，准备好烟泡，一刻钟之后，就可以恣意去想死亡本身，如同去想某个企图伤害自己的瘫痪病人一样；死亡再也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了；它将丧失所有的捕获物，并将悄悄地溜进宇宙的宁静中去。超脱就在那儿，就在眼前。对死人一点忙也帮不上。为什么要更加痛苦呢？痛苦这件祭品到底是奉献给爱还是奉献给恐惧的呢？……他一直不敢去碰烟具盘，充斥在他喉咙里的既有焦虑，同时又有愿望和已被抑制住的呜咽。他顺手操起一本小册子（他从不去动京的书籍，但他知道这本东西他也是不会读的）。这是一期《北京政治》，抬尸体时碰落在那儿的，里面有一份讲演稿，吉索尔就是因它而被学校开除

的。在空白处有京的笔迹：“这是我父亲的讲话稿”。他甚至从未对自己说过他赞同这个讲话。吉索尔慢慢地合上了小册子，眼睛注视着他那已经消逝了的希望的象征。

他打开房门，将鸦片烟抛向夜空，回身重新坐下，双肘低垂，等待着黎明的到来，等待着他的痛苦化为宁静——由于总是跟痛苦对话，他已耗尽了精力……虽然痛苦使他的嘴巴微微地张着，使他的严肃表情变成了一副惊愕的面孔，但他仍未丧失自控的能力。这一夜，他的生活即将起变化：思想的威力不足以控制变态，可是死亡却能迫使一个人变态。从今往后，他只能把自己交托给自己了。世界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已不复存在了；在那儿，在那个把他同天地万物联系起来的尸体旁，永恒的静止状态就象是上帝寻了短见。他从京那里等来的既不是成功，也不是幸福，而是一个没有京的世界……“我已被时代抛弃了”，孩子顺应了时代和世事的演变。毫无疑问，如同感到苦恼一样，吉索尔在内心深处仍抱有希望，但是希望不存在了，只好等待，而且必定是在他的爱遭到蹂躏之后才能发现这一点。然而，毁掉他的那一切在他身上却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死后会有某种美好的东西”，他想。他感到最大的痛苦正在自己身上颤动，这痛苦不是来自有生命的东西或世间之万物，而是人的自身深处产生出来的，我们在生活中试图从这种痛苦中摆脱出来，他可以避开这种痛苦，但仅仅是在停止思念它的时候才能做得到；然而，他在痛苦之中越陷越深，似乎这种受到惊扰的沉思是死神唯一能听得见的声音，似乎这种一直浸透到他心灵深处的做人的痛苦是他被杀害的儿子的尸体所能听得

见的唯一的悼词。

## 第七部分

七月，巴黎。

费拉尔是最后一个到达财政部长接待室的，他用一张报纸扇着风，这张报上登着“康采恩”遭到最猛烈攻击的消息。“流动资金总署”副署长，法兰西银行，法国最大的实业银行和一些信贷银行的代表们，都聚集在这儿等着接见。

（而费拉尔的哥哥已于上周明智地称病了）。这些人，费拉尔全都认识：一个是什么高官的儿子，一个是什么权贵的女婿，剩下的都是“财政视察局”或“流动资金总署”过去的官员们。国家和银行之间的联系太密切了，银行依附于官员们，肯定会有好处，因为这些官员在他们那些旧同僚那里会得到优惠的际遇。费拉尔进来的时候，发现他们都很惊奇：按照惯例，他总是在他们之前到达。他们看他没来，还以为他没被召见呢。他竟最后一个来，这很出乎他们的意料。他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对他的看法，他和他们不同的穿着打扮等，这一切在他和他们之间构成了一条鸿沟。他和这些人是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

他们很快就被引见了。

费拉尔对部长了解不多。他面部这种隔世的表情，是不是受他这一头象摄政时期<sup>①</sup>流行的假发一样厚的白发的影响？清秀细嫩的脸庞，明亮闪光的眼睛，笑容可掬的神态——这副老国会议员的面相，完全和有关部长彬彬有礼的传说相吻合。这一传说是与有关他暴躁的传说相提并论的，他暴躁时就象被蜂子蜇一样，属于拿破仑式的暴躁。当每个人都就座的时候，费拉尔想起部长一段有名的轶事来：那还是在当外交部长的時候，有一次他抓住法国驻摩洛哥使节礼服的燕尾摇晃着，突然，礼服的后背开线了，他摇铃叫人：“把我的礼服拿一件给这位先生吧！”当接待员离开房间时，他又摇铃：“拿一件最旧的来，他不配穿别的！”他当时的面孔是非常富有魅力的，不象现在这样，一只无神的眼睛，总象是否认他嘴里所答应东西似的：这只眼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受伤，换成玻璃球的了。

他们都落座了：流动资金总署副署长坐在部长右边，费拉尔坐在部长左边，代表们坐在办公室里边的长沙发上。

“先生们，你们知道，”部长说，“我为什么把你们召来。你们对问题一定都研究过。我让费拉尔先生把问题概括地跟你们谈谈，并且请他谈谈他自己的看法。”

代表们都一如既往耐心地等着他来吹牛。

“先生们，”费拉尔说，“在这样的谈话中，按理说，应该出示一些乐观的借贷对照表。诸位手头都有财政视察局的报告。实际上，‘康采恩’的形势，比这份报告估计的还要

---

<sup>①</sup> 指1715—1723年法国奥尔良公爵摄政。

坏。我既不向你们呈报过高的预算项目，也不去谈论不可靠的债权。‘康采恩’负债是明摆着的，这一点在座的诸位都清楚；但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任何报表都不可能表示的有关资产的两点，正是根据这两点，才请诸位帮忙的。

“第一，‘康采恩’是法国在远东从事这方面事业的唯一的代表。它即使出现赤字，即使濒临破产，它的结构，它的经纪人的布局，它在中国内地的收购站和销售点，它的印支产品公司和中国买主的联系，所有这一切都在维持着并且也能维持下去。在长江流域的半数商人眼里，法国的‘康采恩’就是日本的三菱财团，我这样说是一点儿不夸张的。我们的组织，诸位都知道，规模之大，可以和美孚石油公司相提并论。再说中国革命也不是没完没了的。

“第二，由于‘康采恩’和中国的大部分商业有着联系，我以最有效的方式参加了蒋介石将军的夺权斗争。从现在开始，他完全同意把协定中规定由法国修建的那一部分中国铁路委托给‘康采恩’去承建。你们是了解它的重要性的。我就是根据这个情况才请诸位答应给予‘康采恩’以帮助的。我认为正是由于蒋介石的出现，才能保证在亚洲代表我们国家的唯一强大的组织不致在那里消亡，即使它从建立它的人手中脱离，也不致消亡。”

代表们很细心地看着他们已经了解的、对他们来说毫无新意的资产负债表。人人都盼着部长开口讲话。

“不要使信贷受到影响，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利益，”部长说道，“也同时关系到各银行的利益。和中国工商银行、‘康采恩’同样重要的一些组织的破产，对每个人都会是



不利的……”

他眼睛失神，无精打采地说着，身子靠在扶手椅背上，用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放在他面前的吸墨板。代表们都希望他的态度明朗些。

“部长先生，您能否允许我，”法兰西银行的代表说，“向您发表一点略为不同的意见？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不代表任何信用银行，所以我可以主持公道。的确，几个月来股票行情的暴跌，使存款减少。但是，六个月之后，被提取的数目又会自动收回，而且正是在那些最主要的、最有担保的银行里收回。‘康采恩’的破产对于这些先生们所代表的银行来说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倒很可能对它们有利……”

“此外，拿信贷当儿戏总是欠谨慎的：十五家省级银行的倒闭，对各银行都是没有好处的，这是由于它们所让采取的政治措施造成的。”

“这些话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费拉尔心里想，“法兰西银行无非是怕自己也被卷进去罢了。假如各银行都付款，它自己也得付。”沉默。部长讯问的目光扫到了一个代表的脸上：这人有一副轻骑兵上尉的面孔，拉出训人的架势注视着他，并有板有眼地说：

“我们平时聚会时的谈话都差不多，我现在要唱点反调。我应该说，从提交给我们的借贷对照表所涉及的全方面的总体上着眼，我不象费拉尔先生那么悲观。财团银行的形势是糟糕，一点不错；但是，某些公司即使在目前的状况下，也还是能够维持的。”

“我请你们维持的是一个事业的整体，”费拉尔说，

“‘康采恩’一旦垮了，对法国来说，它的工商企业就会全部丧失意义。”

“不管怎样，”另一个面目清秀的代表说，“在谈到‘康采恩’的主要资产时，我倒觉得费拉尔还是乐观的。公债还没有发行吗。”

此人在说话的时候看着费拉尔西服上衣的翻领。费拉尔困惑莫解地跟着他瞧了瞧，终于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佩带勋章。他是故意的。谈话对方是荣誉勋位的第三级获得者，他心怀敌意地看着这个翻领上面的炫功的饰眼儿。费拉尔从来不希望被人尊重，只注重实力。

“您知道，公债是会发行的。”他说，“发行与偿还，这取决于美国银行，与那些让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客户无关。”

“我们设想一下：偿还公债，天知道铁路还能不能建成？”

“但是，”费拉尔有点惊讶地说（对方不会不知道他将回答什么），“绝大部分基金投放给中国政府，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些基金将从美国银行直接转给制造设备的企业，这是明摆着的。如果不是这样，您想美国会发放公债吗？”

“那当然。但是蒋介石有可能被杀掉或者被打败；假如布尔什维克死灰复燃，公债就不会发行了。至于我，我不相信蒋介石会长久掌权。我们的新闻报道了他即将垮台的消息。”

“共党分子到处被镇压，”费拉尔回答说，“鲍罗廷刚离开汉口，回莫斯科去了。”

“不错，共党分子是受到镇压；但绝不是共产主义受到

镇压。中国绝不会走回头路了，即使蒋介石胜利了，新的共产主义浪潮也是会令人担忧的……”

“依我看，在未来的十年内，他会在台上的。再说，不冒点风险是一事无成的。”

（他想：“只凭你们的那点勇气，总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忘了土耳其一个子儿也不还你们，用你们的钱去买大炮的时候了？单靠你们自己，什么大气候也成不了。你们象妓女一样委身于国家，你们却把卑怯当作智慧。你们以为只要续胳膊，就可以变成米洛的维纳斯<sup>①</sup>吗？这也太过分了！”）

“如果蒋介石能在政府中站稳脚跟，”一个头发卷曲的年轻代表温和地说，“中国将恢复它的海关自治权。即使同意费拉尔先生的全部设想，但有朝一日，只需中国的一些法律，便能使他股票的全部价值化为乌有，谁会对我们说，他在中国的股票不会丧失价值呢？对此可能有各种回答，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会有各种回答。”费拉尔说。

“反正这件事情是没有把握的，”一个军官模样的代表说，“退一步说，即使不承担任何风险，至少使贷款变成长期性的，这实际上也就参与了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热尔爱先生就是因为在法国的最好企业之一——苯胺颜料公司入了股，险些使里昂银行破产。我们的作用，不是投身于一些企业，而是发放有担保的短期贷款。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应该让实业银行去谈。”

<sup>①</sup> 维纳斯（Venus），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1820年在希腊米洛岛（Milo）发现著名的米洛的维纳斯塑像。

又出现了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费拉尔琢磨着部长为什么不介入。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说的都是这套话，咬文嚼字犹如亚洲的宗教语言，但也并非那般复杂费解。显而易见，“康采恩”的担保是不充分的，不然，他来这儿干什么？大战以来，由信贷银行和大实业银行的介绍，法国用储金认购了商业股票和债券，使法国储金蒙受的损失（正如进行要挟的报界所说，他想到这里，愤怒使他狂热），达到四亿左右，比法兰克福条约的数字多得多。一宗赔本的买卖要比一宗赢利的买卖付出更多的佣金，事情就是这样。难道还有必要由一家信贷银行把这赔本的买卖推给所有的信贷银行吗？他们是不会出钱的，除非部长断然地介入，因为费拉尔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他没有结婚；有女人的问题。人们都怀疑他吸鸦片。他讨厌“荣誉勋位”。他太自负了，他既不遵守习俗，也不当伪君子。可能伟大的个人主义只能在虚伪的粪土上才能得以充分发展：博尔贾成为教皇并非偶然……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者，不是活跃在十八世纪那些醉心于道德观念的革命者中间，而是活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社会结构之中，这是尽人皆知的……

“部长先生，”最老的一个代表说，他说话时，一些音节和象他波浪式头发一样白的短须同时都被吃掉了，“让我们来帮助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说定了。这您知道。”

他摘下了夹鼻眼镜，他那手指微微分开的双手的动作变成了瞎子的动作。

“可是不管怎样，还应该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我的意

思并不是说我们当中谁拿不出五百万，好了。”

部长不易被人察觉地耸了耸肩膀。

“这不是问题所在，因为，‘康采恩’最少应该付还两亿五千万的存款。问题在哪儿呢？如果国家为这样大规模的股票行情暴跌伤脑筋的话，那国家就该解决资金问题；谈到拯救法国和安南的存户，法兰西银行和印支联邦政府比我们更适合。我们也有我们的存户，有我们的股东。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代表各自的银行……”

（“事情很清楚，”费拉尔想，“假如部长直言不讳地要求用资金接济‘康采恩’，那就既不会有存户，也不会有股东了。”）

“……我们当中哪一位能断言，他的股东们会同意贷款去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银行？我们非常清楚这些股东们——还不止他们——是怎么想的，部长先生，他们认为，市场应该整顿，那些朝不保夕的工商业应该让它们倒闭；人为地维持它们实际是给所有人帮了最坏的倒忙。假如那些不可救药的工商业自然而然地得到维持，那么决定法国商业命运的竞争，还有什么效力呢？”

（“朋友”，费拉尔想，“上个月你的银行还曾要求国家抬高海关税率百分之三十二，想必是为了有利于自由竞争吧。”）

“……是不是这样？我们的职业，正如大家十分正确地指出的，就是在有担保的情况下提供贷款，费拉尔先生为我们做出的担保……这你们都叫费拉尔先生自己亲口讲了。我们如果答应为‘康采恩’提供它所需要的基金，那么国家能在这里代替费拉尔向我们担保吗？总之一句话，国家是不是要

求我们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忠心耿耿？或者，是不是国家——而不是费拉尔先生要求我们为流动资金的周转甚至是长期的周转提供方便？论第一点，它不是已经得到了我们所尽的忠心了吗？但最终总要考虑到我们的股东；论第二点，国家为我们担保什么了呢？”

“这话简直是密码，”费拉尔心想。“如果我们不是在演戏，部长就该回答：‘我领略了忠心这个词的滑稽意味，你们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你们和国家的关系。你们既不是靠工作也不是靠效率过日子，而是靠佣金，佣金对你们银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国家已经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给了你们一亿；跟你们要回两千万，你们为它的名字祝福吧，但给我走开吧。’可是不存在任何危险。部长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盒焦糖，挨个儿递过去。每人吃了一块，只有费拉尔没吃。他现在了解了银行代表们的心情：既然不答应部长点什么离不开部长的办公室，那就出钱吧，但要尽量少出为妙。至于部长……费拉尔等待着，他确信部长正在这样想：“舒瓦瑟尔<sup>①</sup>如果处于我的地位，他会怎么做呢？”似乎会这样做：部长不是向有权有势的名流求教意志方面的经验，而是寻求举止或讽刺方面的经验。

“流动资金总署副署长先生如同我本人一样，”他用铅笔轻轻地敲着桌子说，“他会告诉你们说，不通过议会投票我是不能这样向你们担保的。先生们，我把你们召集在一起，因为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关系到法国的声誉，把这个问题

<sup>①</sup> Choiseul Étienne-francois (1719—1785)，1758—1770为路易十五的外交部长，他才气横溢地医治了“七年战争”创伤。

公布于众，你们认为是爱护这种声誉的好方式吗？”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但是，对不起，部长先生……”

沉默。代表们嚼着焦糖，突然觉得，如果一开口，就可能冒出奥弗涅地区的口音来，于是便装出沉思默想的样子。部长沉着脸一个一个地巡视着他们；费拉尔从他的玻璃眼球的侧面看着他，好象看南美洲一个白色鸚鵡，在百鸟中悲伤地一动不动。

“依我看，先生们，”部长接着说，“我们在这一点上算是取得了一致意见：不管我们眼前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存款必须付还。印支联邦政府将接济‘康采恩’五分之一的资金。你们能接济多少？”

现在，每个人都装作嚼焦糖。“小小的玩笑，”费拉尔心里想，“部长是想消遣一下，但有没有焦糖效果是一样的……”他了解部长提出的论据的价值，是他哥哥回答了那些要求流动资金总署不通过议会投票进行兑换的人：“我为什么不擅自再给我的女朋友两亿呢？”

沉默，比前几次更长的沉默。代表之间窃窃私语。

“部长先生，”费拉尔说，“如果让‘康采恩’那些并无风险的工商业，以各种方式复兴起来；如果使存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付还，难道您不认为有必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其中包括维持‘康采恩’的努力吗？在国家的眼里，一个规模如此宏大的法国组织的存在，竟没有几亿存款重要。”

“五百万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先生们。”部长说。

“我是否应该更恳切地要求你们尽一尽你们所表示的忠心？我知道，你们和你们的董事会都坚持不让国家对银行进行监

督。难道你们不认为象‘康采恩’这样企业的衰落会促使公众舆论更加强烈地也许是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求这种监督吗？”

“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了”费拉尔想，“这只能说明：‘再别让我出这滑稽可笑的五百万了。’要对银行实行监督，而当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与实行监督的措施背道而驰的时候，这种监督就只是一种荒唐可笑的威胁。同这位把持哈瓦斯通讯社的代表不想制造舆论反对部长的运动一样，部长也并不真想求助于这种监督。国家反对银行不能比银行反对它更厉害。因为共同的人员、股份、心理，使它们总是串通一气的。同一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之间有斗争，而公司就是靠这种斗争来维持的，只是维持得不好罢了。如不久前在拉斯托饭店，他必须毫不示弱，一点不动怒，才能保全自己。但他最终还是被击败了：他尽管充分发挥了他的主要才华，但这对他处于那些人的对立面的局面没起丝毫的补偿作用，而以往当他处于这种受侮辱地位的时候，他对这些人的人格和作风一直都是鄙视的。他的力量比他们都薄弱，因此，即使在他公司本身的系统，他想的主意也都是行不通的。”

“部长先生，”年岁最大的那个代表说，“我们再一次向国家表示我们的诚意。但是，如果没有担保，面对我们的股东，我们预计给予‘康采恩’的贷款不会高于需要归还的存款总额，并将由我们促使那些无风险的财团工商企业的复兴来担保。天晓得，我们并不指望这种复兴，我们只是为了尊重国家的最高利益才争取这种复兴的……”

“这个人，”弗拉尔想，“真是一个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人物，他那退休教授的模样变成了希腊神话中的瞎眼



俄狄浦斯。当必须在俄国、波兰和北极修建战略铁路的时候，所有的笨蛋，包括法国在内，都来向他的代理行的经理们请教，致使国家日趋减少的资金流到这些人的腰包里！战后，在长沙发上并排坐着的这些人使法国的储蓄金消耗达一百八十亿，这只能由公债开销。太好了！这正应了他十年以前说过的话：‘不论是谁，向一个不知底细的人请教如何存放他的财产，那就等于破产。’一百八十亿，且不说商业方面的四百亿，也不包括我的。”

“达米拉尔先生的意见如何？”部长问。

“部长先生，我只能附合您刚才听到的发言。跟德摩雷斯先生一样，我不能在没有他所说的担保的情况下把我所代表的银行抵押出去。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为的是不冒犯把这个银行变成了欧洲最强大的银行之一的原则和传统，尽管这些原则和传统经常遭到攻击，但当国家求助于这个银行的时候，正是这原则和传统促使它为国家尽忠的。五个月以前这样做了，现在正这样做，今后也许还会这样做。正是由于政府经常提出这种要求而且我们已决定倾听这种要求，部长先生，我才被迫要求担保。何况这些原则和传统是要求我们向我们的存户提供这种保证的。部长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说清楚：正是由于这些担保，我们才听从您的吩咐。我们投放二千万不成问题。”

代表们面面相觑：存款将付还。费拉尔现在才明白部长刚才的用意：不介入，但却要讨他哥哥的欢心；让人付还存款；让银行支付资金，但越少越好；可以起草一份令人满意的公报。讨价还价仍在继续进行。“康采恩”将被摧垮。假

如存款付还了，它即使垮台，对部长也无关紧要。银行将会得到它们曾要求得到的担保（它们还是会受到损失，尽管损失很小）。假如某些工商业能够支撑下来，它们就将成为银行的子公司；至于其它……上海发生的各类事件即将在那里毫无意义地自消自灭。他倒想尝尝自己被剥夺的滋味，倒想看着他赢得的，或者说抢来的事业在摆脱他的控制之后依然生机勃勃地发展。但部长将要看到的却只是他对商会的恐惧；他今天不会撕破男礼服。费拉尔要是他，准会先挑起经过整顿的“康采恩”的担子，然后再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持它。至于那些银行，他始终断言它们患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恐惧症。他自豪地回想起他的一个对手所说过的一句话：“费拉尔总希望银行变成赌场。”

近处的一台电话响了起来。一个专员走进来：

“部长先生，内阁总理先生的电话。”

“告诉他，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不，我去吧。”

他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又返身回来，用目光探询着那个法国最大实业银行的代表，只有这家银行在那儿有代表。他那笔直的小胡子跟夹鼻眼镜平行，秃顶，疲惫不堪，一直到现在一言未发。

“维持‘康采恩’跟我们毫不相干，”他慢条斯理地说。

“法国参加修建铁路一事已由协议确保下来。如果‘康采恩’垮了，另一个企业就会形成和发展，并将取而代之……”

“可是这个新公司，”费拉尔说，“不努力去实现印度支那的工业化，却热衷于分配股息。因为这个新公司不会为蒋介石做什么事情，所以必将面临您目前所要面临的处境，

假如您从没为国家做什么事情的话。此外，美国或英国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在法国的庇护之下钻这些协议的空子，这是显而易见的。再说，您将把拒绝借给我的那笔钱借给谁呢？我们之所以创立‘康采恩’，是因为当时法国在亚洲的银行执行的是那样一种担保性政策，它们宁愿把钱借给英国人，也不想贷款给中国人。我们所奉行的是一种冒险政策，这是……”

“我不敢这么说。”

“……很明显的。我们将自食其果，这也是很正常的。储蓄金将受到保护（他撇撇嘴微微一笑）以致使亏损达五百八十亿，而不是五百八十几个亿。因此，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先生们，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着‘康采恩’将怎么消亡吧！”

神户。

一贫如洗的梅租不起汽车，迎着明媚的春光，朝嘉麻住宅的方向走去。假如吉索尔的行李很重，那就得向老画家借些钱才能再去搭船。吉索尔离开上海时曾对她说过，他将到嘉麻家去躲一下；到这里后，他写信把地址告诉了她。从那以后，便杳无音信了。甚至当她写信告知他，他已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授时，也无回音。难道是害怕日本警察吗？

她一边走，一边看裴写给她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轮船抵达神户办理护照签证时收到的。陈死后，她曾在她躲避的

别墅里为陈的这位年轻的追随者安排了一个藏身之处。

“……我昨天见到了海默里希，他很想念您。他在电厂当装配工。他对我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了为什么而工作，我不再干等死了……’请告诉吉索尔，我们都在等他。自从到这儿以后，我总在想他上课时所说的话：‘当文明最痛苦的因素——奴隶的耻辱，现代工人的劳动——突然变成一种价值的时候，当奴隶不再回避这种耻辱、而是期待着从这种耻辱中解救出来的时候，当工人不再是逃避这种劳动、而是在这种劳动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的时候，文明本身是会转化的。应当使那种还只是地下墓穴教堂似的工厂变为主教座堂似的工厂，应当使人们在那里见到的不是神明，而是人类向地球开战的力量……’”

是的，毫无疑问，只有看到人类所改造的那一切，才可了解人类的价值。革命刚刚经受一场可怕的疾病，但并没有夭折。是京和他的同志们——不管他们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不管他们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把革命传播到人间来的。

“我要作为一名宣传鼓动者重返中国。那儿的一切并没有完结。也许我们会在那里重逢：我听说您的请求获准了……”

对陈只字未提。

她并不认为他信里写的不重要，可是在她看来，他写的这些都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味，就象陈所干的一切充满青春狂热的知识分子味一样。一份剪报从折叠的信中掉了出来。她拾起来：

“劳动应成为阶级搏斗的主要武器。世界上最雄伟的工业化计划目前正在研制中。计划规定，五年内要改变整个苏联的面貌，把它建成欧洲第一流的工业强国之一，继而赶上并超过美国。这个宏伟的事业……”

吉索尔身穿和服，正站在门楣下等她。过道里不见行人。

“我的信您都收到了吗？”她一边问，一边走进一间房间，里边空无一物，只有席子和纸张。门心板已撤掉，整个门洞都裸露着。

“收到了。”

“我们快走吧：再有两小时船又要开了。”

“我不走了，梅。”

她看了他一眼。“用不着问，”她想：“他自己会说明的。”但他却问道：

“您以后打算做什么？”

“想在妇女宣传鼓动支队里做点事。据说已基本安排好了。我后天到海参威，随后就去莫斯科。如果不成，我就到西伯利亚当医生。不过，我很不愿意再给人看病了！……不打仗的时候，总是和病人生活在一起，这需要某种神的保佑，可是没有任何神再保佑我了。再说，现在我几乎不忍心再看死人了……假如必须这样做的话……这也只是为京报仇的一种方式。”

“人到了我这个岁数，也就不想报仇了……”

确实，他身上真有某种东西变了。他神态冷漠，离群索

居，在这个房间里，仿佛只有他的一部分同她呆在一起。因为没有座位，他躺在了地上。她也在一个烟具盘的旁边躺了下来。

“那您自己想干什么呢？”她问。

他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膀说：

“多亏了嘉麻，我在这儿当上了西方艺术史的客座教授……瞧，我又干起我的老行当来了……”

她在寻找他的目光，惊愕地说：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被击败了、我们的医院被关闭了，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许多秘密组织在各个省份又重新建立起来了。我们的人再也不会忘记，他们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另外一类人造成的，而不是前世的报应。您曾说过：‘他们从三千年的睡梦中惊醒了，他们是决不会再重新入睡的’。您也曾说过，那些使三万万受苦人具有反抗意识的人并非是过路人的影子——即使他们被打败，即使他们被处决，即使他们离开人间……”

她沉默了片刻之后，又接着说：

“如今他们都牺牲了，”

“我一直那样认为，梅。这是两码事……京的死，不仅仅是痛苦，不仅仅是变化，而是……一种变态。我对世界从未热爱过：是京把我同人类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京我才感觉到人类的存在……我不想去莫斯科了。我去那儿教书境况会糟得很。马克思主义在我身上已不复存在了。在京看来，这是一种意志，是不是？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命运，而我以前之所以与他意见一致，那是因为我对死亡的焦虑跟对命运

的焦虑是一致的。现在我差不多已经不再焦虑了。梅，京牺牲以后，我觉得死不死是无所谓了。我已从死亡、同时也从生存中解脱（解脱！……）出来了。我还去那儿干什么呢？”

“也许还会变化的。”

“我没有别的儿子可丧失的了。”

他对那些半男子气的女人不怎么感兴趣。她之所以来找他，仅仅是由于他为了爱京而给予她的爱，是由于京对她的爱，尽管这种被蹂躏的精神上的爱——在他能猜测出这种爱的情况下——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曾爱过一个日本女人，因为他喜欢温情，因为在他看来爱情不是冲突，而对一张钟情面孔的信赖的凝视，是最幽雅的音乐的化身——一种令人心碎的甜蜜。他把烟具盘拉到自己的面前，备好了一支烟枪。她没有言语，用手向他指了指邻近的一座山丘：那儿有一百来个苦力，肩膀被拴在一起，正在用奴隶们上千年的惯用动作拉着某种极其沉重但却看不清楚的东西。

“是的，”他说，“是的。”

“可是，”过了片刻他又说，“请注意：这些人正准备去为日本国捐躯。”

“还要多长时间？”

“比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还要长。”

吉索尔对着烟枪吸了一口，重新睁开眼睛说：

“人们可以长时间地欺骗生活，但生活终归会把我们变成命中注定的那种样子。每个年老的人都是见证人，对，所以有这么多人晚年是空虚的，那正是因为许多人本来就

是空虚的，只不过把这种空虚掩饰起来了。这也倒无关紧要。必须让所有的人都能晓得，真实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些冥想的世界——这种冥想可用鸦片，也可不用——在那些地方，一切都是空幻的……”

“人们在那儿冥想什么呢？”

“也许就是那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不会是什么别的……这也就算不错了。”

京曾对梅说过：“鸦片在我父亲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但有时我也纳闷儿，鸦片到底能否决定他的生活，能否解释使他本人不得安宁的某些力量……”

“倘若陈置身于革命之外，”吉索尔继续说，“您想，他肯定会忘记他干的那类凶杀活动的。忘记……”

“别人并没有忘记，他死后，还发生过两起恐怖谋杀案。我没能与他结识，因为他容不得女人；不过我认为，他若是置身于革命之外的话，他甚至连一年也活不了。没有什么尊严不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

他勉强地听她讲着。

“忘记……”他又说。“京死之后，我发现了音乐。只有音乐能描述死亡。如今，每当嘉麻演奏的时候，我就洗耳恭听。然而，我并没做什么努力（这话他既是说给自己听的，也是说给梅听的），还能想起什么呢？我的意愿和我的焦虑，我的命运的分量，我的生命，是不是……”

（“可是，就在您从您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她想，“另外一些卡托夫却烧死在炉膛里，另外一些京……”）



吉索尔的目光仿佛伴随着他那漫不经心的动作已消失在屋子外面；在大路那边，港口里劳动的嘈杂声好象正同波涛一起向绚丽多彩的大海飞去。这嘈杂的声音通过人类的全部努力，通过所有的船只，所有的升降机，所有的汽车，所有忙忙碌碌的人，与日本国春天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致遥相呼应。梅想起了裴的那封信：她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正是隐没于劳动热潮当中——象席卷整个俄罗斯土地的疯狂的战争一样的劳动热潮当中；正是隐没于千百万人的意志当中——他们把这种劳动当作自己的生命。透过松树的空隙显露出的天空，如同太阳一般闪闪发光；微微吹弯枝头的和风掠过他们伸展开来的躯体。在吉索尔看来，这风象江河一样，象光阴一样正从他身上流过。他头一次想到，将他推向死亡的光阴在他身上流过，并没有使他与世隔绝，反而在一片宁静和谐的气氛中将他与这个世界联结在一起了。他凝望着城边上参差交错的吊车，海面上的客轮和小船，大路上的人影。

“人人都在受苦，”他冥想着，“每个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有思想。其实，精神只有在永恒中才想到人，而对生活的意识只能是焦虑。不应当用精神去考虑生活，而应当用鸦片。假如思想消失的话，会有多少零星的痛苦也在这光亮之中随之消失啊……”他从一切之中、甚至从作为一个人之中解脱了出来，于是，怀着感激之情抚摸着他的烟枪杆儿，凝视着所有那些在耀眼的阳光下正走向死亡的熙熙攘攘的陌生人，他们每个人都在灵魂的最深处疼爱他们的造成死亡的寄生虫。“每个人都是疯子，”他还想，“一个人的命运如果说不是致力于把这个疯子同天地万物连接起来的生命还会是

什么呢……”他再次看到被矮灯映照在雾气腾腾的夜幕上的费拉尔正在倾听着：“每个人做梦都想成神……”

五十个汽笛同时响彻天空，今天是节日前夕，人们不劳动了。在整个港口未见动静之前，有些远看非常小的人影如同侦察兵一般，首先奔上了通往城里的笔直的大路，不大一会儿，在一片喧嚣的喇叭声中，远处的大路便被黑压压的人群覆盖了；老板和工人们一起离开了工作岗位。远远地看去，这惶惶不安的浩浩荡荡的人群象打冲锋似地向这边扑来。吉索尔曾见过动物在夜晚降临之时奔向水源的情景：一只，几只，整群整群的，被一种随同黑暗的到来而突然产生的力量所驱使，向水源飞奔而去。在他的记忆中，是鸦片赋予这种宇宙间蜂拥而至的现象一种原始的和谐感，而那些消失在远处木底鞋声中的人们，在他看来全都是些与天地隔绝的疯子，而在天空闪动着光亮的某个地方跳动着的天地的心脏，则一会儿带着他们，一会儿又把他们抛进孤独之中，就象那没有收获的谷粒一样。高高的薄云从深暗的松树上方飘过，渐渐地消失在天宇之中。他似乎觉得这儿因薄云当中有一团，确切地说就是那一团，象征着他曾认识并且喜爱、如今已经死去的那些人。人类是稠密的、沉重的，因为有血有肉、有痛苦才沉重，这痛苦如同正在死亡的一切，永远纠缠着人类。可是，即使是血，即使是肉，即使是痛苦，即使是死亡，也都消失在天空的光亮之中，象乐曲声消失在寂静的夜空中一样。他想起了嘉麻演奏的乐曲，在他看来，人类的痛苦如同世间的歌声一样时起时落；已完全控制他的痛苦象心脏一样隐藏在他身上，在微微颤抖的宁静中，慢慢地合

拢上它那非人的双臂。

“您抽得很多吗？”她又问道。

她已经问过他一次了，但他没有听见。吉索尔的目光又转回到房间里来了：

“您以为我猜不透您在想些什么，您以为我对此不比您知道得更清楚吗？您甚至还以为我不会轻易地问您，您有什么权来品评我吗？”

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的身上：

“您一点也不想要孩子吗？”

她没有回答：这一直是她极其殷切的愿望，可现在她却觉得这是对爱情的不忠。她惊恐地凝视着眼前这副安详的面孔，它确实是从死亡的深渊重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的，同公墓里的一具僵尸一样的陌生。在对消耗殆尽的中国的血腥镇压中，在民众的苦恼或希望中，京的行动同原始帝国的碑文一般铭刻在江河峡谷之中。即使这些人以一种雪崩似的轰鸣把旧中国永远抛进黑暗之中，它也仍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就象京的生命的含义没有从他父亲的脸上消失一样。他又接着说：

“我所唯一喜爱的东西已被夺走了，不是吗，而您却想让我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您以为我的爱比不上您的，而您的生活难道就没起什么变化？”

“就象一个活人死了他的躯体没有变化一样……”

他抓住了她的手：

“婴儿落地需怀胎九个月，可人有旦夕祸福——您对此是了解的。梅，您听着：造就一个人不是需要九个月，而是

需要六十年，六十年的牺牲，意志，……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东西！而一旦这个人造就成了，一旦他身上不再有一点稚气，也不再有任何不成熟的东西，一旦他真的成为一个男子汉时，他也就不再有别的用处，而只有等死的份儿了。”

她撇着他，吓呆了；而他却再次仰望着天空的云彩：

“很少有象我疼爱京那样疼爱自己孩子的男人，这您知道……”

他一直抓着她的手。他把这只手拉过来，握在自己的两只手里：

“听我说，应该爱活人，而不是死人。”

“我不是为了爱才到那儿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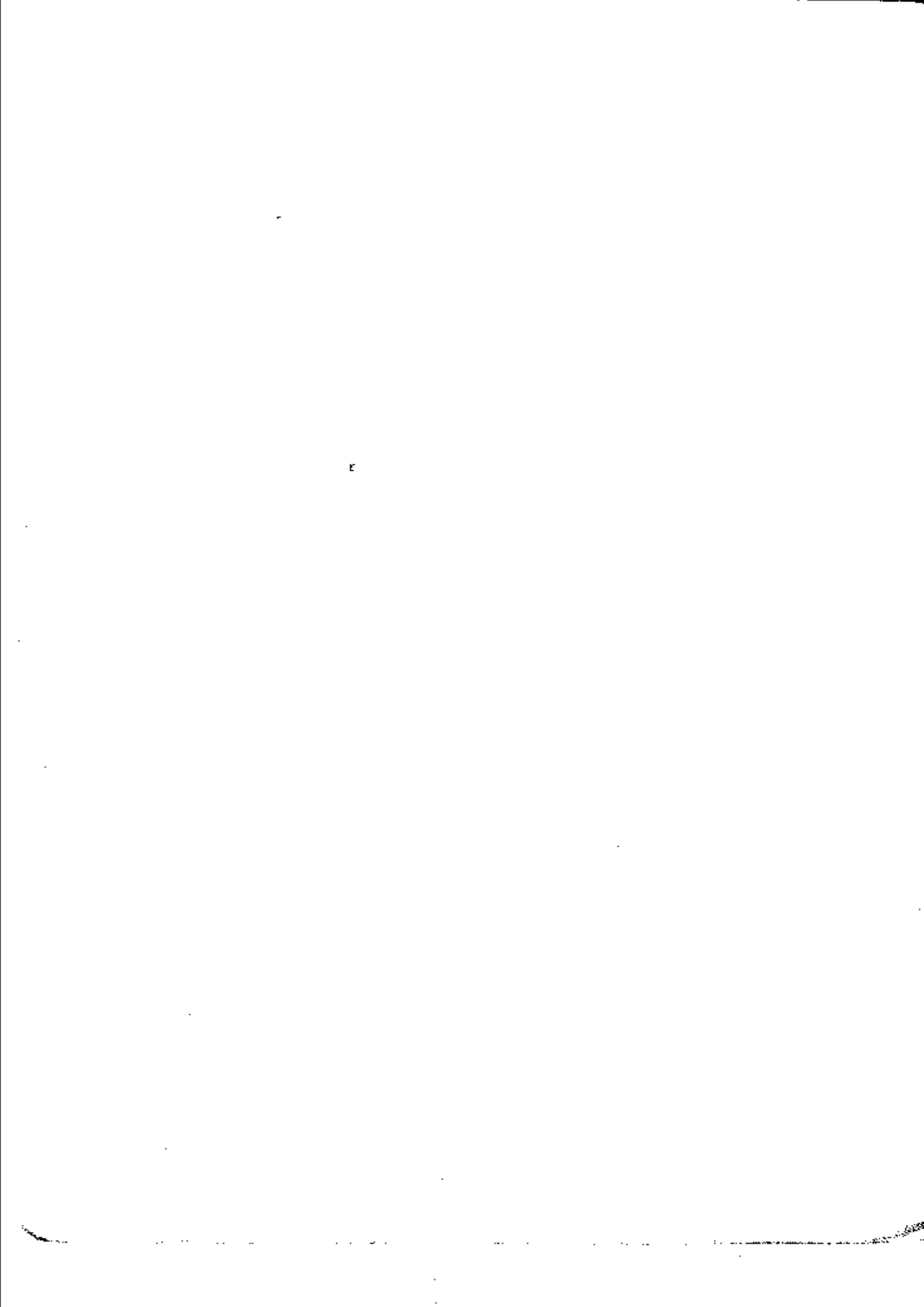
他凝视着充满阳光的奇妙的门洞。她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在复仇的道路上，我的小梅，是会遇到新的生命的。”

“这不是呼唤它的理由。”

她站起来，伸过手去同他告别。但他却用双手捧起她的面颊亲吻起来。京在离别的前一天也是这样亲吻她的，一点不错，就是这样，可从那以后，就没有别的手捧过她的头了。

“我现在几乎不哭了。”她怀着一种辛酸的自豪感说。



## 译 后 记

拿破仑有句名言：“当中国醒来的时候，全世界将随之震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一九六五年八月，觉醒了的中国接待了一位来自拿破仑国度的客人——世人称为戴高乐“一人智囊”的安德烈·马尔罗。他是作为戴高乐将军的特使访问中国的。马尔罗协助戴高乐将军打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率先向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最早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陈毅副总理等，都先后会见了。他在陈毅副总理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你们是一个传奇，你们所进行的长征，把我们连接起来。这个战斗也是全人类的战斗。马尔罗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谈到毛主席的时候说：“自列宁以后，没有谁能象他如此震撼历史的进程。”

马尔罗是举世公认的“具有慑服力”的人物，是跻身于那些为数不多的能搬演人类历史场面行列里的人物，是给他的时代带来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充满骚乱，狂飙四起，他以小说般传奇的行动，以他雄浑的文学，参与创造历史。安德烈·莫洛亚说：“马尔罗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

作。”不论他出现在哪个领域，他都以一种不同凡俗的精神，做出一般人所做不出的事业，达到一般人所达不到的高度。

马尔罗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三日生于巴黎的一个破落的船主家庭。十四岁读中学时就立下在文学领域要有所作为的大志。中学毕业后他放弃升入高校的机会，急不可待地用笔和行动参与他那个时代决定历史的重大事件，开始了文学生活。二十岁与比他年长四岁的克拉拉结婚。二十三岁与妻友一起登船南渡到印度支那，因被指控盗运柬埔寨一座寺窟的古雕塑而被判刑，由于克拉拉四处奔走和巴黎二十位作家的声援，才幸免关进铁窗。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倒使他增强了与强权抗争和反叛的精神，激起了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狂热追慕。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初他生活在远东，曾创办过一份矛头指向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尖锐、辛辣的报纸。一九三三年之后，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六月去苏联参加第一届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八月组建由外国人参加的“安德烈·马尔罗”飞行中队，他站在西班牙共和派的一边，参加空战。在解放法兰西领土的战斗中，指挥过“阿尔萨斯——洛林”大队。他负过伤，坐过牢，越过狱。他既是战火纷飞中战功卓著的英雄，又是一名手握如椽大笔的气吞云雾的作家。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征服者》（一九二八），《王家大道》（一九三〇），《人的命运》（一九三三），《希望》（一九三七）。大战硝烟未散，马尔罗与戴高乐相逢，从此，一直追随戴高乐将军，在两届内阁中先后任过新闻部长、匡务部长、文化部长，在发掘、保护和宣传辉煌灿烂的法兰西文化方面，作出了卓

绝的贡献，使这个文化强国更富有魅力。

马尔罗作为作家，堪称为独具一格的大师。但他早期作品主人公的冒险行动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目的，只是针对生命之荒谬，针对生命之等待死亡。他们的英雄行为只是为了摆脱懦弱、痛苦和死亡。马尔罗笔下的人物从冒险过渡到革命，作者赋予他主人公的战斗和死亡以某种意义。他认为当时中国“流血的大动荡”，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它清楚地表现了人的命运。

小说《人的命运》被公认为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当年就获得了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金，奠定了他文学大师的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法国近代小说杰作之一，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成千上万本关于亚洲题材的西方文学作品中，该书被列为十部最佳小说之一。法国著名作家埃·罗布莱斯（《蒙塞拉》的作者）在谈到《人的命运》的时候说，读过这本书以后，思想里象是燃烧着一团火，急于赶到那里，亲眼看看在那里发生的一切。

小说以一九二七年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为背景，塑造了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卡托夫，毫不妥协的恐怖主义者陈，政治负责人、为穷苦人的尊严而战斗到最后一息的京，京的妻子梅，京的父亲吉索尔等一系列正面人物，他们都以不同方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人的生命——被愚弄的、没什么价值的、注定要死亡的生命，究竟能具有什么意义？答案是：为实现受屈辱的共同体愿望而顽强奋斗，而献身，大家同舟共济，共担风险，在痛苦和死亡中发扬博爱精



神。小说的核心是关于人和人的命运的思考。在作家看来，所谓命运，不是死亡，而是一种意识，是人对其生存舞台一切意识的总和。作为人，他生活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力量之间：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是被奴役的；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作为人的力量和荣誉，意识到人具有一种建立尊严的不可驯服的秉性。《人的命运》把人的这种意识推到了最高点，生动具体地描绘了这两方面极端抗争的炽热状态。

小说共有七部分，是从恐怖主义者陈杀死一个军火走私商开始的。陈杀死他是为了搞到一张到“山东”号轮船上取武器的单据。但是单据到手后才发现，武器并没有付款，于是卡托夫组织人去截获。奇袭成功后，由起义领导者京到各起义点分发。陈率领他的战斗小组，经过出生入死的战斗，占领一个哨所，其他各路起义军也纷纷告捷。正当胜利在望的时候，“法国——亚洲康采恩”董事长、法国驻上海商会会长费拉尔利用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镇压起义军。第三国际的代表沃洛金拒绝同蒋进行公开的斗争，命令交出武器。陈抱着炸弹扑向蒋的汽车，以期在爆炸的轰鸣和火光中与蒋同归于尽。但暗杀未成，陈被炸身亡。京和其他革命者被捕入狱，狱中有二百多名负伤的共产党员将要被枪杀，或被活活投进火车头的炉膛里。京等服毒自杀。英雄们表面上是失败了，但在精神上却取得了胜利。梅，海默里希等继承京的未竟之业。

这部作品有没有肤浅甚至失真的地方？这些人物是否完全真实？活动在中国舞台上的怎么都是外国人、混血儿？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马尔罗不同于

战前的一些作家，他冲破狭小的个人圈子，反对以个体人物为中心，反对一味醉心于心理分析和感情描写，反对只写个性解放、爱情纠葛，风花雪月，儿女情长，马尔罗要用聪明才智和意志力量写出“雄浑的作品”，反映这个世纪将载入史册的革命事件，描绘具有深刻社会内容和历史意义的图景，塑造为维护人自身的尊严而顽强斗争甚至自我牺牲的英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我看来，现代小说是表现人类悲剧最有效的方式，而不是解释某个人。”

这部作品的第二层意义是，在西方文学中，尤其在西方文学大师中，马尔罗献出了真正的左倾作品。他同情并支持中国革命，极力讴歌象京、卡托夫这类英雄人物，讽刺、鞭挞蒋介石以及帝国主义分子费拉尔等反面人物，旗帜可谓鲜明，态度相当明朗。

这部小说使我们中国读者格外感到亲切，因为它为我们再现了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反映了上海工人如火如荼的武装起义，具体地描写了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如何互相勾结、残酷地镇压革命，以及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人的命运》在艺术上有许多独到之处。马尔罗从少年时代就受古典艺术杰作和现代派思潮的熏陶，结识毕加索这位艺术大师并深受其影响，这就使他具备了熔古今艺术为一炉的大师风度。

马尔罗说：“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抑制自己的天分，而是为了重建人类，并轻声呼唤人类想起自身的伟大。”他的小说是用言语和行动表现思想，重在表现，而不是解释某个

人，意志的力量压倒梦想，压倒本能的人的所有弱点，因此，主人公的描写可能是不完整的，作者不说他们的伟大之处。观点可能是片面的，双方对垒中的对手可能一句话也不讲，作品中所有这些“缺少的东西”，正表明作者只关注唯一的战争——智慧对命运之战，个人的欲望被人类所确定的欲望所统治。

《人的命运》所刻画的各类人物是很有深度的，他们的每一举手投足，每一句话，乃至整个形象，都为读者提供了宽广的思维空间和回味余地，充分显示了艺术巨匠高超的大手笔。

读完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给人留下许多难忘的印象。如交替安排行动的场面和思维的场面，既利用电影技术的动作性，又利用法国传统小说的那种拉开人的心灵帷幕的心理描写和大量的内心独白；如在总体结构上的时间高度浓缩，二十几万言的小说，主要情节仅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九日和四月十一、十二日五天之中，用简单的新闻体，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展现，给人一种紧迫感；如在场景描写和人物刻画中，对明与暗、闹与静以及各种气味的等，作者十分敏感地进行了错落有致的调度与安排，把读者置于具体的硝烟弥漫的气氛之中，同时也把读者置于对于人类命运的富于哲理的思考之中；如读这本小说时感到一种带节奏感的和谐美；在对话和叙述中有许多短句、独词句、断句，而在推理和静思或史诗般的章节中，又有内容相当丰富的表现力十分丰富的长句子出现，这种文风的明显差异，又是那么和谐地溶为一体……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先后得到孙绳武、傅惟慈、王中忱等同志的指导。法国的依斯娜、莫尼克女士也予以我们不少启示。在此，一并表示我们的谢忱。

李 忆 民

1987年9月7日 北京